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社 / 会 / 学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孤

独

的

人

群

原著：【日】大渊·理雄 著

译者：张一兵 朱虹

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强
装帧设计 赵 庆
责任校对 汪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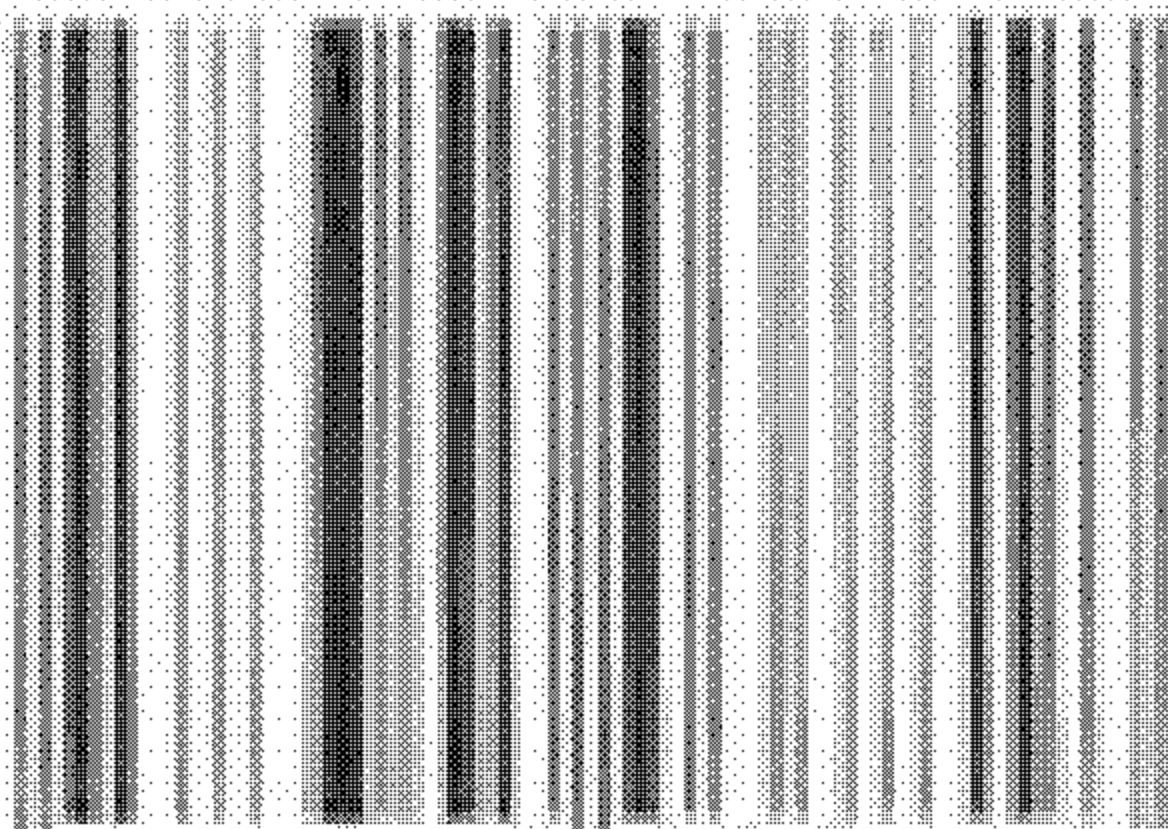
《孤独的人群》一书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同事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经典学术著作。

本书主旨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理斯曼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

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向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美国人的心理动态和人际关系特点，对研究美国人的性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ISBN 7-305-03781-8



9 787305 037818 >

ISBN 7-305-03781-8/C·111

定价：19.00元

当代学术译丛

/ 社 / 会 / 学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亮 任天石

孤独的人群

原著 = 【美】大卫·理斯曼 等

译者 = 王崑 朱虹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人群 (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3781-8

I. 孤... II. ①大... ②王... ③朱... III. 中等资产阶级-研究-美国 IV. D7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090号

© 1961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renewed 1989 by David Riesm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arranged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10-2001-013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孤独的人群
原 著 者 [美]大卫·理斯曼等
译 者 王崑 朱虹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函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77 千
开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3000
ISBN 7-305-03781-8 C·111
定 价 19.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序 言

1947年秋,在国家政策研究会(Committee on National Policy)的赞助之下,我有机会去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授社会科学课程。在此期间我是文化与人格开发这一交叉学科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该学科除了包含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外,还涉及其他许多相关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我的同事们和我一直期望开设这样一门跨系别的社会科学综合课程,这其中包括与我共事多年的老友戴尼。戴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文艺批评和人文科学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在耶鲁大学的最初几个月,我吸纳了格拉泽为研究小组的新成员。格拉泽的代表作《评论》(Commentary)一书中关于“人的研究”的章节,表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的敏锐的批判力。我的同事和我为撰写《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和《大众的面孔》(Faces in the Crowd)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直至今日,回想起著述《孤独的人群》一书的早期准备工作,我尚不禁为自1948年以来,美国知识界和学院生活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惊。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和世界格局的宏观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科学自身的必然发展。

二战前,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诽谤罪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法学教授。我试图了解某些西方国家中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身

攻击和政治谩骂的不同含义。^[1]同时我为自己在研究公众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在我看来,公众舆论不但是解答诽谤问题的手段,更是了解广泛意见的渠道。事实上,自30年代选票统计采用系统方法以后,学生的社会作用更趋于没有发言权和没有权力。为了更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一现象,我引用了在应用社会研究局和国家舆论研究中心东方办的几位朋友的研究成果。格拉泽先生和我收集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政治观察的交往过程的,我们想了解“我不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2]

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普及和繁荣。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发展极为迅速,如同公众舆论一样吸引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劳伊德·沃纳在探索当代各类社团方面开创了新纪元。二战以前,大多数人类学家在学院没什么地位。他们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于那些没有文字、没有海军、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没有“文化”的原始群落,因而并不过硬。此外,人类学家们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孤身探险,观察原始群落的艺术、经济、神话、子女教养、法律制度和血缘关系,再加以整理和概括。人类学初创时期,人类学家只能孤身探险,原始群落的条件也不尽人意,有可能已受到文明的影响,不能保证原始如初。不仅如此,早期的人类学家也不免有些武断和主观,就像早期精神分析学家那样,在论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得出结论。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是一种运用观察和记录能力的艺术活动,要求具备丰富的想像力和自信心。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和乔夫里·乔雷尔等人类学家就具备这些能力,这些勇敢的探索者在二战的影响下,试图从总体上解释和把握美国人、日本人和苏联人的民族性格。

他们的研究成果刚一发表,立刻招致许多人接二连三地

批评,包括他们的方法、概念以及解释上的缺陷。同样,《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也遭到了类似的,甚至是更加无情的批评。^[3] 尽管存在着上述批评,但民族性格、文化与人格领域的研究仍在进行,当然,研究更加注重精确化。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似乎有意避开较为棘手的、似是而非的问题。目前,人类学家不再被称作专门探索其他鲜为人知特性的“神秘的精英人物”了,过去的神秘事物如今已成为常识。当代的人类学家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承担更繁重的观察和分析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当年是单个探险家所无法胜任的。

与此同时,某些精神分析学家也开始了跨文化的研究。或许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涉入,最有力地刺激了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研究人格和文化问题(或者如克拉克霍恩和默里所说的文化中的人格)。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再经过阿伯拉海姆的完善化,把口唇型性格和肛门型性格运用于整个文化分析中,把生物学的普遍性看作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相比之下,我们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论述的则主要是历史问题,较之性心理的范围更宽泛,而比人类命运的问题狭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本人处于新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尤其深入研究过弗洛姆的思想,他在其两部著作《逃避自由》和《为自己的人》中,尝试把社会学倾向的精神分析性格运用于历史变化中。精神分析学家像人类学家一样,十分关注从前被人忽略或没给以恰当解释的重要事实,如梦、儿童游戏、无意记忆、断奶的方式、广告的象征内容、流行的故事和电影等。当然,历史学家也把这些当作研究的素材。精神分析学家在探讨文化时,将儿童性格结构的特殊类型与成年人社会的生产方式、爱、战争及民间传说联系起来。在整个精神分析的工作中,他们关心现象的前后联系和事实,探索人类性驱动力和攻击驱动力的疏通过程,由此启发了某

些历史学家。^[4]如在精神分析的启发下,理查德·霍夫斯特根据形态和风格思考历史问题,既描述历史事件又刻画历史模式(当代历史学家在“浪漫主义”时期,也曾如此作过)。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在各种个人动机和宏观社会形式之间建立了更为广泛、明确的联系,因此,精神分析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很大。

弗洛伊德对待资料的态度是傲慢的,他的一些正统的弟子尽管并不具备弗洛伊德那样的天赋,也效仿这一顽习。其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则顺应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对于仅仅从个案中得出的结论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不急于将结论普遍化。他们认识到,若要了解社会,仅仅掌握个人生活史还不够,还需要了解社会历史。^[5]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假定自己已经了解了特殊文化的基础或基本要素,并假定人的命运在儿童时期的性心理体验中已被确定。而我认为,这种假设不仅过于轻率,而且根据不足。《孤独的人群》强调青少年时期的同侪群体和学校对于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即便这有可能低估了成年人的经验在改变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孤独的人群》总体上更重视从传统导向到内在导向,再向他人导向的特定历史发展,但我们并没有忽略心理顺承性。本书第三编我们着重讨论了心理顺承模式,如自主性、顺承性和精神颓废,而历史或文化的顺承模式退居次席。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任何社会发现不同类型的心理顺承。^[6]然而,正如我们在后文中指出的那样,许多读者因此而忽视历史的和普遍的因素,把自主性和内在导向相提并论,事实上,顺承性存在于各个社会,并非是他人导向性格独有的特点。无疑,我们所重点讨论的顺承性,如顺承、调整、偏离、颓废等,是高度分化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的集中反映。一般说来,精神分析的性格类型学(以卡汀纳为代表)是从个人出发,从而接近社会的。《孤独的人群》选择了另一条

途径：以工业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为起点。我本人更关心社会上层阶层，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固定薪酬的“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们假定，当旧的以生产和工作为特征的社会功能丧失生命力后，以消费和人际关系为特征的新社会结构出现，则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性格类型，但我们并不认为个人是其社会角色的复制品。我们假设，在追求个人成就和社会体制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在冲突中个人不仅不觉得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反而认为是体制的异化物。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解决个人内部的心理机制问题。如果性格分类只是为了便于理解社会的总体变化，那么个人内部的作用就是多余的了。心理学家很容易出于理解社会变化的目的而把个人加以分类，譬如人们常说某人是口唇型或接受型性格，或者是施虐-受虐狂，并认为与之相关的一切属性就是个人真正具有的性格特点。事实上，我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把特殊的个人分为纯粹他人导向型或内在导向型，当我们进行划分的时候，目的是想澄清他的社会或职业的角色，而不是论述这以外的什么东西，我们在划分某人性格类型的时候并不是作为他的一个朋友论述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虽然我们奉劝读者在阅读《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时，尽量避免上述误解。但许多读者包括某些社会学家不仅认为把人分为纯粹的他人导向或内在导向切实可行，而且还激进地得出结论：《孤独的人群》中关于社会性格的尝试性的假设可以加以明确的定义并能够得到证明。^[7]

这样一来，最复杂、最模糊的美国人性格问题，在这些人眼里，变成了明确而简单的问题。可以想像，如果读者和大众都以这种态度对待本书中的问题，他们就会认为社会科学不过是雕虫小技，只从事细小而繁琐的研究，社会科学精确的方

法折射了社会学家的迂腐。当怀着不是去阅读一部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社会科学著作的态度去重新读一遍《孤独的人群》之后,我发现,书中有许多地方我还是急于概括了。现在我宁愿等待更多的事实来证明它们(我只接受最主要的批评并弥补主要的不足,至于那些小的毛病只有在这本书重新改写时才能做全面的修改)。在此,我要强调,没有许多前人的研究及我们对他们的资料 and 解释的引用,《孤独的人群》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希望,作为回报,该书能够为这方面问题研究提供参考和有所启发。总而言之,《孤独的人群》的作者在社会科学方法上是多元论者,既赞赏笼统的、甚至有些古老的著作,也引用新的、更精确的研究,我们对于观察技术和采访的兴趣就反映了我们的后一种倾向。

我们已经指出,读者中有人把内在导向等同于自主性。因此,只有一小部分读者热情地赞赏他人导向的价值,欢迎他人导向的开朗、缺少克制以及对他人的兴趣和灵活性。很有可能,《孤独的人群》对于他人导向的价值强调不够。无论如何,在过去10年中,绝大多数读者已经深信:内在导向的人比推销自己的他人导向者更可取,因为内在导向者在商品化上并未面临什么问题,倒是那些四处推销自己的他人导向者遇到的问题更多一些。^[8]

一般说来,从自由贸易转向社会党人立场的人都会反对顺承性,例如,当格兰海姆征询学生们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以色列人农场迁到他们的居住区时,那些典型的他人导向型的学生不但不反对,恰恰相反,更愿意倾听以色列人农场迁移的理由。

性格结构及其行为表现之间的差异至多是一个暗中的差异,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是一对抽象的概念。正如本书及其姊妹篇《大众的面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个人生活当作一

个整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时候,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属于他人导向或内在导向。所以,虽然根据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程度对人加以比较是一项有趣的工作,但这一工作很难取得确切的结论。那些主张用这种性格特性测量所有公民的人往往把问题简单化。殊不知,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应当走在测量和比较的前面。

本书第一章引用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全书散见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法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的语录说明,我们十分关心他人导向型是否是全新的性格类型。李普赛特教授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3]中有力地指出:根据欧洲访美学者的报告(包括托克维尔),可以认定美国历来是他人导向的,这是没建立过等级制和具有强烈的人人平等及机会均等观念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心理结果。当我们写作《孤独的人群》一书时,我们遇到了许多历史资料方面的困难,如我们对于1830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宗教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何实际意义就不很清楚。我们通过神学争论和信仰复兴运动收集到教徒活动及教会成员的某些资料,但我们对于当时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上层及下层阶级以及新、旧教派的宗教感情等,尚不能把握。我们只能推断,19世纪的年轻人面对20世纪中叶年轻人的所面临的问题时,大体上会怎样回答。事实上,我们在《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中只能寻找可以代表19世纪一般年轻人的典型的某些方面,由于地区和职业的关系,这些人未曾直接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也没做好进入新中产阶级和富裕社会的准备。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在变化了的环境下仍想保留传统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改造。

如果我们把美国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与不发达的南美洲、亚洲或非洲文化相比较,我们则会同意李普赛特等人的主张,

即认为今日之美国与 100 年前的祖先相比依然十分相似。即便托克维尔还活在世上,他也会承认,美国(南方除外)缺少封建传统,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广泛的家庭纽带关系。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顾及眼前利益。总体上说(南方除外)他们在地域和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升迁方面有大量的机会,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孩子、城市和国家持乐观态度。正如马提纽(马提纽:英国作家。——译者注)访美期间观察的那样,在美国,父母似乎是孩子们的囚犯而非主人,父母对孩子十分尊敬,采纳他们的好主意。我认为,我们不应把这一判断理解为 19 世纪美国人教养孩子的行为是以孩子为中心的,而应解释为美国的孩子比欧洲的孩子还要小的时候,父母就鼓励他们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较有主见。

当然,历史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在 19 世纪,甚至更早一点,发现所谓他人导向的前身。但我们不能说,只有他人导向的出现,人的顺承性才开始考虑他人的好建议。实际上,美国人总是在寻求合理意见,如果没有更优秀的人或其他人的肯定,他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他人导向(虽然这一概念本身未能完全体现出来这一含义)意味着对于自我的重新定义。他人导向的人渴望被人爱胜于渴望获得尊严,他不想愚弄、压抑和迷惑他人,而是力图与他人建立友谊。他不想被人看作是势力眼的人,想与他人交流情感。他真诚坦率,从不遮掩自己。

在现代自我意识的社会中,^[10]许多《孤独的人群》的读者一味强调他人导向性格的消极面,忽视其积极的一面。然而,我们——《孤独的人群》的作者——不想回到崇尚爱默生(爱默生:美国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译者注)式的个人主义狂热理想的时代。^[11]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爱挑剔的、不惹人喜爱的人才会对他人导向者身上的良好品质,如替别人着想、

敏感和宽容、视而不见。今天,教养良好的美国年轻一代梦想比祖先们从生活中获取更多的东西,虽然在多重选择中他们也会对是非标准产生怀疑,但安全感和富裕使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格调,而不单单是填饱肚子。教育、人口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促使人类的同情心不断地扩大,超越了种族、阶级,甚至超越了国界。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对于周围的同类给予极大的关注,无论是在自己所处的阶层还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都愿意承认同类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位。今日美国,有钱人的问题主要是他人的问题。由于他人在数量和个性化方面远远超过了从前,人的社会和心理的前景就变得无限远大。而自然、宇宙、神等形象作为陪衬退居到背景中或干脆消失不见了。人的性格有这样一个特点,性格的某些方面越是突出、明显,其他的方面则越会暗淡无光。

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概念常常用来直接表示社会状况和社会性格,其有助于我们分析相关的历史发展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不断地分解、消亡,让位于新的组合,就像美国的政党既把人们的利益分散开,同时又将其聚集在一起。同样,我们曾冠之以内在导向或他人导向的某些行为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划分了。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许多上中产阶级的子女在学校里注重享受,学习不用功,而据科利和斯普尼克等人的研究,今天,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里又变得遵守纪律、刻苦攻读了。此外,根据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的调查,低层中产阶级更喜欢使用时髦的和顺承群体的语言,上层中产阶级则对此不屑一顾。

《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使用的社会性格概念,试图囊括当代社会中较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因而不同于民族性格或众数(modal)性格,后者通常是指群体或民族中性格倾向的集

合概念。我们只对于一部分特殊人性格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并且主要关心这些方面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于人的性格、行为、价值观、特殊社会制度的特点和精神面貌（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刚刚起步）的差异并不十分重视。在写作《孤独的人群》过程中，我们深信历史、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古老的学科对理解社会的变化已变得并不特别重要。只有利用心理分析的心理学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社会的变化。即便如此，我们在本书中仍然强调社会性格，同时也强调当代世界主流社会体制，并认为社会体制不是刻板的父母注入儿童梦想的固定形态。然而，自本书出版以来，整个世界局势使我们更加确信，当代工业社会孕育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性格，我们看到，当代日本的社会体制非常富有生命力，无需二三十年就可创造出一代新人，日本人的一言一行都比其社会性格的变化更为迅速。^[12]

任何巨大的社会形态，为了保持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总要孕育出各式各样的社会性格。例如，如果美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它就会孕育受虐或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在美国北方许多具有这种倾向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在南方则恰恰相反，这种人在南方的群体中可以竞争县司法官。当然，社会体制的法律制度使这种人很难从事政治活动。一旦性格不良的人掌握了政治大权，人的自由就会遭到践踏。在此，我们重申，社会体制在较宽泛的范围内孕育了一种适合社会的个人性格。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们行为反应的可能范围内，社会体制可以选择某些反应予以强化排斥和过滤掉那些有损于社会的、更具个人冲动性的反应。社会体制一旦形成了（正如鲍丁在《纽约的革命》一书中指出的，这一体制由组织者的奋斗所创造），形形色色的人便开始顺承和关切这一体制。卡尔·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时工厂具有巨大力量，工厂榨取了

工人的劳动。而在当代,工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们自身也开始异化。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后期和社会主义后期的官僚制是一个“铁笼”,人们被囚禁于铁笼中,只能借助享乐主义消沉或颓废,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冲淡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许多社会科学家得出了与上述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在当代世界,个人和社会性格作为“生产的因素”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为了真正地解释社会,不仅需要探索人的动机,而且意识到,各种不同的人面临的社会体制是非常相似的,当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力量、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的力量都非常相似,以致于世界各国有可能形成同一风格的社会体制,即一个有赖于官僚制度和生产大量商品的社会体制;一个以提高国家威望或力量、改进生产条件为宗旨的社会体制。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在内,不愿接受这类决定论式的看法,认为人们有能力干涉或解决体制的弊端。我们并不否认,由少数有明确目的的上层人物所控制和创造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权力分散、生活单调的民主制国家的社会体制相比,存在极大的差异。

经过再三思考,我们仍坚持认为,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性格并非绝对不可沟通。

人们的可塑性很大,可以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工作和生活,但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可塑性。美国的印第安人不能成为好奴隶,非洲的黑人则可以,这不仅因为(正如爱金斯在《奴隶制》一书中指出的)奴隶身份破坏了非洲黑人的精神并摧毁了他们的文化内聚力。在历史上,美国的西班牙移民确实曾消灭西部的土著印第安人,并从国外输入顺承性更强的奴隶取代他们,这些奴隶具有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顽强生存的社会性

格。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佩布罗族印第安人比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更坚强,更具抵抗性。同样,美国的移民史也反映出不同源流的文化对类似的社会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移居美国的日本人,其第二代就开始追求接受高等教育,而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第三代仍然在开洗衣店和小旅店。纵观各国移民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到了第三代或第三代以后,他们才开始彼此往来。在历史上,除了个人的重要性及其特殊的性格以外,独立于社会体制的社会性格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孤独的人群》中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性格可以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服务于同一工作,但是,当与性格和工作性质相一致时人们产生的巨大能量相比,性格类型与工作性质的格格不入可以导致人们的消沉与颓废,其代价是高昂的。

这并不是说,那种认为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同时仍能保持其独特文化或民族传统的观点是正确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持有这一错误的观点。正如许多人深刻意识到的那样,这些领导人实现现代化所使用的方法往往会转变成为目的本身,所以可以预见,最终各种具有不同社会性格的人将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废弃历史悠久的本地宗教和本国文化。然而,传统的价值观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要反对各种新技术、反对人的富裕和力量(有时它的矛头指向垄断新事物的人),拼命维护旧制度。为达此目的,传统价值观不惜破坏新的社会制度、维护古老的社会性格。如果大同世界是人类的最最终归宿,人们可以像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发明一种“可塑人”,从而代替19世纪的经济人,同时也可避免社会科学中棘手的人的问题。

我们也许确实要迎来人类的大同世界。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果真有幸活着看到这一世界,我们将发现,可塑人仅仅代表着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性格类型和朝气蓬勃的大

同世界中更独特的个性化性格之间的历史发展阶段。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传统导向的时期(见本书第十二章),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格较为固定,群体的冲突常常反映着人类一般种族的延续和特殊种族的延续的相互矛盾。当然,这样说未免抽象。这些群体彼此相互学习,但并不想模仿对方或成为对方。后来在西方历史上(或许世界上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是如此),产生了做事效率极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内在导向型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给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使他们具有世界人口中最强悍的体魄和力量。16世纪荷兰舰队司令菲利浦退休在家写回忆录时吹嘘说,只需6000官兵即可征服中国。^[13]

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我们无意于解释内在导向的社会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因而,我们遵循马克斯·韦伯的教导,认为清教伦理观不是联系古希腊理性道德与当代西方基督教道德的中间环节。我们认为家庭在培养性格方面很重要,尽管家庭并不能完全说明许多内在导向者性格形成的内部机制和复杂的过程,但核心家庭有可能将子女培养成为与父母具有相同性格模式的人。在进一步研究内在导向性格如何产生及其为何消亡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和跨文化的研究。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推测,随着个人使命感的减弱而产生的内在导向性格之衰落,应部分地归咎于社会体制的强有力变化,对于这一变化,内在导向者是能够明察、描述和不得不附和的。社会体制发生变化的表现之一为:到了资本主义后期,自由市场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而且影响了个人的自我推销术(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使用的“市场倾向”概念对此有清楚的解释)。“他人导向”概念意味着过分重视其他人(或大众传媒代理人),而不太重视人格市场之类

的社会体制。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选择要视其他人的态度而定。^[14]

然而,还是存在一些有信念、有理想的人士,由于这部分人数量大为减少,他们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便愈加重要。在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有信念的人极为少见,正如在《大众的面孔》一书中,我选用了几个访谈资料,几乎所有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可被称作他人导向者,当然,在他人导向类型的统辖之下他们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变异性。对于近200名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采访分析表明,他们具有很强的顺承性和默认性。

我们能由此推论,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他人导向性格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年轻人的社会性格吗?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像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没落》一书中所说的具有“多变的敏感性吗”?尽管各个国家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是从一些学者对许多国家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当代各国学生流行的好尚和对问题的基本看法都极为接近。学生们之间也有许多分歧和差异,但他们彼此喜欢程度远远胜过他们喜欢父母。正如我们曾指出的,他们在可塑性、依赖环境和依赖社会体制方面都极为相似。他们的相似程度使许多观察者大为吃惊,以致认为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国化”了。

然而,我们不可夸大各国学生之间的相似性。事实上,对于相似性也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许多教养良好的美国人具有焦虑、敏感和同情心,而较贫穷、正努力摆脱落后面貌的国家里的年轻学生很难具备这些心理特点。那些仍以掌握美国技术为基本目标的国家也不可能抱有与美国同样的目的。当然,各国文化之间还存在其他区别,各地区独特的文化风格和性格可能抵消文化渗透的冲击力,譬如说,日本的工厂仍保留着某些传统的价值观,而美国或苏联的工厂则抛弃了这些价值观。

各国文化的差异都体现出一种“相对原则”(这一规律如同改变了世界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样重要),也就是说,各种文化和宗教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自明性。固定的社会性格不由固定的信仰来维持。内在导向者把固定的社会性格同可塑的行为结合起来,却不把这一性格与“相对”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内在导向者能够在较短的历史阶段内,酷似所接触到的与自己根本不同的中国人、印第安人、马来人和非洲人(当然,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国家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并能保持与环境的协调。如果身为传教士,他们就劝说愚昧无知的人学习白人文明。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许多异国人愿意接受这种教育,被传教士的力量和正直所征服,从而改变了信仰。今天,有思想的西方人已不再受偏见和无知的影响,把西方的文化和习惯奉为绝对真理;他们不再感情用事,把自己的文化看得高于一切。事实上,目前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讨论热,不过是宣传家对这一文化的相对原则的反抗。

看待文化发展的另一个方法是透过各种文化的实质,观察人类的基本矛盾。有同情心的人类学家对于因白人的介入(或者受白人影响的其他有色人种的介入)而造成的绝大多数无文字文化的解体感到十分遗憾。我也同样感到,许多文化创造了我们的文化所缺少的价值。但是,许多来自无文字文化的人也时常指出,他们的文化缺少点儿什么(不是指物质的贫乏)。他们可能走出家门,以单个人或集体组织形式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这常常使对他们不再着迷的西方人避而远之。在此,我们再次强调,世界上尚存的最重要的动力不是各种独特的习俗、文化和信仰,而是西方组织和技术的成就。其直接后果就是融化了所有独特的习俗、文化和信仰。如果事实果

真如此,我们就可以抛弃民族性格,那时,将有很多的文化特性供选择,使人避免只选择一种而不顾及其余。同时,随着人类各民族环境的日益接近,许多文化特性也将变得更为相似。从而,特殊国家的独特文化特性便会日益失其锋芒,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会跨越国界。正如我们所说,在研究工业社会的职业价值观时,管理者、医生或艺术家群体性格比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国民性格或这些国家制度中占主导的意识观念更能说明问题。

当然,在国家仍掌握着我们生死大权的时候说国家不再重要,未免为时过早。由于社会性格和民族性格是历史的遗产,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性格的差异仍像职业差异、性格差异和生活风格的差异那样重要,地方观念的遗风仍然存在。一旦某一群体或民族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或旧信仰、旧习惯复兴运动来保护其独特的历史遗产,这就标志着(正如在《大众的面孔》中曾指出的那样)旧有的习惯势力已开始自发地、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标志着这一群体或民族飞速地迈入现代世界,而传统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空洞观念。所以,现代化的冲击力势如破竹,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当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都具有自己的同一性和价值观,所以,许多非专业的读者可能试图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找出关于他们的本性是什么及应当怎样生活的暗示和指导。确实,许多读者把本书当作一种测量性格(旧式的、非专业意义上的)的工具。我们并没预期达到这种效果,无论是在本书首次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还是后来作为第一流的纸皮本(一种携带方便、价格便宜的小开本。——译者注)出版时,我们和出版商都认为本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的参考读物能售出几千册就不错了。学院里懂专业的读者倾向于把本书归入传统的“文化与人格”的范畴,而没受过专业训

练的读者会极大地信任我们所说的东西,或者认为本书主要侧重社会学的内容。我们在第一版纸皮本的序言中曾经解释了这一迄今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简缩头4~5版的内容,而且在新版中重写和重编了某些章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惟一的目的是使书的内容更清楚、更准确。我们不打算理会本书第一版所遇到的批评,所以,读者可以确信,他所看到的有关第一版的批评依然保留在新版内。我们之所以改动某些部分主要是为了使本书更易理解,而不是为了减少分歧。

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阅读本书的大学生们熟知关于本书的方法、解释和价值判断的各种意见分歧。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些意见分歧,我打算再次推荐李普赛特和劳温特尔教授编辑的批判文集。为此,我想列出我认为十几年后很可能发生错误的有关内容,当然,这些错误不包括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社会性格的重要性问题。我将按照书中这些内容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和分析。

人口问题

在我们出版《孤独的人群》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意识到,我们依据人口统计学而把历史发展阶段与人口的S曲线联系起来可能是相当不可靠的。阅读了初稿的读者提醒我们,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概念很可能是有用的,即使没有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由人口决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无碍大局。^[15]此外,我们关于人口曲线的思想刚形成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就在1949年《孤独的人群》出版不久,我们看到了斯坦福食物研究所约瑟夫·戴维斯写的一本小册

子,他批判了诺斯坦人口统计学,认为二战后婴儿出生率的增加打击了初期人口减少理论(戴维斯本人并没提出新的人口变动理论,只不过驳斥了过去人口统计学的错误猜测),而我们的结论主要依据诺斯坦人口统计学。此外,我在下列问题上也未取得一致看法:我们是否应考虑戴维斯的观点?人口发展是否面临转折点而不是暂时的涨落?中产阶级的生育观是否已转向要孩子,而不是崇尚勤俭和获取更多消费品?直到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选择多生孩子而不是选择勤俭和聚富可以看作是从炫耀个人地位的消费走向崇尚人际关系价值观的里程碑,我们(还有帕森和怀特)认为这种转变代表着托克维尔和韦伯兰(韦伯兰:美国作家、经济学家。——译者注)所谓的指向外部世界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后代——更重视内心的平衡和感情的美国人——之间的分水岭。1949年,我们感到不能把这一最后时刻得出的道理仓促地写进书中,所以,我们只好把人口发展的假设当作一个有趣的、未经证实的设想而写进书中。

此外,还有一个促使我们在忧虑和朋友阅读初稿后提出批评意见的情况下,仍把人口理论写入本书的因素。有一位研究人类学的朋友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实际的出生率、死亡率或人口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如果罗马人认为他们国家的人口像德国人口一样在稳步增加,这将影响或改变他们的性格结构。”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曾指出的,人口统计学的假设“可以被看作是各种宏观的历史倾向概念(如技术进步等)的表现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的性格并影响着人的性格”。^[16]我们认为,既存在着真实的世界也存在着被观察的世界;但是,我们用人口发展周期来描述社会的发展,也许不如用经济发展、都市化和教育的普及那样有效。

应当理解,我们的人口增长曲线并不是特殊的社会性格出现的原因,社会心理的发展总是以社会制度变化为媒介的。正如韦特弗格尔在《东方的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的:那里缺水,那里的人如果不依靠保存水的社会制度就不能生存下来(如果经常缺少食物,专制的制度就较为苛刻、残暴)。因此,较为模糊的人口增长模式或人口增长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模式共同反映着某一历史阶段的要求。目前,我们所处的技术发达社会,与荷比印第安人的社会完全不同,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贮存雨水的话,将全部渴死。人类能够毁灭自身、毁灭自己的社会,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生态学和技术发展的要求能够限定性格形成的可能范围,但绝不能创造出一个可以简单反映人类必须做什么的社会。以水为主要追求目的的社会是合作的社会,尽管不同信仰和不同社会机制的人,如荷比印第安人、中国人或古埃及人对于合作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毕竟是合作的。

政治: 否决群体和有权势的上层人物

《孤独的人群》出版后既经受了美国公共生活的批评,同时,也驳斥了许多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或盛行的某些说法。在写作本书时,美国的社会尚处于镀金时代(指1870~1989年间美国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译者注),艾森豪威尔尚未就任总统。美国还没有出现典型的自高自大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气氛。那时,谁若认为美国由少数大商人、大财阀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和同盟者所统治,并不会被斥为异端分子。在我们记忆中,许多威赖斯的追随者持有上述观点,他们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而当时(1948年)的共产

党虽然已经失去了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任,但仍然有5万党员。不仅如此,许多把美国看作是由华尔街政客所统治的激进分子加入了保守组织。这些组织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国家的政治统治是如何进行的,他们认为国家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必然性,个别人物在大众传媒和消费活动所造成的腐朽气氛中宣扬有根有据的个人观点,以维持文化的发展。作为《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两部书的作者,我们不同意美国的生活主要由少数重要人物所统治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为了澄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所造成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回溯到已经消失了的历史时代。(文化蔑视未必是错误的,因为蔑视的是贵族文化,但我们认为,这种蔑视文化的传统观点忽略了个人的创造性。)毫无疑问,我们解决问题时,急躁不仅出于我们对现代生活的好奇心,也因为我们希望认为传统的解释已经过时。

因此,我们不认为美国的弊病在于商业阶级的贪婪和权力欲,也不同意把许多美国人的浅薄和缺少信仰归结为传统的、贵族式上层阶级霸权的消失或腐朽的政客对于民主过程的损害。我们遵循弗洛姆、霍尼、拉斯威尔、米尔斯和约翰·道拉德等人的思想发展,着重讨论美国人的被动性和忧郁以及他们对令其不满意的价值观的顺承。在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同时,我们对于轻率的政治治疗不报有多大信心,虽然,这种治疗据说能够使个人感到更大的自由。此外,我们对于人们政治上绝望态度的强烈性也感到怀疑。我们的怀疑不仅反映了美国人的生活缺少道德上的明确感,而且也反映出人们普遍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矛盾倾向感到疑惑。在生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美国人,有的慷慨大方,有的卑鄙自私,还有的愚昧无知。同时,随着嫉妒、害怕出名和顺承性的增强,人们的坦率、容忍和同情等心理倾向也有了不断的增强。这些

不断增强的倾向必然会抵消我们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痛斥的政治被动性和个人软弱性。

《孤独的人群》近几年来一直在避免教条主义、幻想主义，崇尚坦率、多元论和经验论。许多受尼布尔或凯南等人影响的知识分子极力讨伐美国不现实的道德原则，并力图阻止这一原则向战争和政治领域渗透。而我们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试图指明，美国的寡头政治制度的结果会更糟。我们还认为，否决群体为自己的利益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实际上能够做到改革者们所关心的中短期目标；另一个是社会基本变革的长远目标。如果不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区分，而是一味批判现状，那么在理解社会和从事社会活动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由于抵制“简单化”的诱惑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我们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严厉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幻想主义、热情主义和道德义愤倾向。正如我在书中所表达的那样，无论在美国的南部或整个美国，还是在某一独裁国家，当政治上的幻想主义被当作保护既定的意识形态利益的工具时，我就对之极为反感。然而，把政治幻想主义与那种作为施虐狂和权威主义性格发泄工具的道德义愤混为一谈同样不对，二者只是在反对不公正、压抑或浪费时间等表层方面有相似之处。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统治结束十几年之后，对于某些美国人来说，激烈的政治感情是主要的危险，而对于另一些美国人而言，主要的危险是惧怕政治。激进分子能够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体生活日益复杂，很难辨清谁是谁非。正是出于这一政治态度，《孤独的人群》不惜以牺牲清晰性为代价而格外强调政治问题的外表差异及其复杂性。

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我们假设美国新政时期（指罗斯福总统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时期。——译者注）的政

治成就,如社会安全、充分就业、工人的组织权力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势必会更加壮大和扩展。我们承认新政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权力从华尔街政客之手转向产业经营者之手(我们认为这些产业经营者不像金融家那样开明),但我们认为华尔街政客和大商人并非铁板一块。美国在1939年之后经历了虽默默无闻却不可逆转的命运变化,战时经济在政治上对于经济萧条的合理“治疗”,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持续的经济富裕是有根据的。这一切也许令人们过分得意了,为此,布里特在《当一个政治家》一书中指出,二战后,中产阶级财富和人数的增加使那些贫穷而无组织的公民仍然远离政治的影响。关于战时经济的危险性,我们将在后文详细的讨论。

若想正确地评价《孤独的人群》,应当记住,在1948年,政治上的想像力和灵活多变性虽然很少见,但已是政治家们追求的目标了。当时,政治家们提出了控制原子能的巴茨计划和马歇尔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实施均受到了苏联的阻碍。我们知道,苏联人的阻挠反而避免了这两个计划可能造成的国内矛盾,使国内的注意焦点转向了苏联问题。此外,这两个计划也向人们提示了这样的道理:身居高位的人应当怀有更远大的目标。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无论这一计划多么愚蠢、多么自欺欺人,但它引起的冷战讨论却是明智的),国会只同意把资金投入经济目标。在朝鲜战争和麦卡锡(麦卡锡: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执政期间大肆迫害进步人士、诽谤共产党人。——译者注)任职之前,美国的对外政策虽处于大国沙文主义的重重压力之下,但一直陷于激烈的争辩之中;当时《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刊登的有关摩洛哥或巴基斯坦的文章几乎是千篇一律附和冷战的论调和美国的对外立场;在此,我们还没提到美国国内最近10年通过经济封锁而对共产主义世界进行的斗争。

然而,由于我们民族生活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个人的发展,取消少数人的贫困和实施城市规划,所以,即使回溯 1948 年不太压抑和不太恐怖的政治气氛,我们也很难评价《孤独的人群》提出的假设:即美国的政治权力由诸多否决群体分割以及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冷漠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严重。由于人们的主要兴趣是国内问题,所以人们不大关心美国人势力是否进入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欧洲人的统治地区(1948 年,印度宣告独立,共产主义在支离破碎的中国开始巩固政权)。美国势力只进入了欧洲人没占领的工业化国家。在非洲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其他的黑人国家尚未宣告独立。为了描述美国生活富裕的环境,《孤独的人群》把国内情况从国际局势中孤立了出来,我们只在序言中三言两语将之概括。正是在这种国际政治局势中,当时最敏感、最有头脑的美国人认识到了正义、现实性和政治要求的复杂性。

这些问题就是本书的焦点、格调和特点。但是,与本书第二编有关的最大难题是究竟谁掌握了美国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着清楚的权力等级?否决群体的否决行动是否由群体领导人最后决定?或者是否如米尔斯说的那样存在着掌握政治权力的贵族人物?

否决群体的概念与盖尔布兰德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权力抵消”概念极为类似。尽管盖尔布兰德的概念主要是说巨大的权力可能被周围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因素所构成的反对力量所限制或钳制(可能以权力贬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和盖尔布兰德一致同意,单个人不能构成有自我意识的独揽大权的阶层,只有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能联合在一起形成掌握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在《孤独的人群》中,我们指出,这种政治状况在整个国家的水平上更易阻止而不是发起某一政治活动(当然,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掌握政治大权的

人物),结果形成了无领袖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对于不能控制和不可了解的事情漠不关心。^[17]

我们认为,十几年来,美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其中的某些部分有所变化。1948年,战略空军司令比任何一个掌权人都享有更大的权力。有一段时间,战略空军司令部甚至可以通过管辖海军的核武器而指挥海军,使陆军的影响力变小而成为无足轻重的否决群体。战略空军司令部与国家原子能委员会联合起来,迫使原子弹制造计划的主持人、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泰勒的威慑计划和氢弹的外交政策面前持默许态度。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原子能委员会与大大小小的承包商(包括他们的工会、工人和其代表人物——参议员)通力合作,使战争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以致当国际首脑会谈破裂时,股票市场的价格便开始暴涨。这一切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有意使然,而是因为它由比其他国家部门具有更大献身精神的人来领导,并且常常在民间领导无法干涉的地方工作。尽管如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也并非事事如意。因为当时存在着外交僵持和外国挑衅的有利条件,但战略空军司令部却不能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进入持久的戒备状态。战略空军司令部对国会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也不时的感到——象绝大多数富人那样——缺少资金。同样,战略空军司令部也会遇到权力的抵消,譬如国家科学委员会就可以做到这点。事实上,对于米尔斯来说,即使象泰勒那样有激情的发明家也注定不过是国家高级官员、大企业家和大政治家的应声犬,唱不了主角。^[18]如果回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家的特殊决策,诸如不干涉印度支那、一系列裁军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政策等,^[19]我们就会看到,人民像我们一样,开始发觉几乎没有几个内聚性群体能够不断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要得到什么(虽然战略空

军司令部和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某些人明确目的),它们只能认识到无法摆脱的内部冲突。这不仅应归咎于个人只顾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应归咎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意识观念的利益以及人们对于如何看待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因此,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既不在于我们对于权力“贵族”的视而不见,也不在于我们如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被中层官僚所玩弄的鬼把戏和幻觉所欺骗。中层权力机构曾一度是国家的主要权力机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恰当地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曾经拥有那样大的权力来威胁全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人,而面对试图控制这种威吓政策的否决群体时却显得软弱无力。由于身为将军的总统十分关心和平并且不像大多数公众那样害怕被斥之为懦夫或绥靖主义者,总统与可口可乐大王和其他不关心国家防御的高尔夫球阔佬玩友一样害怕通货膨胀,所以,正如我们的城市在城市问题专家提出解决交通拥挤、建设高速公路和航空计划之前十分脆弱无力一样(在和平时期,汽车工业的作用类似于战略空军司令部),我们的国家政府只好回避众多否决群体增加防御力量的要求。

然而,如果公众不与政府保持一致,如果政府的运转受到阻碍,那么,他们就没有安全的生活环境。早期阶段,否决群体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惜侵犯个人自由。现在,政府部门相对的无能为力常常使民众感到软弱无力。当某位大人物发布了一道有损于人类的命令或犯有一个类似的错误时,如今的抵消力量不会比传统的各种组织的平衡力量更有效地制止他。有资格参与决策的群体(常常是官僚的附庸,而不是真正的掌权人物)可以左右局势,从而取代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把不断得到充实的国家行政机构看作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然而,国家行政机构力量的不断加强有可能导致

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引起国家局势的混乱或全面及接近全面的战争。无论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自豪感,还是以联合国内各方力量的伪装形式出现,都不再是权力贵族的工具,这些上层人物本身并不倡导和支持民族主义,更不用说,他们是民族主义制造者的俘虏。1953年,当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美国错过了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这一失策并非是由高层官员本身造成的,而是有着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

当我们探索上述现象的原因(在此只能简短地提几句)时,我们才开始真正了解根据否决群体和抵消力量分析问题的局限性。否决群体除了代表着特殊的经济利益外,还必然代表着自己的商业文化模式,他们具有观察事物和行动的特殊方式。正如《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指出的,旧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虽然已经腐朽,但形成的体制依然存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们。在此,我们所强调的残存的体制不单单是反映政治敏感者或冷漠者所逃避的个人利益,还包括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正是依靠这种信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维持并得到人们的认可。除了所有制形式以外,工业社会还孕育出了某种心理机制或动机,即要求不断地扩张,成为扩张主义者。如果人们的组织不再增长或进步,人们就会感到自卑。人们只注意某些可衡量、可算计和“划得来”的价值,对于那些难以陈述的、较遥远的价值则不屑一顾。在此,推动内在导向者行动的社会体制,在内在导向者变得僵化和消沉的情况下仍发挥着作用。尽管体制的某些方面被新的社会条件所取代,但另一些方面却能够适应新的社会条件。如今,人们不再热切关注自己的异化了,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处境深感不满,但又不认为世道会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他们不能洞察怎样会导致错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错误。

所以,在这种历史关头,人们既不能以原子能的释放为骄

傲,也不能对之寄予全部的希望,这类富有想像力的希望和渴望最好留给未来的时代。对于前人用智慧和献身精神所创造的工业社会,我们也不能持盲目乐观态度,就现在而言,社会既没能激发人们的献身精神,也没能为人们提供预见。在工业社会中,所谓的领导人不过是更得志、更勤奋工作和具有更多烦恼的囚徒。他们比普通人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但常常不知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我们相信,美国人仍具备责任感和丰富的想像力。然而,我们不能再把赢得平民群体领导者的支持作为政治运动的基础了,尤其不能依靠这些人的支持实现新思想方式所引发的政治活力。随着美国富裕程度的增加,特权人物的抱怨而非穷人的痛苦呐喊更能左右政治活动。^[20]

《孤独的人群》重视“逃避的自由”而不太注重“迎合的自由”,关于这一点读者也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我们不是美国曼彻斯特市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国家已被否决群体弄得软弱无能,但我们仍然不把国家当成敌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同盟。然而,本书的焦点是正式的政治活动以外的领域:不仅包括行为赞同,而且还包括群体的压力和对于参与政治、政治情绪和赞同别人等周期性的需要。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人们对顺承性的痛苦和恐惧。这种恐惧心理常常使追求共同目的的合作行为具有浓重的勉强性,好像合作行为是出自对某些参照群体的模仿或害怕与群体的行为有所不同。无论所从事的活动是否重要,是否涉及原则性,情形都是如此。

本书不是写给那些与他人和社会观念隔绝的人们的,如小群体成员、顺承性极强的家庭妇女或穷人、老人,因而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受剥夺”并没有多少影响力(毫无疑问,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农民接触城市和大众传媒以及随着教育和娱乐活动的普及,受剥夺的现象越来越少)。我们依据“逃

避的自由”(在旧的自由含义上,这一自由来自社会的压力;在新的意义上,自由来自个人的内心)来解释强制的和无实际意义的合群性,而根据“迎合的自由”来说明人的受剥夺的不合理性。此外,我们还期望本书能够告诉读者,我们希望迎来一个有助于个人的自由感和效率感的理想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借助自主性不仅可以获取个人的成就,反对庸庸碌碌的生活,还可以增加生活的效率和个人的自我认同感。

大众传播媒介

在讨论大众传播媒介方面,《孤独的人群》主要引用了某些研究者,尤其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发现:政治宣传和政治竞争并非是简单地、昧着良心地赢得广大孤独而无助的普通群众的支持。在政治宣传过程中,各个选民团体和选举的基本单位都处于宣传中心所散布的政治消息的夹击之中。这些消息影响着选民们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和选举投票。例如,在本书中,我们着重阐述了大众传播媒介如何通过为同侪群体提出行动计划表和提供暂时消遣的麻醉物而指导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我们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主持人时常屈从群体的压力,为了提高声望他们宁可把政治消息登在头版头条,而不愿把眼光只放在有厚利可图的商业消息上。因此,美国的大众传媒并未分散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它扩大了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当然,经过传播媒介的渲染,政治已被人们对政治家人格的崇拜和大众发泄义愤的狂热所歪曲。

在《孤独的人群》中,我们尽量不提及大众传播媒介为了推销商品或观念而展开的短期政治宣传攻势(在此,否决群体和抵消力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大众传播

媒介的长远效果。譬如，大众传播媒介要宣传广告或提供娱乐和新闻。我们不禁要问，传播媒介如何通过表现生活的乐观、宽容、文雅和热情（除了体育运动和政治活动）来影响美国政治气氛的？这种“内幕消息预测者”的倾向会不会使一些人介入政治，而使另一些人远远地逃离政治呢？既然传播媒介起劲地吹嘘消费品而不太宣传那些没人出钱做广告的事情（盖尔布兰德在《富裕的社会》一书中曾指出，私人赞助的事物将与无人做广告的公共事物和公共需要进行无情地竞争），^[21]那么由此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传播媒介对人际关系的强调（人际关系的比传统文化的社会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美国人情绪生活和私人生活有何影响？

由此可见，即使今天我们也很难回答写作此书时出现的那些问题（就在本书出版后不久，电视机大量普及，但人们并未大量研究电视普及之前和之后的群体生活的质量差异，只有英国的希梅尔威特及其同事进行过研究。^[22]显然，我们不能把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广泛的文化背景分割开来。正如我们不能把传播媒介中的广告讯息与商品本身在商店、家庭、街道通常的讯息分割开来一样。我们确信，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美国人知觉方式、生活的理解（常常是误解）和如何成为一个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老人等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比夸大商品，如糖果的边际差异（指通过炫耀商品包装、外形和其他表面上的优点而增加商品的竞争性，可推广及社会现象，见本书第二章。——译者注）所产生的影响要强烈得多。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是推论的成分多于研究的成分。因此，现在和在写作《孤独的人群》时，我们都不想不加区分地攻击大众传播媒介散布的虚假消息。美国人在电视机前消磨的光阴真是多得惊人。但在电视机出现之前，漫无目标地出

去游玩、闲聊、参加体育活动、玩纸牌等不见得使人们比看电视更能接触广泛的社会现实,花费的时间也不一定比看电视少。

《孤独的人群》有可能使知识分子读者瞧不起大众传播媒介,他们不是去努力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随波逐流性,而是摆出一副赞助人的架子。然而,我们认为,本书可以帮助那些有志改造传播媒介的人采取更明智的方式。我们曾一度鼓励人们要善于识别各种传播媒介。今天,电影的观众比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减少了,部分原因在于电视的竞争,电影与电视相比毕竟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有影响力。因而,电影竞争不过电视。各家电视台的责任感也有所不同。某些私人电视台有时大胆地播放一些触及现实的戏剧和记录片,尽管他们很少为自己的节目渲染和造舆论(戴尼在其著作《令人惊讶的娱乐之神》中论述过这一问题)。此外,我们不可忽视否决群体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只要否决群体给电视节目制作人、电视广告节目出资人或国会议员发去一封愤怒的抗议信,电视节目就会受到影响;反之,电视节目也可以影响否决群体的态度。

然而,我们并不仅仅关心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的长远影响,当务之急是,如果报刊、杂志、书籍,尤其是电视新闻已不再像1948年那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那么它是否具有更强烈的国家中心的特色?传播媒介是否只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口号和似是而非的冷战辞藻喋喋不休地报道国际新闻?若果真如此,我们就要比我们写作《孤独的人群》一书时更加客观、严肃地用不断发展的思想来评价大众传播媒介,并对之寄予更小的希望。

自主性与乌托邦

在评价《孤独的人群》一书时，理查德·梅尔和班菲尔德写道：

“在他人导向的社会条件下，所谓具有自主性的人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孤独的人群》的作者论述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以我们的子女和学生为标准，新型的自主者将是一个受周围合理的果断行动和可兹利用的社会制度巨大影响的人。与机器打交道时，他是一个设计师或诊断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奴隶。他看问题或行动的逻辑包含着多元的价值观，常常配之以具体的数学公式。当原有的选择已经过时，他将主动进行新的选择。他不大注重对国家的忠诚，相反，他追求国际主义的理想。他的想像活动更加丰富灵活，他的未来计划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当前流行的科学思潮可以预示着他的计划）。他的道德观是实用的、好奇的，不幸的环境将导致他的反社会行动。因此，一旦邪恶得到了他的理解，也就不再成为令人烦恼的问题。然而，作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他还必须克服自身的反社会行动。对他来说，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善良意志的人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神圣目标”。^[23]

上述评论家的态度与其他大多数评论家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就我们所收集到的有关《孤独的人群》的讨论和评论来

看,绝大多数善于发表意见的读者都倾向于把内在导向和自主性看成一回事,他们会认为梅尔和班菲尔德把自主性理解得过于灵活、过于敏感、过于憧憬了。我们认为,许多读者将自主性与内在导向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书中未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自主性概念,并把许多内在导向者的特点说成是自主性的特点。从而使许多读者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理解自主性概念。尽管近年来进步、乐观的情绪比过去有所加强,怀旧的情绪仍然十分强烈。

正如我们在书中指出的,50年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只看到自身的双重角色:一种是追随别人的有组织的人(他人导向型);另一种是浑身裹得严严的牛仔(内在导向型)。在这一时期“合群性”和“能干者”是个贬义词。在这种狭小的个人角色选择范围内,个人的自我中心或对他人缺少关心经常冒充了自主性。个人主义蜕变为自我中心主义和变态的行为方式可谓是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

在写作《孤独的人群》时,我们隐约看见了这种倾向,在最后一章“自主性与乌托邦”中我们试图矫正前面章节中过分强调“逃避的自由”,并努力描绘人类的相互关联性。如果没有正式的社交和投入情感,人类的相互联系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我们为了配合分析而提出的理想使命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般如意。

现在,我们认为,书中有关乌托邦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即是说,在后工业文化中,自主性将出现在娱乐、闲暇而不是工作中。我们因而得出结论,古老的追求温饱的动机已趋于消失。同样,我们坚持主张,工人们工作的意义只是为了彼此交往,建立友谊或为了逃避维持家庭和和睦的虚假应酬,这也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有许多人,尤其是妇女,主要的兴趣是家庭,对她们来说,工作无需有什么意义,只要工作时间

短,轻巧,上下班方便就行。许多人的兴趣中心和摆在首要位置的是8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价这种工作与闲暇的倒置,这不仅因为人们受训于强调工作动机的时代,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后代在未来的时代也将接受这种教育。贝尔在《工作及其不满》一书中批评我们对“娱乐的预测”,看来,他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24]

在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是一个想像力的问题,也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对于许多从未从社交重要性角度考虑工作的人来说,我们提倡取消工作和闲暇的对立。我们不仅一定要避免消极被动地工作,缩小车间的规模,使车间管理与整个企业的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在我们的时代,社会财富和组织管理知识才首次用于工作方式的改革,所以,工作本身对人的要求更高了,同时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工作要求劳动者有更大的主动性,与教育和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听起来好像是行会社会主义的目的,其中大多数目的作为一种企业观念可以在南斯拉夫的工厂里发现。几家美国公司已显露出这些症候。然而,无论何时,我们都认为古德曼在《增加的荒谬》一书里的观点极为正确。他认为人类有一种“分寸感”。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贬低工作而强调闲暇使人们感到极为空虚,不知所措。闲暇本身不能决定工作的好坏,但工作的不顺却可以使闲暇失去乐趣。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义,闲暇才变得更有意义。所以,只有到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共同反对工作与闲暇割裂的历史阶段,我们寻找闲暇的意义才会最终出现。

《孤独的人群》试图减轻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沉重的工作压力。尽管工作时间缩短了,工作条件好了,农民、蓝领工人的比例下降了,但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劳动分工不再不顾医生、高级行政人员

和高级文职官员的生活节律,而要求他们每周工作70个小时了(教授和艺术家也许工作时间更长些,但他们的工作没有多少外界的压力)。然而,大多数中下层工作者仍觉得工作是十分单调、无意义的。他们希望缩短工时,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就退休回家。^[25]

某些批评文章说,《孤独的人群》对于美国的闲暇和富有过于乐观;而另一些人(如我的同事帕森)则批评我们过分强调美国人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异化。他们认为许多事实表明,美国人的生活许多方面都是十分富裕的。^[26]在《孤独的人群》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物质需要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生活期望也变得越来越高了。这就是美国式的“生活所期望的革命”。其座右铭为:“幸福无止境,看你何所求。”托克维尔也许是历史上首次发现这一现象的人,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政治制度》一文中,他指出,当人民忍受着沉重的压迫时,并不一定发生革命;相反,当人民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政治压迫变得不那么残酷时,社会革命却有可能发生。匈牙利和波兰1956年的革命和政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肯尼斯顿最近描述了在许多美国富有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的异化现象。^[27]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寻找生存的原因和生存的使命,一些人甚至去国外寻找,如去印度、非洲、古巴或以色列等国家去挖掘生命的意义。看来,人们不能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观念力量的僵化而实际的世界中,不能长期生活在否决群体、抵消力量、行为方式、常识等社会因素都已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世界。无论老一辈怎样教导年轻人“事在人为,谋事在人”,但对于改变年轻人的这种消沉和异化都无济于事。在一个僵化的社会或在暂短时期内,恐惧可以斩断希望的翅膀。

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把消灭贫穷和剥削看作追求的

目标,而“过分发达”国家的人们则更重视如何消除心理阻碍和间接的异化现象。然而,人们不知,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制定合理的政治计划,鼓励个人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和非武力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只有在种族关系方面,较敏感的年轻人才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可恶的政治义愤者掌握着大权,宽容精神尚未得以体现。许多政治家放弃理想,转而求助罗斯福当政时的对外政策,效仿当时美国和苏联的虚张声势政策。好像一旦接受打着“国家目的”的旗号至备竞赛就可重新使全民族成为内在导向的人。如果他们的设想实现了,美国将失去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和富裕作出自己贡献的机会,况且这种机会本来就是很微弱的。

我们曾经指出,整个世界将走向大同,无论民族还是地区的狭隘观念注定要消亡。也许现存的各地区的差异暂时还不能消除,但将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大同世界。阶级、宗教、民族的分界消失,并不像许多怀旧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必然意味着整个世界是在个人生活风格发展的意义上走向大同。本国与外国差异的消失会令旅游者大失所望,这说明尚未得以很好研究的人类气质、兴趣和好奇心的差异可能取代过去的地理位置或地理环境之差异。美国人目前的心理同一性(显然受埃里克森著作的影响)反映着美国人已开始摆脱性格的必然王国。我们的自主性概念说明:个人有力量通过选择榜样和经验塑造自己的性格。一旦个人具备了自主性、能够主动塑造自己的性格,他就能摆脱自己特殊的出生地和特殊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地方观念。一旦摆脱个人的地方观念,那些感到无根可循和消沉颓废的人就会振作起来,看到自己的前途。从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相互联系和合作终有一天要取代乡土气息,^[28]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致 谢

如果没有“耶鲁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会”的大力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研究会邀请我去耶鲁大学讲学,尽力满足我的各种要求。此外,我有幸得到卡纳吉公司的赞助,在此,对研究会和卡纳吉公司谨表诚挚的谢意。同时,我对拉斯威尔和罗斯道夫(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也深表感谢,他们曾是研究会的成员,并给予本书极大的关怀。

《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完成也应归功于我的两位合作者。戴尼的启发,使我开始研究少年,研究他们对音乐、电影、文学等娱乐的爱好。第四章、第七章、第九章中讨论文学的逃避作用和社会化功能等内容主要来自他的备忘录。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有关现代中产阶级对待工作和闲暇态度的内容也是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学生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我们鼓励学生研究这些问题)。1949年,戴尼先生与我一道对本书的来稿进行了修改和删节。在耶鲁大学从事研究的前半年,格拉泽先生与我共事,帮助我计划和安排了首次采访,明确了我们一致同意的有关政治和性格结构关系的思想。^[29]他的好奇心和宽宏大量促进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本书第一章有关性格结构的历史和作用、第二编性格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第八章自主性概念等内容主要出自他的草稿。此外,双目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纸皮本和缩写本,也主要是由他编辑编写的,眼前这版重新改写的序言也与他的合作分不开。

此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和格拉泽先生对美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了访谈,同时我们也求助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和同事所进行的采访。这些采访(其目

的不在于表现美国人的丰富多彩的特性,而是为了说明和证明我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写作《孤独的人群》有莫大的启发。确切地说,本书的出版有赖于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我们所进行的采访和所设计的几个群体研究方案,促使我们把这些感受和经历系统化、条理化,从而反过来指导我们的采访和对采访的分析(本书的后半部分的某些内容已收入《大众的面孔》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1952年)。在此,请原谅我们只能简单提及,我们在活蒙特州进行的群体研究是在马丁和格尔森的指导下,在翰基(现名 R. H. 瓦克斯)帮助下完成的。翰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访谈资料。在梅尔森等人的帮助下,科纳佛博士在东哈莱姆市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罗斯·考色对这些访谈进行了解释。艾奇霍恩收集并分析了有关学者对活蒙特群体进行的罗丝哈泽测验(这是心理测验的一种,通过观察被试者对各种墨汁图形的反应来了解被试的人格特征,由瑞士的精神病学家罗丝哈泽首创,故得名。——译者注)。此外,在研究美国历史和人口发展周期时,斯波汀先生给予了大力协作。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及下列诸位:戴克斯特、H. 弗洛姆、E. 休斯、N. 雷堤斯、E. T. 里斯曼、J. R. 希莱、M. 辛格、M. B. 史密斯和 M. 沃芬斯坦。

大卫·理斯曼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1960年11月

注 释:

[1] 参见:“民主与诽谤”(Democracy and Defamation),《哥伦比亚法学评论》,1942年,第62期,第727~780、1085~1123、1282~1318页;以及“政治迫害”(The Politics of Persecution),《公共舆论季刊》,1942年,第

6期,第41~56页。

[2] 参见:“舆论的含义”(The Meaning of Opinion),《个人主义的反思》,第492~507页。

[3] 希望详尽了解对于“文化和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学派批评的读者可以参考英克尔斯、平温森合著:“民族性格:众数人格和社会文化系统的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载林赛编:《社会心理学手册》。波士顿,1954年,第977~1020页。还可参见考卜兰:“人格与社会结构”(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载吉特勒主编:《社会学评论:十年来的分析》。纽约,1957年,第87~126页。关于对《孤独的人群》的批评可参见利普赛特、劳温特尔编:《文化社会学与社会性格的分析:大卫·理斯曼的著作》。本序言的某些思想就取自格拉泽和我为上述文集撰写的某些文章。

[4] F.斯滕编:《千变万化的历史》,纽约,1956年,第362页。

[5] 不久以前,在巨大的谬误和巨大的热情携起手来的阴暗日子里,我就打算详细研究个人生活史和历史的统一,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某些有精神分析倾向的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就是这种工作(霍宁曼:《文化与人格》,纽约,1954年)。然而,随着其他邻近学科和人类学的分支建立了自己的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被它们所侵吞。

[6] 在具体的启发和论述方法上,这些类型均可追溯到默顿的文章:“社会结构与精神颓废”(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57年。

[7] E.格兰海姆精心界定了社会性格的定义,设计了一套测量社会性格的投射测验,用以研究小样本的大学新生。据我所知,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个人身上对《孤独的人群》及《大众的面孔》中的社会性格要领进行经验验证。她在论文:“内在导向、他人导向和自主性”中提出了经验研究的复杂性和自然性(李普赛特等编:《文化社会学》)。这一以心理测验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内在导向者是一个严肃的人,举止端庄,能够在威特金倾斜的屋子和倾斜的椅子的实验室中坐得笔直;而他人导向的人则指向外界环境,易受倾斜的屋子和地球引力的影响。

[8] 见奥姆斯特:“性格与社会角色”(Character and Social Role),

《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53 期,1951 年,第 49~57 页。文章描述了这样一项研究:作者研究了史密斯大学学生,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比父亲、同性和异性的朋友及校园里的一般女学生更具有他人导向倾向或内在导向倾向?绝大多数人回答他比其他同学更具有内在导向倾向。

[9] 参见:“美国人性格变化了吗?”,载李普赛特和劳温特尔编:《文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同时参见该书中帕森和怀特的论题:“性格与社会的联系”(The Link between Character and Society),他们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10] 参见拉洛比:《自我意识的社会》(The Self-Conscious Society),纽约,1960 年。

[11] 参见关于个人主义概念矛盾的讨论,J. W. 霍德:“今日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Today),载《耶鲁评论》,1960 年,第 380~392 页。

[12] 比较 R. J. 里夫顿关于共产党中国社会和心理变化的研究。《思想变革和道家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纽约,1961 年版。

[13] 我立即联想到今天的美国人会争辩说,如果让菲利浦率领全副武装的美国人,也许用不了 6 000 人就可以占领中国。然而,说这话的美国人没有认识到,今天整个世界都依赖于白种人的神秘武器:性格、价值观和组织性。

[14] 帕森、怀特:“性格与社会的联系”,载李普赛特和劳温特尔编:《文化社会学》。帕森和怀特澄清了目的(指向某一方向)和动因(决定方向的因素)间的区别。

[15] 许多人种史学者和来自乡下的学生指出,有许多不同的无文字的文化都伴有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读过人种史报告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孤独的人群》中传统导向概念主要用来作为一种历史背景的隐喻,衬托出所谓的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性格斗争的历史阶段。

[16] 玛格丽特·米德:“民族性格与人类学”,载李普赛特、劳温特尔编:《文化社会学》。

[17] 只是在后来版本的改写过程中,我们才清楚地区分了“民间”活动(如关心教育、城市住宅划片及运动场等)和大范围的“政治活动”,并将有组织的、美好而吸引人的民间活动与阴沉、冲动和冲突的政

治活动对立起来。见理斯曼：“战后美国的工作与闲暇”，拉罗比、梅尔森编：《群众的闲暇》，自由出版社，1958年，第363~388页。

[18] 米尔斯心怀忧虑写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一书，我也有同样的忧虑，但是我不同意他把人类的希望说得那样渺茫。如果我们考虑到有某些勇于负责的领导人不害怕中层政治官员的议论，不顾忌中层官员发动的攻势及他们在大众中（正如韦伯兰所说）煽动起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好战热情，这些领导人就能与对方签订有效的条约，人类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19] 戴维斯：“美国政府的近期政治决策”，《基督科学箴言报》，第89卷，第951~967页。

[20] 详细讨论可参见理斯曼、麦克比：“美国的危机：政治上的堆心主义和冷战”，《新左派评论》，1961年，第5卷，第1~12页。

[21] 在广告业兴起之前，托克维尔就像后来韦伯兰那样看到了美国人在炫耀财产方面的竞争。美国人在传播媒介为自己服务之前，已经为接受传播媒介准备好了条件。

[22] 希梅尔威特：《电视与儿童》（与布鲁门德尔等其他合作），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

[23] 参见：《伦理学》，1952年2月。

[24] 《工作及其不满》（波士顿，1956年），再版时，贝尔将之易名为《意识形态的没落》，自由出版社，1960年，第222~262页。

[25] 经济压力常常使人每周工作时间短一些，以谋求第二职业。有的人甚至用整天时间干第二职业，晚上时间干第一职业，当然，他们挑灯苦干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出于工作乐趣。

[26] 参见：帕森：“美国人价值观初探”未公开发表的原稿。同时参见克拉克霍恩：“美国下一代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吗？”，《美国的风格：论价值和行动文集》，纽约，1958年。

[27] 肯尼斯顿：“理想的没落与异化”，《美国学者》，第29期，1960年春季号，第1~40页。

[28] E.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纽约，1955年，第362页。

[29] 见理斯曼和格拉泽：“政治冷漠的标准”，戴高德纳主编：《领导研究》，纽约，1950年。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许 钧 张一兵

张凤阳 周 宪 周晓虹

倪梁康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 序言

第一编 性 格

第一章 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 3

- 一、性格与社会 5
 - 高增长潜力时期：传统导向型 9
 - 传统导向的定义 11
 - 人口过渡增长期：内在导向型 13
 - 内在导向的定义 14
 - 初期人口减少时期：他人导向型 16
 - 他人导向的定义 18
 - 三种类型的比较 23
 - 雅典的例子 24
 - 某些必要的限定 27

二、性格的冲突 30

第二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一：从品德到纪律

36

一、父母角色的变化 37

● 传统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38

● 内在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39

● 他人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44

二、教师角色的演变 54

● 内在导向阶段教师的角色 55

● 他人导向阶段教师的角色 59

第三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二：同侪陪审团

65

一、内在导向阶段的同侪群体 65

二、他人导向阶段的同侪群体 70

● 审判 70

● 镇上人的议论：好尚的社会化 73

● 同侪群体的敌对合作者 80

**第四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三：
传播者即有技术的指导者**

83

一、传统导向阶段的歌谣和故事 85

● 壁炉旁的媒介 85

● 正常和异常的故事 86

二、内在导向阶段印刷媒介的社会化功能 87

● 文字的鞭策 89

● 印刷媒介中的榜样 91

● 引导过度的孩子	94
三、他人导向阶段的大众传媒	96
● 儿童的市场	96
● 胜者王侯败者寇	99
● 突突：一个现代版的警示故事	104
● 自由的范畴	107
第五章 内在导向的生活	110
一、工作中的人	112
● 经济问题：物质的匮乏	112
●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15
二、娱乐的次要性	117
● 渴望获得的消费者	117
● 渴望逃避的消费者	119
三、为自我赞同而奋斗	124
第六章 他人导向的生活(上)： 从内向刻板到惹人喜爱	127
一、经济问题：人的因素	128
● 从手工操作的技巧到操纵人的技巧	130
● 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	132
● 从储蓄到消费	136
二、银河	138
第七章 他人导向的生活(下)：闲暇生活的嬗变	142
一、饮食和性生活象征意义的变化	143

● 从盛麦片的碗到装色拉的碗	143
● 性：最后一道防线	146
二、流行文化中消费方式的变化	150
● 娱乐：顺承群体的手段	150
● 别了，逃避	157
三、两种类型的比较	160

第二编 政治

第八章

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政治风格： 冷漠者、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预测者

	165
一、冷漠者	167
● 旧式风格	167
● 新式风格	170
二、道德说教者	174
● 得势的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	175
● 失势的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	178
三、内幕消息预测者	182
● 内幕消息的输入与输出	184

第九章

政治的游说：义愤与宽容

	191
一、作为消费品的政治	193
二、传播媒介：宽容态度的培养者	195
● 宽容与迷信真诚	196
● 真诚与玩世不恭	198
三、大众传播媒介逃避政治吗	199

四、义愤的贮藏地	202
五、始于责任的梦想	206
第十章 权力的形象	209
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210
● 产业领袖与消费领袖	210
二、谁来掌权	216
● 否决群体	216
● 还有统治阶级吗	221
第十一章 美国人与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	229
 第三编 自主性 	
第十二章 顺承还是自主	243
一、顺承者、离异者与自主者	244
二、内在导向时期的自主性	253
三、他人导向时期的自主性	258
第十三章 错误的人格化：工作中的自主性障碍	264
一、工作的文化界定	264
二、有魅力的人、多余的雇员和必要的雇员	267
● 白领阶级的人格化：“追求魅力”	267

- 阶级对话：工厂里的模式 270
- 必不可少的成员 272
- 三、过度人格化的社会 272
- 自动化与欢迎 274

第十四章 强制性剥夺：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上)

- 279
- 一、社交的否定 280
- 二、社会交往与妇女受到的剥夺 283
- 三、整合社会 285

第十五章 能力问题：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下)

- 288
- 一、娱乐的地位 289
- 二、能力的形成 292
- 消费：研究的课程 292
- 技艺的表现机会 294
- 好尚方面的新批评 299
- 三、娱乐顾问 301
- 四、开放儿童市场 303

第十六章 自主性与乌托邦 305

索 引 309

译者后记 327

第一编 性 格

第一章

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

……博学的读者不会不知道，在人性这一概括性的名称笼罩之下，包罗着千变万化的内容，一个厨师可以很快熟知世上所有珍禽美味，而一个作家如果要阐述如此广博的题材，自然要比厨师付出更大的代价。

——亨利·费尔丁：《汤姆琼斯》(Tom Jones)

(费尔丁，英国小说家。 译者注)

我用单数来称呼美国人，犹如美国人不论东西南北、男女老幼、阶层、行业以及种族，为数不过数百万。当然，我所谓的美国人是具有神话色彩的，探讨这一课题，似乎无法避免用寓言的形式，也许还要报以坦诚的态度如此去做。

——乔治·桑塔亚娜：

《美国人的性格和意见》(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桑塔亚娜，美国诗人、哲学家。 译者注)

本书将探讨社会性格以及不同地域、时代和群体的人们在社会性格上的差异。不同的社会性格类型,一旦形成于社会深层,便会在工作、娱乐、政治和子女教育等各项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本书所要研究的便是社会性格的表现方式,特别要探讨19世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社会性格,何以逐渐被另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社会性格所取代。其原因何在?过程怎样?对当代美国某些主要生活领域的影响如何?这些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

当我们提及“社会性格”时,所指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社会性格既不是指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用来表示整个自我的人格,也不是指天生的气质、才能、生理的和心理的成分,以及暂时性或永久性的特质。本文所谓的“性格”,与当代的一般用法也有出入,后者仅仅指的是人格的一部分,由经验而非遗传作用形成的(划分经验和遗传的界限绝非易事)。而我所谓的性格,是指在社会和历史因素或多或少的作用下,形成的个人驱动力和满足需要的结构,即个人用来接触世界和他人的一种“套路”。

“社会性格”是特定社会群体间共享的那部分性格,正如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界定的那样,它是群体经验的产物。我在本书中将努力阐明,社会性格的概念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阶层、群体、种族、和民族的性格。

我无意于在许多关于社会性格概念的模棱两可的研究上耽擱时间,即社会性格是否可能归因于经验而非遗传?是否有任何经验主义的理由证实它确实存在?是否应该认为存在某些比性格、人格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抑或说性格和人格中的非社会性因素把人们分离为单独个体,而非使其相互接近?过去人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假设某一社会性格确实存在,如今社会性格正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明确

前提。对任何熟知弗洛姆、卡丁纳、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戈若、霍尼等人著作的读者而言,若再熟知其他有关社会性格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性格的论著,即便社会性格一词以不同称谓出现,也会一目了然。

大多数研究者和我一样,相信儿童时期对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大多也同意,研究儿童早期阶段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仅可以影响父母亲对子女的教养方式,而且还直接影响子女本身。基于这个认识,我的合作者和我在本书中,无意于分辨上述研究者之间的观点差异,以及指明我们的观点与其又有何不同。

一、性格与社会

社会性格和社会的关系如何?一个社会如何获得它所需要的社会性格?埃里克森在研究关于 Yurok 印地安人的社会性格时曾写道:“……子女教育的体制……体现为人类创造态度结构的无意识的尝试,态度结构是(或曰曾经是)部落的特殊自然条件,配合经济、历史的必要性而产生的最适宜的条件。”^[1]

从“经济、历史的必要性”飞跃到“子女教育体制”未免突兀,因而学者们对社会性格的研究大多致力于缩小两者的差距,并描述社会最大“需要”的满足如何半神秘地通过最直接的方法得以实现。弗洛姆简明地指出了一条联系社会与性格塑造之间关系的途径:“为了社会能良好运转,社会成员必须具有某种性格,使其愿意按照社会成员或社会中特定阶层所必须顺承的行为方式去行动,他们必须渴望做客观上应该做的事情。外在压力被内心的强制所取代,被人的导向性格的

特殊力量所取代。”^[2]

6 可见,性格和社会的联系当然不是惟一的要点,而是本书中特别予以强调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应当从社会促使个体顺承的过程中寻找两者的联系。在任何社会中,这种确保顺承的方式都可追溯到孩提时代,然后在成长经历中再受到激励或挫败(没有哪个社会有足够的先见之明,确保顺承方式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使那些顺承社会的人得到满足)。我将把“顺承方式”一词和“社会性格”一词交替使用,尽管顺承一词不能完全表达社会性格,充其量仅包含了其中的部分含义。比如创造力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如果缺乏创造力,则社会 and 个人的生活即使相当乏味,也能过得下去;但如果没有顺承方式,即使它以对抗性的方式出现,社会和个体也绝不可能维持下去。

本书中,我所关注的是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两次革命以及这两次革命与西方人的“顺承方式”或“社会性格”的关系。第一次革命在过去的400年里荡涤了统治人类大部分历史的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次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17、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等。这次革命当然仍在进行中,但在最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这次革命正让位于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随着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而发生的全社会范围的变革。

我们对于第一次革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在我们的课本和术语中有各种与此相关的介绍,本书无意对之进行新的描述,只想对其做些评价。第二次革命刚开始,就已引起了当代许多观察家,包括社会学家、哲学家及评论家们的极大兴趣。与此相关的描述和评论仍存在广泛争议,事实上,许多人仍然拘泥于第一次革命,尚未为讨论第二次革命确立多种论点。

本书中我将就深受第二次革命影响的某些社会阶层的环境和性格与第一次革命中类似阶层的环境和性格进行深入比较。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简单地认为,第一次革命推翻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历程和现在的革命颇为相似。

我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取自人口学。人口学是一门研究出生率、死亡率、社会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目,以及按年龄、性别和其他变量所构成的社会人口分配情形的学科。我试图探讨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特定的人口变动情况与特定的社会和性格演变的关系,并研究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尽管缺乏中世纪人口的可靠数据,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曲线呈特殊的S型(越接近西方文明的国家,其人口发展趋势越趋近于S型)。S型曲线底部的水平线表示因出生人口数等于死亡人口数(两者的数值都非常高)而呈现的整个人口增长的缓慢或几乎不增长。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平均预期寿命较低,所以世代的转换相当的快。这种社会被称之为“高增长潜力”阶段,即一旦因某种因素的出现降低了非常高的死亡率(如粮食增产、卫生保健措施改善、疾病原因的新认知等等),必将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从而产生“人口爆炸”。西方社会自17世纪始便出现了这一现象。人口剧增现象以19世纪的欧洲以及欧洲人居住的国家最具典型。这一人口剧增现象可以用S型曲线的垂直线来表示。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阶段为“过渡增长”时期,因为出生率随着死亡率的降低而波动,人口增长率也随后降低。人口统计学家开始从人口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人口增长率中发现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即“初期人口减少”时期。这一阶段的社会特点可以用S型曲线上端的水平线来表示。该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有总人口增长的减

少,但这是由于该阶段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的缘故。

8 S型曲线并不是某种人口增长理论,而是对西方社会所发生的以及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地区所发生的人口变化情况的经验性描述。若S曲线继续延伸,将如何?近些年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口发展不像上述结论那样简单、明了。“初期人口减少”并未造成人口本身的减少、出生率再次上升的不稳定状态,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一现象只是暂时的。

如果说生育、生活、生存的机会,人类的需求与供给、生活空间、市场规模、儿童的地位、人类对生命力和衰老的感受以及其他无数基本条件的改变不能影响人的性格的话,那简直令人感到吃惊。事实上,我认为,人口曲线的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按照各种方式塑造社会性格和确保顺承的社会条件。

“人口高增长潜力”社会中,其典型成员的社会性格表现为:他们的顺承性来源于遵循传统的内在倾向。我将他们界定为“传统导向”性格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依赖传统导向的社会中**。

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社会,其典型成员的社会性格表现为:他们的顺承性来源于早年生活的内心目标。我将他们界定为“内在导向”性格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依赖内在导向的社会中**。

最后,在“初期人口减少”社会中,其典型成员的社会性格表现为:他们的顺承性来源于对他人期望和喜爱的敏感。我将他们界定为“他人导向”性格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依赖他人导向的社会中**。

9 在开始描述这三种性格和社会的“理想类型”之前,请允许我指出,我在此无意于详细分析上述划分,当然,在证实人口阶段和性格类型间的关系前进行详细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人口曲线理论为我们研究许多制度上的因素提供了一些速记材料,这些因素通常通过“工业主义”、“市民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城市化”或“理性化”等字眼高度表达出来。因此,当我把人口过渡增长期或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与性格、顺承的演变结合起来研究时,我从未把这些阶段看成详尽而奇妙的解释。

上述我所指出的各种制度因素既与复杂的技术、体制相关,又与人口增长或统计工作本身有关。依我的设想而言,根据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社会是较为可行的。因此,考林·克拉克在经济领域将社会划分为“原始时期”、“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原始时期指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时期,第二时期指制造业时期,第三时期指贸易、通讯和服务业时期),这种划分和人口统计学对社会三个阶段的划分恰好非常相似。在人口高增长潜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时期”占主导地位(如印度),在人口过渡增长期,“第二时期”占主导地位(如苏联),在初期人口减少的社会发展阶段,“第三时期”占主导地位(如美国)。当然,没有一个国家会是同一模式的,无论人口特征还是经济特征,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地区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社会性格则正是反映着这些差异。

► 高增长潜力时期:传统导向型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表现为高增长潜力时期的行为特征,如印度、埃及、中国(近代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中部非洲的大部分未开化地区、中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事实上,包括绝大多数未受工业化影响的地区。在这些国家,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如果出生率不是同样高的话,人口将趋于灭绝。 10

人口增长处于这一阶段的地区,或人烟稀少,如中南美洲的原始部落聚居区,或人口密集,如印度、中国和埃及。无论

是哪种情况,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消灭过剩人口,马尔萨斯的食物有限供应理论为这种“消灭”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马尔萨斯看来,这是自然为人类设置的庞大陷阱,为了安然躲避这一陷阱,只有通过精心耕作土地以及晚婚来减缓种族繁衍的速度。若非借助晚婚或其他避孕措施来防止婴儿的出生,限制人口数则必然采取扼杀活人的方式。因此,社会“发明”了人吃人、堕胎、有组织的战争、使人成为牺牲品和弑婴(尤其是女婴)等,借此躲避周期性饥荒和传染病。

虽然饥饿和性冲动的矛盾常常引起人类的动荡和痛苦,高增长潜力阶段的社会却至少能在其成员的社会活动中保持稳定,包括成员的导致人口数量减少的“犯罪行为”,从而形成某种制度化和模式化。人类一代代的繁衍生息,或出生,或死亡,或被他人除去,以此为他人让出生存空间。因而,人口的净增长率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种波动通常不能长久保持,这在初期人口减少时期亦如此。所不同的是,高增长潜力阶段人均预期寿命有偏低特征: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相对于初期人口减少时期而言,世代繁衍速度加快,成活率大大降低。

在观察高增长潜力阶段的社会时,我们无可避免地将人口-土地比例的稳定性(无论高低)与习俗和社会结构的情形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绝不能将超越历史时空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跨越个体生活空间的心理稳定性等同起来,个体可能主观地体验着更强烈的暴行以及无组织性。然而,通过最终的分析,个体将借助适应而非创新来对待生活。带有特例含义的顺承行为在“自我明示”的社会情境中大量涌现。当然,在人类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自我明示”,“自我明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文化条件狭隘了人类的知觉。由于食物供应的不稳定性存在于现行文明中,它有助于创造某种

常规的顺承模式。这种模式在许多高增长潜力社会有所反映,即使不是全部。这就是我所说的传统导向。

► 传统导向的定义

由于我们上述讨论的社会秩序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个人的顺承行为易受到其同龄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影响。个人学会去理解和选择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传统行为模式,并随着世代的更替而稍稍纠正一下。生活的重要关系受到周密而严格的礼仪的控制,年轻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即成为成年人的过程中学习到这一点。此外,除经济任务外,文化,或曰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的统治和支配提供了礼仪、惯例和宗教。我们可以说,人类无力去发现解决古老的农业技术或医学问题的新途径,正是这些问题使得人类被文化同化。

然而,我们可能从未意识到,在这些社会中,个体成员的活动虽受到服从传统的性格所支配,但在多数情况下,个体未曾受到赞扬,只是从发展个人能力、主动性,甚至是偶尔迸发的远大抱负中获得鼓励。诚然,在某些原始社会里,个体所获得的欣赏和尊敬比现代社会的某些阶层更多。在依赖传统导向的社会里,个体与群体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明确的功能性关系。如果他不被杀死,就会成为从属者,而不会像当代无业者那样成为社会累赘,也不会像当代无一技之长者那样被轻视。但是,由于从属于自己的社会,他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对自己的明确的生活目标进行选择,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该群体内的任何进步概念都非常有限一样。

12

在传统导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关系的稳定性被始终保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适应体制化了的角色,与其本来是如此的背离。在后来的高级社会里的革新家或叛逆者会感到无所适从和困惑,但他们在传统导向社会里反而成为

巫师或传教士,也就是说,他扮演了为社会做贡献的角色,同时也为其他个体或多或少提供了公认的适当地位。中世纪的教会就以类似方式吸收了许多性格变异者。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特定的个体,尤其是出自上流社会家庭的人,从孩提时代就被鼓励去培养某种个性。然而,囿于选择范围之限,即便是上流社会的人也无能为力,个性化性格的社会表象需要对此也无能为力。可以确切地说,这类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与社会体制是高度相符的,甚至少数不能顺承社会的人也要设法顺承一些,只有极个别人才会被放逐社会圈之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是快乐的,他们所顺承的社会传统也许是可悲的,充满焦虑、施虐和疾病。我认为,尽管人类的各项事务从未完全缺失过,但正如分子的运动速度在低温下会减缓一样,社会的变化也会随着个体变化的减缓而减缓,即社会性格看似越来越接近于社会形态模式。

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可被称作以传统导向为主的时代。传统导向概念表示某种共同的因素,这一共同因素不仅存在于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前的欧洲人中,也存在于其他完全不同类型的民族中,如印度人、荷比印地安人、祖鲁人、中国人、北非阿拉伯人和巴利人等。虽然众说纷纭,但尚能在其中发掘诸学派的共同点,如他们同样使用民族社会(对应于利益社会)、阶层社会(对应于契约社会)、共同社会(对应于利益社会)等形式的概念。这些概念所设想的社会固然有所不同,民族社会、阶层社会和共同社会相互关系的共同之处在于变化的缓慢,依赖家庭和家族组织以及他们相对于后续社会的较为牢固的价值观。正如当代某些学生所认知的那样,在人口高增长潜力社会,高出生率主要是由于缺少避孕知识或技术。人们的总体生活方式——对机遇、孩子、妇女地位、性行为以

及生存的意义——构成了区分两种社会的基础。一种社会是让人类的繁衍生殖能力顺其发展,另一种社会则通过统计,或像弗洛伊德及其他观察家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减少人类的性能力来降低人类的生育能力。

► 人口过渡增长期:内在导向型

除西方社会外,我们对于导致传统导向型社会最终瓦解的微小变化因素了解得很少,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口的高增长潜力。然而,就西方而言,我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渐渐衰亡,以及后来的由内在导向支配形成的顺承行为的兴起了解得却很多。

那些把文艺复兴运动追溯到中世纪的历史批评家们有时看似否认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总的说来,近几个世纪内,当人类挣脱了西方中古时期传统导向社会的原始束缚之后,确实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性格的变化。一切后来的转变,包括从内在导向向他人导向的转变,比较之下均不显得重要了,尽管这些转变目前仍继续进行着,我们却无法知道当转变结束时,社会将会怎样。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稳定的变化是人口高增长潜力时期的特征,同时也是其他深刻社会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案例表明,死亡率的降低总是发生在出生率降低之前,因此在某些时期会出现人口急速膨胀现象。死亡率降低现象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多种因素包括有卫生设施、交通设施的发展(发展可以让政府开垦更边远的地区,以及将食物顺利地由富庶地区运送到匮乏地区),弑婴、同类相食以及其他部落暴行的减少、废止或其他等。另外,农业耕种方法的改进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同时也使人口大量增加。

14

诺斯坦的“过渡增长”概念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过渡”很可能意味着骤变,破坏以传统导向为主导的顺承行为的稳定存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不平衡给社会习俗增加了压力。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性格结构模式来适应社会组织结构的骤变,以及由骤变所产生的新需要。

► 内在导向的定义

在西方社会史上,以内在导向为主要顺承方式的社会类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出现,今天已趋于消失。这种类型的社会以人口流动的增加、资本的迅速积累(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以及几乎连续不断的商品生产和人口的增长、探险、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为特征。这类社会给予人们更大的选择性、创造性,凭借性格类型去面对、处理新问题,不再受“自我明示”的传统导向的制约。这就是内在导向型。

15 内在导向概念的含义很宽泛,那么研究该问题的要义即区分新教与天主教国家间性格类型的差异性,区分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不同影响,区分西北欧地区的清教主义伦理观与东南欧地区享乐主义伦理观的差异。尽管这些区分是明确存在的,甚至对某些特定研究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人们在研究顺承方式的发展时常常忽略这些区分。这一研究可以结合或比较不同社会的发展,因为他们存在共同点:个体导向的直接来源是内在的,即引导在早期的生活中由长者灌输,长者引导孩子走向一条普遍的却无从逃避的既定人生之路。

当我们了解到,在传统导向为主要顺承方式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在保证从可见的外在行为中,即语言和举止中获得顺承,我们就能明白上述观点的含义。当行为被仔细界定后,为迎合仪式和礼节中固定化了的程序,个性就不必得到高度发展,当然社会性格被要求具有行为的注意性和服从性。对比

之下,内在导向型的社会则越来越重要,尽管它也关注行为的顺承性,但因为有许多不能预先解释的新形势出现,所以它不仅仅仅只对行为的顺承感兴趣。那么,在高增长潜力时期借助稳定的社会组织的疏导已经解决了的个人选择问题,在过渡增长时期则借助高度个性化且稳定的性格来解决。

性格的稳定性非常复杂。任何依赖内在导向的社会看似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目标选择空间,如金钱、财产、权力、知识、名誉和利益等,由于这些目标在意识形态上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个人一旦作出选择,其一生就不会有太大改变。不仅如此,这些目标实现的手段,也不再像传统导向社会那样紧随某一社会参照体系,而是受到新的自愿社团的限制,如互助会、共济会、教友会等,其成员依靠社团建立相互联系。实际上,如果读者认为传统力量对内在导向的性格无影响的话,那么可能会对“传统导向”这一概念产生误解。反之,他也会深受传统的影响,因为传统限制了他的目标实现和选择手段。传统变迁产生的影响与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等级分化密切相关。即使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对传统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家庭决定,个体还是注定要意识到与传统抗衡力量的存在。因而个体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需要,会表现出高度的顺承性,反之,环境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初级群体促使年轻人社会化,并在年轻人的早年生活中控制了他们,当初级群体的控制力减弱时,一种适合更开放社会的新的心理机制产生了,这种机制就是我所描绘的“心理陀螺仪”。^[3]“心理陀螺仪”一旦被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掌握,内在导向型的人就会像我们所预见的一样,沿着既定路线发展,即便他性格中所反应的传统不再制约其行为时依然如此。内在导向的人能在其生活目标需求和外在环境冲突之间保持某种微妙平衡。

“心理陀螺仪”的比喻像其他比喻一样,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仅仅把内在导向者看成是不能从经验中学习或由于外在顺承性而对公众意见不敏感的人,那将是错误的。他可以接受并运用来自外界的特定信号,只是这些信号要在他的“心理陀螺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的“陀螺仪”运转并非自动的。

17 慧增嘉在其《中世纪的陨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描绘了新的社会形态缓慢形成时所产生的极度痛苦、骚动和价值观的冲突。到了中世纪末期,人们被迫在新的意识形态下生活。随着自我意识和个性的发展,人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自己生存。今天依然如此。

► 初期人口减少时期:他人导向型

在人口过渡增长期,社会所面临的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源极端丰富并足以有效利用而使资本迅速积累的问题。资本迅速积累的开始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增加,生产的增加能够养活增长的人口,满足现有生活方式下的消费需求而发生的。大多数国家,除了资本和技术需从别国引进,且处于人口增长曲线后期阶段的国家外,为了迅速提高国家资源,必定要舍弃现行生活水准。我们可以看到,处于人口过渡增长期的苏联即是如此。对于西欧国家而言,这一过渡期是漫长而痛苦的。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由于曾经受益于欧洲技术和本国资源,过渡期则迅速而相对容易。

前面所说的传统导向者几乎不能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他从未曾想过个人的生活目标可以塑造自己的命运,或子女的命运可以不必与家庭的命运混为一谈。他在心理上不能充分地把自己、家庭与群体区分开。然而,在过渡增长阶段,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控制意识,而且也能

把子女看作独立个体,子女有自己的事业需要开创。同时,由于已经步出了农业时代,童工被废止,孩子们不再被认为是经济资产了。再者,由于科学思考习惯的培养,人类生殖的宗教和神幻的观点(在早期人口曲线上,这些观点对文化的再现具有一定的影响)让位于理性的、个性化的态度。其实,正如生产资本的迅速积累要求人们接受“新教伦理思想”(M. 韦伯称新教伦理为内在导向的表现之一),同样,出生率的降低也要求价值观有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于必然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

当出生率随死亡率降低时,社会开始步入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从事农业生产或原料工业以及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人们除了物质享乐之外,还有了闲暇。但是人们为这些转变付出了代价,像往常一样,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生。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世界因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冲突而收缩、动荡,且工业化加剧了这种冲突。

在这一新条件下,内在导向型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已经不太必要了。他人而非物质环境,已渐渐成为问题之所在。人们接触越广泛,彼此之间就越敏感。因此,人口高速增长潜力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在工业化的疾风骤雨中支离破碎。心理陀螺仪的控制不再弹性伸缩,社会又需求另一种新的心理机制。

更近一步地说,许多内在导向者的“匮乏心理”在资本迅速积累的人口过渡增长期的社会顺承性良好,但目前必须让位于另一种能够享受奢侈、闲暇和富余产品的“富裕心理”。除非人们想利用战争来减毁富余产品,而这么做也需要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否则他们必须要学会享乐和从事有更多精神享受而非物质享受的活动,如诗歌、哲学等。^[1]事实上,在初

19 期人口减少时期,非生产性的消费者,不论是逐步增长的老年人口,抑或是即将减少的未受训练的年幼者,占据着总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既需要有优厚的经济收入以供挥霍,又需要有允许其挥霍的性格结构。

人们是否承认需要另外一种形式的性格类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相信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 他人导向的定义

我所描绘的他人导向型性格似乎是近年来才出现于美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里,尤其是在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斯波坎、辛辛那提、奇利科提等地,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性格类型的美国人与独立革命前的托克维尔或其他来自欧洲游客眼中的新人非常相似。事实上,游客们关于美国印象的报导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人被认为是肤浅、花钱随意、友善,对自己和自己的价值观不确定,而且比欧洲人更需要他人的认同的人。所有这些特征所构成的印象还是颇为贴切的,与当代一些社会学家关于高度工业化和官僚化社会的美国人的性格的看法相接近,如弗洛姆的“市场生意人”,米尔斯的“经纪人”,格林的“中产阶级男孩”。

20 然而,我的感觉是,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与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尽管托氏笔下的美国人给我们一种当代感,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专门讨论两者的差异。另外,我还觉得决定他人导向性格的条件,一直在影响着高度工业化国家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我对他人导向型性格的分析,就是对美国人和当代人的分析。我常常发现,很难或几乎不可能道出某种性格类型始于何时,而另一种性格类型又终于何时,因而我只能暂时倾向于认为他人导向型性格在美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美国社会中确有某些独特因素,如美国是欧洲

的受益者,且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等。除此之外,我还倾向于把讨论的侧重点摆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都市化等国际性趋势上,而不仅仅限于讨论美国背景下的任何特殊的性格形成。

考虑到这些条件,把当代美国的大都市当作一个社会来阐述较为合适,或许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说明方法。在这一社会里,他人导向性格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顺承方式。现在就说他人导向已经成为主导地位的顺承模式,未免言之过早。但是,既然他人导向性格在大都市的年轻人、高收入群体身上有所体现,我们不妨假设,除非目前的趋势逆转,否则他人导向的社会指日可待。

如果我们把社会性格的类型投入社会阶层的模子里,我敢说,“旧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商人、小企业家、技术工程师等的典型性格是内在导向型;而“新的”中产阶级,包括官僚、商界有薪职员等的典型性格是他人导向型。众所周知,许多经济因素与近年“新”中产阶级的增多相关。伯恩海姆、克拉克、德鲁克及其他人都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在生产和原料生产领域中,如农业、重工业、重型运输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比例均在下降,而白领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识字的、受过教育的人,以及靠从事繁重的机械工业和农业生产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人,正逐渐转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兴旺起来,不再为特权阶层专享。

教育、闲暇、服务业伴随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消费字眼和消费形象的增长而共同发展。尽管人口过渡增长期的社会最初从都市中心传播新的词汇,这些新词汇很快就会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流行起来。这一传播过程,一方面受国家和阶级的深刻差异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文化和宣传的差异性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社会,这种现象随处可见。逐渐地,个

人与外界、与自身的关系都要以大众传播的流通为媒介。他人导向性格的人认为,政治事件可以通过荧屏语言而成为经验,荧屏语言往往使政治事件孤立化、个人化或虚拟个人化,而对仍然停留在内在导向阶段的人而言,倾向于会将词汇的流传系统化、道德化。

大部分人认为,不论是为了事业的成功或为婚姻与个人的适应,上述发展过程都必然导致成功途径的改变,并要求有更多的“社会化”。与这种变化相关的是家庭与子女教育方式的改变。都市的小家庭里传统的纪律约束开始松懈下来,“宽容”对待孩子的方式逐步推广到社会的广泛阶层。在这些新的约束方式的影响下,同侪群体(同年龄、同阶层人组成的群体)对孩子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父母们则教导孩子们,一个人如果在人际关系方面失败或不能协调好与他人的关系,比违背内在道德标准更有害。更为甚者,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广播、漫画和流行文化等的存在,学校和同侪群体的压力被不断强化和推动(其内在矛盾将在后文讨论)。我们称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性格类型为他人导向型。对于该性格的讨论后文将有专章论述。所有他人导向性格的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均把同龄人视为个人导向的来源,这些同龄人无论是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当然这种来源也是“内化”了的,它依赖于早年生活烙下的痕迹。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这种与他人保持联络的方式易促成其行为的顺承性,这种顺承不像传统导向那样通过行为本身的训练进行,而是通过对他人的行动和愿望保持某种特殊的敏感性来进行。

当然,非常关键的是这些“他人”是谁?到底他们是个体直接生活圈内的人或是高一阶层的人?更或者是大众传媒的

无名氏的心声？究竟他们害怕的是偶然结识的人的敌意，还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的不满？他之所以需要他人（当代人而非古人）的赞同与指导，绝不只是因为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虽然所有人时时都需要并且希望讨他人的喜欢，但只有当代他人导向者把这一点当作导向之主源，当作感性范畴之主源。

也许这种博取他人赞同的心理需求，使得美国大都市里他人导向型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人都会城市或其他阶层中的同类型者，如18~19世纪的欧洲、古雅典、亚历山大或罗马时期。在所有这些群体中，时尚不仅取代了道德和习俗的统治地位，而且其自身也在不断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众传媒尚处于萌芽时期，美国上中产阶级群体的人数还较少，社会精英阶层仍具有相当的反响能力。例如，18世纪后期英国《观察家》杂志的读者覆盖面远比今天《纽约人》杂志的要大。在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描述了某一类型的人，他们尽管在官场上声名显赫，但也不得不为迅速变化的时尚作准备。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史蒂潘就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却际遇不佳的人，特别有趣的是托氏把史蒂潘与列文，一个有道德、内在导向的人加以对照。在晚宴上，史蒂潘充分展现了他的社交手腕，在下面的引文里，他所表现的政治手腕也是颇有社交性的：

史蒂潘拿了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读了起来，这份报纸并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它只是拥护大多数人的看法。尽管史蒂潘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对报纸所载的大多数人的看法一味赞同。只有当大多数人的看法改变时，他才

随之改变。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他人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地使他改变了。

史蒂潘的政治观点或看法并非自己选定的,这些政治意见或看法自行潜入他身上,正如他的大衣或帽子的样式并不是他自己选定的,只是他随意采用了大多数人穿戴的样式而已。所以,他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由于能自由选择,人更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活动和自己的看法,就像自己需要一顶帽子一样。如果有什么理由让他偏爱自由派的观点,而非保守派的观点的话(史蒂潘的生活圈里还有不少人是保守派的),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的观点更富有理性,而是因为其生活方式与自己更为接近……自由主义成为史蒂潘的一种习惯,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来支雪茄一样,吐出来的烟像一层轻淡的迷雾弥漫在他的脑海里。

24 尽管史蒂潘良好的合群性格使他看上去更像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分子,但他并非完全的他人导向型。这种合群性格如果脱离了把他人视为个体的敏感性和把他人当作导向的源泉,就不算是他人导向型。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区分19世纪的美国人和当代他人导向型美国人。前者像托克维尔、布鲁斯或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合群、迎合大众舆论的特性;后者在性格上,无论工作或娱乐活动,都更有兴趣和更有能力与他人沟通。由于两者的区别易被混淆,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尽管内在导向的人常常寻求且有时会获得与大众舆论和邻居对自己看法的相对独立性,但大体而言,他们仍然重视自己的良好声誉,至少美国人不甘于后。这些顺承行为最初表现为外向的,在服饰、窗帘款式以及银行存款等细节上

尤为明显。事实上,顺承行为是一种标准,由个人环境中“最优秀的人”提供模范。相比之下,他人导向型的人虽然眼里盯着大众、紧随大众,但却在外在细节的表现上未能和内心体验保持一致。即他与大众保持一致的高度敏感性在更高水平上超过了其外在表象。任何独立的或依赖上帝的念头,都无法阻止他求助他人来指导自己追求和解释人生经验,当然这个他人一定是指好人和最优秀的人。

► 三种类型的比较

若要了解三种性格类型在结构上的差异,方法之一就是研究每一种性格类型的情感认可或控制的不同。

传统导向的人把文化的影响力看成--个整体,但这种影响力必须通过他日常所接触的少数个人表现出来。这些少数个人并不指望他成为具有某种典型性格的人,而是希望他的行为方式为大家所认同。结果,认可他的行为的力量是“羞耻感”。

内在导向的人很早就由其父母或类似父母的具有权威性的人为他确立的某种心理陀螺仪,并接受权威人物的讯号。因而他们在生活中看上去缺少独立性,顺承内心的“导航”。一旦为了顾及内心的冲动或迎合当代人百家争鸣式的观点,他就可能脱出常轨,产生“罪恶感”。

内在导向者生活的方向是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中从少数家庭成员身上学到的,且其行为原则,而非行为的细节,是内化了的,所以能保持较大的稳定性。特别是当他的伙伴们也有着同样运转速度、同样方向的心理陀螺仪时,这种情形就尤为显著。但是仍有许多内在导向的人,即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也能保持其稳定性,如在热带地区的、与世隔绝的英国人仍能照常生活。

27 与内在导向的人相比,他人导向的人能从比父母所创立的更广泛的社交圈中汲取信息。家庭已不再是其从属的紧密单位,而是其早年关注的更广泛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人导向者与传统导向者颇为相似:两者都生活在群体当中,缺少内在导向者那种独闯天下的能力。然而,这两种典型群体的环境特征截然不同:他人导向者对外在环境一视同仁,在他看来,熟悉事物和陌生事物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而这种界限在传统导向社会十分明显。由于熟悉的事物不断地融合并重组了新奇的事物,新奇的事物很快也会成为熟悉的事物。另一方面,内在导向者通过对他人反应的不敏感,而获得“身在外,心在内”的感觉;而他人导向者既随遇而安,又处处不自在,他似乎对每个人都一见如故,但又仅限于表面的敷衍应付而已。

传统导向者从他人身上获得信息,而这些信息具有文化上的单调性,传统导向者不需要复杂的接收装置,便可将其识别出来。他人导向者则必须能够从远或近,都能接收信息,信息的渠道来源众多,变化迅速。可以内化的东西,不是一种行为密码,而是需要收集信息,且偶尔参与信息传播的复杂装置。由于有这些装置,他人导向者可以对抗罪恶与羞耻感的控制,他们主要的心理约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这种控制装置不象陀螺仪,倒像雷达。^[5]

► 雅典的例子

其他的文明,如古希伯来、希腊、罗马等在人口发展阶段上,也可以分为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吗?自1650年始,世界人口迅速增长,其结果就是人口增长S形曲线。S曲线在人类历史上是独有的,而且是技术、经济、社会组织等社会化了的新类型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每一个社会都有

其自身的组织形式和技术,即使它们是不科学的仪式,也证明了人类致力于降低死亡率,提高生活水准,使人类不像其他动物那样,仅仅求生存。对雅典城邦的研究表明,其人口增长与社会性格类型的关系与我们所描述的近代西方国家的情形类似。

我们手头上的有关雅典人口长期增长趋势的有限资料,都是从当代人口统计学家的潜心研究与古希腊作家的评论中引证出来的。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是一个动荡的社会,私有财产制已使传统导向的部落、氏族和宗族组织瓦解。居民们能在某一地区安居乐业,使得土地的耕种有了革命性的改进,生活水平亦有所提高,并肇始了最初的人口增长,此现象持续了几个世纪。私有财产、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以及财产世袭制度鼓励财富的集中,产生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一种新的、三权分立的社会制度逐渐渗透到传统社会组织中,不仅使氏族成员间的凝聚力松懈下来,而且也鼓励个人去结交其他部落或氏族里经济地位与其相近的人。梭伦及后人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显然也表示,某些个人和家庭在获得新的、悠闲的经济目的和物质财富方面,远比其他人或家庭更为成功。

雅典城邦建立后的 500 年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断扩张的“边疆城市”经济,一部分是基于国内资源的开发而来的,主要原因当归功于技术的改进和奴隶制的实施;另一部分是极大地依靠向外征服,将被征服者的财富纳入本国经济。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对家庭和子女教育态度的变化,倡导个人自由法规的颁布,允许产品自由分割转让,由第三方来执行对犯罪惩罚的重大改革,以及商业、农业、工业等就业机会的增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徙,人们热衷于探险、征服、哲学思辨和科学思考等等,来说明这段时期的内在导向的倾向。

公元前 5 世纪末,雅典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

人已经熟知人口增长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固定的人口”。两个世纪后,我们发现人口问题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人口减少的恐惧取代了对人口膨胀的恐惧。波利比阿斯在公元前2世纪指出,希腊人口的骤降主要归咎于溺婴行为。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当时的溺婴现象就像今天的避孕措施一样,大部分只限于上层和上中层阶级。这表明了当时人为限制家庭规模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人口不仅有了初期人口减少的迹象,而且人口确实减少了。只有当社会变革兴起,人口膨胀达到顶点,我们才看到以他人导向为主的顺承方式的出现。

譬如说,古希腊的“贝壳放逐”制度原本是防止暴政的手段,到了公元前5世纪却成为公众舆论的可怕武器,反复无常地被用作保证社会的同一性、消灭异端的手段,或用来迫害那些有卓越能力的政治家、剧作家和演说家。此外,普通老百姓中告密者丛生,“不断地诬告城邦中杰出的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使他们遭受大众的妒嫉”。罗乃夫在《神的妒嫉与雅典的刑法》(The Jealousy of Gods and Criminal Law in Athens)一书中,详细地考证了“无情地滥用惩罚”的事实与演变,认为这一现象是在某种广泛的性格焦虑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许可以被看成是全能的“同侪群体”的优势所在。

28 与这些现象同时存在的是,政治圈内常见的内在导向的责任感开始降低。尽管许多学者对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颇为敬重,人们仍不免为选民们(有投票权的人)的冷漠而惊讶。以往下层阶级得之不易的权力,即参加人民大会,在民主政治时代却成为一种义务。各种刑罚措施被用来作为确保法定人数的手段。当这些措施不再有效时,选举权对整个国家而言,便成为一种服务方式。

综上所述,雅典城邦的历史便是一个能进行更深入研究

和分析的历史时段。显然,关于这一研究,前人不过提出了一些可供研究的问题而已。同样,从奥古斯都大帝在位时罗马帝国所出现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口发展达到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后,他人导向的性格类型便开始出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罗马诗人卡特洛斯,也许还有伽洛斯等人的作品里,含有强调个人情感复杂状况的新诗语言,可见在统治阶级中已有了他人导向的趋势。

► 某些必要的限定

语言的限制使我在谈及社会现象时,好像是说社会为了生存需要总是设法制造社会组织和性格类型。这种假设不但使人们对事物产生片面的印象,认为社会对人们施加要求并检验过程,于是就把不当的目的论引入社会变化中。事实上,就特定社会而言,那些保证性格顺承的方法大多是偶然发生的。那些成功地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一旦产生了,就会不知不觉地传播下去。正是由于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去研究调查。仿佛存在着一种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有目的的力量介入,确保性格顺承性的成功。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存在着保证社会性格持久的成功之道,社会还是可能解体消亡的。与此相应,社会可能比人们所料想的更能承受动荡不安、社会性格与社会要求间的巨大分裂,而不致崩溃解体。

我们绝不能高估性格在社会发展过程的地位。例如说,某些学者认为,德国军队之所以团结是因为“德国人”有权威主义性格,这种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军队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性格类型,他们在战争与补给的既定情况下团结起来。再者,如美国性向测量专家们的假说,某些职业只有某种性格类型的人才能胜任,所以我们需要“外向”或“口唇型”的人当销

售员和管理者,需要“内向”或“肛门型”的人当化学家和会计师。事实上,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也会有足够的的能力胜任各种复杂多变的工作。换句话说,社会体制可以制约不同性格类型者的不同动机,利用其去完成社会所要求的同一职业。当然,这并不是说,性格只是历史的阴暗的元素,如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而是说,性格将会影响到工作态度和心理素质,这些态度和素质在经济或政治的分析中,看上去几乎没有区别。

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尽管人们的性格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去行动,但人们仍然有可能与此背道而驰。社会的变化有时可能比性格的变化来的快,反之,有时性格也会比社会变化的快。其实,社会所要求的行为和性格所允许的行为间的差异也就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杠杆。幸好我们尚未真正见过赫胥黎在《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所假想的悲观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社会性格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完全满意,结果除偶发事件外,无任何社会变化。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性格类型是一种抽象概念,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可在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身上来表示,为了研究这一点(正如本章开始所说),首先必需从现实的个体中提炼出他的人格,然后分析出他的性格,最后才找出“社会性格”的共性。

事实上,有辨识能力的读者也许已经意识到,社会或个人根本没有完全单纯依赖传统导向、内在导向或他人导向而行事,每一种顺承方式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在于社会群体或个人依赖这三类顺承机制的多寡不同而已。因此,所有人都可以说是内在导向的,因为人们由年长者抚养长大,从长者那里获得了一些永久性定位。同时,所有人又可说是他人导向的,因为他们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关注同伴在某些时候为

其创造的“心理场”(科特·列文语)和“情境限定”(W. I. 托马斯语)。^[5]

更有甚者,既然我们人人都具有这三种顺承方式的能力,那么个体在其生命过程中有可能从依赖一种顺承方式转变为依赖另一种顺承方式(尽管环境有时会促进顺承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除非个体完全疯狂——事实上个体从不可能完全疯狂,否则,人们不但会将社会环境的暗示组织起来,还会时时留意这些暗示。因此,如果将一个他人导向者置于一个没有同伴的环境,他可能会陷入其他的导向形式中。同样地,显然绝对没有任何个人或社会可以不极度依赖传统而存在,尽管传统常常被时尚风行所掩盖。 31

由于读者的价值判断仅侧重每一类型的孤立性,我们有必要强调这几种类型各部分之间的重叠关系。因为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重视独立性,所以倾向于偏爱内在导向型,而忽略两件事:第一,心理陀螺仪机制促使内在导向型的人看上去比实际更独立,其顺承性并不亚于他人导向型的人,只不过他聆听的呼唤更为遥远,是年长一代的呼唤,这种暗示在其童年就已被内化了;第二,如上所述,这种顺承方式只不过是以内导向机制为主导特征,内在导向者对他人的看法并不敏感,甚至有时也会投机取巧。因此,内在导向者不必经常把他人当成父母的替身而作出反应。我的意思是说,比起他人导向者,内在导向者更加不关心持续不断地从当代人(或他们的替身——大众传媒)身上获得引导、期望和赞同。

我得再重复一遍,本书中所论述的性格和社会类型是一种典型,事实上并不真正存在,只不过是在选择研究某些历史问题时,所建构的一种结构。如若采纳更多的类型或亚类型,还得更了解更多的事实(或许是同一事实,但说服力较弱吧)。然而,我的同事和我都宁可从一个最小的构架上去探讨,通过

研究,我们力图描绘社会和其典型的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寻找两者联系的特性,忽略那些与我们的研究关系不大,但往往表面上很显著的行为。

二、性格的冲突

32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几百年的历史是后两种性格类型逐渐交替统治的历史。先是传统导向型让位于内在导向型,而内在导向型亦复被他人导向型取代。当然,社会与性格类型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举例而言,在某一现存文化中,人们可以发现代表着人口发展曲线全部阶段的群体。同样,我们还可以发现,顺承每一特定人口阶段的各种性格类型。由于人口的迁移,帝国主义扩张及其他不断将不同性格结构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历史发展因素,性格的混合更富有多多样性,人们在人口曲线的不同点汇聚到一起。

这些性格类型像地理学或考古学上的层次一样,一层层叠积起来,时而某一种亚类型从这里或那里显露出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社会的横断面都既表现着早期的性格类型,又表现着后期的性格类型。早期性格类型的变化是通过后来出现的性格类型的压力而改变的。传统导向型在拉丁美洲、欧洲南部的农业区、亚洲和非洲居主导地位;内在导向型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农村或小镇、欧洲西北部、中欧占统治地位。但目前出现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趋向,内在导向型正逐渐渗入东欧、土耳其和亚洲的一部分。此外,在美国的大都会,也许还有西北欧的大城市中,他人导向型的趋向已开始显著了。这一新近出现的类型,正扩展向内在导向型占统治地位的广大地区,犹如内在导向型曾经向传统导向型的地区渗透的过程

一样。

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人的性格结构。在美国,人们仍可发现南部乡村群体,黑人和贫穷白人群体处于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在这些个案中,我们可以找到传统导向的痕迹。同样,从欧洲乡村和小镇迁居美国的移民带着他们的出生率和性格类型涌入美国的主要城市和农村。在这些条件下,这些人不得不从自己生活时代的传统导向型一跃跨入他人导向型的社会。这一跳跃常常可以分为两代人,父母从传统导向变为内在导向,而子女则直接跨入他人导向。

不同性格类型人的混合就如同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混合在一起一样。这一现象是工业化和殖民地化的结果,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那些能够良好地顺承环境的性格类型也会发现自己处于新的顺承更好的性格类型的压力之下,为此他们将退缩到从属的地位。或者,他们会受进入自己观念中的新目标的引诱,不顾及传统文化所制定的获取目标的手段而勇敢地追求这些目标。

譬如,在美国都市环境中,内在导向型的人可能会被迫产生愤懑和反抗,由于缺少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用作行为导向的“雷达信号”接收器,从而不能适应新环境。他们可能拒绝顺承环境,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不允许外界信号的传入。或许他们发现外界信号固然很吸引人,但似乎不是指向自己,因而感到失望。对于那些少数因肤色或脸型关系而不能身居要职或受到大众传媒贬低的人,情形更是如此。同样,对于那些祖先地位不低,但由于本人个性缺乏社会要求的顺承性和缺乏对他人的敏感性的人,此说也很适用。

从对美国印地安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原有的性格类型处于新的性格类型的压力下时,类似的情形就会发生。正如埃里克森所描绘的那样,在苏族印地安人领地的孩子中

34

间,存在着两种对白人文化的反应:一是愤恨的抵制;另一种可称作顺承的反抗。前者的行为在白人教育家眼里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而后者的行为则是没骨气了。在这两种情形中,因为孩子们至少保留了父母和其他苏族成年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无论在外表上是否屈服于白人,内心里都保留了苏族人的性格和传统。这种文化和性格的冲突消耗了孩子的能量,使他们显得懒惰。无论是抵制型或外表顺承型的孩子对白人的文化和白人的政治都很淡漠。

我认为,美国有成千上万内在导向者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不断增长的他人导向所带来的价值观。他们的愤懑可能是有意识的和口头上的,就像苏族印地安人一样。这种愤懑在文化上既由长辈所支持,又由往日农村小镇的久远记忆所强化。长辈的故事和乡村报纸的文章讲述着过去的的生活,所以都市的声音和形象并未能抹煞古老的过去。因此,愤懑可以表达出来并可以在故地战胜他人导向型的侵人。然而,笃守道德者(姑且如此称之)为此感到不安,因为外部世界的影响直接针对他们,他们不断加剧着愤懑,直到残余的内在导向型的人成为其祖先性格的一幅讽刺画时为止。

另一类怀有抵制和愤懑情绪的人是逐渐消失的传统导向型美国移民,这些移民或来自美国的殖民地波多黎各、美国最南部及独立前的菲律宾,或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东方各国。由于他们抵制美国文化的同化,所以,很难在他们身上发现有美国文化的痕迹。从南方移居北方的贫穷白人或黑人并不需要学习新的语言,但却像外来的移民那样衰落了。他们的服饰和礼仪就是一个悲哀的例子:他们努力顺承都市生活方式,同时又不情愿完全被城市公共生活中流行的文化和内在导向模式所征服。

我们还可以从矿工、伐木工、牧场工人及城市工厂工人身

上发现类似的愤懑情绪。正如在其他社会一样,许多人不喜欢让这些工人成为文化的主流。同时,工人们也对城市软绵绵的生活有一种轻视感。像苏族人拥有牛仔故事及英勇善战的历史一样,这些工人也有值得炫耀的传奇。我们必须注意,当他人导向已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超出了都市范围时,这些类似苏族人的工人群体到底如何消亡。一旦失去自己的地盘或保留地,这些人必须进行选择:要么无家可归,要么迅速地融合到他人导向的价值观中去。

“性格的冲突”不单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发生在处于性格和人口曲线上不同点的某一国家的社会群体中。初期人口减少的那些国家,都会感到受到人口过渡增长期国家的人口压力和扩张的威胁,甚至还会感到受人口高增长潜力的东方大国的威胁。这种以恶性循环表现出来的国际紧张,有助于初期人口减少国家的人们保留适合人口过渡增长期的内在导向性格和匮乏心理。因此,人们向往适合富裕社会的性格类型,并为此梦想了几个世纪,暂时被历史搁置起来,人们的性格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所差距则是必然的。

人们采取不同态度来对待这一差距。一种态度是,由于世界存在两大对立的集团,另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此刻谈论富裕时代的性格类型与其可能引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世界上大多数农业人口及许多城市居民们仍处于饥饿和痛苦之中时,谈论美国的富裕即使政治上可行,实际上也是不道德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对于前者,则认为世界大战即将或曰必然爆发。我必须指明,国家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像一个精神病人,自寻烦恼以及战争的危险,并借助这一危险推进国家的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事实上最终战争爆发与否并非美国一国所能决

定的。对于后者,我认为用世界上生活悲惨的人作为反对可能富裕的论点,实际上助长了人们的匮乏心理,使之源于痛苦并助长了痛苦。如果把这一观点推向荒谬的极端,那么人类事务中将不允许有领导者,除非由那些经济地位最贫困的人担任领导,否则那些较富裕的人岂不成为饱食终日、挥霍无度而又无所事事的典型?与19世纪流行的趋势正好背道而驰的是,悲观主义成了人们的麻醉剂。本来,消除人们心中对战争的恐惧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反而利用它来使我们的顺承和禁欲主义合理化,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总之,我认为葛德文的“不实际”的思想与他的主要对手马尔萨斯的观点相比,要显得高明得多。他认为,我们终有一天能够在花盆中制造出供全人类需要的食物,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这些“花盆”了吗?

注 释:

[1] 埃里克森:《儿童时代和世界想像力——对 Yurok 部落的观察研究》(Observations on the Yurok: Childhood and World Image), 1943 年版。

[2] 弗洛姆:“神经质的个体和社会起源”(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Neurosis),《美国社会学评论》,1944 年。

[3] G. 墨菲:《人格》(纽约,1974 年)一书中有相同说法。

[4] 这些事例引自亚伦 G. B. 费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 伦敦, Macmillan, 1935 年。

[5] 雷达的比喻引自威特弗格尔。

[6] 比较弗洛伊德和沙利文的社会化过程概念,弗氏认为“超我”是道德生活导向的内在源泉,它建立在父母意像基础上,后成为上帝、领袖和命运等父母意像的替代者。沙利文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更强调同侪群体的作用,也就是说,重视美国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好朋友作

用。沙氏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使他比弗氏更相信人的顺承能力,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现象可视为朝他人导向发展的一个特征。

第二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一： 从品德到纪律

问：你认为当老师应该惩罚那些使用化妆品的孩子吗？

答：是的，我认为应该惩罚他们。只要知道我是个现代派母亲，尽管我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我仍是够现代的。要知道你不能经常惩罚你的孩子，否则他们会认为你很刻薄，其他孩子也会这么记。

摘自某 访谈

人口发展曲线和经济结构只是性格形成的一部分生态学原因，在两者和社会性格之间，还有其他促成性格形成的人为因素存在，如父母、老师、同侪群体和大众传媒等。这些人是社会遗产的传播者，他们对儿童的生活，甚至整个社会都有莫大的影响。孩子们生活在人口持续发展的前期，有很大的可塑性，是未来社会性格的接受者。关于性格形成原因的变化将分三章来讨论，本章探讨父母、老师在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的青年社会化过程中角色地位的演变；第三章讨论同侪群体的社会化功能；第四章讨论说故事者（当代称之为大众传媒）的角色演变。

在此,我们着重分析作为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主要顺承方式,从内在导向型向他人导向型性格的转变。然而若想透析这一转变,必须先简要回顾一下传统导向的社会。由于传统导向在美国社会的演化中,作用并不显著,我们只好拿西方原始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例子来替代说明。只要把社会化的方式作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新的性格类型,特别是他人导向型性格究竟新在那里。

一、父母角色的变化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因为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容易过分强调和推崇早年生活在性格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即使在这段早年生活中,人们的研究焦点也往往集中于子女教育艺术的妙诀:喂奶与大小便训练的时间表。从中可以隐约看出,这种过分强调和推崇含有乐观和悲观的两面性。说它使人乐观,是因为一旦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有了机械性的改变,则将改变子女的性格;说它使人悲观,是因为精神分析学假设一旦孩子到了断奶期,其性格结构便已大致定型,孩子们就会排斥精神分析治疗的干预,日后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使原已定型的倾向更加显著而已。

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儿童的性格在早年生活之后,仍可能产生重大的改变。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文化因素比父母扮演的角色更具重要性。文化不仅决定性格形成过程中各阶段的个性差异,而且文化自身在儿童发展的各阶段所依赖的因素也有不同。人口发展曲线的每一新的历史阶段,都显露出寿命与社会化过程延长的特点。社会化过程特指个体尚未完全具备成人的社会和经济角色的那段过程。同时家庭、家

族和村落以外的性格形成因素也更为重要。

► 传统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39 在传统导向的社会,孩子们在儿童时代就开始准备扮演成人的角色。成人的角色几乎世世代代稳定不变,除了需要经常强化的技术和手工技巧的训练外,成年以后的生活就不太需要复杂性的和文字化的指导。孩子们只需注意周围的成年人的言语行为即可从小学会像成人那样去做事。在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就有许多孩子开始模仿少数成年人,以其为榜样。通常,这种小孩都是生长在大家庭里。孩子们很容易了解成人的所作所为,成人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孩子们在不具备完全成熟的生理条件之前,便早就能将成人的行为模仿得惟妙惟肖。社会成熟常常走在生理成熟的前面。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下,成人生活的角色与孩子们不成熟的生理条件差距越来越小。由于孩子们的游戏和好奇心不太受抑制,所以尽管某些仪式的神秘性仍证明了成人的权力和孩子们的无助,孩子们还是很早就知道有关性和其他成人的所为。

在这一时期,外在的生活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传统导向社会里,家庭里一般只有一个房间,没有墙壁将老人、大人和小孩隔开,也没有墙壁把人们的各种不同活动分开。一个大家庭也就是一个经济单元,人们不必去办公室或工厂上班,也不必离家很远。人们也不担心节省时间的问题,所以不感到孩子是累赘。事实上,大人们也许并未感到自己与孩子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不仅如此,在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社会流动性很小。父母培养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继承他们,而不是让孩子在社会体系中出人头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切以年龄等级将社会划分为各个阶层,人的地位的提升就像软木塞自然在水中

浮起那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个人本身用不着为此做多大改变。

在这种社会里,上层社会群体的成熟几乎与下层的成熟一样快。这两个阶层的孩子所学习的东西只是在复杂性程度上略有不同。尽管如此,上层阶级孩子的个性化可能比下层阶级的孩子来得早。譬如在中世纪,贵族、流浪艺人和传教士往往更接近于内在导向型,而农民则更接近于传统导向型。不过,一般说来,领导者的训练当然费时较久,他们的性格较个性化,至于社会各阶层的年轻人,很早就参加劳动、成人仪式并开始性生活。

总而言之,在传统导向的社会,孩子们性格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延续家庭、维护家族或群体的存在。儿童所模仿的榜样通常取自整个成人群体,而不仅限于自己的父母;孩子们模仿的内容是成人的行为和诸如勇敢、机智等心理特性。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们面临的选择问题与成人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孩子们的成长可视为是一个长大、变聪明,成为一名传统的卫道士的过程。

► 内在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一) 性格与社会流动

人口曲线上过渡增长时期的来临,为社会和地理上的流动创造了广泛的机会。人们开始在新的疆域创业,从事生产、殖民活动和发现新知识等。尽管这种社会流动的直接影响仅限于少数人,但以原始群落为媒介的社会则不再断然声称个体必须顺承社会了。反之,正在成长的孩子很快就会意识到社会中存在一些对立的习俗和对立的生活之路,可以任其自由选择。虽然出身和门第对大多数人而言,多少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需求和机会的增加,要求人们具备一种追求既定

目标的性格,而非那种只知普遍化和抽象目标的性格。这种性格必须在个体内在动力的驱策下,产生某种特殊手段,追求普遍化的目标。

毫无疑问,父母向孩子们灌输、推行的目标和理想,既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目标,又不符合清教徒的理想。前者是世俗的、自信的,以个性为荣和追求摆脱陈规陋习束缚的人,后者是畏惧上帝、受良心支配、为不能得到拯救而焦虑的人。¹然而,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具有较强的个性,都受内在力量的驱使,并且都善于创业。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许多人都受内在力量的驱使,追求有限的价值、财富和权力,那么这一社会必然由于它所蕴含的各种竞争力量而含有某种变化的动力。即使那些不屑于为高官厚禄而奋斗的人,也不得不如此去做,才不至于在社会体系中落伍。当然,这一社会体系已经变得较为开放,不太注重以年龄和出身来划分社会等级了。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进步,人类角色日益复杂,上述种种倾向就越加强烈。社会分工的加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把父母当作学习的榜样。这一点尤其对男孩子而言,更是如此。西方社会中,人的性格演变似乎最先发生于男性身上,而母亲和祖母则直到最近还在培养女儿充当传统的女性角色。在最近的一部叫《陌生人之家》的影片中,那位意裔银行家,像乔尼尼(乔尼尼:美国银行家。——译者注)和波兹一样,在移民家庭中长大,早已脱离了父亲的模式,立志追求他认为是道地美国人个性的金钱和权力,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个拘泥于早年生活背景的、以传统导向为主的古板女人。

尽管人口过渡增长阶段的父母,对于成人的工作角色和孩子们将来的生活方式,都没有把握,但他们并不让孩子们顺承性自由发展和由机会决定。一个人若想具备担任该角色

所应有的驱动力,就得注意正式的性格训练。尤其在新教国家,性格训练已成为教育的重要一环。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父母刻意教育子女迎合新的社会需求。

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创造了新的情境,这意味着尽管社会化过程所适用的社会角色尚未完全定型,但孩子们必须以不同于父母角色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化。家鸽可以被训练得朝家飞,而内在导向的孩子则必须学会从家往外飞,飞向未知的目的地。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少孩子会遭遇到像伊卡洛斯(伊卡洛斯:古希腊神话中建筑师和艺术家达罗斯之子,相传达罗斯被囚禁于迷宫中,他与儿子伊卡洛斯把羽毛粘起来,做成翅膀。在飞离克里特岛途中,伊卡洛斯飞得太高,阳光熔化了蜂蜡,便坠海而死。——译者注)那样的命运,然而,这种灌输在孩子身上的驱动力,使之实现理想并检验其不断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非盲从于顺承传统。

(二) 性格训练:父母有意识的任务

传统导向社会中,父母尽力使孩子们不至于成为成人生活中添麻烦的因素。这项任务常常被授权给哥哥、姐姐或其他成年人来完成。小孩子很早就明白,行为的顺承性是确保平安的代价,同时还学会去搏得周围人的好感或至少不去打扰他们。内在导向的父母不仅对自身要求十分严格,还常常更严厉的要求他们的孩子。父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宽泛的家庭血缘关系已趋消亡,他们更需要把子女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和关照之下。他们并不因为孩子们行为上的顺承而感到满意,他们要求的是孩子们更细致的顺承,即孩子性格上的顺承与自律。尤其是那些清教徒,冷酷地劝说自己和子女接受上帝拯救的信号——拯救是上帝预先决定了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上帝的拯救信号已转变为预测社会流动的信号,它不再表示从地狱升入天堂,而是指个人社会地位的飞黄腾达。

一方面,清教徒父母出于自身的犯罪感和焦虑感,总在不断地寻找潜在的失败预兆;另一方面,也在寻找神赋的奇迹,因为神赋不能平白浪费掉。

我们所见到的“拔苗助长”最典型的例子是约翰·穆勒
43 (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译者注),他还不到10岁,他的父亲就满怀热情地督促他研读古典名著,撰写长篇大论。即便有些家长不像穆勒父亲那样专心教导孩子,也会由于自己的焦虑、强迫性和发泄的需要无意识地要求孩子们做这做那。事实上,内在导向的人总是不太能应付偶发事件。这或许是因为他太关注自己的感受而生怕浪费时间。反之,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就会避免自我关注。此外,他与别人、包括与自己的孩子的联系是以不断考验和约束自己的性格需要为媒介的。

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性格,我们称之为内在导向型性格。内在导向的过程在新教、詹生北教派、加尔文教和虔信派教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拉丁语国家、路德教和英国教派的国家表现得不太明显。无论何处,只要内在导向的影响遍及大多数中产阶级,下一代的性格形成,就象非家庭经济的生产那样,逐渐被理性化。这时,生产的任务不再取决于外部群体的制约或环境的压力,而取决于个体内在的驱力。个体借此促使物质、社会、智力环境以及自我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产阶级的生活由于具有社会和生活空间上的安排,使孩子们很难透彻了解从而难免承受某种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使孩子们成为内在导向型。许多原始部落或农民家庭都只有一间大屋子,相比之下,内在导向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则在四面是墙的环境中长大,墙壁是父母支配权的象征。墙壁把父母与孩子隔开,把办公室与家庭隔开,使孩子们很难(希

望不是不可能)通过某种“赤裸裸的”父母形象或他人父母的形象来批评父母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父母说的比他们实际做的更为真实。这一现象对于儿童的训练具有很大的意义,语言成了交流、指导和控制的手段。父母和子女的对话,被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所阻碍,孩子们只有私底下才能把这种谈话逐一继续下去。

与传统导向时期的社会化过程相比,内在导向时期在培养孩子方面耗时更久,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压力更大。弗洛伊德在他的“超我”概念中贴切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超我”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一旦灌输到孩子身上,即使再更新指令,都会伴随一生。也许这一概念不太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但用在西方内在导向全盛期的中产阶级身上却非常恰当。甚至于有人说,内在导向性格结构包含着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的紧张对立。现在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孩子们是被“培养大”的,而不是被“溺爱大”的。纵使他们远离家庭,他们还是能把自己养大,他们在未来一生中都会尝试去发掘个人的性格。此外,写日记的习惯也可以看作是新性格类型的症候,日记可作为个体内部时间与活动的研究根据,因为个体借日记来记载并评价着自己每天的行为。日记还可以说明行为的自我和反省的自我之间的差距。

(三) 离巢

成长中的孩子从父母身上继承了自我观察和性格训练的责任以后,就准备迎接并适应新的环境。事实上,如果他在事业上由崭露头角到声名显赫(这一点在人口过渡增长期已变得十分复杂)或者移居边疆拓业,那么他将发现他的顺承行为颇具弹性,不用改变原来的性格。他认为行为顺承与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他是具有新的自我意识水平的个人。

此时,原始群落的社会组织不再为其成员提供选择,反而

15 排斥成员的选择。这既是自我意识的原因,又是自我意识的结果。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必须决定做什么,即决定自己该做的事情。个人的责任感或曰不同于家庭及家族的个体的感觉,使个体对自己已内化了的理想所表达出来的信号十分敏感。如果理想像清教徒心目中的那样是“善”,或像文艺复兴时期孩子们心中的那样是“伟大”的话,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究竟该做些什么?他知道如何去实现这些难以办到的理想吗?正如韦伯和托尼在描绘清教徒时所清楚预见的那样,谁若问自己这类问题,谁就势必不得安宁。

内在导向倾向较为强烈的孩子的家境相对不太优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至于太放纵,也不会太散漫,因而孩子们在面对问题和社会时,对孤独和心理不适会有所准备。更确切地说,孩子的性格表现为:只有置身于类似其家庭环境的那种需要奋斗和拼搏进取的外界环境中时,他才感到舒适。

可见,父母本身属于内在导向的人,也会替孩子装置一套心理陀螺仪,并使其转动。当然,这种心理机制建立在父母本人和其他权威的认知之上。如果孩子们运气好的话,心理陀螺仪既不会转得太快,引起歇斯底里症的危险;也不会转得太慢,引起社群生活的失调。

► 他人导向阶段父母的角色

(一) 性格与社会流动

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个人发迹的机会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内在导向的人能够预见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机会,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理智去拓展边疆城市。而到了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社会既不需要这种热情,也不需要什么独立性。商场、政界乃至专业技术领域都相当的官僚化,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此时,社会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工业过程中难以驾驭的因素——操纵机器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流动性依然存在。但社会流动的原因与其说是在于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作为,不如说在于他人的看法以及个人如何操纵他人或为他人所操纵。换句话说,当人们感到社会的基本物质条件已具备,或者当人们能借助经营计划建设社会的时候,他人导向的人若能洞察人际关系中的微妙机会,就能挤入上流社会。^[2]虽然,就技术而言,人类能够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人们仍不断地工作,与人口过渡增长期时一样努力,流动的驱使力根深蒂固地植于他们的性格中。然而,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产品,也不是机器,而是人格。

如果把他人导向的人格类型与其典型的经济构架结合起来研究,则不难看出,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商场垄断式竞争的“产品差异”特性。“产品差异”一词是经济学家用来指生产者不以价格而是运用广告等手段标榜自己的产品,从而使之与其他同类产品的竞争不限于价格竞争。例如,有的公司把香烟制作得稍长一点,另一公司把香烟制作得更接近椭圆形,而第三家公司则把香烟装在绿盒子里或加上过滤嘴。《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也都从事产品差异的竞争,汽车、流线型轿车、牙膏等生产厂商及旅馆、大学的经营者也是如此。此外,在商场上谋职、政界的升迁和专业领域,都需要把自己的人格特点表现出来(这种特点与其实际的技术、能力是相对的)。当然,个人在表现自我时不能太离谱而弄巧成拙,就像克莱斯勒 1934 年款流线型轿车的宣传那样为时尚早。在研究中,竞争方式的社会性可推广到人、服务业及商品等各个方面,我们称之为“边际差异”,以区别于经济学家“产品差异”的概念。

弗洛伊德用“自恋”表示个人、群体和国家所引以为荣的

与众不同的特点。“边际差异”有时也含有这种自傲的性质，或者像韦伯兰（韦伯兰：美国作家兼经济学家。——译者注）所说的“惹人厌的特点”。然而，我的所谓“边际差异”现象与其说是自傲，不如说是焦虑；与其说是公开的敌意，不如说是隐藏的竞争。我们将看见，“自恋”将随着其他更强烈的因素的冲击而有所减弱。

这种情形中的父母企图以内为导向的方式，强迫孩子将某些明显的目标内在化，这样做实在很冒险，容易把孩子剔出人格市场。心理陀螺仪的定向伸缩性尚不能保证孩子迅速而灵活地顺承社会环境，况且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没有心理陀螺仪装置的竞争者。父母不敢把自我和社会的鲜明轮廓呈现给孩子们，而只能教育孩子尽力而为，不求结果。然而，对孩子最有好处的并不是父母的控制，而是进入学校和同侪群体，最终导致孩子们加入等级制度。学校和同侪群体的权威性虽不十分明确，但这恰好说明以往指导内为导向性格的选择原则已经不管用了。例如，社会地位的升迁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公众问题，靠私下的含糊不定的愿望来求得升迁已经过时了。正如某些就业机会资料显示的那样，许多人宁可选择安逸、稳定的职业，也不愿选择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尤有甚者，即使一个人有意想往上层爬，也不得其门而入。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原有的等级模式解体了，现存的等级模式又不易进行比较。譬如，一名上校军官或一名物理教授、银行副总裁、评论家、石油公司执行官，谁最有资格担任国际联盟的首领？

父母对于如何培养孩子越来越感到困惑，于是开始请教其他同龄人或求教于大众传媒，再者就像本章开头所引访谈中的母亲那样，把教养孩子的职责付诸孩子本身。然而，父母们依然会固守着自己的一套教养孩子的方式。由于他们本身

的焦虑,使他们不得不向孩子们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教导孩子,却总是将自己的强烈焦虑感传染给了孩子。当孩子表现良好时,他们就给予赞扬,以便强化这种教育方式。

无疑,内在导向的父母往往偏爱那些在外头表现良好的孩子。一般来说,表现良好的标准比较明确。他人导向的孩子不仅在行为上符合表现良好的要求,同时还要了解表现良好的确切含义。他发现,表现良好以及个人评价完全取决于周围的人们: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后来是同事和上司。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孩子们交往的同伴犯了错误,那又该怎么办?此时,孩子们只好通过大众传媒再去选择其他可交往的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惟有赞同本身,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绝对的好事:当一个人赢得了大家赞扬,他就是好的。因此,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或实际存在或想像中的某些能给予赞同的群体手中,孩子们从父母对自己的反应中获悉:除非他的性格、拥有的一切,名声、才能和他想做的事情对他人会有影响,否则这些事物本身都是不足以引起什么评价的。表现良好几乎就等于结交朋友,更或者说结交善良的朋友。俗话说,“一旦给人好印象,莫愁以后没赞扬”。

(二) 从培养孩子到反哺父母

典型的他人导向型的孩子,大多在靠近市中心或城郊的小家庭中长大。他人导向阶段,父母离家外出去工作,工作场所很远,中午通常不能回来吃饭。所以,对他而言,家已不再是温暖的“世外桃源”了。随着家庭人口和生活空间的减少,以及与老一辈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减少,孩子们自然会直接面对父母紧张情绪的压力。因此,随着父母自我意识的提高,子女与他人交往的自我意识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49 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孩子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不再是被剥夺的对象,也不再将对舒适安逸生活的憧憬诉诸于难以实现的梦想。女孩子也不用像在早期社会里那样,一直守在家里干活,直到青春期才突然被给予自由这一惟一的资本,去加入成人的生活圈,从而有了生存的基础。近来,家境优裕的男孩也被期望勤劳自立,早起干些诸如送报纸之类的零活,以培养自己的性格。

这一阶段的父母不但缺少成功的内在导向者的那种自信,而且也缺乏不成功的内在导向者的撤退战术。无论在工作或社会关系上,往日确定性的逐渐丧失常使父母对于如何培养下一代感到困惑,父母不再自认比孩子行了。孩子们也不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所以孩子的人口数较之成人要少。其结果是,只要客观上可能,父母就把所有怀的孩子都生下来,并尽量把他们都抚养大。父母在每一个小孩身上所下的赌注都要比早期更多。孩子们在种族和社会观念上都比他们的父母更美国化,例如 Jigg 的女儿就比他时尚。至于,为什么许多流行文化都重视年轻人,理由何在?我在此将不作进一步的探讨。

50 如果我们回顾 19 世纪的那些“启蒙故事”,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年轻人生活的演变,那些故事描述了被误解的少年与严厉而伪善的父母进行斗争的故事,特别是当把早期最优秀的小说,巴特勒的《众生的归宿》(The Way of All Flesh)与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屈林的《另一个玛格丽特》(The Other Margaret)相比较,就会对上述问题更加了解。屈林描写的一个早熟女孩玛格丽特生长在城市有知识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在上等学校受教育。她为黑人受剥削而鸣不平,回到家里,她更为黑人家仆,另一个玛格丽特的卑贱地位而愤愤不平。玛格丽特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而她的父母并非如此。

学校的教育使玛格丽特敢于批评父母,虽然父母的思想还算开化,但面对批评却只有辩解的份儿。他们很紧张而且很在意女儿的想法,尤其是对他们的看法。最后,三个成年人包括另一个玛格丽特试图打消小玛格丽特对“另一个玛格丽特”的美德所存的憧憬。父母讲道理,女仆则用恶劣的行为打消了小玛格丽特的憧憬。但是到后来,父母却对自己的胜利忐忑不安,深恐他们的意愿并不如意,反而伤害了敏感的女儿。他们毫无《众生的归宿》中提奥拜德的父母那样有自信和安全感。

大众传媒可以说在双亲态度的变化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孩子们从大众传媒,如收音机、电影、戏剧以及同伴身上,很容易了解父母的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规范与父母的看法和行为对上号。那么,孩子们身上的某种“务实性”才得以复苏,务实性在传统导向时期是孩子们的天性。他人导向的孩子往往比父母懂得更多,就像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自己知道的已经够多了,用不着父母去指点他。^[37]

如前文所述,父母的导向来源也依赖大众传媒提供。他们不能确定教养孩子的方式,便逐渐从书本、杂志、机构的宣传单和收音机的节目中去吸收相关的知识。媒介让焦虑的母亲接受孩子的行为,使她们明白并无所谓的问题儿童,只有问题父母。一旦她不得已拒绝孩子的要求时,包括从未间断的爱,她首先要反省自己。孩子稍有不高兴,做母亲的就得让步。此外,传媒还教导母亲放松些,以便与孩子相处更融洽,这些劝告无形中也成为母亲迫切顺承的命令了。

当今的孩子也许并未获得成人(不再是内在导向型)失落的力量。其实这种力量或许就像巴特勒所相信的那样,是非自然的,但却足以破坏孩子的自发精神,使其焦虑麻木。“牢

房的阴影开始笼罩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囚犯或许感到压抑和负罪感，但在法庭受审判时，倒不至于太焦虑。相形之下，他人导向型的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会了焦虑感，一种适合他人导向者的情绪调节机制。

（三）“理性”的束缚

尽管父母的权威性已经被削弱，他们仍竭力设法控制某些事物，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自信，其策略也有所改变。当他们和孩子彼此深入了解之后，他们既不能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榜样，也无法以善恶为名体罚孩子或剥夺孩子的权力。他们充其量对孩子象征性地打两下，至于公开的肉体惩罚也仅限于下层阶级。

尤其在上中产阶级，父母仰仗人事管理的方法，以合理的方式——确切地说，是以讲道理的方式操纵孩子。孩子则以相同的方式回报父母。我们可以就这一历史事实归纳出：传统导向的孩子讨好父母，内在导向的孩子反抗或者屈服于父母，他人导向的孩子控制父母或受控于父母。

前几年的一部影片，《温顺女孩的诅咒》(The Curse of the Cat People)不但反映了美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一般态度（当然这和本书的讨论关系不大），而且还提供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控制关系的例证。影片描写了一个生长在市郊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姑娘，家里布置得很整洁，有花园，有黑人家仆。就象《另一个玛格丽特》里的情节一样，父母和仆人在情绪上都给小姑娘莫大的压力。她本打算邀请邻居小女孩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但她父亲开玩笑说，院子里那棵大树就是邮筒，她信以为真，就把请帖放在大树下，当然永远也发不出去。等她的生日到来时，她说过要邀请的那些女孩就嘲笑她，不愿意和她一起玩。而她的父反而责备她不该把他的当真，同时她又因不能和伙伴们融洽相处而倍感苦恼。然而，父母和仆人

决定生日派对照常举行,哪怕装装样子也好。派对上,大人们力劝孩子说,没什么好伤心的,这个派对和没开成的那个不是一样好吗?

父母坚持说,即使没有正式的教诲,小孩子至少也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大树当然不可能是邮筒,而晚会却是真的。小姑娘越想越觉得委屈、寂寞,后来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一个隐居在附近一幢大房子里的奇怪的女人。但她的父母并不欣赏这个女人,也不喜欢她送给孩子的戒指。于是小姑娘在后花园里发现了一个虚拟的朋友,一个可以与之说知心话的漂亮的老妇人。父亲当然看不见这个老妇人,结果又因女孩撒谎而惩罚她。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在这个虚构的家庭里孩子没有私人空间。影片中发现戒指的那一幕,似乎说明小姑娘的情绪很难逃过父母的眼睛。不仅如此,父亲对女儿撒谎说大树就是邮筒,象征着大人知识的干涉。女儿不准撒谎作假,却必须和父亲共享谎言,屈从父亲的决定。所以,父亲和女儿因虚拟的朋友而产生公开冲突是意料中的事,小姑娘不可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或在心灵上把自己锁起来(在下层社会的家庭里,虽然孩子的生活空间更小,但孩子的私人心理空间并不见得少,因为父母一向对孩子没多大兴趣)。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控制关系的合理且微妙性。这一点可以从父母为女儿及其伙伴筹办生日晚会,以及后来事情弄糟后,父亲大发雷霆这前后两件事中看出来。更有意思的是,小姑娘把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树当成邮筒,从而与伙伴们的沟通受阻,家庭危机由此凸显,而一切的起因在于女儿和父亲对于所谓真和假的理解有隔阂。

显然,遇到这种情形,父母应该主动采取一些措施以弥补过失。可是影片里的这对父母却什么也没做,他们宁可轻描

淡写地把事情掩饰过去,迫使孩子接受一个没有朋友的晚会。影片以夸张的形式讽刺了在他人导向型的家庭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经常彼此控制与反控制的现象。

与这种情况相比,内在导向的父母并不太担忧子女的怨恨和敌意。他们也不容易意识到子女的不满。他们和子女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反而保护了双方的感情。然而,他人导向的父母不仅想赢得孩子的美好行为,而且也刻意获取孩子的友善。因此,他试图用高超的诡辩技巧来说服孩子。当孩子们也学会以诡辩之术(这是心理雷达装置的一部分)反其道而行之之后,父母要么向孩子屈服,要么把祖父母的那套严厉方法搬出来。影片《温顺女孩的诅咒》中的父亲在设法说服女儿,虚拟的朋友根本不存在未果之后,最终揍了孩子一顿。打过以后,父母又想方设法安抚孩子,把打屁股变成控制锁链的一环。

54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问题及其内容变化。内在导向驱动力和张力越强烈的父母,越会强迫子女去工作、储蓄、打扫房间或刻苦读书、祈祷等等。而那些内在导向倾向不明显的父母则希望男孩子更有男子气概,女孩善良贤淑更有女人味。这个要求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大家庭人手多,不乏劳动力,而小家庭里人手不足、事情又多。父母通常在学校教育的大力支持下,以身作则,为子女在工作学习方面充当表率。孩子们相信父母的行为方式在现实和未来都是使自己获得社会承认的最佳道路。

反之,在他人导向的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涉及家务事。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城市家庭的孩子没有什么家务活可做,在外亦如此。他们用不着洗刷清扫(除了洗澡),甚至还不如一台吸尘器有用。

他们也不必照顾一大群年幼的弟妹。美国的主妇大多受过教育,健康而有效率,对料理房间或小家庭有很高的标准。如果不做家务,而让子女包办,她们便会觉得像失业了一样。幸好现代美国人已经从上一代的困窘境地中解脱出来了,主妇不必为生活来源操心,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样面临如何打发闲暇的问题。持家和照顾孩子常常成为她们打发闲暇和逃避现实的借口。

所以,最初父母和孩子只是为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争论,后来他们为使用家里的小汽车而争论。现在他们像影片《温顺女孩的诅咒》中的情节一样,为了孩子与他人交往以及争论本身的情绪色彩而争论。就争论的性质而言,父母很不容易获胜。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父母至少可以依据早期留下来的行为标准为孩子指明哪些是不言而喻的、应该做的事情;而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闲暇和消费,这些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若想作出决定,人们则必须求助家庭以外的榜样,寻找父母所属群体中不断改变的行为规范,并遵循这些规范。事实上,收音机和印刷品把榜样带进家中,父母和孩子就像法律专家一样,从审讯记录中摘要出已于有用的东西。

综上所述,他人导向型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装置了一套所谓“心理雷达”,这项装置并非用来引导和稳定个体的内在,使之沿着特定的方向前进,而是用来探测他人的行为,特别是一些象征性的行为。因此,父母对子女性格上的影响,也仅限于如下三个方面:①父母的信号和他人的信号在雷达上混合出现;②父母将子女置身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限的改变子女接收到的信号;③冒险检查孩子们收到的信号(对孩子而言,似乎不太公平)。总之,比起内在导向阶段的父母角色,他人导向阶段父母角色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二、教师角色的演变

从内在导向步入他人导向社会的过程中,除了父母之外,其他成人权威的角色演变也有值得论述之处。基于经济上的原因,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的家庭已不再雇佣管家、保姆和家庭教师。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孩子们不再由那些为他们树立家庭或阶级标准的人带大。这个标准在内在导向期,是一个良好的训练,能使孩子们获得普遍化的目标,同时也多少缓冲了同侪群体良莠不齐的影响。更妙的结局是,一个由管家带大,并有专门的家庭教师教导的孩子,对家庭和社会的权力差异有敏锐的感觉。等他进入寄宿学校或大学之后,他可能对老师的教诲无动于衷,正如一个上层阶级的母亲告诉校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跟我的孩子处不好,我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和他合得来。”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对老师指导他与同伴的交往或情感生活提不起兴趣。

不仅如此,家里有仆人、家庭教师之类的成年人存在,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传统导向时期的大家庭,有助于缓和子女与父母关系上的紧张情绪。虽然小孩子知道谁是一家之主,他仍可能利用这些被雇佣的外人来对抗父母的权威。事实上,内在导向的父母往往不太热衷于孩子们对他们的温情,而是更愿意让孩子的情感宣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身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内在导向的年轻人,往往会找妓女或其他下层阶级的人,以寻找情感的慰藉。因此,他虽然能处理一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人际关系,但却不能应付其他更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他为不理解同伴的需要和愿望而付出的代价,同时,这也说明,在追求其所重视的目标时,他能够铁石心

肠,不在乎同伴的冷漠和敌意。

如今,祖母的权威早已像管家的权力那样被完全废除了。在现代家庭中,没有了她们的位置,而且她们也像孩子一样,在经济上扮演着无用的角色。尽管她们的寿命延长了,可是,他人导向的性格使人际关系越来越个人化,家中的“陌生人”越来越不易被接受了。联姻问题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化中,曾是一个常见的笑话,如今也有了新的含意。惟有敏感和高度个人化的人才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不必有性格上的防御。 57

祖母的家庭核心地位之衰落象征了社会变化的迅速,这一衰落与当今所谓“透支消费”的观念已有两代之隔。现在,父母努力跟上孩子的步伐,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持年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持对孩子的影响力。可是祖父母几乎做不到了。因此祖辈在下一代他人导向性格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通常可以忽略不谈。祖父母往往在幕后支持父母亲,而不直接给小孩子呈现比较一致的“家庭画像”,在祖父母身上,孩子们觉得,年轻一代从老一辈那儿学不到什么东西。

社会的发展也使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父母的替代者”消失了,以往哥哥、姐姐们在家中的地位像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戏弄新生那样,迫使弟妹们服从家规。今天,家中的大孩子(如果有的话)宁愿替别人家照看小孩赚点儿零花钱,也不愿照管自己的弟妹。工作的诱惑使孩子到外头找活干,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回到家里,他们似乎是一个二流旅店的特权客人,旅店的经理人(孩子的父母)即使满腹苦恼,也得笑脸相迎,而且还要随时感到客人革新的压力。

► 内在导向阶段教师的角色

尽管上述各种权威都消失了,但仍有一个重要的权威保

留着,这就是教师的权威。由于社会已步入他人导向阶段,作为父母的代理人,教师的权力有增无减。现在我们来探讨教师角色的演变。

内在导向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学校只是到了后期才大批出现,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幼儿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孩子们知书达礼。礼节既指维护教学秩序的纪律,也是上层阶级子女所必备的优雅风采。当学校大量涌现,且平民百姓的子女也能上学时,教师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孩子们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去说话和做事(如果孩子掌握了这些,就有可能得到赏识并荣升到比父母更高地位的阶层中去)。教师并不费心去了解孩子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仅限于教孩子们读书,从而把他们的职责与家庭职责划分得很清楚。

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客观环境也大致反映了这一特点。座位是固定的,大家都面向前方而坐,通常按姓名的字母顺序编排座位。墙壁上装饰着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公元79年因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译者注)图片和凯撒大帝的半身雕像。只有极个别学生能够超越古典教育死气沉沉的模式,使古代世界生机勃勃地呈现于脑海中。墙壁上的雕像和饰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学校的教育和孩子们的情感世界的风马牛不相及。

教师既不愿了解也无暇理会孩子们情感上的问题,只有在约束孩子的时候,教师才会注意到孩子之间的关系。教师通常根本没有什么权威性,不过是众矢之的,只有挨责备的份儿。有时,她企图借助惩罚和责备来维持秩序,但这些做法反而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使孩子们联合起来反抗权威。

最近上映了一部瑞士影片《苦恼》(Torment),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这种情形在近代社会仍然存在。影片中,教师和父母共同承担向孩子灌输内在导向型价值观的任务。补习

学校的老师疯狂、粗暴，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恶棍。所有的男孩都恨他，有的怕他，尽管老师试图接近、了解学生，任何一个自尊心强的孩子都不想做他的朋友。于是一个敢于反抗的男孩就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出于老师的逼迫而反抗，并非发自内心。虽然孩子们觉得痛苦，但老师和父母却始终无法打入他们的生活圈。于是，只要无伤大雅，他们彼此与女孩子分享私人的秘密。这种叛逆性就是内在导向性格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它终将获得成功。

安东尼·怀特的小说《五月的霜》(Frost in May)描写了一所女子修道学校的故事，情节感人。修女们是学校的老师，对性格塑造过分追求，对有天赋的女主人公的自然、纯真和开朗大加挞伐。事实上，修女们只知道老式的忏悔赎罪，以期得到上帝的拯救。尽管学生们逃避、屈服或祈祷，但总是不能与修女像朋友那样坦诚相处。修女们穿着千篇一律的类似军校里的制服，象征着等级与抑制观念，把自己(代表权威)与孩子们远远隔开。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学校主要关心与人性无关的事物，实行两性隔离。教师们只注重灌输知识，不关心孩子的情绪体验，连说话的语气也像修女那样缺少人情味儿，孩子们不允许发展自己的个性，学校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使孩子们顺承未来的现实生活。无论是古板型还是母亲型的教师，即使有时间、有精力，也都对促进孩子与集体合作或培养孩子的社会化所知甚少。尽管父母可能赞成老师贯彻校方的道德法规，如衣着朴素、考试不作弊等等，并支持老师向孩子灌输某些和社会地位升迁相关的礼节规范。可是，他们却不准老师干涉孩子的游戏圈，即使老师的干涉有利于加强种族上或经济上的民主也不行。在家长看来，老师只要能按部就班督促孩子的功课就行了，而不必让学生体验读书的快乐或学会群体合作。

现在的小学，老师有权决定是否把孩子安排到他所向往的群体中，并观察他如何适应群体的生活，这对于从前的老师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老师和孩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学校教育所强调的智能，在形成孩子内在导向的性格的过程中，却有着非常重要作用。智能的训练使孩子们相信，成事在于个人的学业和知识，而不是他笑得多么甜或者他的态度多么合作。尽管迄今为止，判断智力和能力的客观标准，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我们在智力测验和笔试中，能够清楚的看出阶级偏见。可是在传统导向阶段的学校就不会意识到这一偏见，所以它的标准是明确而稳定的。出于这一理由，无论是成功者或失败者均可将这些标准内在化，使之成为真实而确定的标准，不致成为某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总之，这一时期的学校只是辅佐家庭为孩子建立一些对日后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能提供导向方针的明确目标。

60 无论孩子在社会地位的观念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安全感（在他人导向阶段，学校的安全感已不复存在），我们都不该忘记，这种教育制度对失败者的伤害有多深。失败者往往一败涂地，得不到人们的丝毫怜悯。孩子们只好用聪明、社会地位和顺从赢得老师的欢心，而不是把遇到的问题告诉老师或以人格的力量与老师交往。表现不好的学生，叛逆性因此而产生，学校则会把这些叛逆者塑造成不良典型。边疆开发或其他流动机会往往为这些失败者提供出路。有时候，这些叛逆者居然以一种神话英雄的姿态荣归，以此减轻其他不良顺承者的罪恶感，使那些人对自己的未来重新寄予希望。总体上说，学校标准给予孩子某种明确的保证，甚至失败者也内化了这一标准。他们内心常常带有情绪冲动的副作用，情绪冲动一旦爆发，他们不在乎批评，甚至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教诲。

▶ 他人导向阶段教师的角色

进步的教育运动解放了孩子们曾经被束缚的才能和被压抑的意志。天才的粉碎和意志的压抑曾是许多人经常遭遇的命运,甚至那些看上去性格稳定、行为合理的内在导向者也往往难逃此劫。当代教育的目的和成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发展了孩子的个性,教师们注意培养孩子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智力。目前所谓进步的教育已不再是进步的了,他人导向化更明显以后,曾被誉为解放个性的教育方法业已阻碍人的个性的发展,而不能保护和发展的个性了。下文将就这一现象进行简单论述。

先进的学校降低了入学年龄,2~5岁的小孩子一提到学校,就会联想到理解他、陪他玩的大人,而不是冷酷的大人和枯燥的课程。理解和陪他玩的大人指的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懂得关注孩子的社会和心理顺承性,而非学习成绩。换言之,他们懂得从孩子的知识行为中,观察到孩子社会顺承的不良迹象。这些新老师高度专业化,但他们仍不敢自称了解孩子。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近代美国心理学家格赛尔的理论——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点。这样一来,不仅孩子们开始信任学校,不再联合起来反抗学校,而且老师们也更能参与学生的各种社会化进程,如消费、友谊、幻想等,这些都是旧时的老师即便有这种个人愿望也不能办到的事。今天的富裕社会大力鼓励人的个性化,并有条件丰富学校的娱乐生活。

学校环境的布置,如座位的编排、年级和教室的装饰等也表现出教师功能的演变。男女生混班上课,座位也不再是固定的,老师不再按学生姓名的字母顺序来排座位,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彼此的关系来排座位,使志同意合的学生聚在一起。这就是说,座位编排反映了问题所在,一个人坐在哪儿,

62

就可一眼看出他的朋友在哪儿。格赛尔的分等法与早期智力分等法一样严格。不管孩子的智力天赋如何,都愿意与合得来的伙伴聚在一起。^[4]课桌的形状也变了,桌子可以随意移动,除了藏东西的地方,桌子上面还有开放的书架。老师也不再呆板地坐在黑板前的讲台上,而是与学生打成一片。

最重要的变化是教室的墙壁。现代小学的墙壁上装饰着孩子们自己画的画儿或者挂着孩子们社会实践活动的照片。挂在墙上的画就像“竞争”从上面不断地俯视下来,提醒督促着孩子们要关心时代问题。这些画跟老师本身一样,不再是非人性化的事物了。这种做法无疑是进步的,鼓励着孩子们的创造性与个性。然而,同样的,我们又会遇到一些难解而矛盾的事情,虽然学校不那么重视成绩和报告单了,但墙上的画似乎不时在告诉孩子,镜子,墙上的镜子,谁是班里最棒的?^[5]

63

尽管绘画和照片反映了孩子们青春期以前的天赋想像力,但学校本身仍是扼杀儿童想像力的场所之一。与历史上的情形差不多,到了青春期,绝大多数孩子的想像力枯萎了,留下来的,既不是艺术技能,也不是艺术想像力,而是孩子们社会化了的兴趣和趣味。这一点可以从孩子们对绘画和故事感知能力的公式化倾向中看出来。高年级的学生讲述的故事已倾向于现实主义了,这种现实主义受进步运动的理想所影响。凯撒大帝的雕像和庞贝古城的图片被取下来,换成了参观乳品公司、逛百货公司的照片或《生活杂志》以及《读者周刊》上的地图。神仙故事也被火车、电话、百货商店的图片,后来甚至还加上介绍种族关系、联合国或拉丁美洲的邻国资料所取代了。

布置和风尚的变化,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同时也消除了学生之间的隔阂,加速了兴趣爱好的传播,这正是

他人导向社会化过程的前奏。在内在导向的学校里,学生们喜欢把自己写的故事和画的画儿藏在枕头下,就像内在导向的大人藏日记那样。而他人导向的孩子喜欢把写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把自己的画儿贴在墙上供大家看。过去,游戏仅是课外活动和个人私下的爱好,只在小群体圈子里流行,现在,游戏成为学校日常安排的一部分,为“现实目的”服务。

这种情形下,老师往往居于意见领导者的地位,她向孩子们传播一些来自发达都市的流行风尚。她告诉孩子,重要的不是勤勉或学习成绩,而是顺承集体、保持合作、创造性(非常程式化及有限的)及领导能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们受到的协作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教育,常常是抽象的。不管强尼在幼儿园里玩的是卡车还是沙箱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能否在玩玩具的过程中与比尔(其他的孩子)合作。其实,只有少数几个运用道尔顿教育制度(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由美国人 H. H. 帕克赫斯特于 1920 年在道尔顿中学创行,因此得名。其目的是废除年级和班级教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拟定的教学计划,以不同的教材、不同的速度和时间学习,以适应孩子的能力、兴趣,发展其个性。——译者注)或其他类似制度的学校,让学生自行选择学习计划和学习进度,把老师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图书馆。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与老师合作是必须的,也是有意义的。然而,大多数学校并不能达到这一水平,老师往往执掌着权威,与他们的同伴——学生父母一道,把权威掩藏在说理和控制的名义之下。老师一个人决定教学计划和学习进度,却忽略了一点,小孩子在没人束缚的时候,反而会对许多抽象的事物感到好奇。老师常把算术变得更实际,把语言说得更风趣或者以历史课取代社会实践等,殊不知,这样做反而耽误孩子们他人导向性格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说

64 得极端一点,孩子们用不着与别人合作,因为老师会把一切都替他们做好。因此,老师如果要求学生保持合作,不过等于要求学生乖一些罢了。

尽管老师只是要求孩子们乖一点,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事实上,这个要求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老师对这一要求总是很认真的。由于老套的约束方式已经废弃不用了,老师显得比父母更束手无策,因为父母偶尔还能用老套的办法惩罚孩子,虽然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内疚,而且也谈不上有效,可是老师则不敢,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她所受到的教育告诉她,学生的过失,就是老师的失职。此外,老师本身不大关心教学的内容,更何况教学内容又不必在教学会议或家长会上提出来讨论。从种族和经济观点来看,这些成年人所关心的是教育的持久性。至于现在课程设置上对社会科学的强调,只能说明智力的技能和内容在日益削弱。因此,老师的情绪和精力转入到公共关系领域。她的社交技巧发展了,对纯友谊的小群体非常敏感,并且设法破坏它。相对应的,她对某些孩子产生特殊偏爱,也与自己的职业教育不相符。她需要所有的孩子都相互合作,以证明她的尽职。她表面上和蔼可亲,内心却焦虑不安,渴望孩子们的回报,这使孩子感到莫名其妙,从而使孩子们得到一个结论,不与他人合作是最糟糕的事。

当然,老师也督促孩子们在小事情上合作,如决定研究秘鲁人抑或哥伦比亚人,通过选举班干部让学生了解选举仪式及国会政治的功能或者发起红十字会捐款及慈善募捐等活动,从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性。因此,老师们认为,孩子们在发挥智能技巧,充分表现合作的活动中学会了民主。事实上,这种所谓尊重能力表现的民主技巧,也只有运动场上竞技时才有所体现。

很奇怪的是,当代小型学校的教师角色(私立和公立学校

中这种教师的角色也很多)和现代工厂工会的角色极为类似。后者也不断关心员工与员工、员工与经营者的关系,而越来越不关心员工的技术了。在少数更先进的工厂中,甚至连讨论会之类的事情,都需要经过民主决策。这种作风当然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个体工作效率和资历问题。但这种民主决策通常是琐碎的,就像小学校管理也要实行民主制一样是不必要的。可见,他人导向型的孩子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是要他去适应一个只重视群体内部关系和道德规范,而非重视产品的社会。

注 释:

[1] M. 米德曾有著述论及这一领域。她指出新教徒如何把自己毕生无法实现的理想转嫁给自己的子女,虽然他们的理想是不变的,但转嫁理想的驱力却刺激着变化与进步。“社会变化与文化替代”(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Surrogates),《教育社会学期刊》,第14期,92页。

[2] 当然,我们没有把握说,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的社会必然成为头重脚轻的官僚化社会。可想而知,人口迁移可以促使社会流动且有助于资源迅速流向第三产业,即不断增加的闲暇和服务于娱乐的工业。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三编。

[3] 然而,尤其在中产阶级社会里,知识往往产生某种局限性。在传统导向的家庭,这一点尚不太明显。孩子的知识,如对性知识的了解是从周围成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中得来的。如果他看见他叔叔在工作时特别不正经,他就会联想到昨夜村子里发生的事。与此相反,他人导向的孩子对性知识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客观想像上,他不能把夜生活和学校、家庭或寓所中看到的大人联系在一起。尽管弗洛伊德研究发现,孩子揭开了性的神秘面纱,但也仅限于从戏剧和电影中,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情欲的巨大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善于隐藏情欲,也许这就是性欲往往对他人导向者仍有诱惑力的原因,尽管成人实际上完全了解并充分体验过性生活,却无法彻底从中解脱出来,本书第七章将专门论述该内容。总的说来,他人导向的孩子对成人世界的实

际态度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明显受压抑,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孩子参与成人活动后所面临的问题。

[4] 关于这一段所述,贝克在1951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中,在论文:“芝加哥公立学校教师的角色和经历问题”中进行了精辟阐述。他观察了跳级生和留级生的活动,老师将班级中年龄相同但智力和性格不同的孩子分为两三个不同的群体,各群体之间不提倡流动,某一群体的儿童被鼓励模仿自己的同伴。公立学校的老师可能是内在导向型的,但她不得不在学生中提倡他人导向型。

下面的引文摘自访谈录,充分说明了教师为促成孩子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尽的努力。“每一年当我带新班级的时候,我就先做一个调查,要每一个小孩站起来,谈谈他是怎样度周末的。最近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站起来就说:‘我星期六看电影,星期天也去看电影了……’我已经教了25年书,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孩子们应该做些更有趣的事,不至于总看电影。于是,我就跟他们谈一些值得做的、更有趣的事,如观光、参观博物馆、打棒球、骑自行车等。如果到了期末当某个孩子再站起来说‘星期六我去看电影……’时,大家就会笑他,因而孩子们得设法干些更有趣的事情。”

[5] 更矛盾的是,越强调孩子创造与发明精神的学校,孩子就越难以表现。孩子不敢模仿成名大师的作品,甚至不敢模仿或重复自己以前的作品。虽然学校的课程介绍了整个艺术世界,孩子们却没时间从外界汲取刺激因素,所以有些孩子就将注意力转向同伴或成人之前未曾注意到的事情上。

第三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二： 同侪陪审团

“个人主义是介于两种社会组织类型间的过渡阶段。”

——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The Unadjusted Girl)

一、内在导向阶段的同侪群体

随着传统的大家庭(即传统导向的家庭,包括叔伯、姑婶、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都生活在一起)的衰落,内在导向型家庭的孩子常常受理想化了的父母的更严厉的压制。为了博得父母的宠爱,免受责难,孩子们之间彼此竞争。理论上讲,孩子们可以联合起来反抗父母的专制,但是从小说里描述的故事来判断,常常是父母瓦解了孩子们的联合并分而治之。一家之内的孩子们,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无法像同侪群体那样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因此,任何一个孩子随时都可能遇到一些独特的难题需要他独自处理,甚至得不到女仆和姑婶的同情。

67

这就是内在导向型的孩子所付出的代价,在这种环境中,他不必等到加入以年龄来划分的同侪群体时,就已经成熟了。他的父母不会再压制他,因为根据权威观念,孩子尚不能做什么事。在切斯特菲尔德(切斯特菲尔德:英国政治家及作家。——译者注)写给儿子的信中,充分显示了早期工业化阶段人们的普遍看法,孩子只是一个少而未经世故的成年人。在切斯特菲尔德的信上,似乎认为他15岁的儿子在性和知识方面已经完全成熟了,只需再学会深谋远虑和与成人相处的经验就行了。内在导向的成年人认为,训练孩子与别的孩子游玩或培养孩子们的良好合作,不是父母的职责。

由于周围都是些内在导向的成年人,孩子们常会遇到一些极不合理的要求。孩子们并未受到压制,但也从未得到任何解脱。成长中的孩子在面对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时,要么因犯罪感驱使而竭力遵循榜样,要么默默地反抗。当成人对他们提出不合理或异乎寻常的要求时,他的反应与他人导向的孩子不同,不能团结起来,形成反抗联盟,而使成年人感到挠头。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孩子往往被孤立,不与同伴接触,尽管他在学校里与其他孩子也有往来。小康之家的孩子之所以可怜,也正是这个意思,他们是父母或女管家手下的“社会囚犯”。

事实上,无论在人口曲线的哪个阶段,家庭的所在地确实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除了狩猎和游牧民族,家庭住所都是固定的。家庭是社会化活动最多的场所,在社会化过程中,大家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人口过渡增长阶段,年轻人必须离家到别处成家立业,他们移居到未开拓的边疆或不发达的城市,并在那里安居乐业。尽管学校和其他特殊因素对孩子们的社会化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但新的家庭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

角色。

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人口仍在不断流动，以期寻求消费和生产的新天地。换句话说，人们择邻而居，以便使孩子们与好人来往。当今的美国人在城市或城市之间迁徙，主要原因是为了找份好工作，也可以说是在不断寻找与之相配的好邻居和好学校。许多人都在寻找更好的邻居，这种压力加上当前美国城市以流行风尚和居住价值的变化迅速为特色，没有人会把现在的居住地当作终生不变的栖身地（孩子们长大并成家立业后，父母们或许又会因满足自身的消费价值需求，仍想要搬迁）。从家庭居住地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人导向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与他人的接触。当然，住在市区或郊区的家庭，生活空间小，膝下只有一两个孩子，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常常让孩子们接触家庭以外的物理和心理空间（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工人阶级家庭也比早期工业化阶段拥有更多的生活空间，但我们在此仅限于讨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历史）。

言归正传，内在导向的孩子可以在兄弟姐妹或其他同龄的伙伴中找玩友。这种现象在当今乡下地区仍然存在，乡下没有正规的运动场地，年纪相仿的孩子一起在池塘里游泳或在野地里打球。然而，一旦到了“明白事理”的年龄，内在导向的孩子就从与自己阶层接近的那些人当中选择朋友。其实阶级本身就是一道障碍，尽管人们在选择邻居时，并不比今天城市人更注重阶级和种族的严格划分，譬如，南方的白人和黑人可以相处得很融洽。在5~15岁期间，性别差异也是内在导向的孩子的交往障碍之一，男女生不混班上课，是因为人们在观念上不愿意让男女混在一起，正如不愿让不同阶级的人混在一起一样，即使到了六七年级是否举办学生舞会也还是个未知数。内在导向的孩子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渴望获得的身份地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以此选择朋友，限制自己。而

这一切对于今天许多他人导向的孩子来说,就显得过分挑剔了。

69 内在导向的孩子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仍会在居住地和禁忌允许的有限范围内,找到一两个要好的朋友,他可能在年龄较大的亲戚或朋友中找到一个值得效仿和羡慕的人。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以志趣相投来选择朋友,有一些特殊的爱好兴趣,成年之后仍不会放弃。今天英国的男校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有自己的嗜好。具有特殊嗜好的人能在嗜好活动中获得满足,并在这一活动中广交朋友。例如,对养鸟、开摩托车、收集矿物标本、诗歌等有相同爱好的人,其友谊也特别稳固。

正如我们要在第十五章讨论的那样,嗜好或技能本身不是内在导向的标志,他人导向的孩子也可能追求嗜好。尽管这两种类型的孩子的嗜好本身并无什么不同,但两者的嗜好意义和社会内容则有天壤之别。内在导向的孩子很少与同侪群体分享个人嗜好(也许集邮是惟一的例外),但当几个有共同嗜好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仍不免交换细节与热情,就像两个牛奶场的主人碰到一起不禁津津乐道地谈起他们喜爱的奶牛品种一样,交换意见丝毫不令人感到尴尬。在共同爱好的问题上,内在导向者与他人导向者一样,不在乎维持“边际差异”(差异固然有,但是不大)。因此,孩子们不会因为别人的嗜好和自己不一样,就对自己的嗜好产生动摇;相反,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对自己的嗜好的独特性更有信心。

我们在此要告诫读者,千万不要太迷恋于《派洛德》(Penrod)或《哈克贝利流浪记》(Huckleberry Finn)里的故事,也把自己的童年理想化。在教练、老师或其他成年人的鼓励下,同侪在运动和学习方面,竞争得十分激烈。很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小学时获得了不少荣誉,升入中学后,却无法在更激烈

的竞争中取胜,从而一蹶不振。在这一竞争中,输得越多,下得赌注就越大。内在导向的孩子,尤其是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当无法实现某一目标时,往往会改变目标。不仅如此,父母和老师出于天真的想法,把那些勤奋、衣着整洁,彬彬有礼但实际可憎的年轻人拿来当作孩子们的榜样。

此外,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许多内在导向型的孩子,都会有寂寞的命运。家庭、学校以及从家到学校所经过的车站,都成了戏弄、迫害和误会的场所。没有大人会关心、同情那些孤独、受欺侮的孩子,更不会主动去询问或给予这些孩子忠告。他们从不把孩子们的游戏当作重要的事看待,常批评孩子只想着玩而不用功。同时,学校里也没有“以社会好尚为衡量尺度”的老师,故而老师不能了解孩子间的友谊和争端,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友谊。只要看看林德的小说《城中央》(Middletown)就会知道,孩子们是多么的脆弱。在小说里,一个读高中的女孩子因为母亲买不起一双丝袜就辍学了。孩子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具有友谊、理解和在一起合谐游戏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大人对孩子们的这些权力也很关心,所以只好自己默默承受痛苦或屈服于难以忍受的寂寞。

只有经过昨天与今天的对比,我们才能知道今天的优点。我们可以看出,重视内在导向的社会并不认为寂寞和受欺侮是最可怕的命运。父母,有时甚至包括老师可能已经打破了道德权威,同侪群体也会有吸引力或威慑力,但其道德约束力却很小。然而,尽管大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很少指导或帮助孩子。既不教育孩子成为群体的一员,也不教给孩子如何从群体生活中发现乐趣。

二、他人导向阶段的同侪群体

到了他人导向时期,父母扮演的角色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支配地位,长者也不再是掌权人或掌权人的任命者了。其他成人权威,如管家、祖母等人的权力也都消失殆尽,而另一些成年人,如教师等则充任新的角色,成为同侪群体的媒介或催化剂,与许多牧师从道德约束转向纪律约束的情形差别不大。

如上所述,他人导向的孩子在城市里(包括城市外围郊区)长大,而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市民等级越来越明显,并且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以年龄和阶级来划分等级的群体。因此,人们让自己的孩子与另一些年龄、社会地位相仿的孩子相处,一起去学校、运动场和夏令营。如果成人是法官的话,孩子的同侪群体就是陪审团。正如在美国,陪审团在审判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样,同侪群体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的影响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 审判

内在导向的父母强迫孩子们为家里尽点儿责任,如卫生和大小便的习惯等,而他人导向的父母在这类事情上表现得较为宽大,而是急于迫使(虽然父母未意识到他们在强迫)孩子进入社群生活圈。今天的父母宛若三四岁的儿童聚会的舞台监督,就像早期父母为儿女包办婚姻那样。虽然目前婴儿自我要求的喂奶时间表甚为流行,但在家庭以外的社会化过程中,不常观察到自我要求。有母亲担任后勤工作的家庭日常活动的时间表,旨在培养孩子必备的才能,尤其是合群的能力。有些成人对孩子喜欢独处或只找一个玩伴感到不可

思议。

因此,孩子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志趣相似的同伴,而没有气质和品位上相似的朋友。从外表看,这些孩子没有多大差异,所以很难评判或意识到自己与同伴的内在差异。显然环境是高度标准化的,每个孩子都面临特定时期的儿童训练和儿童娱乐方式时尚风潮的冲击。我们知道,正是这种高度的标准化削弱了父母的权力。一旦孩子的活动偏离了这一标准,父母和孩子便会立即感觉出来,并认为这表明了父母的经验不足与无能。在这种情况下,成人十分关心孩子能否在同侪群体如鱼得水,关心孩子的顺承能力。同时,父母还倾向于忽略甚或抑制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间的差异性,因为该差异性会使父母对自己的顺承性以及养育子女的方式产生怀疑。

大多数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进度很快,可是,以孩子智力因素为荣的成年人也许对当代他人导向的儿童在社交场合的踌躇不大在意。事实上,当代孩子不论是和大人在一起,还是在校内外可天天见面且结伴去舞会或派对的异性面前,不再害羞了。更进一步说,这种顺承性为孩子们长大准备了新的社会流动性,该流动性不同于内在导向社会中暴发户社会地位攀升的经验。后者只是从新朋友那里获习知识和社交上的优点或者阿谀奉承新朋友,他们不是继续保留粗俗、低鄙的行为举止,就是在攀升中学习新的仪态。无论前者或后者,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地位的痕迹,并为其言行确立标准。相比之下,他人导向的孩子在与新朋友相处时,能够随着身份地位的微妙标识自动调整适应自己。

在讨论了他人导向者社会性的积极成就之后,让我们从同侪群体对个人的教育和启发功能转而探讨其对个人的压抑

性。今天,6岁以上的孩子有句流行的话:“他(她)自认为是大人物(或者说他自以为了不起)。”这句话象征了同侪群体在塑造他人导向的性格方面的作用,其用意是煞煞那些太锋芒毕露人的傲气。从很早开始,外露自夸就被认为是要命的缺点,就像从前的人认为不诚实是最糟糕的一样,自夸和自夸千万是要不得的。

此外,脾气大、好妒嫉、情绪化等在同侪群体中也是不受欢迎的。所有的特殊个性和怪癖都要多少收敛或克制一些。同侪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判断,常带有明显的个人喜好偏见,因而这种判断以较为含糊和不断变化的词语表达:如惹人喜爱的、讨厌的、老土、亲爱的、好样的、宝贝儿、时髦的、母狗(没有确切含义)等等。当孩子们被问及愿意和谁坐在一起,不愿意和谁坐在一起以及愿意让谁当头儿或找谁做朋友时,好尚的异同就立刻反映了出来。这些判断是有意义的评估,因为判断是根据孩子们的个人好尚作出的,孩子们正是根据这些好尚因素将同伴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类型。

73 然而,如果说同伴的判断纯属个人好尚,而不反映道德或品质问题,并不表示任何孩子大可对这些判断置之不理。事实上,孩子们常受他人意见的左右。如果同侪群体是一个粗野的,给人带来痛苦的群体(我们仅限于讨论城市中产阶级),那么每一个孩子都会义愤填膺,以致故意反抗群体的命令。像他人导向的社会化过程中成人那样,同侪群体还算友善和有忍耐性。同侪群体里面,强调公平竞争,加人的条件也似乎是合理的而有意义的。如果群体不是如此而是邪恶的话,道德的义愤也就为时已晚了。孩子们在群体中受到“陪审团”的审判,既得不到自己道德良心的支持,也得不到成人的支持。一切道德都以同侪群体本身的道德观为准。事实上,真正的道德观被“群体的功能在于玩乐”这一混淆的观念所掩饰,道

德问题的严肃性(可以使儿童正确判断是非)也被冲淡了。

► 镇上人的议论：好尚的社会化

在同侪陪审团的眼中，一个人可能今天是好样的，明天就成了孬种。撇开领导问题不谈，光是容忍力就依靠对时髦风尚的高度敏感性的反应来确定。获得容忍力有几种途径，其一是个人摆脱群体判断和好尚的纠缠，诉诸于我不想争辩的托辞；另一种方式是借助特殊的消费能力，如休闲娱乐活动来赢得重视。运气好的话，一个人甚至还可能成为品位和舆论的倡导者，对整个同侪陪审团有着莫大的影响。

每一个特殊的同侪群体都有自己的拥趸和独特的隐语。个人在群体中的安全保障不仅在于掌握特难的社交技巧，而且还要掌握消费好尚的动向和表现方式。所谓消费好尚既包括对消费品的喜好，又包括对群体成员的欣赏。恰当表达个人好尚的方式则是，个人必须技巧而敏感地觉察出他人可能的好尚，然后交流双方的共同好恶，促进亲密往来。

这种说法，在内在导向阶段已为人们所熟悉。所以对我们而言，认识消费好尚的训练取代礼仪教育的程度究竟有多深，是十分重要的。表面的礼仪可以说是人们处理与不愿深交的人的关系的一种托辞。成人与青年、男人与女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界线越分明，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沟通就越需要有某种法则充当媒介，此时表面的礼仪就特别有用。因此，礼仪既是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的手段，又是保持人与人之间一定距离的手段。对某些人而言，礼仪在情感上的影响力或许微不足道，是随手可得的行为掩饰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礼仪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等级使人感到紧张，以至于表现出性格上的强迫症症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牵涉到的都不仅仅是个体与个体的冲突，还代表了不同社会等级、不同社

会角色的人们间的接触。

相比之下,在他人导向者身上,消费好尚的训练取代了礼仪训练。其作用与其说是便于与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交往,不如说是在沟通同年龄、同阶层的同侪陪审团的好恶。例如,某些群体(不论大人或小孩)热衷于讨论凯迪拉克牌与林肯牌汽车的边际差异,另一些群体则关注福特车与雪佛莱车的差异。前者也好,后者也罢,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具有观察他人好尚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不止于礼节性的交换意见。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们与那些交换意见的人交从甚密,其实他们的交流只涉及对商品的议论而已。但不可否认,在交流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情绪上的激动或兴奋。一方面,他人导向者对其他人的好恶变化非常感兴趣,而对好尚社会化差别较小的传统导向或内在导向的人来说,对此则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人导向的孩子不论他自身的心理雷达装置是否运行正常,都希望从交流中学到新的知识。

当然,害怕落伍与赶时髦心理特别强烈的社会阶层,一定要有迅速接纳新风尚的能力。为了避免跟不上时髦而与众不同,人们在外表及言谈举止上,就需要能做到今日之我不同于昨日之我的地步。在此,人们必须准确洞察变化中的一切。75 一般来说,风尚的兴衰过程表现了喜好人数的多寡与流行时间的迅速性。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产生了闲暇经济,其时收入和产品分配的改善促进了社会产品分配形态的改善。人们也更能促进风尚的流行与传播,并从细微的差异上来区分产品的好坏。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后期,大量的生产与分配不仅允许,同时也要求产品数量增加,以及花色品种更丰富齐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形成了商品边际差异的垄断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现了迅速设计、生产和分配各种产品的机器和组织。

这就是说,一个准消费者要学的东西比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要多。举例而言,外国人到美国游览观光,可能会觉得女推销员、交际花、女明星的穿着打扮几乎没什么不同,不像欧洲社会人的身份地位的区别较为明显。但美国人知道(如果他想在爱情和生活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知道),游客的认识是错误的。一个人必须能找出象征各种风格与社会地位的细微差异的标志,譬如说,能区分上层阶级人偶尔的随意打扮和下层阶级人有时有的郑重装饰。越注重礼仪的时代,社会阶级间的差异就会越明显。

为了了解孩子们在具有决策能力之前的消费天赋(我们再也不能低估孩子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我们必须倾听孩子们对电视模特儿、汽车外形、各种流线型轿车性能的谈论。即使父母买不起孩子所谈论的最新款式,孩子们也能参与意见。事实上,如果只把有财力的人培养成消费者的话,经济的发展将缓慢下来。

与内在导向阶段相区别的另一个实质性变化是,当今格调品味的社会化范围更广泛了。在内在导向阶段,礼仪与阶级力量的约束,使得生活的某些领域被视为纯私人的范畴,在礼仪范围内,人们要么冒犯礼仪,要么受礼仪约束。而在今天,人们已作好准备开放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同侪群体对个人生活的某一领域感兴趣,就可无所顾忌地干涉。正如《妇女家庭杂志》中“青年侧影”专栏的连载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年轻女子喜欢和她们的闺中密友,私下谈论并比较几个追求她的情敌的亲吻、抚摸技巧。^[1]鸿雁传书的爱情方式已经过时了,新的爱情方式打破了做爱的神秘性。孩子们早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和异性约会,甚至明白对情感的好尚和对消费品的好尚一样,都会被社会化,然后在闲聊中派上用场。尽管礼仪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障碍,但消费品味的社会化交流要求

人们,要么放弃个人品位,要么像一个自由派神学家心中的上帝一样,把个人品位埋藏在个人本性深处。面对同侪陪审团的裁决,个人已经没有特权来免于自我牵连。

那些促进消费品位社会化的力量,也造就了更多的行为社会化标准。他人导向的孩子一旦开始学钢琴,就像天天在和大师决高下。他压根没想过他的同侪或指导老师一直在把他的技艺和大师们相比。无论他朝什么方向努力,如艺术成就、谈吐仪态或指法技巧等,同侪们都会立刻予以比较,并以一种典型的大众传媒受众的艺术鉴赏眼光来评判他。不久,这一过程就在他身上内化了,即使没有旁人在听他演奏,他也会自认为是在和杜钦或赫拉威茨等钢琴大师比赛。因此,把他人导向的孩子培养成为掌握高超艺能的人才十分不易,因为标准太高,而他拥有的私人时间太少,无法日臻成熟。

77 新的时尚模式与其说在培养孩子弹奏乐器的能力,不如说是在培养孩子对音乐的鉴赏力。1947年秋,我对芝加哥地区十几岁的孩子进行了访谈,主要问及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爱好情况。同时,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些音乐专家,并研究了自动留声机的牌号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我主要想知道,这些青少年如何把他们对音乐的兴趣,运用在顺承同侪群体的过程中。这些爱好流行音乐的年轻人,与8~11岁的孩子通过收集消费卡来体现他们的消费竞争一样,似乎把收集唱片作为与群体建立紧密联系的手段。好像哼几首流行歌曲就表示跟上了流行。女孩子在这方面的要求比男孩子更强烈一些,尽管男孩们也不弱。流行歌曲实际上代表着人——人的情感和与他人接近的方式。此外,我发觉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对自己是否选对了爱好十分担心。有一次我访谈其中的一群小孩时,发现他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总是左顾右盼,看着别人的反

应,如果不是问及一般音乐,如交响乐或协奏曲,而是特殊歌曲或唱片,他们总是非常关注群体中其他人的态度。读者如果没有仔细观察过青年人对于与群体不一致的恐惧,就会轻率地认为,年轻人总是顺承群体的抉择。这么说当然也没错,不过我认为,今日年轻人对音乐爱好的一致性,较之内在导向阶段更为特殊,也更为强烈。在内导向时期,有些孩子们本身就爱好音乐,有些被父母强迫去欣赏音乐,还有些根本就与音乐无缘。

我访谈的对象中也有学钢琴演奏的人,可是他们却不见得真的对音乐感兴趣。其中有一个14岁的孩子倒真的对音乐颇有兴趣,能弹奏古典乐曲。他的母亲告诉笔者,她不愿意孩子练得太多,以免和其他孩子合不来,并常常鼓励孩子参加户外体育活动。她说:“我希望他做个正常的孩子。”访谈获得的经验显示,不能把消费行为和品位视为人类谋求自己与文化媒介密切联系的手段。如果这些媒介被当作建立人际关系的筹码,就很难有个人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不论文化媒介的特质如何,它都值得回味,值得通过个人纯粹的、独特的爱好来保持非人为扭曲的真实性。

除了讨论兴趣爱好的交流外,我们接着要讨论那些试图影响众人的判断,并能左右众人判断的意见领导者。²¹事实上,他们这么做是很冒险的,他们必须在边际差异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尝试,才能把冒险性降至最低限度。我的访谈资料显示,在一定的地区或阶层里面,同龄的孩子群体有自己的音乐好尚,例如年纪小的孩子喜欢甜美的音乐,稍大一点的孩子则认为甜美音乐平淡无味。从一般倾向可以看出,一个女孩或许不喜欢梦露的歌而把科莫的歌列为最佳歌曲。如果她能详细而坚定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她就有机会被大伙儿推举为意见领导者。尽管大多数青年人可能并不喜欢热门爵士乐或南

部乡村歌曲,但他们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强烈好恶,于是就成为意见追随者,更谈不上边际差异能力。

79 他人导向者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扩张消费界限的活动中去了,正如内在导向者的全部精力都付诸于生产一样。内在导向的倾向性往往不鼓励成年人和孩子们消费。但是有时候,尤其是较少受清教徒禁欲主义洗礼的社会上层人士,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为了积德或做善事,大量消费自己的或祖先遗留的财产。这种消费方式在上层阶级中尤为显著。传统导向业已成为明日黄花,内在导向的上层社会人士,渴望拥有财产,以资炫耀。在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驱使下,他们追求获取与消费。其实,他们的目标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只不过时代不同,个人天生欲望的决定力量强于消费者群体的决定力量,以使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不亚于对金钱的热爱。漂亮的房子、骏马、美女、名贵艺术品等,都可能成为他们新的投资目标,因为这些东西在消费者的品位上,其价值是稳定的。

现在,这种较为稳定的个人主义式追求,已经被他人导向者从同侪群体中接受的变化多端的好尚所取代。不仅如此,在内在导向社会中,驱使人去工作,甚至逼得人发疯的种种欲望,在今天已经比较容易获得满足了。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欲望成为生活标准的一部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欲望依然存在,并且是无止境的,他人有,自己就该有。今天的消费者受同伴的影响,其潜在个性也被这种影响训练有素。在他人导向而非目标导向的影响下,消费被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消费者因担心招致他人妒嫉而不敢过于卖弄,同时又由于妒嫉他人而不敢太吝啬。

今天,除消费对象本身存在某种划分外,成人和孩子的消费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孩子们也许出得起游戏或玩具的钱,大人们则买得起杂志和汽车,两者的消费模式越来越趋同

了。在同侪群体里面,孩子们作为消费者的训练很早就开始了,并且持续到成年以后。内在导向的孩子被认为是有职业心的,即使他不见得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有明确的认识。今天的孩子,将来无疑是一群精明的消费者。

这种现象在孩子们早期的娱乐消费中就已表现出来,最典型的莫过于玩具种类的增加。男孩子的玩具不仅有模仿生产的东西,如卡车、蒸汽铲子、玩具士兵、战争玩具等,又增添了新的贸易玩具,如洗衣店的卡车、玩具电话、加油站等。女孩子的玩具除洋娃娃及衣服外,还有成套的少女化妆品和录音机。

孩子们娱乐时所用道具的增加,落后于他们对消费品偏好的“合理计算”的增加。在内在导向阶段,孩子们接受印有注册商标的麦片做早餐,主要是因为家里餐桌上摆的就是这个。今天,孩子们吃麦片粥或其他类似东西,是为了迎合大众潮流:“吃麦片得冠军。”宣传画上也写着:“吃麦片令冠军更放松。”因此,他人导向的孩子很快就会明白,消费任何东西,必有其理由。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他所消费的商品是同类产品中最棒的。当孩子成为准消费者之后,就不再求助于广告识别什么是系列产品中最好的。被大多数人称赞或同侪消费者一致推荐的产品,就是最佳产品。按照这一标准,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大多数人喜欢的商品。事实上,这些商品被广泛推介也是有原因的,肇始者不是受广告影响,就是从大众传媒获取信息。此外,当然还有其他若干原因。英国诗人布莱克有诗云:“孩子的玩具和老人的理由是两个季节的果实。”在消费群体里,玩具和理由混杂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说,孩子和成人的消费趋于一体。

这些消费模式为女孩子增添了额外负担,一则由于女性是社会公认的消费领导者;二则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易感受到

扮演其性别角色所承受的压力。无论任何社会或阶层,男孩子被允许比女孩子具有更多的攻击性,在好尚方面也有更多的选择,比女孩子更能抵御他人消费好尚的影响。

81 最后,孩子从准消费者一跃成为家庭消费的指导者,反过来教导父母。《生活》杂志曾经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少年的乐趣”(Teen-age Fun),论及某些美国城市流行的风尚和娱乐。有些娱乐甚至对于一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都还是闻所未闻,十几岁的孩子启发了成人的消费,而非相反。该文称:“最典型的例子是,丹佛高中的老师竟然模仿最受欢迎的男孩子的独特的问候方式”。

► 同侪群体的敌对合作者

男孩子借问候方式表现了自己作为意见领导者的才能和边际差异,恐非偶然之事。消费群体除了进行消费时尚和消费购买意见的交换外,还利用消费者的名义进行消费活动。换言之,友谊被视为最大的消费品,而同侪群体本身也是消费的主要目标,群体自身的时尚时刻处于竞争中,同侪群体按好尚的标准不断地进行交流。例如一个人扪心自问:谁是我最好的朋友?其次是谁?再次是谁?最讨厌谁?一个人的他人导向越彻底,他就越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好尚分类,并和他人的进行比较。事实上,他人导向的孩子与内在导向的前辈相比,对众人的评价格外敏感和了解。以体能勇武来划分等级的方法已经过时,那只是工人阶级子女比高下的方法。然而,在上层阶级的子女中,杰出者的标准更模糊,成人往往不得而知。可是,对孩子们来说,这一标准是不言而喻的。

内在导向者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所具备的巨大竞争力,似乎已转化为获得同侪群体赞同及赞同的无形保证的竞争了。个体为了博取赞同而竞争,就会压抑自己外在明显的竞争性。

在此,我们从别处借来“敌对的合作”一词说明这种情形,十分贴切。

这种竞争行为的转变十分重要,本书第六章将作专门讨论,此处我们只需注意一些可作参考的要点。由于父母的性格是在早年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竞争性,因而从表面看来,他们的竞争性要比孩子显著。我们的许多意识形态,如自由贸易、个人主义等,都是靠父母、教师、大众传媒传递而来的,颇具竞争性。同时,我们还发现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助于个体顺承群体的约束力,但其重要性被旧的意识形态的延续所掩盖。同侪群体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个人根本不能抵抗群体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内在导向的父母因望子成龙而灌输给孩子们的成就动机,与同侪群体需要的合作动机产生冲突。因此,孩子被迫重新考虑父母要求的成就动机,并将其转化为同侪群体所要求的合作动机。结果,父母、同侪和孩子,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转化过程。参与这一过程的三方都没想过,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塑造新的群体性格的过程中,究竟提供了多大的能量。

注 释:

[1] 一个学生写信给我:“在男孩们的谈论中,谁都不能扮演绅士。他必须说出姑娘的名字、日期以及做爱细节。困扰在于即使男孩子对那个姑娘情有独钟,仍不免将一切坦白出来。坦白足以说明同侪群体和他人导向的影响力。”

[2] 默顿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应用研究所展开对意见领导者的概念以及从群体中识别意见领导者的方法问题的研究。由于他人导向者对于垄断中心的超越常常受意见领导者的影响,所以,意见领导者的观点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意见领导者在高中、大学或工作场所学会了他人导向模式并通过传播媒介接触更新的价值观,并转化这种新的价值观来支持他们的想法。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流行

的态度和爱好时观察到这一过程,但这一过程如何形成性格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尚未得出结论。沃特·巴格赫特对这一问题作了有趣的推测。见:《物理学与政治学》杂志,1948年,第91页。

第四章

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之三： 传播者即有技术的指导者

答：我最喜欢超人，因为超人能做常人做不到的事。蝙蝠侠不会飞，而会飞是很重要的。

问：你想不想会飞？

答：如果别人都会飞，我当然也想，但是如果别人不会飞而我会，那不是太惹眼了吗？

——摘自与一个12岁小姑娘的对话^[1]

前一章我曾提到，语言是同侪群体最精炼而有力的工具。对群体成员而言，无论何时语言都是了解群体流行好尚和情绪的关键。对于局外人，包括成年旁观者，语言是神秘费解的，它不断为群体成员传送只有他们才明了的信息，局外人对此则琢磨不透。

当我们更仔细地推敲青少年群体的语言用法时，就可以了解这种语言的多面性。语言本身已成为一种消费品，它既不用来指导经济生活，也不用来建立自我与他人的任何亲密关系，不用来回忆过去，更不是纯文字游戏。反之，在当代同侪群体中，语言被用来表达群体的心声，其作用就如同一节柜台，区分里外。个体通过语言参与同侪群体艰难的自身社会

84 化过程。当代的同侪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运用语言而获得力量,因而也成为语言的牺牲品。他们极度依赖语言,因为大部分的信号都是从语言中获得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不信任语言。正如我们所见,同侪群体的判断往往十分模糊,有些古老的说法,如杂种、小人等仍然保留着,但其意思更模糊了,一个人甚至可以面带微笑骂脏话。每隔几年就会冒出一些新词汇。

同侪群体正好介于个体与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之间。大众传媒就好比批发商,而同侪群体就像传播过程的零售商。然而,传播的方式并非千篇一律的:当喜好、技能、语言首次出现在同侪群体时,同侪们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赞同与否,而且还能挑选出部分喜好,在与之交往的群体中传播开来,并最终反馈回大众传媒,以便流传更广。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一过程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发展了特别的表现风格后,不是被群体忽略,就是被群体接受。如果他和他的特殊风格都被接受了,就意味着已被整个群体接受了,至少已不再属于他个人的了。在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也可能发生这一情况,譬如前一章结尾所讨论的男孩子的个人问候方式的例子。可见,大众传媒能将个人或群体所发展出来的风格,降至非个人化的的程度,使其流传甚广。

85 本章中我所要强调的是形象描述和讲故事对儿童的影响,而非大众传媒本身及其操作和控制的方式。当然,这些影响和塑造孩童性格的父母、教师及同侪群体密不可分。譬如我们发现,某个孩子更多地受印刷品而不是他人的影响,那是因为他觉得他人太压抑,故必须隐匿于印刷读物中求解脱。不仅如此,不同文化在教育儿童对人与人的区别以及各种外在形象的区别产生知觉印象的过程中也风格迥异。不过一般说来,讲故事的人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他们向小

孩子描绘着世界,因而也限制了儿童的记忆和想像。^[2]

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千万不可将文学的类型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混为一谈。本章中,我所使用的“故事”一词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诗歌、神话小说,还包括各种传说和经过渲染的事件,就这个定义而言,一段真实的新闻纪录片也是一个故事。

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的社会,在技术上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时间和物质条件来满足来自城市中心人们的丰富想像力。工业化和大众教育并驾齐驱。这一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家庭以外的性格形成条件。因此,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传播媒介的代言人对他导向孩子的性格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只要将今天的经验和传统导向或内在导向孩子的经验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对近代社会的发展一目了然。

一、传统导向阶段的歌谣和故事

► 壁炉旁的媒介

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导向的社会利用口述家史、神话传说与歌谣等形式来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这些表达形式难免会有些含糊。但是由于故事通常是由家庭成员或与家庭有密切关系的人说给孩子们听,因而故事多少已被加工过了。事实上,孩子们也可以对故事提出疑问、批评和推敲,并按自己的理解对故事的内容进行整理。换言之,讲故事是家庭代代留传下来的一种高超技巧,与社会的其他社会化进程有一定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亲朋好友面对面所表演的故事和歌谣,带

- 86 有明显的告诫和规劝的内容,并不足为奇。他们讲述的多半是个人不服从群体或触犯超自然的权威的故事,或讲述一些杰出的人物如何在现存文化中表现出勇敢忍耐的品质。然而,在传统导向的文化里,仍有许多故事并不具有直接的劝戒意义,如《圣经》里的某些故事,描述了或成功或失败的反叛权威的例子,尽管反叛的主题通常饰以伪装,不能明说。

► 正常和异常的故事

有关反叛性主题的故事,充分说明在传统导向社会仍存在一些尚未完全社会化的内容。当人们接受某一种文化的约束,就不能再去设想另一种文化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文化的约束力。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梦想的缩影,是逃避约束的避难所、救援者,甚至还可帮助他们梦想成真。羞耻感和罪恶感等压力凭借最普通的忏悔得到解脱,神话传说为这种解脱提供了可能。神话传说将顽固的、尚未社会化的人类本性刻画得人木三分。这就是神话传说跨越时代、跨越文化疆界的原因之一。神话把人们描写得比表面上还要凶狠、妒嫉,且更富反叛性。

为什么神话的力量会如此之大呢?如果人们只知顺承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没有超越文化禁忌的观念,生活将会变得非常乏味,以至于危及文化本身。依赖传统导向的文化,通常设法把某一程度的反叛性制度化,不仅因为这些反叛性偏离了社会正常轨道,而且还为使人人无邪念。有时,制度化的实现建立在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因此,某些文化允许,甚至鼓励孩子们傲慢无礼,以钳制成年人;另一些文化则允许老妇人淫乱,借以钳制年轻女子。有时候,社会规定几个特殊的日子,如宗教节日,在此期间不允许娱乐。

- 87 反叛的孔隙存在于文化所认同的幻想王国之内,大众传媒

的前身——传说和故事具有双重的社会化功能。长辈通过讲故事告诉晚辈：如果想赢得大家的欣羡，就得向某某人学习，遵守群体的神圣传统。甚至他们还告诉年轻人：某某人坏了规矩，他所干过的坏事比你们曾干过的或想过的还要多。不管这个人是否还活着，他的确有生命力，因为人们总在谈论他。故事里正反两种情绪的并存，促使年轻人融合了他们内心一直被压抑着的冲动，将这些视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并通过神话故事将成人心理压抑的部分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最终，这些故事使年轻人或多或少地脱离了他们耳闻目睹的周遭环境，不论他们的行为受到赞同或批评，他们都照样做下去，换言之，故事里榜样的行为，并不能在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找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可以假设，内在导向的演变最初总发生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这一小部分人借教育或其他途径了解社会发展的大致方向。正如在数字传播理论中，所有的传播渠道都是技术上所谓噪音和信息的混合，从而限制了传播者的自由。同样的，一切促使年轻人社会化的信息，也必然混合了引起不同效果的噪音，噪音可以使年轻人过度社会化，也可以使他们社会化不足。

二、内在导向阶段印刷媒介的社会化功能

当社会步入人口过渡增长期之后，正式的学校教育的机会增加了，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培训人们适应工业和农业社会新的、更专业性的工作；其二是吸收农村剩余年轻劳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多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然，年轻人学会了读写。与此同时，老年人也受到了教育的刺激和影

88 响。从而社会中出现了报纸、书籍等印刷读物的渴求。这种渴求受分配机制和技术的引发,却远远得不到满足。渴望读书所引致的激动,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而形成的性格革命的标志。

美国及其他初期人口减少的国家,读书的渴望已趋于平缓。尽管许多严肃性刊物已趋饱和,但满足大众文化娱乐需求的书刊仍然供不应求。若需了解旧的模式,我们不妨从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苏联和墨西哥等国来看。那些国家老人渴望读书,年轻人热爱学习。美国南方那些自我教育的黑人社会中,也有类似情形。

上述情形何以促成从传统导向向内在导向的演变?我们可以从托马斯和赞尼基合著的《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³一书中找到答案。作者描述了19世纪末波兰的乡村读物如何帮助波兰农民重建了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指出,当时,识字的单个农民不仅在不影响性格塑造的基础上学会了技能,而且还脱离了社会的主要群体和传统导向。印刷读物带他们进入转折点,不但支持他们脱离社会主要群体,抨击主要群体的价值观,还为他们提供联盟感,虽然仍有些人对此感到苦恼疑虑。

于是,印刷媒介联接了个人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波兰农民的乡村读物不仅支持新性格的建立,如谦让、勤俭等,而且还像美国农业变革那样,孕育了科学种田事业的发展。在波兰农民的眼里,科学是一种内在导向的道德观,与传统导向农民的迷信思想相对立。这些态度既体现于报刊的政论性文章中,又体现在充满道德说教主义主题的小说里。

89 因此,读者可借读书来逃避邻居的批评,并参照读物中的榜样来检验自己的内在导向倾向。因为他偶尔可能是刊物的地区通讯员,就会为刊物写稿,将自己的体验公之于众,以求

得其他读者的认同。这一点很像 19 世纪的美国人,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投向本地的报刊。这种体验公开的表现,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使农民们更坚定自己的内在导向进程。

► 文字的鞭策

传统导向的人不仅具有传统的生活标准,连工作时间、努力的程度也都有传统标准。印刷读物融合了其他社会化媒介,摧毁了这些标准。内在导向的人通过印刷读物得到理性思维的启迪,塑造了一种新的性格结构。这一新的性格结构驱使他比传统导向的人工作时间更长,减少休闲娱乐方面的开销。他之所以会被驱使是因为他自愿如此。

文字对我们的影响不是暂时的,它能左右我们的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的程度。当然单纯靠印刷读物并不能完全为任何特殊形式的社会强制力提供保障,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即使是内在导向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识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印刷品的出现强有力地使某些榜样合理化,并告诉人们该如何行动。报刊杂志所介绍的知识,就像教师或家长对孩子们的直接指导一样,使人们社会化的进程从传统导向家庭壁炉旁的聚谈,一跃进入新兴中产阶级的私人卧室和藏书室里。这也就是说,孩子们可以借助简单阅读来迎接生活的挑战。

若要更充分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影响了文学的内容、风格以及杂志的类型,而且还影响着读者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文字内容的大量增加,使孩子们比传统导向时期有更多的选择阅读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信息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信息,他们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再受传授者观点的限制而阅读。读者接受的信息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变化上都更宽泛了,印刷品

因而成为促进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丁文《圣经》被译成口语化语言,使得平民百姓也能读懂从前只有教会人员才能读的《圣经》。

研究从传统导向阶段向内在导向阶段的演变进程,最常见的困难是一般人常从语言目的性的角度出发。例如,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假定,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的主要对象仅限于那些能引起共鸣的人,而经常忽略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来证明任何特定传播媒介都有其确定的对象。此外,生活环境的非个性化加速了人们认知程度的两极分化,人们要么盲从轻信,要么毫不相信。譬如,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反映个人地位沉浮的故事,中产阶级对此极感兴趣,而贵族阶层却对此心怀不满,他们认为其他阶级最好安分守己。

我的印象中,在印刷读物的压力之下,那些性格中犯罪感和紧张感不断增加的人最易受到过度影响。他们的性格结构不能应付内在导向社会对其提出的要求,其心理陀螺仪毫无规律地乱转。由于未能在印刷读物中找到说明自己行为的理由,没能发现对人类过去罪恶的解释,印刷读物就成了他们不良顺承的证明。殖民地的传教士借助印刷读物的宣传,利用礼拜天的布道,就可使教徒陷于长达一星期的心灵折磨之中。

91 因此,传统导向社会的神话和图腾,将受众的叛逆倾向融入文化模式,并以此来维护传统,印刷读物既能使受众顺承社会,又能使其反抗社会。文字一旦普及,就确立了相应的文字审查制度(不仅仅是官方检查),这就是印刷读物双重性的明证。以美国为例,如果拿今天的报刊杂志与过去的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于印刷读物越来越笃信了,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检查制度使编辑对出版物的态度认真而负责。报刊杂志一旦涉及色情报道,总编就会警告说:“先生们,别忘了,这份报

纸要走进千家万户”；或者像《纽约时报》所标榜的：“所有报导均适于发表”。

虽然我不能准确地衡量早期资本主义的传播媒介如何影响持不同意见者，其不良作用的程度又如何，但我可以合理设想，印刷媒介比口头的、面对面的传播含有更多的频道噪音。

► 印刷媒介中的榜样

内在导向阶段，印刷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教育孩子认识成人扮演的各种角色，并使孩子在幻想中尝试担当这些角色。人口过渡增长阶段与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生活的区别在于，过渡时期的成人经常从事一些孩子们不再注意或理解的活动。这些成人一旦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就需要各式各样的印刷读物填补内心的空虚，需要内在导向模式而非传统导向模式来引导其生活。印刷媒介和其他流行文化的形式，通过促使其回想父母对他们的热切期望，以及父母在他们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给予的特殊指导，而满足他们的需求。

就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南北各地而言，所谓成功的新途径，完全是以成人的标准来确定和衡量的。在人口过渡增长阶段，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长，所以受过教育的孩童和成人在年龄上的差异，或曰在成熟度上的差异比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小得多。尽管印刷读物和小说故事比以往流传更广而且更易得到，但仍有许多穷人买不起合适的书来读，这些人中当然也有因工作繁重而无暇读书的年轻人。因而，成人的故事和叙述的风格常常是针对孩子而言的。以至于后来甚至有些成人流行使用孩子的语言来讲故事，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更好地向孩子灌输成人的观点。

早期的印刷读物指引着人们的成功之路，成功之路的路标，除了教义和宗教教海外，还包括礼仪权威的至高无上。诸

92

如卡斯狄莱昂所著《弄臣》(The Courtier)之类的书,大体是专为成人而写的,对那些即将成为成人的青少年而言则无书可读。同时,人们愿意像切斯特菲尔德那样相信,年轻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在要求礼仪的场合表现得体。大约在公元1600年以后,新教国家一致认为,印刷读物的目的和主旨越来越关注于如何在商业上获取成功,而非爱情和交际的成功。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崇尚商业味的风气达到了高潮,如斯麦尔的成功传记系列。在美国,崔拉修·阿伽(阿伽:美国文学家,作品主要反映青年人如何为摆脱贫困而奋斗。——译者注)的书也是如此,在十几岁的孩子中很有市场。

韦伯将富兰克林的小说《可怜查理的日记》(Poor Richard's Almanack)选为新教伦理盛行时期典型的自我激励的文献。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等。虽然这些作品未能明确揭示成为企业家的方法,但至少提供了一些告诫。例如,在《天路历程》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社会选民和宗教拯救的动机,而在《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中,则可以找到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痕迹。这两部作品旨在点燃内在导向年轻人的野心、志向和冒险精神。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神话在风格上的变化也比工业社会以前的传统导向时期更为显著。例如,中世纪时代,个人也可以从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基督教义的或是古典的和民间文学作品)中,汲取有关人类本性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未必靠语言或文字来表达,教堂的玻璃窗和石壁上,画满各种了教诲。孩子们被训练去了解这些象征符号的含义。与此相反,内在导向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自创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风格,避免直接使用任何象征符号。

这种纪实风格成为内在导向时期的一种文学索引。在这一时期，人们有闲暇创作小说，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幻想。《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运用各种写作技巧，如第一人称叙事以及对衣食住行的细腻刻画、贸易日记、共同见证等手法，烘托了冒险故事的写实背景。在这方面，笛福堪称喜剧小说的开山鼻祖，他试图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描述来掩盖环境的虚构性，这一处理手法与内在导向时期中产阶级对待生活的方式相关。笛福认为，生命存在于外部的细节中，象征符号的意义必须经过具体情节的过滤。

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人们一窝蜂涌入大城市谋生。此时，笛福早期的自然主义倾向渐渐让位于描写都市复杂人际关系的写作手法。随着社会阶级界线的逐渐明显，小说的内容开始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微妙阶级差异。地位的浮沉以及为了向上爬而产生的冲突成为小说的基本素材。孩子们被教育要树立远大抱负，要学会辨认阶级地位与阶级道德的细微特征。小说、日记与信札为人们提供职业与社会地位的指导。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人物，或同时代的美国情景剧《东林城》(East Lynne)、《不宽容》(Intolerance)中的人物，甚或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角色，都是老派的典型榜样。然而，对老一辈读者而言，这些小说或戏剧对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别处)中的人及其社会阶层的描写，或许并不难以理解，反而探索了混乱的世界，为年轻人理解这一世界提供了帮助。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乡村中学演出的《庞金·克利克的狡猾阿伦》(Aaron Slick of Punkin Crick)一剧中看出，涉世未深的内在导向型观众对剧中人物老派的阶级、志向和美德的真实表演有何反映。

传记和小说都促使内在导向社会的孩子在幻想中试图脱离家庭,步入一个理想的社会,以便与父母为他装置的内在“自我驱动”程序相符。例如,孩子们在听了乔治·华盛顿的传奇故事后,就会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当总统。孩子们因此有了一个衡量和约束自己的尺子:只要不说谎,努力学习,效仿华盛顿的童年生活等等,那么,他们长大以后,也能成功担任华盛顿所属的角色。不仅如此,在孩子们的心中,角色的作用是持续的,即某某永远是总统。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不再像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那样昙花一现。在想像中,小孩子不仅以英法殖民战争期间的华盛顿自居,而且以就任美国总统后的华盛顿自居,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华盛顿的角色均在社会生活和地理空间上把孩子们拉出了家庭。

同样地,B. T. 华盛顿(B. T. 华盛顿:黑人教育家。——译者注)的故事,对黑人孩子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华盛顿总统的故事对白人儿童的影响。B. T. 华盛顿的毕生事业和努力就是鼓励黑人孩子从传统导向转向内在导向型性格。他曾专为黑人写了一本名为《性格的塑造》(Character Building)的书。此外,他还在塔斯格基主持出版的《黑人工人》(Negro Worker)期刊中,强调节俭、勤劳、懂礼貌等良好品质的重要性。尽管该杂志受到北方城市黑人的非难和攻击,但目前已成为关于改进“性格”而非“人格”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了。

95 ▶ 引导过度的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过分迷恋传记中的英雄人物,就会产生某种危险,因为他可能是独自一人读这些传记的,未能与成人或其他孩子沟通。也就是说,他可能被过度引导而误入歧途了。内在导向的孩子,试图按照印刷读物所描绘的理想化人物来塑造自己的性格。然而,他们对这些理想人物

没有根本性的了解,对他们不如对自己父母了解得那么深。此外,孩子们对传统导向社会口述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以神的化身出现的英雄也不甚了解。因此,在孩子们的眼里,华盛顿、克伦威尔(克伦威尔:英国将领、政治家。——译者注)、伽利保地(伽利保地:意大利军事家、民族领袖——译者注)、俾斯麦(俾斯麦:德国政治家、第一位首相——译者注)、爱迪生或福特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带有加尔文教派上帝的那种令人敬畏的色彩,使许多热衷效仿的孩子感到不安。即便是孩子们的父母(他们在效仿榜样时并不如此糟糕)也难以抚慰孩子的不安全感。

然而,由于社会鼓励人们自我克制,且安抚人们内心的不安,所以人们在从事追求善行和名利的内在导向活动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以造就一批“顺民”。不过,有时候内在导向的要求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太大,会致使个人崩溃。也就是说,冲突产生的情绪压力,在同一水平上又聚集了起来,或使情绪释放或产生新的情绪。

在此,我要强调,如果将孩子的社会化任务交给成人(成人可以与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以外的其他因素,势必造成某种危险。卡金纳斯人和荷比印地安人在责罚过孩子之后还能为其做新衣服。与此类似,传统导向时期的成人多少会关注故事是否对孩子的影响是否过重。然而,到了内在导向时期,孩子们离家上学,有机会阅读书籍或受到其他大众传媒的熏染,此时,大人们却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孩子是否被书本和同伴影响过深。

教育普及后,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要强于父母。因此有些孩子能从书籍和剧本中获知,若从事与父母不同的职业该如何着手,或者至少知道他们可以从事与父母不同的职业。当然,也有一些孩子不大能顺承性格的成规,因而缺少自律和系

统化能力，他们从书本和大众传媒中只学到了茫然失措和极度自卑。如果父母再缺少适当的社会认识，不能及时给予孩子适当的内在导向训练，孩子的失落感就会加重。至于那些所谓害群之马的孩子，无法忍受严厉的家规，印刷读物反而加剧了孩子接触外部世界的不适感。

尽管印刷媒介的传播会带来许多危险，但即使在神权政治的国家，印刷媒介也具有抚慰人们灵魂的作用。男孩子可以通过读流浪冒险小说来逃避现实的压力。事实上，内在导向时期的父母往往不允许孩子们读这类小说。同样，清教徒牧师也不允许教区内的人读这类小说。但是，无论父母还是牧师都无法摧毁印刷媒介为人们提供的避难所。我们务必牢记，在内在导向时期，人们大部分的阅读时间都花在阅读。圣经上，而圣经本身就集合了丰富的资料和各种传说，因而其中的各类信息可谓层出不穷。

印刷媒介提供的避难所，鼓励孩子们脱离家庭和同侪群体的束缚。孩子们学会如何去批评所经历之事，就像前文论述的那些追求自我解放的波兰农民刊物的读者一样。印刷媒介为读者提供了榜样，开拓了视野，为他们尝试扮演新的角色开辟了广阔空间。文艺复兴运动就充分证明了印刷媒介的力量。小说和戏剧所提供的生活方式鼓励追求个人主义，独自阅读成为独处的新方式。

三、他人导向阶段的大众传媒

► 儿童的市场

前文曾指出，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

消费训练。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自四五岁起,就有了零花钱,他们在家里既是意见领导者,又在家庭预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零花钱是要被用掉的,而在人口过渡增长期,孩子们倾向于把零花钱积攒起来以示节俭。此外,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的垄断竞争更有条件使孩子们建立日后能派上用场的消费习惯,因为这一时期人们想活得更久一些,垄断经济的时间也被期望更久些。事实上,垄断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未雨绸缪,因为垄断可以使专家们进行周密的经济规划,并且可以因规划的成功而储备更多的资金。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职业传播者认为孩子的大众传媒市场值得一顾。大众传媒不但能为专家们的研究和市场调研提供特定年龄、阶层的文化模式,也能使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在内在导向时期,教育工作者可能使用孩子的语言来表达成人的信息,但在今天,儿童语言被广告商和传播者用来宣传儿童喜爱的东西。人们不再指望孩子们用成人的观点去理解成人的世界,因为这不是孩子们该做的事,并且成人眼中的世界不像以往那么单纯了。今天的大众传媒要求孩子们用孩子的,或曰其他孩子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电影制片人把玛格丽特及其同伴的童年世界搬上银幕成为可能;同时,收音机里播放哈代斯、欧德里奇和其他青少年的故事,而广告和包装设计上也开始起用专职儿童模特儿。总之,大众传媒勾勒出孩提时代生活的场景,就好像人们在战争期间用上兵的语言描绘军旅生活一样,迫使孩子们要么自觉接受,要么强烈抵触这一场景。

可见自从孩子们能听、能牙牙学语时起,就不断受到广播和戏剧的“轰炸”。这种轰炸难免过之或不及,尤其会对某一特殊年龄段的孩子产生影响。例如,许多孩子对漫画的取向

可有规律地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动物故事“兔八哥”，接着是超人之类的英雄故事，再后是蝙蝠侠之类由人扮演的英雄，尽管他们有弱点，但最终总是胜利者。本章开篇时所引的对话表明，孩子们长大后，不但意识到自己的进步，还能察觉那些早该长大却仍迷恋动画片的滞后者。

事实上，在美国，内在导向向他人导向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在社会发展史上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大众传媒设法在如下三方面迎合孩子的喜好：①学校教科书与校规；②专供孩子阅读的刊物；③廉价的恐怖读物。然而，当把这些与现今的媒介进行比较，我们立刻能发现两者的差异。早期作者对儿童传媒市场的评估，较之今日的市场调研要外行多了。不仅如此，早期作者一般旨在刺激和鼓励人们的社会流动，而非左右人们格调品位的社会化过程。诚如奥威尔所描述的^[5]：英国《男孩子周刊》通常反对男孩子抽烟、喝酒，老师和教徒平日也这么教孩子们。然而这反而让我想起了欲盖弥彰的典故。《男孩子周刊》和他们的美国同行都在培养和教育孩子的生产意识（包括竞争意识），因此，涉世未深的孩子可能避免抽烟、喝酒等坏习惯。同样的媒介，若换在今天，则会去培养孩子的消费意识，告诉孩子如何区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如何区分老金牌赛车与切斯德菲尔德车。

我们可以引用一首古老的歌谣来说明这一变化：

一只小猪上市场，
一只小猪在家躺，
一只小猪吃了烤牛排，
一只小猪啥没有，
那只小猪哼哼呀呀把家回。

这首儿歌可视为早期孩子个性化和非社会化的行为的典范。反观今天的小猪，还有谁会呆在家里，都跑到市场去吃烤牛排，然后哼哼呀呀跑回家。

► 胜者王侯败者寇

也许，当今社会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听读方面的变化。与内在导向时期孤独的读者相比，今天的孩子有自己的群体，他们躺在地板上，边读边交流自己喜欢的故事，聆听电台播出的《孤独的流浪者》节目。尽管读和听是不相干的两回事，但在孩子们的感觉上是一回事，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同侪群体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难怪本章开头所访问的那个超人迷并不愿以超人自居，因为若这样别人会笑话她，但如果别人也相信会飞是很重要的话，就不会再认为她傻了。

正如我们所见，传统导向社会的大人把故事介绍给孩子，并不会觉得孩子与自己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大人们鼓励，至少赞赏孩子们听故事时表现出吃惊或兴奋的情绪，再后来，大人们鼓励孩子们讲故事、编故事。今天，孩子们聚在一起读故事或听收音机里讲故事时，不会有成人在一旁指手划脚。大人也不再会对孩子说：“听，孩子，从前有个……”这种亲子间的惬意关系不复存在了，孩子的想像力有了障碍，他们不再幻想飞翔。

需注意的是，连环画和神话故事之间区别明显，这些区别与上述变化有关。在神话故事中，正面人物往往处于劣势，他们多半是小孩子、丑小鸭或凡夫俗子，而反派人物多是有权有势的，如国王、巨人，或恶毒的继母。但在连环画里，主人公常是武艺高强、腰插两把枪的英雄，即便没有超自然的力量，至少也是身材魁梧、令人畏惧的。处于劣势的主人公有赖神助，

100 神的帮助通过无所不能的英雄来实现。在神话故事“杰克与豆茎”中,杰克得到了神的帮助,主要因为他的胆识、好奇和运气,而连环画里的杰克则有一个全能的助手协助。与此有类似主题的故事还有“义盗罗宾汉”和高拉哈特武士等,从中我们发现无敌英雄的形象被重复使用。

这一模式的相对变化并不能归咎于连环画,^[6]而是变化符合了孩子们在一起阅读时的接受风格。事实上,如果他人导向的漫画迷读和听的故事不属于漫画题材,他也能把故事当漫画看。他们关心故事结尾谁获胜,而不是故事的情节或道德寓意。如果有人问他们如何区分大众媒介中的好人和坏人,他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获胜的就是好人。显然,他们认为,获胜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好人的标准。

当然,孩子在读故事时,总想预测故事的结局,并竭力寻找外在线索帮助他猜测故事结束时谁获胜。在漫画故事中,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因为好人的外貌一目了然,鼻直口方、眉清目秀、身材魁梧;同样的,坏人一出场也能迅速被认出来,笨拙的、不修边幅的、胡子邈邈的、面容憔悴的等等,十足的欧洲南部龌龊人物的形象。然而在电影或漫画中,尤其是当有性感美女出现时,孩子们不易分辨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按一般漫画的标准判定是好人的最终却是坏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三剑客》(The Three Musketeers)中温特女伯爵(拉娜饰演)一角,她面貌如此姣美,何以心肠这般歹毒?

101 因此,我们遇到了悖论。他人导向的孩子被训练得对人际关系异常敏感,善于体察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使内在导向的大人也自叹弗如。不过,他们对故事中人物所面临的问题毫不在意,只关心故事的结局,甚至于先读故事的结尾,而忽略那些与故事结局无关的个人经历。看来,同侪群体的阅读兴趣及影响,使他人导向的孩子失去了判断能力。他们舍

不得花时间关注与故事结局无关的具体细节,或对故事中的英雄存有幻想。孩子间在交流彼此的体会时,不需知道英雄是何许人,就像集邮者收集邮票时,不需知道邮票是哪个国家发行的一样。

神话故事和弗兰克丛书同样强调在故事结尾谁获胜,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当代传播媒介和读者注意力转移之间的确切差别。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区别是关于旧日的雄心和当代的有敌意的合作之间的差异。我认为,雄心壮志是内在导向时期人们追求既定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以指追求名利或善行,如求职、打胜仗、造桥等。内在导向时期的竞争常常是冷酷无情的,但人们却毫不担心自己是否有资格竞争,因为竞争总是存在的。人们只有在失败时(而非成功时)才有罪恶感。相比之下,有敌意的合作可以说是他人导向群体的典型特征。在他人导向时期,人际关系比既定目标更重要。在新的竞争状况下,人们常常怀疑是否有竞争的必要?如果有,其目的是什么?社会要求人们必须合作,而不是敌对,人们就有可能对自己的成功产生罪恶感,甚至于对他人的失败,也觉得负有一定责任。

显然,内在导向时期儿童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雄心。同时,孩子们常常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尽管此雄心所支持的既定目标是和印地安人打仗、寻宝、北极探险、冰河游泳或破案等等,看似遥不可及,孩子们却毫不在意。也就是说,读者可以在幻想中效仿故事中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如勇敢、自制等。因此,不论是老的或现代版的故事,其结局总是千篇一律的英雄获胜。其实,孩子们应该被鼓励不仅仅关心最终谁获胜,还要关心英雄人物在胜利前或使胜利成为可能时内心的挣扎。

有时候人们会随便说说,今天的连环画只是在以新的形

式表达旧的主题而已,事实并不尽然,今天卡通故事的主题在不断变化,孩子们意欲效仿的英雄的变化就更大了。孩子们通常喜欢超人或变形金刚,而不是凡夫俗子,前者因有超凡的能力,使得孩子们的模仿可能小了。然而,不管联想如何丰富,特异功能培训班如何火爆,都无法使人成为超人,更何况目前人们的想像力已不常见。如今,孩子们接触的媒介比以前更复杂,因而他们对现实生活很了解,根本用不着去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他们可以很快发现一部影片的优点或批评西部影片的失误,如一个牛仔手持一把6响左轮手枪,居然连放了7枪。当代电影艺术融合了色彩和音响效果,故事情节更为逼真,这是笛福时代的作家梦寐以求的。在内在导向时期,许多小说人物都有点儿拘谨木讷,如在小说《朱利士·佛恩》(Jules Verne)中,作者更着眼于探险行为的细节,而不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好比一套宽大的制服,可让孩子们试穿、模仿。即使像皮尔(皮尔:美国作家、插图画家,擅长儿童文学。——译者注)那样富有想像力和深沉的文学家,也会为那些渴望当英雄的人,留有幻想的余地。

这套宽大的制服并没有给读者或听众模仿英雄人物的遐想留太多的空间。尽管连环画故事主人公的个性特征不明显,然而外在细节的描写却很详细,包括服饰和谈吐举止的细节。细致描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众传媒中的英雄典型不胜枚举,为了吸引大众,作者必须学会使用边际差异来创立自己的品牌。某一作家的手法和文风可以立即被另一作家识别出来。

103 写实主义的手法存在矛盾。一方面,连环画所刻画细节是众多读者模仿的对象,如一个平胸女子,看到连环画中的波霸,不免有受奚落之感;另一方面,同样采取写实手法可能是出于树大招风之虑,就像本章开头摘录中的小姑娘一样,一

旦她成了超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连自我陶醉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早期读者暗自认为自己是维多奇（维多奇：法国政客、探险家。——译者注）或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侦探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的话，就没人能看穿他了。

这些概括性的说法不必扯得太远。有些孩子（至少曾听他们说过）以超人自居，或以圣人、魔鬼自居。当然还有些孩子一会儿是英雄，一会儿又变成了被英雄所救之人。尽管连环画里英雄都是不朽的，有青春永驻的诀窍，但成长中的孩子会根据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和抱负选择不同的英雄来效仿。英雄人物的局部特征，如超人的斗篷等，往往是孩子们争相效仿之处，因为该细节能使孩子们联想到收音机、电影和连环画里的英雄造型。不妨试想一下，任何一个穿超人斗篷的人都以超人自居的话，是多么滑稽可笑，我们只能说他是个超人迷，向往他心仪的英雄罢了。

还有一件事儿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连环画可以将从前需要很长篇幅才能说清楚的故事加以浓缩，让现代读者在几分钟之内读完。反之试看《基督山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一书，伯爵在狱中几年，他的痛苦、他的令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他的勤劳、他对神父教诲的反思，日积月累，使他的报仇心理逐渐道德化了。在看过许多章之后，当他最终获胜时，已垂垂老矣。相比之下，当代连环画和广播剧里的英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胜利。同时，故事讲述时间的缩短，也使胜利得来全不非功夫的现象更为突出。确实，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连环画里的英雄也经常挨揍，但这只是为了增加刺激，为英雄在后来给歹徒的迎头痛击埋下伏笔，与人的道德和内心变化不相干。

104 此外,这一变化的另外一面值得注意,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谁是胜利者,而只追求取胜过程本身,那么他对现实生活中他人占上风也不会太在意。但大多数人都关心谁是胜者。许多人对骑手、马以及赛马知之甚少,但照样去看赛马、大下赌注;许多读者之所以站在英雄一边,仅仅因为英雄最终会获胜。同样的,游戏、体育比赛、政党竞选的旁观者站在赢者一方,是为了使竞争更精彩。显而易见,对赢家的众望会使竞争更激烈。比赛、故事或游戏为人所欣赏,不是人们真正爱好它们,而是想知道谁最终获胜。

可见,故事中英雄人物的胜利不过是表面的道义上的胜利。当然,古老道德的遗迹依旧存在,这一点在审查制度的存在以及人们对审查制度的畏惧中表露无遗。然而,连环画故事探讨的是主人公本身的道德,而非法律与权利上的道德。就此而言,道德往往成为胜利的障碍,就像推理小说中,除非真相大白,否则每个人都有嫌疑。同样,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只有赢得胜利,才能证明他的功与过。“胜者为王”实际上就是说,无论谁只要最终获胜就是好样的。

► 突突:一个现代版的警示故事

105 孩子的父母有时候认为,连环画和收音机作为最廉价、最广泛的传播媒介是新态度和新价值观最主要的表达工具。同时,他们也相信,在拒绝接受罗杰斯和卡扬思想的家庭,很难看出受众的反映。事实上,在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阅读的有关社会化和非漫画性质的教育读物中,充斥着他人导向的主题。反过来,这些教育性读物,也可能会影响社会意识较高的广播剧和连环画的作者。传播媒介通过父母和老师教给孩子一些有关儿童成长方面的规矩。我们从家长会所使用的教材中摘录以下一段话,以证明这一教育倾向:

儿童正常的、较为可取的发展远景是：能够不断地控制自己的个性，社交和游戏技巧日臻完美，在少年时代或青年早期就能有高度合作的表现。青少年应当学会从群体活动中受益，增进自我控制能力（尽管还不太完善），洞察他人的需要和愿望。^[7]

《引擎突突》（科兰普顿撰文，乔治配图）是“小小黄金丛书”里最受欢迎，同时也是在许多方面最有吸引力的一册。故事很简单，采用了同类儿童读物的拟人手法，把卡车、消防车、出租车、拖船等拟人化，为孩子展现了生活的真实画面，是个警示故事。“突突”是刚出厂的小引擎，被送到引擎学校主修两门课：遇到红旗停车；切勿脱离规定路线行驶。小引擎只有努力学习，长大后才能出人头地，成为豪华流线型汽车。开始时，突突一直很听话，但有一天，他无意中开出了规定路线，来到郊外，看到漫山遍野的鲜花，十分开心。回去不久，突突犯规的消息便传扬开来了，可是突突的玩心越来越重，虽一再被警告，仍继续溜去郊外赏花。引擎学校的校长拿他没办法，只好向学校驻地引擎镇的镇长请示。于是，镇长召集了镇民大会，讨论突突的违规行为，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突突的，大会一致决定对突突采取制裁。下一次，突突又想开溜去兜风，正待转弯，迎面遇到了红旗，便停了下来，转向另一个方向，又遇到了红旗，转来转去四面都是红旗，不得不停下来。最后，突突终于开到一个没有红旗的地方，然而这里却没有鲜花和绿草，这一切自然是镇民们有意安排的。

突突正望着前面的路感到沮丧纳闷时，突然发现他的老师举着绿旗子，在前面频频向他招手，示意他回去。本来处处都是红旗，突突几乎变得神经质，现在看见绿旗子自然十分高兴，于是兴高采烈地按规定路线驶回去。突突答应以后再也

不开小差了。回到车库,突突受到老师和镇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向他保证,突突长大后一定能成为出色的流线型汽车。

用这个故事来教导他人导向孩子的顺承行为,似乎极为恰当。孩子们可以从中得知,开小差去赏花是不好的;只要跟着绿灯走,不仅能获得成功和赞许,还能得到自由。¹²《引擎突突》故事的寓意与另一个故事《小红帽》截然不同。小红帽在拜访祖母的途中离开大道,一只野狼教给她一些关于自然美(隐喻性)的知识,然后把她吞了下去。幸运的是,英俊的伐木工人剖开野狼的肚子,把她和祖母救了出来。这个故事虽然也可视为警示故事,涉及了人类的攻击性、真实情感和性,但未能含蓄的提出美德的回报问题,也未能揭示成人世界的仁慈一面。所以在想像力的掩护下,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故事缺乏想像力,而带有浓厚的写实色彩。

107 突突的故事或许也带有类似的写实性。突突所处的外在环境体现了成人对孩子的控制,成人强迫孩子顺承同侪群体,并对孩子们符合成人要求的行为施以奖励。更重要的是,引擎镇的镇民对突突相当宽容,他们理解突突,并没有因为突突违规而忌恨他。尽管镇民们联合起来对付突突,那也是为突突好,他们对突突的改邪归正报以热烈欢迎,不居功自傲。尽管如此,故事中仍存有过分矫饰之处,如成人(教师们)的世界并不那么和蔼,镇民(同侪群体)也不是那么合作,信号也不明显,甚至人们对突突以后成为流线型汽车的保证也不非常确定。但孩子是易受感动的,因为一切都安排得如此之好,至少没有像《小红帽》故事那样的阴森恐怖气氛。探寻整个故事的原委,还是比较容易发现骗局的存在,如镇民们为突突叫好是虚伪的。最后,突突也把自己曾经开溜赏花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那些野花比起引擎、信号、道路、镇民大会等成人世界来简直是幼稚。

► 自由的范畴

以上我们已经论述了当代大众传媒的社会环境,讨论了儿童受众接触传媒的具体特点,并讨论了社会环境对受众认同故事主人公的影响。需特别强调的是,认同中隐含着竞争性。受众的认同方式,一方面重视故事结局谁获胜,另一方面却借同侪群体的约束严格限制自己在情感上与英雄人物完全同化。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同侪群体虽是孩子阅读和听故事的媒介之一,多少还是受到职业传播者的控制。在此,我想提出另一个可能的事实,即同侪群体本身也具备一套相对独立的规范,帮助维持边际差异,并使群体与媒介打交道时留有一定的余地和自由。可想而知,但凡能将态度和价值观反馈给大众传媒的同侪群体,必存在某种成就感,知道自己的贡献为人所知。当然,同侪群体也可能会有被侵犯感和被社会流行的好尚标准抹煞了个性的感觉,其最终结果完全要看同侪群体是否认为大众传媒在追随它,或同侪群体中的成员是否都愿意顺承大众传媒的领导而定。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青年同侪群体几乎不可能迫使大众传媒和其他同侪群体接受它的领导。事实上,同侪群体往往有机会建立自己的批评媒介的标准。例如,年轻人的热门爵士乐迷群体,有着相当细腻精确的评价流行音乐标准(几近学究气的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研究,儿童在顺承同侪群体和在大众传媒的肤浅渗透性的掩护下,是否有私人心理生活空间。换言之,我们得反思我们已有的假设:他人导向的孩子何以没机会独处?何以六七岁以后就很少自言自语、创作歌曲或做不受监督的梦?

我们注意到,在收音机旁长大的孩子能够消除收音机里

的杂音,就像人们梦想有自动清除仪将广告消声一样。这类孩子可能给同侪群体带来杂音,也可能消除同侪群体的杂音。不仅如此,连环画故事本身不仅是同侪群体消费模式的一部分,有时也可能是孩子逃避同侪群体,反抗厌恶连环画的一本正经的成人世界的方式。本书第三编将着重讨论大众传媒能否培养个人的自律、适应、独立和顺承的问题。

注 释:

[1] 参见沃尔夫、弗斯克:“儿童谈论连环画”(The Children Talk About Comics),《交往研究》,1948~1949年,第26~27页。

[2] 沙赫特尔的著名论文:“论儿童遗忘症患者记忆特点”(On Memory and Childhood Amnesia),《精神病学》,1947年。同时参见里斯曼:《儿童时代的绘画记忆》(Childhood Memory in the Painting of Joan Miro)一文。

[3] 托马斯、赞尼基:《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纽约,1927年版,第2卷,第1367~1396页。

[4] 显然,今天的成人文学作品更加晦涩难懂,主题也更严肃,相比之下,在传统导向时期,孩子和成人都能读懂马克·吐温的尖锐作品,也能读懂狄更斯的粗狂和威尔斯的感性。

[5] 奥威尔:《狄更斯、达利和其他人》(Dickens Dali and Others),纽约,1946年,第76页。

[6] 在此,我们说内在导向转向他人导向是一种突变,并非是夸张。埃利特·弗莱德森研究了儿童对故事的记忆能力,发现他们更易回忆起一些传统的神话故事,如“金锁”、“三只小猪”,而不太容易记住当代的黄金丛书等。参见:《儿童与神话:社会化视野》(Myth and the Child; an Aspect of Socialization),芝加哥大学,1949年版。

[7] 布兰克里奇、文森特:《儿童的发展》(Child Development),菲拉德非亚出版公司,1943年版,第456页。

[8] 《引擎突突》的故事虽未明讲其他引擎的遭遇,我们只知道突

突和慎民(同济群体)的关系非常融洽。突突的出人头地,并不表示其他引擎的失败,如果其他引擎都不指望成为流线型汽车,谁有把握突突会希望成为流线型汽车呢?

114

第五章

内在导向的生活

托马斯·达林先生永垂不朽!

托马斯·达林先生逝于1789年11月30日。

先生生前意志坚强,精通科学、文学、哲学,善于思考,博览群书,洞察力透彻,擅长推理,笃守道德。

先生为人谦虚忠厚、和蔼可亲、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待人宽厚仁慈、忠于职守,赋有社会责任感。

先生生前是一名神学教授,能言善辩,以理服人,虔信上帝,为救主上帝奉献毕生。

——摘自美国纽黑文葛地墓志铭

110 根据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性格类型始见于少数具有传统导向倾向的人身上,如东北部的法属加拿大人,三角洲地区的黑人以及德克萨斯州非法越境的墨西哥劳工等。这些人都是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的社会和阶级遗留下来的典型。其次出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性格类型是内在导向型,他们是人口过渡增长期遗留下来的性格典型。这一性格至今仍在某些地区、行业,甚至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具有明显内在导向倾向的人之外,如果我们把

那些渴望成为内在导向而实际上既无能力顺承内在导向又无能力顺承他人导向的劳动阶级也算在内的话,内在导向的人数也许是最多的。美国历史上最新出现的性格类型是他人导向型,关于此我们已在前三章讨论过该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结果,尤其是针对大城市和中产阶级。

本章及其后两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美国自进入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后,成人工作和娱乐内容的转变。他人导向性格类型的产生不仅受影响父母的和影响早期性格形成的各种因素决定,而且也受塑造或改造成人(生活在浓厚的内在导向氛围中的成人)性格的社会体制的制约。孩子虽然是人口发展过程中边缘性格的先锋,但即便是在以孩子为中心的文化里,操纵引擎、控制信号、著书绘画、玩弄政治游戏或其他阴谋的,仍然是成人。

本章开篇所摘录之墓志铭,告诉我们内在导向阶段中的一个完美典型。当然,并非所有内在导向的人都像达林先生那样完美无缺,我们必须明白,内在导向不等于良知导向。一个恶棍不择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像敬畏上帝的清教徒那样受内在导向的引导。因此,若要把握内在导向性格的特征,最好先了解这一时期人们心目中惟一的导师是上帝。

本章的前半部分,将讨论工作对于19世纪美国内在导向者的意义;后半部分将论述他们如何利用闲暇。前后两部分的划分不很严格,因为工作和娱乐总是息息相关的。此外,本章及其后两章的讨论将带有辩证色彩。讨论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将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视为两个极端,以便构成两者的鲜明对比。由于当代许多人认为内在导向已不成为问题,因而读者和作者必须极力防止将内在导向性格过分理想化,而对他人导向性格过分非难。

一、工作中的人

► 经济问题：物质的匮乏

本章及下一章的主要任务是比较工作对内在导向者和他人导向者的不同意义。工作的意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正如历史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一样。内在导向者倾向于把工作视为非人性化的目标，如客观的社会组织；而他人导向者对待工作和对人一样，不仅看工作的技能、性质和数量。因此，对内在导向者而言，生产是根据技术和智力过程而不是根据人的合作来衡量的，企业中的人际关系、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全靠一只“无形之手”促成的无形合作态度来控制的（“无形之手”一词系亚当·斯密所创，用来表示自由市场的经济计划）

内在导向阶段，人们自然晓得，工业组织的合作成就并非自动获得的。尽管人们一贯重视纪律、自制和诚实的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工作压力所引起的情绪问题是个人问题。这一阶段，大量农民离乡背井进入工厂工作致使劳动力过剩，又因没有护照制度而使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去外国谋生。此外，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容易受到新的或传统导向阶段遗留下来的价值观，以及发达国家宗教信仰的牵制。与此同时，管理者的工作压力倒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管理者为数不多，不论他是否被他人喜欢或与他人观点是否一致，都能与他人积极配合，共同完成体力和智力上的工作。与其说是他们的合作情绪，不如说是内在导向的法则使他们努力工作不息。

因此,即使在庞大的官僚化的组织机构里,人们也只关注产品(无论产品是商品、报告、决策,或是发现都无关紧要),而非人的因素。引人注意的是产品本身,而不是消费者如何使用产品。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商品崇拜论”(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内在导向的人只关心产品,忽视自己也是消费者,他不需要通过消费者的眼光审视自己。因此,在物质匮乏和技术发展僵化之前,商品的买卖问题、甚至商品交换的意义都有赖于人的心理状况。

边疆的开发,使人们注意到工业和贸易的供大于求以及地理、科学上的新发现。尤其是在我们考察地理新发现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虽然移居边疆的人善于和邻居相处,在盖房子和政治活动中能互相帮助,然而他们在选择时首先关心的是自然环境,而非人际关系。例如,托克维尔在密歇根州遇到的边疆移民,他们虽然极为好客,但实际上对他人并不关心。他们只考虑良好的自然环境,他们相信,要改变或适应环境,只有依靠努力奋斗和自给自足。

在其他事业和创业活动中,也有类似情形发生。西方传教士的热情和执著以及他们不远万里将福音传到印度、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壮举,反映了19世纪的拓荒精神。兄弟教传教活动也反映了这种拓荒精神。传教士及其家属常常成为移民的榜样和核心人物,如在夏威夷,传教士把欧洲的生活方式传播给当地人,最终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和金融大权。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也具有同样的传教意义。同时,科学家们开辟了知识的新天地,并忘我地投身于探索该领域的工作中去,他们也许像牛顿那样有强烈的妒嫉心和竞争欲,因而与同事的交往都是非私人化的,局限于文章和学术会议,没有集体研究的正式组织。在此,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控制,人们把工作视为个人与环境或观念的联系媒介,反而与人没有直接的

联系。

就目前而言,至少在经济领域,“无形之手”(其历史短暂性尚无法把握)仍半是事实,半是神话。^[1]商业主义衰落之后,政府制定了周详的经济计划,由于这些计划没有多少官僚性,而且是通过由来已久的关税、司法、运河及铁路运输等手段来实施的,所以计划是系统且有成效的。从摩尔到托尼,所有的道德君子和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生活的非个人性不满,但这一时期的非个人性不是太严重。产业往往是家族世袭的,正如托马斯·曼在《布鲁克没落记》(Buddenbrooks)一书中所描绘的,世袭观念深受封建社会残存的价值观的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和自由竞争的风气日盛,传统导向的个人化呼声仍残存于许多领域。这种个人化倾向改善了内在导向的个人主义的盛行和泛滥。

然而,与今日之情形相比,内在导向阶段的经济是相当松散和非个人化的(非个人化的情形看上去可能比实际还要严重)。这一现象使那些关心社会资本膨胀,试图解决农业、采掘业、加工业技术停滞的有雄心抱负的人,更加努力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原料生产业,对内,它沟通了人口和生存之间的鸿沟;对外,它支持了武器制造和殖民主义。事实上,该阶段内在导向过度的人,尤其是清教徒和詹生北派教徒,会超越特定的经济要求和个人收入。由于过分勤俭,他们往往使自己与家人、朋友都隔绝起来。

我们不妨说,工作为那些不能顺承流行思想性格要求的人提供了保护伞。因此我们不能假说,该阶段的事业成功人士,就一定能完全顺承社会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社会性格。在美国早期的社会生活中,许多表面顺承良好的人必然会意识到,若要接受内在导向,个人就必须努力适应,而不管这种顺承是否发自内心。

在私人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与柏尔和米恩斯《当代合作与私人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所描绘的后期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工作与财富的关系支持着离群索居的倾向。对与内在导向者而言,财富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而在传统导向时期,个人在情感和家族传统方面都必须固守自己的财产。如果内在导向的人积累了财富,那也完全是靠他的努力和精明投机。财富已不仅仅是扩大家族产业的事,而是象征个人自我能力的拓展。^[2]

这种私人财产虽然是内在导向者的保护伞和试金石,然而在当代,一个人却不可能因为拥有巨额财产而成为地位显赫之人。苏联在头几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边疆的开发者与美国、欧洲几十年前的先驱者性格类型相似: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充满自信。他们组建了大规模的正式组织,技术上不断革新,以期携手征服大自然。这些内在导向者,有时会效仿美国、德国的先进典型,在德那拉斯特罗、明托夫斯基及西伯利亚铁路进行会战。

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印度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身上发现类似的内在导向倾向的人。仿佛世界各地的人都蕴藏着内在导向的潜力,只要西方式的工业化一开始,潜力就会迸发并居于主导地位。

►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口过渡增长阶段内在导向者的工作态度,可用教科书中的一句谚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ad astra per aspera)来表示。尽管成为流芳百世的人不容易,可内在导向的人还是愿意付出毕生的努力去追求。他之所以甘愿付出如此长久的努力,是因为他所追求的目标十分广泛。他不仅追求金钱、权力和名望,而且还追求艺术或专业上的不朽成就。他想流

芳百世,让后人永远纪念他,并且也想留给后人一块像本章开篇所摘录之与达林先生一样的墓碑。

话说回来,人们之所以甘愿付出如此长久的努力,其社会原因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实现工业化和科学的新发现都需要长期投资。要修建一条新铁路,建立国家行政体制,创建孔德、麦克斯威尔或马克思等人那样的思想体系,也不是短短几个月就能做到的。竞争再激烈,也仅限于少数几个人而已。一个人若相当精明能干,他必有理由希望他的发明、投资或组织计划不被他人超过。虽然内在导向时期在技术和智力上的无形变化比人口高增长潜力时期更为迅速,但与今天的发展相比,还是很缓慢的。也就是说,在内在导向时期,一个人即使对他人的发展丝毫不理会,也能和其他人保持同步,因为他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废除或修正了自己的知识或行为。

直到1920年为止,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子对自己将来的就业问题不太担忧。如果他出身名门,他大可依赖家庭的关系网谋取高位;如果不是,他仍可依靠自己的社会性格(有形的内在导向性格)去谋求合适的职位。因为就业与生存问题并不严峻,不致使他失业,故而对长远目标存有憧憬。一旦他选择了某项事业,他就会敦促自己向行业内的佼佼者看齐。年轻的医生梦想成为奥斯勒,年轻的律师会效仿乔特、鲁特或福尔摩斯,科学家会效仿阿加西和帕斯提尔,至于年轻的画家和作家则会效法莱诺瓦或托尔斯泰。然而,一旦内在导向者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或为能力所囿,无法驾驭困难,终至徒劳无功,落个悲惨的下场。自塞万提斯以来,许多讽刺作家都评论过追求事业成功所遭遇到世俗障碍。

二、娱乐的次要性

内在导向阶段,娱乐和消费居于从属地位,工作才是首要的。对男人而言更是如此。有些男人对娱乐不感兴趣,把它完全付诸妻子;另一些男人则把消费当成一项工作,一项以购物为目的的工作。还有一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则把娱乐当作逃避工作压力的方式。

不同人的不同消费态度体现了传统导向演变为内在导向的特点。传统导向的人不必在工作和娱乐之间作出选择,亦不必费心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因为一切事物都由传统而定。对他们而言,娱乐与工作的差异仅限于服饰与仪式不同,另一方面,工作与娱乐是二位一体的,例如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中,手工艺品常常用来装饰生活用品和仪式。内在导向的人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导向和束缚,充分意识到工作和娱乐的不同。至少在神权控制较为松弛时,他必须决定允许自己花多少时间娱乐。有一点很明确,即那时还谈不上什么体闲,工作冗长无味,疲惫的商人应运而生。然而,我们今天对工作和娱乐的广泛选择足以划分如下两类人:把消费视为获取的人和把消费视为偶尔或正当逃避工作的手段。

117

► 渴望获得的消费者

内在导向时期,工作极为勤勉的人,在消费行为中也显得非常独立。19世纪的美国,狂妄的百万富翁在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吃苦耐劳了大半辈子后,开始在娱乐方面尽情享受。无论工作或是休闲,他都有可能挂上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一旦拥有了可任意支配的巨额财富,他们就会为妻子

和孩子选择管家和仆人,聘请消费、格调品位、艺术鉴定等方面的专业顾问。

因此,这段时期堪称消费的鼎盛期,富豪们在工作中付出的代价要在休闲娱乐中得到补偿。生产商为了利用资源和运送成品和半成品,大力修建新的铁路网,同时,消费者也开始在市场上活跃起来。生产商推,消费者拉,两者配合激活市场。消费第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消费者极端渴望将商品据为己有。

消费者可能不惜金钱和精力布置家庭,仿佛要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百货商店,像影片《克恩城的市民》(Citizen Kane)和《鬼魂西行》(Ghost Goes West)里一样有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家具摆设。消费者可能喜欢收藏欧洲珠宝,可能花钱购置游艇、钻石、藏书室,或者与有相同爱好的富有老友,联手购买歌剧院、天文馆和动物园。大多数情形下,他们的消费活动可自我调节,就像去北极探险一样正常,并且他们在消费活动中的表现比工作时更为果断和痛快。这一阶段的消费不必犹豫不决,因为消费品就像工作成果一样,可终身享用,不会即刻过时。

与其说渴望获得的消费者关心的是建立个人的收藏或嗜好,不如说更关心炫耀其财富,因此,乍看之下,他的行为有吸引他人注意之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韦伯兰的经典著作,就会明白他所描述的他人导向消费者,只是徒有其表而已。韦伯兰笔下渴望获得的消费者,只不过在追求符合其社会地位所要求的(或他认为该地位的人应当具备的)生活角色,真正的他人导向者则注重追求经验,而非物质,渴望被他人导向而不嗜炫耀。渴望获得的消费者以金钱为衡量他人的标准。他们认为金钱可以衡量世间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土地和美女。这种现象使内在导向的消费方式具有非人性的色

彩,其工作亦是如此。同样,如果他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他就能在投资或买卖时明确认识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所应具有的消费层次,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这样,在某一程度上他就成为消费大师,一个深知消费技巧的人。如他有欣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高超技巧的能力,而今天的他人导向的消费者,尽管对艺术知之颇多,却不敢赞赏非表现派艺术大师的技巧。于是,内在导向的消费者会在表面上竞争,韦伯兰用“装腔作势的”、“互相攀比的”、“炫耀自己的”及其他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敌对竞争。他人导向者也可能以同样的表现方式进行竞争,但只在同伴的强迫下才如此做。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不想太过锋芒毕露。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韦伯兰所强调的休闲和消费,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无情的挥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可说是社会变化的指路牌,并为性格的演变铺平道路。

► 渴望逃避的消费者

渴望获得的消费者将其在生产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动机与理想带入消费领域。反之,渴望逃避的消费者试图将工作和休闲的对立情绪极端化。

逃避的概念难以把握,我们不禁要问:逃避什么? 逃往何处? 内在导向者由于其性格和环境提供了自立自强的精神,使之能为远大理想奋斗,而不至被拖垮,因而他有逃避的可能。小时候,他就有逃避的经验,常常逃学、游玩以逃避枯燥的学习和家庭作业。他不像引擎突突那样,害怕因去河边采花而留级,当然他也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因为学校没有给孩子们游戏的权力。在逃学时,他也许会有罪恶感,可这种感觉反而更能增加冒险的乐趣,使他由逃学进而学坏。他的父亲(在

维多利亚时代长大)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很少出去寻花问柳。内在导向者因在工作中有太多的较为固定的社会化自我,故而在休闲娱乐中便以非社会化的方式放纵自己。

内在导向者尽管有能力放纵自己,但他常压抑克制自己的放纵冲动。他不能因为有了替代中世纪钟声的怀表(内化的行为准则),就不再为自己制定时间表。即使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打交道,他也不会摆架子、给脸色。当然,在阶级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同阶层间的交往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由于顾忌太多,他发觉他不由自主地去尝试未经许可的新事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论表面还是内心,是一种资本,而这一资本在清盘时可被挥霍掉。其实,从他的生活目标来看,这么做是相当危险的。清教徒把复杂过程的理性化称之为“拯救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同时也是公司的审计员。

但是,我们在这部分所讨论的对象,尽管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种种束缚,仍能以某种方式逃避。所谓逃避是指人们的态度和活动偏离了无所不包的工作领域。因此,以下我们将讨论人们如何从工作或职业生涯中逃避出来,逃向更高或更低的水平。

(一) 向上逃避,进入艺术领域

在闲暇时间向上逃避包含许多重大的周期性活动,如夏令营、巡回演出、每年各城市反重商活动的礼拜日布道、流动书报亭等等。若要介入此类活动,总要花费精力,肯花精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时间一久,服装的样式变了,从周末聚会的礼服到日常所戴的帽子都有了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人们社会角色的变化。

不止于此,还有许多的业余表演。钢琴演奏和业余音乐技巧的培养甚至比抽水马桶更能代表中产阶级对受人尊敬的渴望。同时,经常有机械学会或巡回演讲的人为青年工人讲

授各种知识,从监狱制度的改革讲到税制的改革,再到系统制度的作用等。我们只要看看贝拉米(贝拉米:美国作家、思想家。——译者注)所著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一书,就可以了解各俱乐部讨论的情况。

显然,参与者的动机并非纯粹为了逃避,而是一种伪装了的追求社会地位升迁的欲望。通过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圣经》的研读,个人可以逃避来世的危难,而非逃避今世的生活。尽管日常生活极为困苦、单调,闲暇娱乐则偶尔成为寻求解脱的一种尝试。

对于文化教养的渴望,使人们亟于遁入19世纪以前的上流社会传承而来的英雄式的理想里。因此,19世纪的一些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在休闲娱乐时常常回顾早期的更英雄化的时代,如伯利克林时代(伯利克林时代,指公元前495~429年伯利克林执政时的雅典艺术、文学、建筑业兴盛时代。——译者注)的雅典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9世纪的中产阶级为工作所驱,墨守成规,只能在私底下幻想像塞利尼和达芬奇那样多才多艺以自娱。随着夏令营的巡回举行,当代旅游和探险发现的乐趣得以传播,关于古代世界和文艺复兴时代成就的半流行文化又开始兴盛,其中罗宾汉等武侠小说的畅销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该时代工作上的困难在闲暇生活中含有情感上的对立面。

尽管时尚在古代历史、欧洲旅行或其他典型的逃避方式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我认为,就内在导向者的安全感而言,这些兴趣与他们在工作中或眼前碰到的问题相去甚远。在阅读了有关古希腊的作品,参观了佛罗伦萨之后,内在导向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认同也可能是空想的。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及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著名作家H.詹姆士或福斯特的

小说中,都描述了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男男女女热衷去意大利旅行,与其说这是在向上逃避,不如说是产生了更大的情绪障碍。这些具有充满幻想的旅行者关心自己能否体验到丰富的文化差异和感受,从而构成另一种逃避的典型——他人导向的逃避类型。

(二) 向下逃避

内在导向者既能向上逃避也能向下逃避。他能从廉价小说、斗鸡、赛马、流行歌曲等事物中发现其工作角色的不同变化。有些人到法国夏特城观光旅行,有些人则去娱乐场所欣赏艳舞女郎。尽管清教徒与保守妇女呼吁将这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娱乐驱除出生活,可19世纪的中产阶级男士则乐此不疲。

122 S. 安德森曾在作品中描述一个男子在午夜后只穿袜子偷偷溜进房间的情形。几年前这个故事被冯特改编了,并在“坦白的麦克风”节目中播出。凌晨三点,冯特站在大街上,装作不敢回家的模样。他拉住路过的人,要求他们陪他回家,以便向妻子解释为什么醉醺醺及夜归。所有的人都很同情他,虽然没有人愿意介入这一棘手的事,但人人都建议他编个谎话骗过妻子。其中一人催他先打个电话回家,另一个人则愿意帮忙把他捆起来,还有一个建议他送件礼物给太太以平息愤怒。其他的人,有的替他编造骗太太的故事,有的为他打气。从声音上判断,这些大部分是中年人。这一切说明了早期美国妇女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和对丈夫的严厉,助长了男人不安于室的心理。

讨论内在导向者的逃避意义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破坏传统的娱乐的危害性。即使在没有传统或传统力量薄弱的时候,也会产生娱乐和评价能力的问题。

一方面,美国的内在导向者世代都面临着假借沉迷于艺

术而向上逃避的要求。有时候,内在导向者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寻找到逃避的方式。较为常见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迫于女人的压力,男人被迫做一些力不从心的事情,如一个睡意正浓的商人被拉去欣赏一出听不懂的歌剧等。另一方面,他孜孜努力以免成为被动消费者、成为社会升迁中的叛逆者,借吃喝嫖赌一类的下流活动而向下逃避。因此无论在娱乐的细节或工作的大问题上,他都会竭力胜任自己的生活需要。由于向下逃避无助于或有损于个人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社会地位,所以娱乐的可选择性不多。娱乐的能力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所以,内在导向者比今天他人导向者更不愿参与娱乐活动,不愿说“我玩得开心极了”。内在导向者去观看棒球比赛(棒球是他人导向者融合经验和协作为一体的运动项目之一),也不能说是他想证明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

123

然而,我们千万不可过分夸大内在导向者和他人导向者在逃避方式上的差别。许多内在导向者通过勤奋工作来证明他们的娱乐能力。皮伯第是美国西部边陲城市的一个牧师,因组建了一只棒球队而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后成为格劳顿队的创建者。表现天主教会、兄弟会或修女运动员等的影片题材源自传统导向,大明星克里拜主演的影片《我行我素》(Going My Way)就是其中一例。更有甚者,许多内在导向的美国商人或专业人士,把娱乐当作交际的手段。他们打高尔夫球不过是一种逃避,他们的太太倾心于园艺也往往出于提高身价的动机,这类人在心理上的赌注比他人导向者小,但在经济领域上的赌注却很大。

不过,心理上的赌注还是存在的。在内在导向阶段,引导过度的人既不能放弃抑制,又不能接受抑制,因而无法总是遁入私人生活来保护自己。无论在酒店还是妓院,他们都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们证明自己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因而他们的肉体在纵欲时表现出厌恶或无能，他们只好努力战胜肉体弱点，服从理智的约束。大体而言，内在导向者比今天的他人导向者更不易受他人的左右，不会在娱乐中惹人喜爱。

三、为自我赞同而奋斗

综上所述，内在导向的社会大致可概述如下：内在导向社会的倾向是不惜使个人进行自我攻击，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

在内导向时期普遍流行的恐惧和冷漠的攻击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修道院的院规特别强调懒惰和倦怠是最大的心理危机。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中世纪神学家、哲学家——译者注）在与自我进行斗争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诚如韦伯所云，当清教思想使整个世界变成一座修道院时，全部社会阶级，而非少数僧侣开始对这种内在危险的恐惧感到困惑。内在导向的清教徒必然认为，他必须固守内在原则，时刻保持警惕，才不至于迷失生活的方向，一旦稍有松懈就会成为世俗生活的俘虏。尽管他们的性格看上去极为稳定，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由于清教徒会将内心情感祷告给上帝，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是否能获得上帝的恩宠或成为上帝的子民，经常患得患失。

内在导向者不断与倦怠的恶魔搏斗，以防止倦怠成为一种冷漠症，因而他随意编造了一个人们迄今为止仍相信的神话：传统导向者逍遥自在，缺乏向上拼搏精神，对他人冷漠的职责（例如今天经常有人抱怨公民政治的冷漠）往往就是与内心冷漠作斗争的方式。事实上，内在导向者内心十分清楚，他

的心理陀螺仪不是自设的,而是他人安装的,他人利用他对心理陀螺仪长期停转的恐惧而操纵他。因此,他并不是自我驱动的人,同时,他也明白生命不是一种过程或不断的更新,而是避免心灵死亡的努力。

为了更容易记录对冷漠的控制,内在导向者往往把生活划分为几个区隔,他可以在每一区隔内检验自己的心理防御性。他在内心还停留在孩子的状态,常确立一些力所不能及的目标和理想。尽管追求强烈。却无法掩饰个人能力的不够,他人的喝采,说穿了不过是满足自我努力的副产品。他认为,要从自己的行动和身份地位中发现可循之理由,应该依赖信仰,而非光靠努力工作得救。聪明的记录者可将工作转变为信仰,自我批评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纯粹行为的顺承无法与性格化的理想相抗衡。

因此,内在导向者的内化标准给予他某种自由,蒙蔽了他人,使他人觉不出他的无能。他就像爱迫生那样,因内在价值判断的推动而一试再试。虽然他无法保证自己免受自我批评,却能因此使自己免受他人批评。内在导向者不仅可以通过已做之事,而且还能通过将做之事来证明个人的存在。但这只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一旦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的希望成为泡影,他的内在力量就再也不能抵御外界的无情了。他将满含罪恶感而自暴自弃,竭力否认自己的失败,虽然外界事实会引起价值判断,但亦被内化。难怪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发达国家自杀率较高,纯系任何文化传统所无法控制的心理抑郁症的表现。

注 释:

[1] 参见波兰尼:《伟大的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的出色论述,纽约,1944年版。

[2] 参见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一书中的自我定义。纽约,1896年版,第1卷,第291~292页。同时参见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135~136页。

第六章

他人导向的生活(上): 从内向刻板到惹人喜爱

纯粹的社交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内容和结果,故而社交完全是以人的个性为中心的……但是,正因为社交的个性因素,对个性的强调切不可太个人化。

——齐美尔:《社交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

内在导向的人不仅为了没完没了的生产而疲于奔命,而且终生致力于自己性格的内部生产。内部生产如同外部工作一样带给人无尽的烦恼。正如生怕在经济生活中被迫退休或解雇一样,他们在内在或外在生活中表现出某种心理冷漠,这种冷漠标志着性格资源的利用不足。因而内在导向者迫切需要在心理、性格的各个意识水平方面都加以开发和利用。总之,他是一个全神贯注于事业的人。

他人导向者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他看来,无论工作或闲暇都是涉及与他人交往的活动。实际上,今天的许多职业和娱乐活动在内在导向时期就已经存在,所不同的是人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方面的进行探讨,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在同一追求形式中或随着新的追求形式的产生,性格的

演变与生活意义之间的相应变化。

一、经济问题：人的因素

在美国，当人口过渡增长期接近尾声时，边疆城市于1890年始表现出了“不再需要帮手”的迹象；如果不考虑实际的土地利用问题的话，1924年，全美国显示了同样的迹象。美国高悬黄牌，给来自欧洲的移民热潮降温。这些逐客令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世界的希望和流动的动摇乃至瓦解。移民热潮的缓和以及出生率的降低，不仅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同样也改变了人口性格的分布。今天，需要人类智慧来解决的不是物质上的困难，而是人类自身的软弱，正因为人性的软弱，为社会流动性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生产领域，甚或是边疆土地，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或在此阶段之前，已经有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生存空间，从未有拥挤之感，然而今天的美国已是拥挤不堪，再不像从前那样到处是荒野和丛林了。

在工业或专业技术领域，人员拥挤现象尤为明确。以工头地位为例，工头不再是有着独特地位的鹤立鸡群的老板助手，在他的周围有一大群人。他是下属、上司和其他工头（如人事管理员、安全检查员、工程师、查账员以及其他部门的间接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媒介。经理的情绪有时会十分低落，他不仅要处理工厂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工厂与外部社会，如工商联合会、工会、消费者、供应商、政府以及公共舆论等的关系问题。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社会福利和教育上，从而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引发人才之间的竞争。

因此,人的因素乃成为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说,原有的工具、机械技术、企业管理等的革新已经宣告终止,而是意味着工业进步已经趋于稳定,生产的持续增加已成为社会体制的副产品。美国的新工业革命已达到顶峰(虽然这一革命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才刚刚开始),革命更关注于人际沟通和操纵人的技巧,而非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进。电话、电子计算机、产品的品质管理、第三产业、霍桑实验以及工人士气的振奋等,都标志着这一革命的进展。在经济富裕和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工具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工作的真正目的是保持与他人的接触和观察他人的反应。当然,管理者未必非具有他人导向的性格不可,许多内在导向性格的人也可能成为成功的管理者,但通常,管理者的内在导向性格易使他们忽视自己操纵和压迫他人的严重程度。然而,就控制他人而言,管理者性格的他人导向倾向和对他人内心微妙需要的敏感性是一致的。

我们的一次访谈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被访者是西海岸一家大机械公司负责销售与广告的副总裁,同时这位先生还是机械贸易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父亲是中西部一个小镇上的牧师,可见他的家庭背景、升迁动机和技术方面的创造力都是典型的内在导向型。但是,他的现有职位要求他具备谈判的技巧和人际关系的敏感性,而这些都是他人导向性格的特性。这一冲突造成了他的心理紧张。当我们问及为什么最近他改变了政治主张时,他回答道:“我认为这一问题似乎和你研究的范围无关,不过,我可以这样说,现在我已经更能容忍劳工领袖和工会负责人了,(他停顿了一下),他们不同于煽动者,我甚至开始欣赏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他们采取某些特殊的方法和手段,也是迫不得已。我正需要一个精神分析学家。”

129 他还告诉我说,他最担忧的问题是,他无法与公司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融洽相处。他的提议有时会被否决,但事后证明他是对的,否决提议的人明明知道他的提议的可行性,他为此感到困扰。这种情形令他没有安全感。他表示说,每次开董事会之前,他都寝食难安。他征求访谈者的意见,询问是否他自己开一家小公司会比在大公司任职要好。打高尔夫球是他的业余休闲活动,其实他并不在乎打或不打。他有着典型的内在导向者的习性,或曰纯粹的美国式风格,喜欢没事就在储藏室拿着工具随便敲敲打打。

当然,人们可以对访谈所得的资料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我并不敢断言我们的解释就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就此下结论说,这位副总裁因为不能断定自己到底属于他人导向型还是内在导向型性格而感到困惑,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属于某一性格类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现代管理者是否表现出两种性格类型的混合特质,他在办公室内或办公室外都会处于不断的社会压力之下。只不过上述这位先生更善于把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紧张表达出来罢了。

► 从手工操作的技巧到操纵人的技巧

社交能力的竞争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专业技术能力的贬低,揭示了这位高级雇员生活的另一面,即如果一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越高,他就越要被迫放弃他的技术。这一现象是美国商业和专业技术领域的新特点。机器操纵者开始步入前台。身为负责销售和广告的副总裁,他已经成为一个操纵他人者和自我操纵者。同样,报社里普通人升为专栏作家或编辑,医生升为主治大夫或院长,教授荣升院长、校长或基金会主席,工厂监督员升为业务主管等,都会存在这种现象。这些人最终势必放弃自己的专业,与昔日技术上的同僚失去往

来。他们必须更少地与具体的事情打交道,从而更多地与人打交道。

当然,工作时总免不了与他人打交道。在企业规模尚小之时,新老板自然能与同事们保持融洽关系,他并不固步自封,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环境。威廉·怀特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之所以毕生能平易近人,是因为我始终以一个勤奋记者的身份与人交往。同样,老一辈的大学校长们也都是些一贯保持学者气质的人,老一代企业经理总把帽子挂在大办公室里,衔着烟斗,与同僚打成一片。然而在今天,高级雇员和低级雇员之间等级分明,工头和工人之间不相往来。高级雇员坐在自己新的大办公桌前,不断琢磨人的新的心理和人格特点,从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专业技术特长。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在这里向大家讲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程师如何改行担任赚钱更多的销售经理工作的事。^[1]这位工程师非常喜爱工程技术,但他的妻子劝他不要放弃这次升迁机会,他的老板也认为机会千载难逢,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老板还问他:“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带着工人的绿眼罩吗?”他终于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新职位。当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里他手拿一把滑尺,忽然觉得不知该如何使用它,在惊恐中他醒了过来。这个梦显然表明他觉得新职位没有专业特长,反而使他与专业技术远离。

从专业技术领域改行当管理人员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自己的工作好比一个空调房间,只有空调运转正常时才会觉得温度适宜。那些没有升迁的同事出于妒嫉之心就会提醒他,他不能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才能的工程师了。如果他是编辑或专栏作家,就会很少参加总统记者招待会;如果是大学校长,就会少有机会参加学术会议;如果成为销售经理,就很少在策划工作会议上发言,这在专业人员看来是一个不成

文的规定。

事实上,越依赖人际操纵的社会,越会压制有专业特长的人,就像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社会歧视有手艺的农民和工匠一样。早期工业化阶段,工匠的社会地位和下层劳动阶级没什么两样,直到工业化晚期,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才略高于一般管理阶层。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种时代背景的差别。然而,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下,都是先有机器设备和组织管理的发展,再推动工业的进步,然后再经过长期的性格形成过程,最终影响到人类本身。

目前,他人导向的性格占主导地位,但大企业的某些传统的部门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尚待解决,内在导向者仍有用武之地。在医学界和法律界,自由经营的观念依然十分强烈,运用客观标准指导人事安排的风气犹存,并随着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增强而不断强化。医院、律师事务所或大学不仅为那些有组织能力的人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那些有专业特长及科学头脑的人提供了广阔天地。当然,也有一些一心扑在专业上的科技人员,他们就像隐士一样不善交际,不在乎能否与众人行动一致。

大企业之所以保留着那些适合内在导向者施展才干的职位,是因为某些技术问题并不能靠他人导向的合作来解决。此外,在大的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往往需要目光敏锐的内在导向型人才,洞察别人的花言巧语,果断决策。另一方面,他人导向的价值观正在迅速流传,可能在某些经济部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以前,便瓦解了这些部门。在美国,他人导向的工作和品味格调,并不见得总是能与经济的发展并驾齐驱。

► 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

自 1914 年联邦贸易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禁止不公平竞争以来,虽然人们不断地攻击商人的欺诈行为和故意抬高物价,但透过这些抱怨,我们应当认为,压低商品价格是不公平的。在国家复兴计划推行时期,这一态度受到了政府与公共舆论的认可,当时若称某个人为压价者就意味着对他的侮辱。在罗宾逊-帕特曼法案(Robinson-Patman Act)和公平贸易法颁布之后,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变成了对立的两个概念。物价由行政部门或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决定,当物价不公平时,人们便组成物价问题领导小组反对垄断组织的不合理提价。以往凭借价格机制或法令解决问题,现在改由协商方式来解决。

物价问题领导小组常常寻求经济学家的帮助,因为经济学家可以提出避免物价冲突和划分各市场范围的指导性建议。物价领导小组还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它将决策的重担转嫁到了“他人”身上。这些所谓的物价领导者看政府的脸色办事,因为价格已不再是指导者了。在争取合理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过程中,追随领导可以带来好处,如工会负责人能够从与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接触中获益,反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稍后我们还将讨论到,政治上的他人导向模式和企业管理的他人导向模式并无二样,两者的领导机制都是无固定模式的。此外,无论在企业或政治活动中,他人导向的管理者都喜欢相对稳定的环境,不愿整日忙于公务。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他宁可选择较为轻松的生活,而不愿冒险去扩张或卷入竞争热潮中。

然而,管理者的生活未见得就轻松自如,其原因在于,他人导向者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经营管理中都无法做到我行我素。尽管引入了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之风仍盛。许多观察家通过分析大公司所控制的社会财富的比率来判断垄断的程度,但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少数不起眼的小公司也可能拥有与其自身资产完全不相称的发展潜力。举例而言,橡胶业就是个

133

垄断行业,难道我们永远需要橡胶吗?电影业由少数公司垄断,难道电视业也存在垄断吗?今天垄断尚未出现在小的边缘工业中,然而明天则可能会出现,现在就预言未免言之过早,更何况目前技术革新的动力仍富挑战性。尽管技术的革新可以让工业的死刑期一缓再缓,但工业界的所有部门,甚至工业界本身终将消亡。于是大的垄断公司内部仍保留许多技术部门和以技术为主的专业人才,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规划也都不能完全消除技术的力量或为技术革新限定框架。

由此推及,如果商人的性格和经营行为摆脱了价格的束缚,他就必须为自己的企业寻求新的动力,他必须征求他人关于好企业的标准的意见。因而,担心被称为压价者的敏感心理开始转化为害怕不够时髦的心理状态。就像有人担心生活方式不够时髦一样,商人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的商业行为不够时髦。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人和消费领域之上,同时他把自己的生意也看成是一种消费。

134

大体上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商业公司只需要三个方面的专业顾问:法律、财务检查和工程技术。顾问工作都是非私人化的,就法律顾问而言,他的服务甚至包括贿赂执法者或法官。由于当时专家顾问数量极少,供不应求,因而他们与商业公司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如下两种普遍类型:一种是家族-阶层地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早期社会的小群体中就已存在,今天尤其在美国南部和社会小群体中依然存在;另一种是根据工作表现或品格产生的金钱关系。首先,今天的雇主不能确定在众多的服务项目中该选择哪一种,是找个律师还是雇个公关经理?找个市场研究代理或是请管理顾问公司代为决定?其次,他也不能在众多的提供服务者中确定具体的人选,因为他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

是否有卓越的工作表现和品格。因此雇主们选择时往往取决于诸多偶发因素,如偶然的接触与交谈,商业周刊上的相关报道,时事通讯上的内参消息,以及推销员的运气等。

我们追溯许多大公司的历史沿革,从中不难发现,它们中的许多都是从小家庭企业发展而来的,创业者抓住了大机遇,潜心研究价格,对于良好愿望和公共关系一般也采取“不妨让我看看”的态度。这一切往往影响了接班人,使他们的经营目的有所转变。接班人的资产财富透明化,热衷于加入贸易行会,其目的与其说是赚钱,不如说是注重现代企业的基本素质。在企业的员工队伍中,又增添了一系列的“准知识分子”,如工业关系指导人、培训指导、安全督导员等,发行企业内部刊物,聘请市场研究专家,实行标准化操作程序,同时,销售部和商店的门面装修一新。人们普遍希望地位的升迁,收入的多寡成为地位升迁的诸多标志之一,这一制度激励雇员为争取更高的地位而奋斗。

在经营方式转变之际,常常发生老一代内在导向者与年轻一代的他人导向者之间的冲突。老一辈由店里师傅或技术学校培养成长,对于人际关系问题知之甚少;而年轻一代受新的伦理思想的熏陶,他们看上去依旧关心盈利,除此之外还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建设成为像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那种公司楷模。一些商人自诩为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良好,这显然意味着他们对于年轻人的新思路的认同。当他们试图操纵公众或平衡公众间各方面的关系时,俨然像一个政治领袖,受公众期望的制约,并竭力赢得公众的信任。

如果一定要说出转变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说,旧的时代随着亨利·福特的去世而宣告消亡。福特死后,他的公司——最后一家以传统方式经营的大公司——采用了新式的管理技术,引进了新的劳动形式。

135 “公平”一词多少体现了同侪群体的价值观已进入了商业圈。同侪群体的成员受公平游戏的观念熏陶之后，商人们也开始接受公平交易的思想。这就是说，商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必定愿意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谈判的当事人不仅希望获取谈判条款的胜利，而且希望赢得谈判对方对自己和自己公司的好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对具体的生产过程了解的越少，他在交易上的让步就越容易达成。他有点儿像街头巷尾兜售商品的推销员，本来值5分钱的苹果，只卖了4分钱，回去后在众人的责骂下，他只好狡辩：“为了流通周转嘛，只好这样。”由此可见，工艺技巧虽然还没有真正贬值，至少已不如操纵人的技巧那样重要了。

显然，我们上述所说的绝大部分情况可以适用于商会、学术界、专业技术领域和商业界。举例而言，一个律师一旦在司法界或社会上享有声誉，他就再也不必专心于财团经济之类的琐碎事情，他可能转变成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既然交际能力不是先天的，而且交往之道世代不同，因而就为那些特别具有谈判能力的他人导向者提供了升迁的机会。

► 从储蓄到消费

拉扎斯菲尔德教授曾经对他人导向阶段人们经济态度的变化状况进行了概括。今天，消费支出与人们的消费活动密切相关，正如在内在导向阶段银行存款和生产观念相连一样。消费支出使人们尽情享乐，并且打破了内在导向时期娱乐和工作的严格界限。成功的他人导向者，无论是以消费者的眼光来称赞自己的公司还是在会议场合，都能将他在消费生活中学到的那一套态度运用到事业圈里。

经商被认为是有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平静之后，报刊杂志的商业版面连篇累牍地刊载商业年会

演说辞：“现在买卖又变得有趣了”，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然而内在导向的商人却不希望经商变得有趣，现代经营方式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悲观消沉。他人导向的商人则热衷于新式的经营和买卖活动，喜欢经营过程中的社交活动。工作时间的缩短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比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影响更大。至于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继续延长，他们为了工作而经常很晚下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午餐、喝咖啡、开会或其他与娱乐兼顾的活动中。同时，他们办公的大部分时间也在进行社交活动，诸如与同行交换意见、发发牢骚、与他人拉关系、与推销员闲聊或与秘书谈笑等。事实上，那些只知埋头辛勤工作的人，时常置家庭与妻子于不顾，保持禁欲作风，易与他人发生纠纷，整日陷入烦恼之中。他们认为在办公室里就应该努力工作，而不应该做其他的事。对于这一类的人，我们应当灌输交际消费的观念。但是，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精彩段落的作者齐美尔先生认为，这种社交能力负荷了过多的工作负担，岂能是自如的或真正以社交为目的的。

为了满足新的职业需求，就必须要有新式的教育。这就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被引入高级技术学校和大学课程的原因之一，通才教育日渐盛行。制定这种教育计划旨在培养全才，训练公民的民主精神，反对培养那种只懂专业、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事实上，本书的畅销多少也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盛行有关。当然，我们不敢保证这一教育计划就能使工程师或商人成为更好的公民，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接受这种教育之后，在人际关系方面肯定会变得更随和。他们可能会对人际关系滔滔善辩，以此来表示瞧不起技术学校的那些“直炮筒子”。今天，雄辩之才成为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正如19世纪英国的政客和官员必读古典文学名著一样。

在此,我不愿过分强调官僚化经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对于这一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有些公司,如谢尔斯罗布克公司,似乎由开明的、注重人际关系的人在经营;另一些公司,如沃德公司则不然;还有一些,如阿纳卡达这类的公司更重视公共关系,至于其他公司则不见得如此。当代商品流通过程以及买卖方式的进步,削弱了销售员的重要性,奥特马特公司就是一例。此外,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只要技术人员被派上用场,推销员的人格特点就会相应地被降低至最低限度。例如,推销一台技术复杂的设备,需要由技术人员教给顾客如何使用和对机器进行保修;再如,IBM公司的推销员不仅要有销售手腕,同时还必须知道如何装配该机器的线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了解整个公司的信息流通。因此,虽然商业人士是人际沟通革命的促进者,但他们已不像早期推销员那样对技术不闻不问了。今天,各个企业或公司更迫切需要有专业技术头脑的经营销售人才,这种人即使在人际关系方面稍微迟钝一点儿也不妨大局。

二、银 河

上一章,我曾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格言,来表示内在导向者的雄心壮志。内在导向者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出发点,开始自己的社会化过程,他总是以行业巨子或明星为效仿的榜样。相形之下,他人导向者则很少把生活看成是个人化的事业,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超越特殊同侪群体或特定文化的名望,而是追求同侪的尊敬,或曰比尊敬更为重要的——同侪的爱戴。

他人导向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是要克服物质上的

困难,而是要与有同样追求的、有敌意的合作者进行竞争,同时他还要不断根据这些同侪的态度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不会像内在导向者那样与明星人物比高低,而是心甘情愿地在众星银河中流动,当然他也不能过分随波逐流。这一点正是初期人口减少阶段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的主要特征。

今天,生活的不稳定确实是年轻人不愿树立长远目标的重要因素。战争、经济萧条、服兵役等因素被认为是个人职业的障碍,其情形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更为严重。但是,这一现象并未代表整个社会的状况,我们仍可发现,一些优柔寡断的人暂不考虑那么多,他们一心一意耕耘,不问收获。由此可见,除了生活不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妨碍年轻人追求远大理想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曾提及的因地位升迁而荒废专业的例子。这种因升迁而对专业忍痛割爱的现象在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之初就初现端倪,说明当代青年在计划自己的职业前途时所面临的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

当然,职业发展的复杂化也有积极的一面。过去,许多内在导向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这是基于全盘接受父母的教诲和受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的基础上的。今天,他人导向的年轻人谋求像样的职业,远远不止于满足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和金钱的需求,而是不满老一辈的权威等级秩序的安排。他人导向时代为谋职和选择个性化的职业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以往个人的职业选择往往受到社会的压力,以及个人一旦无法作出选择,就会有的恐慌感,现在这种压力和恐慌感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释。

由此可见,事业成功的标准对内在导向者和他人导向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内在导向者追求去边疆创业,试图在新的地域和工作领域建立丰功伟绩,获取安全感。如果他成立了一家小公司,这一公司就好比 he 拉长了的身影的化身。

139 如今,他也还是公司的阴影,他体现野心的长远目标被引进公司,有时会限制公司的经营活动,将他人导向者在赢得同事友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温顺、友善的交际手段模式化。

今天,一个人若想一枝独秀,似乎希望不大,而且有时还很危险。其实,一个人大可兢兢业业工作,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但却有可能遭到众人的非议。因而人们必须学会通过合作来保持工作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于同侪群体和公平竞争观念不啻是个莫大的讽刺,好在同侪群体为此制定了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然而,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怀疑别人也像自己一样进行着“不公平竞争”,所以,人人都时刻在监督他人的所作所为。

总而言之,尽管充当“众星银河”中的一员的困难已不同于往昔,但也实非易事。他人导向者若想安抚或操纵形形色色的人,就必须本着“顾客总是对的”的态度与他人交往。正如休斯教授所言:有些人较他人更可取。应付形形色色顾客的方式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全靠他人导向者自我摸索,只要有效就可采纳。因此,他人导向者要不断猜测对方是谁,需要什么。好比一家公司放弃单一价格的政策,转而采用秘密制定的调整价格,针对顾客购买力和是否“好说话”程度的不同,亮出不同的价格。他人导向者同样也放弃了内在导向者的单一面孔策略,代之以私下设立的多面孔的策略,根据交往对象阶层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140 然而,一旦他人导向者与某人建立了友谊,即可获得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庇护。同侪群体可以根据阶级或伦理道德的标准决定什么是不受欢迎的,应当抛弃的或者对谁(如南方黑人)可以不必认真对待,只需记住他的名字。当然,这种“看人下菜”的策略有时也难免不发生错误。这么做可以使圈内生活变得较为容易,却无法保证他人导向者在“众星银

河”中获得赞同。

注 释：

[1] 芝加哥大学的休斯教授在指导我分析商业和技术领域的转行情形时,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第七章

他人导向的生活(下):
闲暇生活的嬗变

民主国家的人民在含辛茹苦地工作的时候,难道真的不感到可悲可怜吗?当然不是。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意,一旦人们的焦虑感解除了,那么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民主国家的人民离不开焦虑,甚至胜于贵族政治国家的人离不开享乐。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托克维尔的著作出版迄今,惟一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闲暇领域转变成了焦虑领域。旧日的生产和边疆开拓所带来的艰难生活依然存在,只是因为新的消费方式存在而改变了形式。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指出的,休闲娱乐的价值观和惹人喜爱的态度,已渗透于人们日常对工作的看法,使工作的意义有所变化。同样,人们在“八小时以外”的闲暇时间里也摆脱不了同僚的影响,毕竟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工作时间。

他人导向兴起后,我们看到,内在导向时期那些有获取能力的消费者和逃避工作的人都消失不见了。当财产不再具有稳定性和客观效用后,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大为衰减。人们逃避工作的倾向也有所减少,因为工作与娱乐已经相互交错在

一、饮食和性生活象征意义的变化

一起。我们可以从上层中产阶级群体对饮食和性生活的态度中,看出一些新的倾向。

► 从盛麦片的碗到装色拉的碗

内在导向型的人对饮食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是各式各样的。美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喜好美食的民族不同,他们不论是近代的清教徒还是非清教徒,都把饮食作为炫耀个人地位的一种手段。许多人一起出外用餐或请好友吃饭时,菜单几乎是标准化的,很少有改变,但为了炫耀身份,他们总是挑最上等的肉片、精致的餐桌以及优秀的烹饪技术。当然,这一切几乎全由主妇一手包办。在许多场合中,人们在餐桌上忌讳谈论饮食问题。丰盛的食物象征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体面,近年来,饮食又可体现一个人关于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后者尚未在南方流行,因为多数南方人是贪吃而不大讲究的。《波士顿烹饪学校食谱》(Boston Cooking School Cookbook)的早期版本几乎千篇一律,主要谈论烹饪的技巧、饮食营养及如何用料问题,还谈不上美食。

20世纪中叶美国的他人导向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好卖弄格调品位,不直接用饮食来炫耀自己的财富、体面及营养学知识。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孩子们在学龄前就已从收音机里接受了他人导向式的训练,并且学得非常认真。中上阶级的家庭中,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不愿直接告诉孩子们吃什么会对身体有好处,以免孩子们偏食,但自己却常常随着

收音机里的节目讨论饮食风味。事实上,父母这么做往往掩饰了其对孩子们饮食习惯的担忧,正如他们掩饰了自己对餐后洗盘子的讨厌一样。因此,他人导向者不仅能在请客时露一手,而且还能在吃饭时的闲聊中展现自己的交际才能,不难看出他是在借助这一机会表现自己。

113 很早以前,就有少数人讲究美食,内在导向者就有此习惯。今天,更多的美国人认为应该讲究美食。在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美国的富饶促成了人们讲求美食的趋势。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条件购买精美的食物。过去,由于季节和交通的不便限制了食物的丰富性,而今天的便捷运输网和先进的食物保鲜技术打破了这种限制。这是人口过渡增长时期遗留的产物。消费者在选择食物时,大可不必依据传统或马尔萨斯的食物有限论去挑选。

因此,用餐的场合以及餐具、菜式都连带受到影响,打破了以往不准谈论饮食喜好的清教徒禁忌。墨西哥的蒸锅与铜盘取代了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餐桌上的白色亚麻桌布和古香古色的摆设。更重要的是,主妇不再抱怨家中的厨子只按自己的而不按她的口味做菜了。到了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中产阶级家庭不再雇佣仆人,即使少数家庭仍有家仆,男女主人也不再恪守清规戒律,而是让仆人选定菜单后自行烹调。他人导向者不再通过饮食和餐桌炫耀身份、特权和禁欲主义,用餐者可以随意把腌牛肉或泡菜当作自己喜欢吃的菜,而不必有所顾忌。他还可以遍寻国外的烹饪技术或效仿饮食专栏作家所讲究的异国风味。只有在传统的正式场合,人们才能看到牛排、鸡肉、土豆、豌豆等传统菜色。今天,主妇大都会一两手拿手菜,如用炒面代替主食。男人们对饮食烹饪的关心也不亚于女人,他们和女人一起下厨或去后院烤肉。

当今最流行的食谱是《烹饪的乐趣》(The Joy of Cook-

ing),至于其他的一些特殊食谱,如少数民族风味、地方小吃等也逐渐迎合边际差异的需要。菜谱的书名在不断地变化,从最初的《波士顿烹饪学校食谱》到《烹狼术》(How to Cook a Wolf)或《饮食四字诀》(Food is a Four Letter Word)等,都显示了人们饮食态度的变化。他人导向者不再依赖那些指导内在导向者成功的客观标准去行动,换句话说,他感到不该错过任何一种饮食带给他的乐趣。此外,人们认为饮食应当带来愉悦。至于那些认为“饮食不只是将食物从盘子里往嘴里送”的人,可以手捧《炉边食谱》(Fireside Cookbook)仔细研究。如果他还不满意这本书上的食谱,他还可以参考《家中特食》(Specialite de la Maison)一类的书,看看别人到底吃些什么,甚至还可以查阅考沃德、毕柏等人最喜爱的菜是什么。著名厨师麦克默里和考波特创制了一些新菜谱,名曰“蛋与我”、“无中生有”等。麦克默里在一篇介绍自己最喜爱的蛋类食谱的文章中写道:“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将两个煎蛋的‘金黄的眼睛’摆在盘子正中央,好比他们对着你痴痴笑一样,在旁边加上几片酥脆的火腿做点缀,或将蛋打碎重煎,夹两片土司。”法文食谱《玛丽》(Tante Marie)的英译本非常流行,据《烹饪的乐趣》一书介绍,这本法国食谱最初是作者为自己的女儿收集和整理的菜肴,后来作者灵机一动,没准别人的女儿也会喜欢这些菜肴,乃将之出版。这种情形一如今天女儿的烹调技术较少由母亲传授,女孩子们如果真的要学烹饪,只好求教于外人了。总之,他人导向者在对待饮食方面的态度,就如对待性经验一样,不断追求新异而特殊的东西。用沃芬斯坦和雷提斯的话来说,即所谓“趣味道德”的困扰。^[1]

当然,这种说法似乎过于强调闲暇生活变化后的不利面。不容否认,今天有更多的人的确比以往讲究单调的美国式的饮食时期更爱好美食,也更愿意谈论美食品位。

无疑,在讲究饮食格调品位的人里面,有许多人并不具备他人导向的性格,正如在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仍有许多内在导向的人也崇尚交际一样。纵然如此,假使我们想要了解美国的他人导向者的确切含义,我们可以在分析饮食好尚的变化过程中发掘出一些较为准确的线索。生菜色拉、大蒜、精致的调味品、烤肉、美食杂志和饮料(包括酒类)等从纽约向西传,从旧金山往东传,并且渐盛行;人们常常花两个小时吃午饭,谈论他们在美食和佳酿方面的心得;各种适合不同口味的食谱取代了“波士顿烹饪学校”的单调食谱。种种迹象表明,新的社会性格类型正在形成。最近,莱因斯在《知识分子、知识浅薄者和普通人》(Highbrow, Lowbrow, Middlebrow)一文中,设法根据消费或饮食指数来划分当代美国都市社会的体系。我们不妨说生菜色拉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正如这些人对汽车、衣服、言行举止的爱好也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一样。从莱因斯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美国都市社会体系中,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与传统社会划分阶级的标准有所不同。沃纳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他根据社交对象和消费行为的风格来划分社会阶级,而不是根据财富或权力来划分。然而,上述几位观察者的思想仅仅是零散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详见第十一章)仍然根据财富、职业、社会地位等老式标准来看待社会结构。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些旧式的标准之下,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社会结构正在出现,而在该社会结构中,意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老式标准将面临着根据人的品位来划分社会等级的挑战。

► 性:最后一道防线

内在导向时期,人的性欲是受压抑的,那些深受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和阶层尤其如此。在其他地区,如

意大利、西班牙,即使男人的性欲满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存在许多特定限制,不少下层阶级的人认为性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性都被简化了,前者以禁忌简化了性行为,后者则以传统简化了性行为。内在导向者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头等大事,性生活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场合或对象中方可涉及,如夜晚、太太、妓女、偶尔来次粗野玩笑、白日梦等。只有在上层阶级——当代他人导向者的前身中,才把做爱看成是比生产或维系生活更重要的,如在法国上流社会,他们在大白天也公然做爱。在这些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性几乎完全与生产和再生产分离开了。

这种分离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而遍及整个社会,加之节育手段的先进,性于是成了工业化促进初期人口减少的表征。在这一时期,不仅人们的娱乐生活增多了,甚至连工作本身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工作过程中监督的加强以及工序的复杂化比人口过渡增长时期更为单调、枯燥。随着人们工作兴趣的逐渐降低,性观念渗入人们的白天时间和娱乐的意识中。旧时的或当代的悠闲阶级都把性生活看成是一种消费品。

他人导向者虽然常常患有“缺乏冲动症”,但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崇尚“省力原则”,例如,他可能欢迎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规律化;汽车公司的自动门窗或自动装置都能使他向往;他还可能对政治毫无兴趣,然而在性生活方面他却可能无法应付自如。虽然如何做爱问题令他不安,但是应不应该做爱是不容质疑的。其意识固然为性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但会屈服于性的冲动。因此,性生活为抵御冷漠情绪的威胁提供了某种防御。这就是他人导向者之所以寻求性刺激的原因,即他想从性生活中证明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观内在导向者,他们深受“心理陀螺仪”的驱使,全神贯注于外在世界的生产问题,并不需要用性生活来证明自己的活力。

某些内在导向的消费者有获取倾向,他们有时会追逐某些过时的消费品,他人导向者则对此不屑一顾。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曾指出的,他人导向者自孩提时代起就知道如何处理周围环境的消费品。他游历广泛,经常和同伴或父母去野营。他知道富人的汽车和自家汽车的差异只是表面的,充其量不过是马力大点而已。他还知道,明年的流行款式会比今年的更好。纵使他没有去过夜总会,他也知道那里面的情况,因为他在电视上见过。受剥夺的内在导向者渴望发财,把聚敛财富当作毕生的目标。他人导向者则很少把消费品看成是长期支配自己理想的东西,当然,性是一个例外。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一直在努力宣传,但性爱消费仍然隐匿在公众舆论的背后。一个人若拥有新的凯迪拉克牌汽车,他人导向者就立刻会明白拥有名车的含意(社会地位、财富),并且多少会效仿这种经验。另一方面,一个人若有了一个新情人,他人导向者则不知这意味着什么。名车的意义人人皆知,性的魅力只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如果没有大众选美活动,美国人在性方面的吸引力的竞争就不会存在。然而,名车和情人在神秘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道德上的羞耻感和禁忌的丧失(尽管不是在无意识水平上的彻底丧失),他人导向者不再顾忌自己的妒嫉心。他并不是存心有打破唐璜风流艳事记录的野心,但他又不想轻易错过任何一次艳遇的机会,他人能享受,自己也应该能。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演变可以说是相当矛盾的。在他人导向时期,食谱的魅力大增,性方面的指导书却不尽然。老的婚姻指导手册都以浪漫迷人的口吻叙述并记载了许多性爱方面的乐闻逸事,至今仍深受人喜爱。而新的手册,包括高中生的性知识手册,只是平淡如实地描述事实和介绍生理卫生知识,就像《波士顿烹饪学校食谱》一样枯燥无味。然而尽管

如此,年轻人还是像汲取维生素那样吸取性经验。今天的时代是个竞争时代,一般性知识的研究,从生命的意义及情感反应来看,都未完全受到压抑。他人导向者追求异性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检验自己吸引异性或赢得异性好评的能力,除此之外,还为体验生活和爱情。

促使性生活改变的原因之一是,女人不再是有获取倾向消费者追逐的目标,她们本身也是同侪群体的一员。尚未彻底解放的太太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内在导向者的情妇不敢向男人性行为的特权严格挑剔。今天,成千上万的妇女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摆脱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更加能够享受爱情,在男女相爱的过程中,也可充当性生活的主动者。由于她们变成了懂行的消费者,男人对于无法满足女人欲望的忧虑增加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现象对男人而言却又是一项考验,使男人努力根据他人的评判塑造自身个性。过去只有妓女才懂得做爱的技巧,良家妇女对此一窍不通,而在今天,普通人早在床上生活中掌握了性体验,而不是只在幽会情人时才能享受。过去,人们单纯追求性爱的优雅,如恋人们一起去欣赏音乐会或观赏巴尔扎克的滑稽剧;今天,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性爱带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自然谈不上什么乐趣。因此,性在禁欲主义的掩饰下,成为令人焦虑的事情,同时又是那么令人神往。

性方面的竞争不同于内在导向时期社会地位方面的竞争。女人利用性作为武器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谋得自己的位置。工作时她们施展自己的性魅力,因为工作领域的竞争仍具有前垄断时期的特点。直到最近,剧院和电影才被一些新派人物所控制,他们提醒说,19世纪初期,在“工厂法”颁布之前,英国磨坊主把自己的磨坊当作“后宫”,对女工随心所欲。^[2]在《谁该受教育》^[3]一书中,沃纳等人指出,中学女教师

二、流行文化中消费方式的变化

► 娱乐：顺承群体的手段

第四章中，我们曾讨论过，内在导向的年轻人试图离家创业，他们直接接受文学、小说和人物传记，担负起去边疆创业的使命。他人导向者正好相反，文学作品只能影响他们生活中非经济因素的方面。他人导向者之所以需要文学作品的指导，是因为随着传统导向的消亡，人们再也无法从基本群体（如家庭、游戏群体）中学到生活的艺术了。而在内在导向时期，人们可以从流动升迁的家庭中获知生活的艺术。他人导向的孩子从小时候起，就从大众传播媒介中学习生活的艺术和与他人交往的诀窍。

从斯麦尔和阿伽等人的成功者传记乃至当代著述，凡涉及心灵宁静主题的，都不免有教诲的味道。早期的书籍直接讨论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探讨节俭和勤奋工作的美德。后来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美国兴起了在今天已几乎被遗忘了的“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正如格里斯沃德所述，“新思想运动”的口号是“思想以致富”（Think Your Way to Wealth），^[1]换言之，财富不再单凭在现实世界苦干就可以得到，而是要靠自我控制，即某种经济的自我暗示。当然，财富本身仍是人们追逐的目标。

从那以后，启发性文学作品所涉猎的，已不止于社会、经济进化的主题了。卡耐基1937年版的《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

别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一书,推荐了一套自我控制的方法,自我控制的目的不仅在于赢得事业的成功,还有助于赢得人缘。到了1948年,卡耐基又推出了一本新作《如何摆脱烦恼,开始生活》(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此时他已不再把自我控制视为取得社会成就的手段,而是作为顺承个人命运与社会地位的手段。卡耐基的观点发生转变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从经济萧条到充分就业的社会变化的因素。其他杂志,如《生活周刊》《你的个性》(Your Personality)、《你的生活》(Your Life)等都有类似卡耐基的这种观点转变,认为人们追求事业的途径和希望、焦虑感的增加,刺激了人们向专家求教的欲望。1949年4月24日《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同时刊登了这样两则新书广告:“保持心灵的宁静”和“独处时如何寻求快乐”。从内容上看,后者主要讨论“如何在生活中与人交往(与恋人、同僚、朋友、醉汉)……如何与人交谈……赴宴,打发无聊时光”等,这些问题每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可能遇到。事实上,新的人生目标以追求幸福、心灵的宁静等取代贪得无厌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旧人生目标,确实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个人在改变自身的过程中,必须扪心自问,这种改变是否只是毫无异议地、一味地顺承现实?

在此我们不是要对上述趋势作个评价,而是想借说教性文学作品来说明流行文化究竟如何被利用到顺承群体的用途上去。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有求于人,宁可去看电影或其他大众传媒中去找乐子。这一现象已是屡见不鲜了。大约20年前,在潘恩基金会赞助下进行了一次关于电影的调查研究,有许多事实说明,不少年轻人是通过电影学会穿着打扮、美容以及做爱的技巧的。^[5]看电影时,人们既可以学习,又可以获得感官刺激,尤其是下层阶级出生的孩子更可以从电影中初次

目睹做爱和富丽堂皇的生活镜头。然而,由于今天的观众已经成熟,电影所表达的综合信息也就更复杂了。

光从1948年10月出版的一些妇女杂志,如《妇女家庭杂志》《美国人》《好管家》《少女》等,我们发现,许多故事专栏和广告的印刷不很精致,大部分都在讨论如何自我控制,进而控制别人,控制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感情。其中有两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形,一个是坦伯尔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的《威利·凯波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Willy Kepper);另一个是斯洛孔波在《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今夜出游》(Let's Go Out Tonight)。

(一) 处理公务

《威利·凯波的反叛》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所讨论的是解决工作方面,而非闲暇或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故事描述了一个害羞的油漆推销员威利,威利曾是一名工人,现在成了推销员。公司档案室有位漂亮的女档案员,威利很想接近她,但又不知如何去做。正在这时,股东的儿子被安排进公司工作,顶替了威利梦寐以求的推销主任的位置,不久又缠上了那个女档案员。这一切使一向温顺的威利一反常态,火性大发,时常与公司同事和店里的顾客发生磨擦。这就是所谓威利的“反叛”,当然,威利的情绪变化很快就被别人觉察出来了。

由于威利一向待人友善,所以工厂的同事并未埋怨他,而且还想找出问题的症结。他们一致认为错不在威利本人,后来他们发现,股东的儿子应对此事负责,于是,他们开始整他,他不是被油漆滑倒,就是把事情办得一团糟。有一次他与顾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威利替他解了围。经过几次类似事件之后,股东的儿子为了赢得好名声,决定到车间做事,从头学起。威利的升迁之路又畅通无阻了。后来,威利请教股东的

儿子如何征服女档案员,他告诉威利要多赞美姑娘,威利照他的话去做,最终博得了女档案员的青睐。

关于这个故事,有几点值得讨论:第一,虽然故事以工厂为背景,但讨论的问题却是工厂推销员的目标,即建立人际关系网,凭借一张友谊的“提货单”,把油漆兜售给顾客。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人的因素和非经济性的动机考虑工作情况。第二,股东的儿子之所以能和女档案员约会,不是靠财产和社会地位,而是凭他的擅长语言的魅力。语言在此表现为自由消费的商品,每个人既是语言的消费者,又是语言的生产者,不存在什么专利或垄断。第三,我们可以看出威利和股东的儿子正是所谓“敌对合作”的写照,他们在职位和女人问题上的敌意已减弱,以至于两个人可以相互交换制胜对方之道。换言之,他们在乎的与其说是胜过对方,不如说他们对获得对方的赞同更感兴趣。所以,最终威利不再无故发脾气,股东的儿子也不再象以前那么嚣张。

(二) 治家

《今夜出游》描写的是一位少妇的消费追求。女主人公大学毕业,家住市郊,丈夫能挣钱,也很忠于家庭,两个孩子也十分健康。她拥有一切,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丈夫忙于经商,回家后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只顾看报纸、睡觉,很少多看她一眼。早上,少妇和好友在电话里聊天时,总是抱怨说,婚后他们从未逛过公园和外出娱乐。她非常怀念大学时代的生活,那时,她丈夫正苦苦追求她,生活充满了乐趣。她突然决定重返大学,看看大学时代的自己有什么吸引丈夫的绝招。

当她走进大学时代曾住过的寝室时,她认识到那时候的生活并不那么容易。她不禁联想到当时的一切:她心甘情愿地为未来的丈夫安排舞会,挑逗他吻自己,向自己求婚。最后,她得出结论,她并没有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随后,

她完全容忍和理解了自己的丈夫，满怀热情地去改进自己的操纵之术。她买了一套新衣服，雇了保姆照看孩子，并且像大学时代那样，请先生一起去剧院，早上她给好友打电话说，这个策略果然成功了。

内在导向时期，指导人们如何行动的故事常常激励读者开拓眼界，放长线，钓大鱼。今天，很多这一类的故事给我们的感觉则是逃避现实与多愁善感。当代杂志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既不鼓励人们上进，也不主张逃避现实。《今夜出游》之类的小说，很难让人承认这是一桩美满婚姻，因为夫妻之间，竟然还要不断耍心机，读者不会从中发现值得赞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固然，我们不应该认为，象《妇女家庭杂志》一类的书只是在迎合读者，但是很显然，读者不会被小说所鼓舞从而对生活和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上述两个故事当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途径既不应使人冒险也不要令人为难，而是要靠个人所拥有的性格资产——人际关系的努力和容忍来解决，他人导向者已具备这样的资产。

流行文化的“协同作用”理论历时已久，在“面包与马戏”概念中就已经得到过概括。韦伯兰在《靠救济为生的人和电影》(The Breadline and Movies)一文里，提出了一个更成熟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大众向统治阶级付出了劳动的代价，才赢得娱乐的特权，使自己生活在欢乐的氛围中。该观点假设流行文化更具有整合能力。在当代流行文化中，顺承群体和行为定向的影响并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的阶层。事实上，他人导向者在顺承方式上所承受的压力相当大，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压力越大。其所采取的形式可用以下几个例子来说明。

(三) 沉重的和谐

美国东部一所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在致家长的信中写道：

本校的音乐教研室希望尽最大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丰富的音乐经验。

我们相信,音乐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影响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所体现。孩子们一起唱歌游戏可以增进了解和友谊,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这种和谐。

本校一直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共享音乐之同好,我们将鼓励孩子们参与更多的音乐活动,尤其是交响乐团的演出。

这封信的内容似乎并没有违背音乐的宗旨。信中把音乐看成是使各地区与国际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手段。个人如果把音乐当作现实的避难所,借故遁入创作生涯,在今天的学校当局看来是极端自私的做法。

何薇小姐的一部描述哈佛大学校园生活的小说《幸福者寥寥》(We Happy Few),⁶以更精炼的笔触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陶乐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战争期间大谈恋爱,躲在家里弹奏巴赫、莫扎特的钢琴曲,试图逃避社会义务。后来陶乐经历了一系列的群体顺承考验。何薇小姐认为,这种锻炼改造了陶乐身上的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陶乐成为一名助理护士,与其他护相士处得很好,那些助理护士都是好人、质朴无华。当陶乐来到儿子的训练基地附近的一个叫阿伦的小镇以后,她觉得真正认识了美国:女厕所的恶臭,站台上的生离死别,中西部人民的善良心肠。小镇的民风代表了另一种群体顺承的考验,镇民也是些纯朴无华的人。最终陶乐回到麻州的剑桥,她已经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聪明女人,她的清高消失了,学会了欣赏大自然的美,经常用歌声和故事抒发对自然的赞美。

何薇小姐用陶乐音乐兴趣的转变象征她的学习过程。在医院当助理护士的那段时间,她在业余时间不仅喜欢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还开始喜欢上了舒曼的小夜曲,“她的审美观和个人兴趣也在延伸,虽然尚未成型,但至少在情感上热情多了,更具有深刻的内涵”。

155 何薇小姐的评论,不必解释就相当清楚了。她不让陶乐在护士工作中把人际关系弄僵,所以,陶乐只能改变自己。为了使别人接纳她,她必须顺承群体热衷的音乐趣味。如果她学会欣赏尼文的作品,她将得到更多人的谅解与接纳。^[7]

然而,一旦陶乐在护士工作中学会并受益于人际关系,就会产生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与患者相处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在病中十分需要别人的关怀。尽管她的角色没有变,但她能够把工作中的态度转移到闲暇生活中去。工作与闲暇是不断扩展的,直到两者完全重叠。工作和悠闲的主题当然都是属于群体顺承范畴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为冷漠辩护,从而贬低热情,也不是在批评他人导向者对自己或他人的诚挚热情。事实上,美国的许多内在导向者已超越了情绪的强制和可怕的冷漠,敞开了交际之路。

(四) 孤独的成功

在我们所讨论过的漫画《引擎突突》和《威利·凯波的反叛》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当代流行文化一味地强调孤独的危险,以及群体精神的美德。华修在《歹徒:悲剧英雄》(The Gangster as Tragic Hero)一文中,讨论最近一连串的盗匪影片,他的观点和我们的看法一致。^[8]他解释说,匪徒的成功必然是其失败的征兆。因为成功使他脱离了群体,既脱离了守法的群体,也就脱离了匪群。当他达到成功的巅峰时,其命运反而更悲惨,面临一落千丈的危险。

我们可以把上述故事理解为有警世寓意,它告诫人们树大招风,成功是很危险的。根据匪盗影片的逻辑,个人绝不能自比为孤独的逃避者,否则,其命运就会像陶乐一样,充满痛苦和恐惧。影片《灵与肉》(Body and Soul)也包含有同样的思想。主人公是一个来自东海岸的犹太男孩,登上拳王宝座之后,渐渐与周遭的群体(他的家庭、女友、胸无大志却忠诚的跟班、东海岸崇拜他的犹太男孩)疏远了。后来,他同意为一大笔酬金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输给对手,并赌自己必败。他的失败使他缓解了与群体的疏远。在去赛场的路上,有人告诉他,犹太人把他视为英雄,就像战胜希特勒那样的英雄。他不禁回想起,当年他因赢得比赛而背叛了他的支持者。一贫如洗后,才得以重新回到最初的群体——家庭、女友和犹太人中间。

电影和小说并非千篇一律。兰德的畅销书《寻根者》(The Fountainhead)就很有特色,后来被改编拍成电影。故事的主人公是建筑业的泰斗,不屈服群体顺承的压力,最终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他赢得了一切:盛誉、对手的太太,并置对手于死地。这个故事的最惊人之处在于,作者有意无意地嘲弄了顺承群体与抗拒群体的行为,群体本身有其特点,不宽容、古板、腐朽,但同时,抗拒群体的人是一个粗俗的虐待狂,他想否认群体的人性和人对群体的依赖。对一般成年人而言,这个超人的角色正是孤独成功的典范,足以使人羡慕,但毕竟太矫揉造作而不可效仿。

兰德的读者大多为摒弃群体的精神和不屈服他人的行为而喝采,可是全然不知其本身在琐碎平常的生活里,也有顺承别人的倾向。就此而论,《寻根者》可以说带有逃避色彩。

► 别了,逃避

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少讨论内在导向者的明显的逃避倾

157

向。相反,我们主要论述了流行文化,并将其看成是培养个人的群体顺承性以及指导消费取向的有效途径。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姑且不论其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人导向者似乎无法逃避自己,不能以富裕或放纵的姿态去浪费时间。当然,如果我们将之与借酒浇愁型的逃避者作比较,结果却又不同了。

在清教主义的影响下,内在导向者舍不得浪费时间。出身下层阶级的有志青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内在导向性格,不与酗酒、赌马的纨绔子弟为伍,每日进行行为反省,驱除浪费、懒惰等不良习惯。他们几乎从不享乐,除非他们认为娱乐有助于自我改造,因此,他们的生活必然十分紧张,没有片刻闲暇。他人导向者决不像这样有浓厚的清教思想,他不在乎浪费时间,他的穿着、言行举止、伦理道德都比较随便。但是,在其闲暇生活中不免有清教思想之余威。当他想度假或在周末放松一下时,他也许会说:“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但实际上,他的自我像一辆汽车或一幢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必须精心维护和保养。他人导向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核心可资逃避,生产与消费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顺承群体和为个人兴趣服务、以及工作和娱乐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一个有趣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人们(尤其是男人)穿晚礼服的习惯渐少了,甚至有些人穿运动装去上班。这看起来好像是追求省力原则的热潮,男人会说穿西服上班实在太麻烦,并以此作为晚饭或晚间不换礼服的借口。今天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晓得如何改变自己的角色,哪里还谈得上借助换上合适的衣服来表达自己的角色变化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深怕被认为骄傲自大。人们宁愿身穿华丽而俗气的衣服,而不愿穿着笔挺。运动服或随便一点的衣服,可以表示这个人不仅在高尔夫球场、度假期间是个随和的人,而且

在办公室、餐会场合也很容易相处。

女人仍盛行穿晚礼服,或许这表示她们对社会模式的变化反应较迟钝,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受到流行消费模式的影响。男人们无论上班下班都谈论工作上的事情,而女人则更关心家务、照顾孩子及参加晚会等。此外,为了博得整日外出上班的丈夫的喜欢,女人们总是力争做好一切家务。我发现,女人的话题不外是子女和家务(当然,话题并不仅限于这两个范畴)。男人角色的改变使其工作与闲暇的界限模糊不清,而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能够在谈话时更富有技巧、兴致和写实色彩。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男人不仅在白天的工作时间与人谈话,解决问题,而且在业余时间也迫切需要与人聊天呢?或许这像盗匪影片里所表现的恐惧孤独的心理在作祟,恐惧导致了心理紧张。流行文化不但可以填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借谈话来消除人的孤独,促进了人们的往来,而且流行文化并不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它得到了同侪群体的赞同。他人导向的女子则与此不同,她们结伴去看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必彼此交谈,只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看到悲伤之处是否该哭?遇到这种情形,怎样的反应才算得体、成熟?当她们从影院出来,总觉得应受点儿感染,却有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反之,内在导向者独自阅读,很少留心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进入书中的角色,与小说情节融为一体,然后再从故事中走出来,重新戴上他的假面具。就像几个人聚在后屋打扑克,都戴着假面具,这种情形似乎更适合内在导向者,他们对于社会距离,甚至孤独感都习以为常。而他人导向者却深恐孤独,试图在人群和幻想中消除对孤独的恐惧,这种幻想犹如一面镜子,只反射他对自己的关心。

三、两种类型的比较

我们已讨论过两种类型的直接对立,现在似乎有必要为他人导向型重新进行辩护。我知道,本章中我对于他人导向者的看法似乎不太公平。事实上,我们很难对他人导向型作出公正的判断。“他人导向”一词和“内在导向”一词相比似乎表示浅薄与肤浅,尽管两者最终都根源于社会环境,并在早期生活中就已经内化了。

除了名词本身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令人偏爱内在导向者的因素。如专家和学者瞧不起商人,所以,当我们把那些令人讨厌的商人和献媚的广告商说成是操纵人的他人导向者时,他们十分高兴。就我们所知,商人并非没有良心,为了反省自己,他们也时常去观看揭露他们丑行的影片和戏剧。此外,不少有虚荣心的专家学者往往有意贬低好莱坞电影、广播剧和其他大众文化,从中得到满足。

社会地位较高的内在导向者,常使人联想起盎格鲁-萨克森的传统,令人景仰。但我们应当看到,内在导向者常常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题大作,动辄板起面孔,而他人导向者从不如此。如果我们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带给我们某种吸引力,我们会鼓励内在导向的性格,尤其是在我们未亲身体验到内在导向的种种限制时,我们也常怀着可以理解的怀旧情感看待内在导向时期。

我并不想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关心他人、关心人际关系是错的。事实上,我们能够关心这些问题,足以证明它是高技术与社会生活富裕的结果之一。有人批判当代工业社会人受到操纵,试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到工业革命早期那种贫穷、野

蛮的生活中去？我个人认为，若能达到巧妙地说服他人的目的，耍点儿手腕的说服远比暴力征服可取。一个人若指责人际关系的软弱，他就有可能冒险选择强硬的态度。本书的目的正好与强硬态度相反，旨在指出：他人导向者既已成事实，在许多方面来说已经够强硬的了，作为儿童消费的指导者、家长、工作者和娱乐者，他人导向有很强的焦虑感。他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个是对舒适生活的憧憬，如果他能找到恰当的群体顺承方式，生活本应十分容易；另一个是时隐时现的生活不易感。在双重压力下，他的生活反而变得微妙起来，有时他会把严肃的内在导向者作为理想人物，尽管这种理想人物是虚幻的，经由他人编造的。事实上，正因为他的他人导向型性格，导致他经常轻易把某些永不妥协、自觉的人当作榜样。他的同情心和对他人的敏感可能会有损他的形象。

由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和人际关系实践集古老的世俗表现之大成，因此，我们评价它的表面成就并不困难。譬如，我们可以或从激进或从保守的立场来评价人们对他人导向的批评。然而，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评价他人导向的性格类型，而是努力揭示一个接受闲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潜力的社会观，而他人导向对流行文化的追逐和吸纳就是新潜力的典型标志。内在导向时期的价值观是经济匮乏的产物，不能轻易将之用于富裕社会，即使运用也要事先对之重新解释。我认为，将来取代他人导向性格的不会是内在导向性格，而是自主性格。关于这一观点，我将在本书第三编加以论述。

注 释：

[1] 格林索：《动荡》(Movies)，自由出版社，1950年版。

[2] G. M. 杨著：《时代的画像》(Portrait of an Ag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15页。

[3] 沃纳等著:《谁该受教育》(Who Shall Be Educated),纽约,1944年版,第123页。

[4] 格里斯沃德:《美国人成功的奥秘》(The American Cult of Success),耶鲁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

[5] 布卢默等著:《电影、青少年与犯罪》(Movies, Delinquency, and Crime),麦克米兰出版社,1933年版。

[6] 在“论‘幸福者寥寥’的伦理观”(The Ethics of We Happy Few)一文里,我详尽地阐述了该观点。参见:《大学观察家》,第1期,第19页。

[7] 在分析同侪群体选择所喜爱的人时,“参考热情”这一标准是十分有意义的。阿希在一个有趣的试验设计中,把热情-冷漠坐标视为被试控制自我人格的尺度:被认为是热情的人无论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何,都具有肯定价值;而被认为是冷漠的人无论多么诚实和勇敢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参见:《变态心理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41期,第258~290页。

[8] 参见:《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第15期,第240页。

第八章

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政治风格：冷漠者、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预测者

在一些国家，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也许在他们看来，时间太宝贵了，没有闲功夫对社区政治事务发生兴趣……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被指责为：一个只关注自己事务的人，那么他就会感到人生的意义失去了一半，生命是那么的空虚、颓废和痛苦不堪……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接下来，在本书的第二编，我将致力于应用前面建构的性格理论来揭示美国人的政治风格。首先，我必须指出，应用人格理论来探讨政治风格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时，我的一个普遍性命题是：内在导向的人格特征在政治态度上的倾向，表现为“道德说教者”风格；他人导向者的人格倾向则表现为“内幕消息预测专家”风格。这两种风格的划分，一方面与政治情绪由激奋到宽容的变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政治主张由统治阶级的集权支配到权力分散到众多的处于竞争压力的边缘群体的演变相关。这些变化也许还包括了引起他人导向兴起的原因。

164 做完以上说明后,我还必须作一些明确的界定。首先,我想再一次提醒读者注意,我所描述的美国人的性格特征受社会阶层和社区环境的限制。其次,正如我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现实生活的人是一种混合体,是复杂、多面、支离破碎的,任何一种分类都不能涵盖其所有方面。例如,一个十足的他人导向性格特征的人,其政治风格可能更接近内在导向性格特征的风格,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会设法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他们呈现出优于“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预测专家”的风格,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恰恰只不过是政治的“缺席者”。政治可能的确是他们最健全的活动,政治也可能是他们最不擅长的事务。

这些性格特征的问题不是阻碍我们解释和预测特殊政治行为心理背景的惟一因素。下面仅举一例说明。当代政治中的危机情绪通常是结构化的,缺少可供选择的想像力。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无法发展新的政治风格,给政治带来新的动机以及界定政治的新途径,同时促进性格特征的变化。

165 我的研究角度不是从政治体制出发,即不从国家、政党、阶级等角度入手作正式的政治分析,而是探讨这样两个问题:人们与政治发生关系的途径以及政治态度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显然这两个研究领域并没有清楚的界限。从现代政治科学的传统来看,无论是从马基亚维尼、霍布斯到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同时关注这两个领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讨论性格特征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时,用了一个印象派的术语“风格”^[1]。假如说政治是历史所要上演的一出芭蕾舞剧,风格则不是告诉观众,演员在舞台上来来往往的动作,而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个性以及观众的反应。

当我着手从政治风格问题到政治权力问题,讨论性格结

构和政治结构的关系时,其间的含义比“风格”一词所涵盖的意思要丰富微妙得多。显然今天许多人回避现实中的政治权力,而从心理层面解释社会行为,或是为了绕开来自于当代政治信仰的挑战,或是通过新的分析框架试图恢复政治适应性的信心。然而政治现实主义者存在同样明显的缺陷,即忽视了人格特征的作用,忽视了基于人们的心理需求来解释政治权力的形成。所以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用于不充分的解释,甚至根本不能使用。

一、冷漠者

► 旧式风格

正如社会中的所有成年人都必须投入政治决策的观念是近代社会的现象,政治冷漠和政治消极被视为一种异常现象,也只是近代社会的观点。在古代的东方社会只有皇亲国戚、贵族大臣等少数统治集团才有权涉足政治领域,其他的人与其说是政治冷漠者不如说是政治的沉睡者。同样,在古希腊的城邦制中,只有公民才可能发生政治冷漠的问题,而对于妇女、外国人和奴隶根本就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也就不存在政治冷漠的问题。

在美国,少数内在导向者属于上述类型的政治冷漠者。他们的冷漠属于古代或中世纪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大众所呈现的古典式冷漠。在历史上,人们常常以嘲讽或者偶尔的反叛的形式接受贵族专制。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不懂得如何进行政治参与,因为他们缺少表达能力、政治训练、组织经验等基本的参与政治的工具。

今天,美国的这种传统导向的政治冷漠者已经为数不多了。只有在极少数的“保留区”,人们才可能避免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影响。然而,在一些移民群体和乡村黑人群体中,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导向的政治冷漠。下面我将引用一个访谈来说明这一问题^[2]。被访谈者是一位居住在哈林顿区的中年女清洁工,来自于英属西印度群岛。虽然她受到强烈的内在导向倾向的影响,但她的政治态度,至少是表象上的保守倾向,似乎代表着传统导向冷漠者的主要特质。

问: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一般兴趣、还是毫无兴趣的人?

答:嗯,我没有什么兴趣,我丈夫倒是有兴趣,他能言善辩。

问:你如何看待目前的政治局势?比如说你希望谁当选?

答:不知道,我相信最优秀的人能当选。

问:那么你不认为不同的人当选会有所不同吗?

答:没有什么不同,反正是优秀的人当选。他们当选后都干同样的事,都一样,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完全相同。

问:你有没有从收音机里听到过让你感到愤怒的政治消息?

答:没有,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也就不会愤怒。

问:那么你有没有从收音机里听到与政治无关的其他事情使你感到生气。

答:没有。

问:从收音机里听到过使你高兴的消息吗?

答:也没有。

问：你认为那种类型的人对政治感兴趣？

答：嗯，富人更感兴趣，穷人也感兴趣，不过穷人没有机会。

问：你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

答：不可能。圣经上罗马人好战。（访谈者按：圣经上好像是这么说的，我记不太清楚）我认为永远会有战争。（访谈者按：她在说这句话时非常确定，就像人们常说“这儿永远是英国的”那样。）世世代代都有战争，圣经里就是这样说的。

问：你认为我们可以避免经济萧条吗？

答：我想你可以尝试着去做点什么，不过时事难料，有时会顺利，有时会很难。假如你有好的想法，那你就努力去做吧。

问：你是否认为华盛顿地区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能预测未来是否会发生战争。

答：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人不会知道的，人们只是希望……

问：你认为美国所有的地方都是民主的吗？

答：我只能说美国是一个有福气的国家，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美国运气最好。

传统导向冷漠者的特征是将政治视为他人的事务。上面的被访就认为政治是她丈夫的事，是富人和会所里的白人所关心的事。这种类型的冷漠者彻底地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人行使。虽然他不直接参与政治，但从不感到怅然若失；他们缺少政治责任感，因此也不追逐权力，而且很少因为政治而怀有挫折感和内疚感：他们认为只有“智者、善者、富者”才能从事政治（亚密斯语），政治责任是上帝的事，与人类无关。

► 新式风格

如上所述,少数政治冷漠者的政治风格与其传统导向性格、低社会地位、贫穷和政治训练不足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另一类政治冷漠者,他们不是传统导向者,他们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能明确意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规律,总之他们对政治工具驾轻就熟。的确,当我们在对生活在城市和农村贫民区的人进行政治和组织训练时,常常发现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人们无法形成政治动机和掌握政治技术,比如象电话这类简单的工具都缺乏,而对于中产阶级和具备政治意识的人而言,这些工具和技术是政治参与最起码的条件。当然自19世纪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工作时间的缩短、工会和其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兴起以及人们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行为方式的日趋了解,贫穷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似乎有所提高。

然而,虽然这些人的冷漠不同于传统导向者的古典式冷漠,但总体来说都属于政治冷漠。这些政治冷漠者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政治生活却拒绝参与政治,洞悉政治内幕但从不发表议论,明白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责任却逃避责任。我们可以将这类新型的冷漠者划入内在导向或他人导向型,他们已不能顺承与其性格特征相吻合的政治风格。另外,在性格特征与社会倾向上,他们是处于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过渡的阶段。如刚刚脱离传统导向但还没有成为完全的内在导向者,或者内在导向者还没有变成一个纯粹的他人导向者,都是处于两种类型之间。

当然,这只是推测。目前政治局势中的外部因素常常足以解释所有阶层和所有性格类型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的政治冷漠。显然,个人之所以完全退出政治生活是由于政治形势看

上去充满希望,人们似乎没有涉足的必要。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十分富足安逸,就连多数低收入阶层都生活得不错,所以美国人安于现状导致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拥有更多的食品、电话和旅游机会,生活得更富足、更舒适。美国人的安全感造成了更多的政治冷漠者。相反,一个人之所以逃避政治也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任何政治参与都于事无补。这些原因反应了许多美国人的心态。一个人不参与、不关注政治可能是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造成,并不意味着一定与性格因素相关。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对政治刺激没有反应,将导致他的情感萎缩。这种情感萎缩可以从政治生活扩散到其他生活领域,也可以从其他生活领域渗透到政治生活,最终影响到一个人性格的形成。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引用马丁和梅尔森在沃曼的一个小镇上进行的一组访谈。小镇上的老人似乎有强烈的内在导向倾向,年轻一代则接受了越来越多的他人导向倾向。老一代表现出政治责任感,尽管他们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感觉自己与政治密切相关。老人们常常通过罪恶感和伤感的形式来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切。每每谈及有关政治事件时,他们常常使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我认为”、“我想”、“我恨”等等。听口气好象是由他们来决定政治事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发挥才智和精力为政治提供指导。

镇上的年轻一代对政治的态度与年长者完全不同。尽管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熟练掌握各种基本的政治技术,但他们却认为政治与其无关。他们对政治既不抱怨也不会产生罪恶感。即便政治事件与他们密切相关,甚至直接有损他们的利益,他们都逃避政治。无论政府制定什么政策,如服兵役,他们都被动地全部接受^[3]。他们在评论政治事件时尽量

170 避免用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有时用集体指代词“我们”，更多情况用“他们”。由于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辈更“社会化”、更具合作精神，所以他们对周遭发生的事务不从个人的角度去作出反应。他们超越了父辈的“政治愤怒”，而变成“政治冷漠”者。显然，这种冷漠不是传统导向者的冷漠，可能是间于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之间的一种冷漠。

没有人能够预测，当这些年轻一代变成老一代时他们的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是否会发生变化。他们的政治风格很有可能随着生命周期而发生变化。当人们步入老年时，政治兴趣有可能增强也有可能减弱。然而，在我看来听天由命和消极被动的新式冷漠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政治风格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当然，前提条件是预测社会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他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加入农业局或者在工会政治活动中跑跑腿，也许会使其产生一些政治上上进心，不过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放弃抗争，消极认命。谈到这里，假设上述预测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证明人的政治冷漠是政治风格长时期历史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人的生命周期的变化特点。

我所定义的新式或旧式的政治冷漠者，大概占了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并不等同于弃权者，在一定的压力和利诱下，他们也会承担一些政治差使。他们也并非没有政治见解。实际上，假如我们确信民意调查是可靠的，那么 10% 的人拒绝民意调查，另外 10% 的人属于“情况不明”一类。根据接受民意调查的态度，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所有地区和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直接且容易地影响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政治意见和政治决策的讨论。人们愿意表达政治意见是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标志。但是，如果进一步仔细检验访谈和民意调查所附带的政治态度，我们则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

访谈和民意调查所反应出的政治意见既与被访者的直接政治兴趣无关,又与其明确的政治情感无关。这类政治意见倒像同侪群体中消费好尚的交换,不同的是消费好尚很少进入政治市场并转化为政治商品的交易。由于政治冷漠者不相信可以借助行动、信仰和知识换回能充分改善生活的政治商品。所以,他们偶尔也会受人操纵,像旁观者那样浮光掠影地观察政治生活。

由于这些新式的冷漠者受过一些教育和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而且他们既无政治原则上的道德承诺又不会在政治事件中投入情感,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训练成为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就如同他们容易被训练成为现代机械化和专业化的部队一样。老式传统导向的冷漠者则缺乏这种潜质,他们最多只能零散的、不自觉的参与政治活动。新式冷漠者不沉湎于私人生活,所以不会认为政治具有侵犯性;他们也不会囿于自己所属的阶级群体,因此不会认为政治具有局限性。他们很像前面所描述的沃曼小镇上的年轻人,被动、合作、社会化,当然不仅仅是表现在政治领域。他们的忠诚无处不在,只要某项政治运动能消解他们对政治的惯有嘲讽或者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嘲讽,就能赢得他们的忠诚。他们不把个人爱好和情感看作自己和政治组织之间的障碍,惟一妨碍他们与政治联系的是他们的冷漠。

这种冷漠产生两种效果。它剥夺了新式冷漠者的政治热情和真正的参政能力,同时它又有助于人们免于受到许多政治谣言的蛊惑。在历史上,这些谣言曾蛊惑人们进行政治冒险。对于传统导向者有时则容易受到刺激而产生政治义愤,他们有时甚至就像渴望学习文学一样渴望政治灌输。尽管美国当代的政治冷漠者不会以嘲讽的方式抗拒政治,但他们却具备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免疫力。

二、道德说教者

有时,人们称我为理想主义者。好吧,这是我对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充满理想主义的国家。

——威尔逊总统

在19世纪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内在导向者的政治态度表现为道德说教者的风格。由于内在导向者工作至上,将所有的情感和才能都倾注于工作之中,所以当他们在处理政治领域问题时也习惯于依照工作领域的思维与方法。每每听到政治消息,他关注的是其中包含了什么工作任务,而从不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因此,他常常带着明显的情绪和纯真的态度来看待政治。当然,不是所有的内在导向者对政治的反应都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内在导向者都是道德说教者。

道德说教者的一个不同的政治风格是,将自我完善的性格倾向投射到政治生活中;他想改进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制度。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的“保护农业社运动”孕育了许多这种类型的人,“金色十字架”的讲演标志着勤劳简朴、积累财富的道德说教热情发展到了顶峰。但是,到了美国支持“国际联盟”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人认为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十足的道德说教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能使他的朋友,他的政敌,甚至他自己明白政策该如何实施和操作。道德说教者的另一个政治风格表现为,他试图发挥道德力量去阻止时常

发生的邪恶，而很少身体力行地做善事。这种“抑恶”但不“扬善”的倾向反映了道德说教者的内心冲突。对他而言，罪恶的定义简单明了，比如，工作不严肃就是懒惰，讲究享乐便是放荡，怀疑私有财产便是社会主义。

内在导向者在处理政治事务时，倾向于低估政治观点的可缩性意义。他不想通过政治从混乱的世界中找寻知识性的指导。他也不认为政治仅仅是令人感兴趣的游戏。相反，他利用政治来保护他的既得利益，无论政治问题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他的政治态度都毫不含糊。因此，在同一性格类型和同一政治阵营内，我们可以发现税制鼓吹者、禁酒者或狱制改革家等形形色色的人，只要他们在政治压力作用下，产生相同的情绪反应，就能形成统一阵营。

正如我们在第一编讨论性格冲突时指出的那样，某一性格类型处于发展还是衰弱阶段有着很大的不同。得势的道德说教者代表着旧式的中产阶级及其内在导向的性格在 19 世纪占统治地位。失势的道德说教者标志着旧式中产阶级及其性格类型在 20 世纪的衰落。

► 得势的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

通过对 19 世纪美国政治的多方了解，我们应该考察内在导向的自我利益和内在导向的道德化问题。今天，我们倾向于将道德化和自我利益作为政治生活中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只有伪君子才将两者混为一谈。这说明许多因素的介入已使今天的政治不再单纯。在 19 世纪，自我利益和道德化是兼容的，因为与今天相比，内在导向者清楚的道德意识和明晰的自我利益之间根本没有冲突。《联邦论》也许就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其实，随着选区的扩大，要求人们像先辈那样坦白，或者像比得尔那样了解自己的痛苦，已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导致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利益和道德分开,或者用含糊不明与蛊惑人心的观念来掩饰两者的疏离。即便如此,到了南北战争时期,无法遮掩的经济利益不断地侵入政治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财政政策、基本建设、税收、奴隶制与反奴隶制等围绕财产与利益的大讨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展开了有关利益道德化问题的讨论,比如,男子的选举权、普及教育和奴隶制等。

南北战争以前的工会和机械师协会的组织 and 计划反映了19世纪的政治关系的模式。这些组织中自我教育的工人热切地关心政治、立法、经济平等问题,间接地关注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些工人是没有罪恶感的道德说教者,渴望介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他们的出版物和会议不是站在劳工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劳工报刊杂志和活动节目中已经消失,在极少数旧式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业组织会议”的监督员身上还残存这种现象,作为工会官员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劳工的利益所在,只是一味地向冷漠的、徒有虚名的工会成员灌输空洞的思想说教。)

内在导向时期的出版物积极鼓励读者扮演政治角色,并教会读者如何扮演好政治角色,同时设法让读者相信他们的参与可以推进政治的进步。新闻界热切保持个人主义的倾向,崇尚个性,反对受人影响,在美联社、报业联合和邮政等传媒尚未一统天下时,这是容易做到的。当时传媒盛行个人主义,帮助读者确立这样的政治观念:即个人的政治首先为了自己的需求,然后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玩世不恭(如讥讽民主制、寡头政治和其他特殊政治形式和习惯)还鲜为人知。的确,当时许多阶层都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政治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人们觉得政治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习惯并热心政治运动的人去处理,如职业政

治家(政党领袖、职业政客)和业余政治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或优秀的政府工作人员)。

因此,在19世纪的内在导向者看来,政治领域的范围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动机而言,政治活动并不比工作更具神秘性。许多政治任务需要完成,任务往往是根据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居住地区和道德观念来分派,所以每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都能找到满意的职位。这些职位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许多问题已被热情的改革家所解决,如选举权的扩大、义务教育的普及、监狱和疗养院的改进、工厂立法的设立等等。也许正是因为每项改革目标都很单一,所以改革者才如此成功。

总之,当我们讨论内在导向者的政治风格时,必须时常考虑内在导向者带入政治领域的自我利益。内在导向者之所以参与政治不是为了促进群体合作而尽一分义务,而是出于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通常除了上述个人利益关怀外,内在导向者参与政治还有更广泛的利益诉求,如阶级利益、阶级对立和阶级抱负。由于政治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是作为娱乐和心理逃避的方式。所以人们感到政治被动地反应这些需要的压力,人们能主宰政治。与此同时,政治不能也从未侵入过私人生活。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到对政治是否有反应,或出于对利益的关注,政治才会影响一个人。这也许就是与20世纪的政治相比,19世纪的政治界定得过于清楚和过于严格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历史的新发展,得势的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今天的政治排斥19世纪政治组织结构。由于有大众传播媒介作后盾,政治领域的喧嚣和要求已侵入私人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入打破了旧有的政治

参与程序：从个人利益出发关心地方事务，从地方利益出发关心国家事务，从国家利益出发关心国际事务。现在个人直接投入到复杂的国际政治事务之中，无法清楚区分自己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在纯技术的意义上，政治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一部分的原因是政治已侵入过去半独立的领域，如经济领域；另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决策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各决策群体之间相互依赖。例如，在现代战争中，人们有权知道提高税收的充足理由不是为了政府扩大消费或者重新分配收入，而是因为抑制工业和私人消费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假如人们将手中的钱全花掉，政府就没有充足的钱购买战争物资和提供后勤服务。

由于政治事件越来越复杂，加上人们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水平整体下降，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尽管正规教育长足发展，但是致力于农场经营、独立经商和销售部门的职业教育却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与此同时，独立企业家的人数不见减少，但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掌握在这些企业家手中。人们不能再通过某人对工作和才能的自信程度，甚至是过分自信，来判断其政治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

177 ▶ 失势的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

早在 19 世纪就有许多道德说教者将政治视为混乱的、有悖伦理的，他们的观点有些狭隘和偏执。这些现代内在导向者的前身，将自己投射到政治生活中，害怕自己过多地卷入政治，而不愿涉足政治生活。然而，我们对周期性爆发的排外情绪又如何解释，如反天主教、反互助会、以及其他协会组织的神圣秩序。这是由于一些美国人时常不能区分诸如自治会这

样自愿结社的组织和社会阶级与阶层。此外,政治保守的人
会认为,如果当选者在他首次亮相时,不具备“罗斯福第二”的
风度,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

这种病态的焦虑深植于性格中的嫉妒和困惑。传统导向
的政治冷漠者,既不感到绝望也不感到被政治侵犯,因为他们
与政治之间隔着一层帷幕。而内在导向的义愤者只要在政治
上稍不如意,就很容易产生失望和被侵犯的感觉。正如我们
在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当内在导向者不能实现其内化的目
标时,他就会变得十分脆弱。一旦成功了,他就忘记了政治领
域中那些无形的因素,而如果失败了,他就会追究无形的因素
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他的政治态度就像他的性格一样,一
旦失败而又耿耿于怀,则会变得暴躁起来。

由于信息闭塞、孤陋寡闻,内在导向的义愤者甚至认为城
里的骗子都比自己更有出息、更有信心。他嫉妒他们并过高
地估计他们。其实,19世纪城市里的工商业巨头和大律师们
的性格与将他们视为对手的乡镇上的小业主和律师相同,都
属于典型的内在导向者。但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像各地区与
各阶级之间的沟通一样,总是濒于封闭的边缘。

今天,人们时常假设,随着城乡教育差距的缩小,以及收
音机这样的大众传媒同时吸引着城乡听众,城里人和乡下人
在性格结构上的差异也大大地缩小了。也许部分地区已出现
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人导向的城市居民和
内在导向的乡下村民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而且试图缩小
两者之间差距的努力,常常反而加深了乡下人的自卑情结和
对城里人的嫉妒。

在那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移民身上,人们也可以发现
作为政治义愤态度源泉的嫉妒心和被取代感,他们只是名义
上的城里人而已。这些人,无论他现在的身份是城里人还是

乡下人,一旦手中掌握了政治权力,美国式生活中的他人导向因素带给他们的心理不适就会渐渐消失,他们能够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如果这条通向相互理解的道路被切断了,这些顽固的义愤者就会作出绝望的反抗,或者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引证埃里克森对印地安儿童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进行消极的抵抗。

另一类道德说教者则不受政治挫折的影响,总是满怀希望地处理最棘手的事务,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热心人”。从“热心人”词义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风格的演变历史。在英国克伦威尔时期和长期议会时期,所谓的“热心人”是指卓有见识、充满智慧的人,如贵格会会友、平均派或掘地党人。但在18世纪的英国,“热心人”已开始失去其宗教含义,成为嘲讽之词,不再有敬畏或羡慕之意。这就像我们在现代口语中,“行善者”、“改造世界者”、“改革家”、“童子军”等字眼中包含的讥讽之意或善意的告诫:想在政治中行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179 热心人和义愤者相似,往往政治情绪超过政治智慧。这导致他们卷入那些思想不成熟的政治运动。但是热心人与义愤者的政治情绪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的政治情绪是玫瑰色的、明快的;而义愤者的政治情绪是则是充满了阴沉和灰暗。^[5]到了19世纪热心人的政治活动依然很活跃。如果他们的政治参与遭到反对,他们就会辩解,即便在今天也会这样争辩:那些游手好闲之徒都经常有政治工作可做,何况是我呢?这一辩解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关心政治是出于一种宗教式的义务;二是因为美国人有政治参与的嗜好。这一嗜好使得19世纪的许多内在导向者滋生了为政治奋斗不息的信念。

战争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在导向向他人导向的转变,使

得道德说教者的政治风格，无论是义愤式还是热心式的，都声名扫地。南北战争本身就是道德说教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宣泄，它为新的政治生活扫清了道路。也许那些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少数幸存者，依然竭力鼓吹战争正义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虽然还不时地回忆其战争经历，但却很少谈及战争的正当理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绝少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评判战争的正义与否。这些人不是道德义愤者。由此可见，从南北战争以来，人们的政治对立情绪、选举过程的暴力行为以及捍卫道德观念、是非立场的义愤和热情都在逐渐淡化。

当然，内在导向义愤者的政治风格依然有所保存。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家门肯的讽刺社会群体的诙谐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具有极端道德化倾向的群体：乡下人、中西部人、小镇上的清教徒、南方的精神卫生协会、小商贩等。在近年来他人导向日趋传播的情况下，这类群体更具有世界性，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形式已经消逝。

正如道德化政治风格导致了内在导向的性格一样，现在，人们对政治缺乏热情导致了他人导向的性格。换句话说，由于政治本身侵入了人的生活，形成了人的经验及对经验的解释，因此，政治也就成为塑造性格的因素之一。这种复杂的相互影响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所谓的与人口增长曲线有关的特征类型的主要系统中，我们发现了并期望发现根源于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不同变量，例如，英国和美国都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及避孕措施（它替代了马尔萨斯的道德论）的普及而进入了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但是两国所遭遇到的历史危机，如内战，却发生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活在战后宽容统治时期的作家康格利夫也许会对维多利亚时期道德化的盛行感到吃惊。在维多利亚时期，福音派思想的复兴、工业的进步和

工业领域的政治力量都威胁着旧式的政治态度。同样,从历史的不确定性看,如果谁预言美国政治领域里的道德化风格行将消亡而且没有任何复兴的可能的话,将是十分轻率的。事实上,如果有影响的人物成为道德说教者,那么外在导向的人会因为他人导向的倾向,而努力成为道德说教者。

三、内幕消息预测者

雅典人和外邦人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传播或道听途说一些新鲜事。

——圣·保罗

181 他人导向型的兴起将“内幕消息预测”态度带入了政治生活,这种内幕消息预测态度最初源于消费领域而非工作领域。它和他人导向性格一样,不是什么新玩意。在此,这种转变仍然只是量变而已。

他人导向者拥有丰富的社交技巧,他需要这些技巧来生存并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里游刃有余。他可以把某些社交技巧运用于政治生活,如克制自己的情绪。由于他追求生活的合作气氛,所以,他努力克制个人的不快情绪。这种技巧与他不断自省的意识有关,他能时刻意识到人人都具有同等重要性,而内在导向者恰恰缺少这种意识。

内幕消息预测者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既然自己无法改变政治,那么只好去了解它。或者,他可以通过与某些知情者通电话来观察所有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某些内幕消息预测者非常渴望成为政治圈子的人,加入政治组织或创立政

治组织；而另外一些内幕消息预测者的最高目的就是探听到政治内幕新闻。只要任何同侪群体满足他们这一愿望，他们就会加入该群体。

无论哪一类型的内幕消息预测者都希望详尽了解他人对生活中重要或重大的事情上的想法和做法；他在政治上是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地区主义者。如果他不能改变决定他政治兴趣的人，他的性格就会促使他控制自己，模仿他们，而不是改变他们。他费尽心思，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知情的旁观者。当然，并非所有的他人导向者都是内幕消息预测者，但由于缺少更成熟的介入政治的方式，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希望成为内幕消息的预测者。

学校的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教给内幕消息预测者不少探听消息的技能。意识形态告诉他们，生活在政治浸染的环境下，他们必须像了解其他消费领域，如体育运动那样了解政治局势的变化。

绝大多数内幕消息预测者并不主动加入政治活动，但有一些例外。我们发现，许多政府和政党官员以职业所鼓励的方式处理政治消息，也就是说以办公室闲谈的方式论述政治。一些报界、广播新闻界的政治新闻记者，经过长期的训练，能够不带个人情绪冲动地报导政治事件，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内幕消息预测者，他们从不受任何人的任何理由或事件的欺骗。另一方面，某些内幕消息的提供者，尤其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人，似乎开始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向政治义愤者们渗透。他们常常利用所掌握的内部消息来激起对美国政治腐败的关注。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种族歧视、警察的不人道和公司诈骗案等。这种政治姿态在某些群体中成为社交礼节上的需要，在这些圈子里，与群体保持一致并不是导致政治上的忍耐和消遣，而是导致人们的愤恨情绪和政治行

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暗示出：我是根据顺承模式和对他人的反应，而不是根据针对那些反应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内容，来使用“他人导向”这一概念的。一般说来，人的顺承机制和试图顺承的价值是与现实一致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倾向，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情形，如成功的他人导向者可能模仿内在导向者的行为（我们将在第十五章讨论这种情形）。

► 内幕消息的输入与输出

在得势的日子里，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对社会结果的延续很有信心，——“无形之手”的概念就暗示出这一点——即使他当时并不知道社会结构是如何延续的。相反，内幕消息的预测者或者因为对政治内幕知道得太多而忧心忡忡，或者因知道得太少，坐失唾手可得的可以改变自己的机会。他的理解力变得狭隘，这是因为，当他接触到一个以内部故事呈现出来的事件时，总是根据自己的预测对这些事件进行归类 and 改造，或者给他们贴上机密信息的标签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吸引人。由于内幕消息预测者既关心消息的正确性，害怕被骗，同时又害怕被人认为是痴心妄想（他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的本性），所以，他把握不准可用来主动控制个人经验的最佳尺码，缺乏一个敏感的参与者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应有的个人反应。当遇到十分复杂和驾驭不了的政治局势时，他便产生了动摇和退缩情绪，反之，正是由于他的退缩，政治局势在他看来就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和不可驾驭。^[5]

不仅如此，为了附和大量以政治为消遣的人，内幕消息预测者必然准备应付政治局势的变化。在这方面，他就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个谈判者：知道具体情况越少，越不轻易诉诸法律，他越可能获得成功。内幕消息预测者越不像道德说教者那样投身于政治事件或将政治与个人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他就

越能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就是内幕消息预测者总是以官员形象出现的原因。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史蒂潘（我们第一章所引证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毕利宾以及短篇小说《伊万·艾里奇之死》中的艾里奇等，都是一些内幕消息预测者。这也是为什么这些 19 世纪的迎合宫廷舆论的俄国人，名字虽然很怪，但却如此符合潮流。

有事实表明，在美国，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就越可能波动。同时，在这类群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内幕消息预测者。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曾进行过一个有趣的研究：美国人如何看待苏联人？结果发现，中产阶级对苏联人的看法比下层阶级要复杂。下层阶级对苏联人总是充满敌意和怀疑。而在中产阶级看来，苏联人是战时的盟友，在战后有一段时期是朋友，但现在这已经被深深的敌意所取代。其他研究，如对战争和孤立主义看法的研究，也表现出类似的阶层差异。总体上说，在这类问题上，中产阶级被更多地卷入政治，易于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比下层阶级更加注意信息传播的迅速变化。

实际上，对于内幕消息的预测者来说，政治主要是获取群体一致的手段。他必须持易被人接受的观点，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也必须以能被别人接受的方式行事。上流社会与激进群体一样，受道德化政治风格的影响很大，许多决定文化模式的人往往都具有出于政治责任感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他们来说，政治好像是有极大意义的生活领域。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专业人才和商人像对待高尔夫球或其他消遣一样对待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履行社会角色的一种方式，很好玩，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且还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当然，人们往往在不同水平上，怀着窥探内幕消息的动机从事政治活动，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已经在情绪上卷

入了政治,或出于其他原因留恋政治。内幕消息的预测者常常用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为自己的冷漠情绪辩解,强调自己熟悉内幕消息,并因此而瞧不起那些情绪激动者。

185 这些上层中产阶级的内幕消息预测者与乡下或小镇上的内幕消息预测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比前者更容易接触到地方官员,甚至国家官员。在小镇上,有政治影响和无政治影响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很小,政府机构的运作也基本上是透明的,下面这一事实可证明这一点:在电话会议中,每个人都听到相同的内容,因而彼此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虽然他们有时也对地方事务表示极大的愤慨,但这一情绪并不常见。我们发现,乡下人或镇上的人偶尔也会具有他人导向类型的开放性政治态度,十分逼真地模仿都市内幕消息预测者的政治态度。⁶⁷

事实上,我们很难对内幕消息预测者和政治冷漠者进行区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前文得出的观点:传统导向和他人导向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两类人都感到政治是无望的,并持有各种宿命论的思想。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则竭力放纵这种消极态度。然而,内幕消息预测者和政治冷漠者之间也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别,与冷漠者不同,内幕消息的预测者总是与同侪群体保持一致,这些群体把政治当作重要的消遣,并强调不带感情色彩的对待消遣。新式的冷漠者或介入政治,或不理睬政治。而内幕消息预测者则做不到这点,他像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一样,被某种强迫的动机所驱使,竭力与政治发生联系。

内幕消息预测者确实把道德说教者缺乏的现实性带入了政治生活,他们从不想超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作为一个观察者,也作为一个行动者,他们十分了解政治问题的局限性,

从而不会好高骛远。此外，他人导向者将基本的政治技巧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城市规划、劳资关系等，这些领域对于内在导向者来说属于政治之外的事物。内幕消息预测者反对道德说教者把政治问题简单化，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研究政治问题的专家，他们比那些消息闭塞的内在导向的义愤者和热心者知道的消息更多，无论义愤者和热心者掌不掌权都如此。除了政治专家外，普通的内幕消息预测者也习惯于从世界政治和跨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一点是19世纪民族中心主义或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在19世纪，绝大多数报刊文章在论述国际政治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狭隘的口号：国家荣誉。麦森、斯立德的文章及《缅因》报上的文章就是如此。而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通常（不乏例外）以人人皆知的心理战方式讨论国际政治，在解释政治事件时，往往是为了给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施加舆论压力。传播媒介常常要求公众支持某项政策，因为公众的支持可以作为一种自我操纵的平衡手段来左右公共舆论。只有在他人导向盛行时期，人们充分理解了政治活动的心理力量之后，我们才能得出上述结论。

也许有人会发现，目前关于我们讨论“生活方式”会勾起对“国家荣誉”的讨论。应当看到，“生活方式”和“国家荣誉”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字面上。“国家荣誉”既可以是一个伪善的字眼，掩饰着我们为了阶级利益而侵略海地的行径，也可以是19世纪各种仇视外来移民的情绪表现的统称。无论“国家荣誉”一词的内容多么含糊，但在针对国家敌人时，这一概念的含义是确切无疑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则具有更多心理上的内涵：涉及国内事务时，这一概念的内容十分具体；涉及国外政策时，它所指的内容则不那么具体，也不应当具体。“国家荣誉”有时束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设置了我们不愿也不准备捍卫的道德据点。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几

乎从不为对外政策提供道德指导，对外政策是纯政治方面的事情。“国家荣誉”一词使我们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行径，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语则使我们想起他人导向者掩盖自己和别人的道德观，尽管他有自己的道德，也会出于权宜之计来运用道德。1947年，密执安大学观察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当问及在他看来，美国对联合国太迁就还是太为所欲为时，他回答：

也许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在联合国太为所欲为了（他被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国家感觉到我们在试图控制他们的国家。他们知道苏联想这么干，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争论的原因。如果这些国家认为我们企图掠夺，他们也将不会信任我们，因而我们将不能顺利地推行整个计划，而我认为，这一计划正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当我们得不到我们需要得到的，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大肆渲染我们被一些事难倒了。我认为这倒不错，因为它使其他国家感到我们正如他们一样，我们也有麻烦。那会使他们更同情我们，对我们更友善。^[7]

像这样的心理上的谅解代表着真正的进步。道德说教者通常不能容忍这种精明，至少不会对它们感兴趣。

许多重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解。譬如，为什么有这么多由他人导向者加入的同侪群体仍然将政治列入日程？为什么许多人，如知识分子仍然不用时髦之物取代宗教之类的其他事物？在美国，应该使我们惊讶的不是政治冷漠者的人数，而是为什么冷漠者的人数不再那么多？为什么人们标榜自己是

老派道德说教者却又像内幕消息预测者那样消息灵通？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交流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培养和支持后两种政治风格（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预测者）过程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同时，传播媒介是各类消息的不间断的传播者，它既是培养潜在内幕消息预测者容忍性格的导师，也是培养潜在道德说教者义愤性格的导师和煽动家。

无疑，父母向孩子们灌输、推行的目标和理想，既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目标，又不符合清教徒的理想。前者是世俗的、自信的，以个性为荣和追求摆脱陈规束缚的人，后者是畏惧上帝、受良心支配、害怕自己不能得到拯救的。⁸¹然而，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具有较强的个性，都受内在力量的驱使，并且都善于创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许多人都由内在力量驱使，追求有限的价值、财富和权力，那么这一社会必然包含着它自身产生的各种对立力量的动力变化。即使那些不屑为高官厚禄而奋斗的人为了在社会体系中不至于落伍，也要奋力一搏。当然，这一社会体系已经变得较为开放，不那么注重年龄和家庭出身来划分社会等级了。

注 释：

[1] 我在这里使用风格一词的含义与拉斯威在《政治语言的风格》(Style in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一书中的含义不同，(《政治语言的含义》拉斯威等著，纽约，1949年，第20~39页)。在此，我要致谢拉斯威的这篇论著，我和我的合作者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政治与性格的关系要归功于拉斯威在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学领域开创性的工作。

[2] 该访谈是由科纳夫博士对来自欧洲南部、意大利和加勒比海的哈里姆区移民进行的访谈之一，载于：《大众的面孔》，第98~119页。

[3] 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有意识地抵制兵役，这需要罕见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我所指的是他们的主观态度而不是外在行为，他们放弃了批评和获得尊重的权力，甚至表达自己感受的权力。

[4] 在罗乃夫的论文：“道德义愤与中产阶级的心理”中，对这种类型的义愤与仇恨进行了精辟的描述。虽然我们在这里强调人的性格，但我们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性格表象下的气质区别，正如古希腊人所说的多血质、胆汁质等。

[5] 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与 19 世纪政治观察家的看法极为相似。这些观察家认为，由于人的本性所限，也由于社会的发展遵循自身的规律，人的能力受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人不可能影响社会变革。19 世纪初对法国大革命持保守批评态度的波克等人，以及 19 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着这一思想主线的两个分支。然而，这些人的“能力有限论”思想并没有产生能力不足的主观感觉，至少，就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言（也许波克也可包括在内），他们对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还是带有乐观积极的色彩。如果让世界自行发展，改革家放手不管，人们便不会感到挫折和无望了。人们只需承认这一限制，然后投身到未来可能的变化中。

反之，当代社会宿命论者则假设，我们的文明正日趋衰落。在 19 世纪，持这种悲观看法的政治观察家为数很少，亚当是其中之一，但他连自己的预言都不信。甚至上一世纪的悲观主义者都不能想像本世纪的政治将变得多么可怖。但今天的人感觉到了政治的无能，而且他们的哲学探讨强化了这一态度，使之更适合于他们的性格和地位。

[6] 比较一下默顿在《影响的模式：关于地方性的人际影响和沟通行为的研究》中的有价值的论述。载于：《交往研究》，1948～1949，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编，第 180～219 页

[7] 摘自：“四个美国人谈对欧洲的援助”（Four Americans Discuss Aid to Europe），载《研究》，第 18 期，第 13 页。

[8] M. 米德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是很大的，很有启发性，她指出新清教徒如何把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传给自己的子女，虽然他们的理想是不变的，但这一理想的驱力却促进着变化与进步。《教育社会学杂志》，第 14 期，第 92 页。

第九章

政治的游说：义愤与宽容

“能够为顾客提供微妙的‘心理价值’的超级市场要比单靠‘物美价廉’来招揽顾客的传统商场更加生意兴隆”。芝加哥珍珠食品店的副总裁兼常务经理克里蒙今天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在谈到如何提供“心理价值”来吸引顾客时，克里蒙认为商家必须发掘一套讨人喜欢的特性，正如我们的朋友身上吸引我们的品性。他概括了这样一些特性：整洁、时髦、大方、礼貌、耐心、诚恳、善良和富于同情心。他说：“每个商店经营者都该反躬自问，他的商店是否具有这些吸引顾客的品质。”

克里蒙先生认为，要明白驱使顾客购物的心理动机，我们首先要回答这一问题：“人们真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吗？”这一问题的答案表明人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克里蒙先生同时又认为：“但是人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摘自超级市场机构第十二届年会报告。
载《纽约先锋论坛报》，1949年5月10日

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把来自于生产领域的态度带入了政治领域,而他人导向的内幕消息预测者则把消费的态度带到政治生活。他人导向者认为可以根据消费好尚来评价政治。政治家也是人,所以越具个人魅力,就越有好处。此外,政治与市场也有一个相同之处,政治行为的方式与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一样重要。这一点正好与他人导向者的倾向一致,他人导向者比内在导向者更强调手段,而不太注重目的。

在政治舞台上,大众传媒可能是他人导向的演员与观众之间最重要的沟通途径。大众传媒不仅可以批评演员的演技和演出的情况,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训练观众的政治消费技巧。所谓直接训练媒介是指那些公开发表政治言论的报刊杂志。如《朝气蓬勃的共和党人》《纽约先锋论坛报》和少数老资格报刊。这些报刊的编辑都是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间接的训练媒介则范围广泛,包括了从连环画册到电视的整个当代流行文化领域。这些传媒控制了美国最高阶层以外的各个阶层的闲暇生活,其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创造他人导向的政治风格方面影响深远。尽管传媒的影响模式十分复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 流行文化实质上是消费导师。它训练他人导向者如何消费政治,怎样把政治消息和政治态度当作消费品。政治也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赛、一种娱乐和一种消遣,而人们则是购买者、参与者、游玩者和业余观察者。

(2) 大众传媒对于外界压力十分敏感,因此宽容精神至关重要。即使在传播道德说教者的思想时,他人导向的听众也会心平气和地接受道德义愤者的信息。这种态度使听众不重视媒介的内容,而注重表达的诚意。流行文化和政治生活强调诚意的做法,使得观众忽视并宽容大众传媒的某些不佳

表现。

(3) 由于美国政治新闻界与编辑界仍然保留着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风气,所以流行文化虽然赞成他人导向的宽容与忍让,但其说服力已被削弱。

一、作为消费品的政治

190

正如本章开篇引文所发现的,他人导向者沉缅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但却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这一结论可以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与此相反,内在导向者则把政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都视为工作。他们十分明白自己的需要,可是对于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却一无所知。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芝加哥附近新建的“森林公园社区”所作的一项调查访问。该社区是在政府的支助下,由一家私人机构——美国社区建设协会创建的。协会把房屋租给住户,并与社区居民联合会合作承担政府财政管理机构的职责。在访问中,我们询问居民对“美国社区建设协会”的印象如何以及他们参与地方政治的情况,并收集对协会的闲言碎语。结果显示大部分居民都抱怨生活设施和社区布置都不尽人意。但我们注意到这些抱怨常常是指责“社区建设协会”的公共关系。几乎没有批评意见是直接具体地指出有哪个方面不符合他们的居住需要与感觉。可见,“社区建设协会”只因不善处理公共关系,才惹来如此之多的抱怨和批评。其实,人们的抱怨并非来自对居住条件的不满,而是由于“社区建设协会”忽视沟通技巧,不讨居民欢心所造成的。居民对改善具体生活设施的要求与他们的喜好相比并不重要(这一点被认为

是顺承庞大组织的技巧)。^[1]

在这种被动消费的情况下,可以预见如果允许自由选择,人们很可能退出内幕消息预测者同盟,加入到众多新式冷漠者的行列,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大众传媒在政治表演中发挥着蛊惑人心的作用。大众传媒发明了一种“灵丹妙药”——魅力,来医治危险的冷漠情绪,就如同性的魅力取代了传统导向者的爱情和非个性的家庭纽带;产品包装和广告的魅力取代了价格上的竞争。如今,政治上的魅力无论是领袖人物迷人的神秘形象包装,还是大众传媒的大肆渲染,都取代了内在导向者的自私自利的政治风格。总的来说,凡是充满魅力的事物,我们就会怀疑旁观者是否持有冷漠态度。

和以上论断相同,追求政治魅力也就是要努力提供吸引选民的心理价值。正如克里蒙先生在超级市场年会上所讲的那样,挖掘像好朋友那样讨人喜欢的品性,即“整洁、时尚、大方、礼貌、诚意、耐心、善良和富有同情心”。大多数政治策略都可以依照这些词条来加以解释。1948年,杜鲁门就被认为不够时髦;杜威则缺少同情心,不够善良诚恳;而艾森豪威尔,则具备了上述各方面的优点。在美国,人们爱戴具有吸引力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的成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魅力的追求。在1948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们认为具备各方面优点的人一定会赢得选民的衷心爱戴,也一定会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这么多讨人喜欢的品性,人们就会另选一个有魅力的候选人。这种现象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不过在收音机普遍的现代,我认为追求政治魅力的观念已经十分顽固。就是那些铁石心肠的美国政治领袖也会从罗斯福总统的经验中学会重视魅力。当然,有选举权的人越多,个人的政治魅力也就越容易取代争端或旧式的爱戴。但到目

前为止,仅仅只是一种趋势而已。我并不是说,人们不顾自己的需要只管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并不是说了解他人导向性格比了解经济趋势、伦理传统和政治组织更有利于预测选举结果。

二、传播媒介:宽容态度的培养者

目前宽容的态度已成为人们对待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事务的方法。而传媒之所以要宣扬宽容精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促进宽容倾向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传播媒介的受众。报刊杂志等出版物,虽然不具备电影那样的感染力,但也遭到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重重压力。这些压力在传播媒介的经营与分配结构中已经被内化了。

其次,大众传媒的传播范围越广就越需要以大都市作为发行中心,进行采编和出版。而在大都市里,来自于倡导他人导向的宽容态度的压力最大。传媒在大都市里比在小城镇更少受到来自广告商和地方食古不化者的压力,媒体风格也要更大胆和前卫。但是,大都市的传媒受众,人数众多而且异质性强,难免众口难调,所以编辑们常常害怕冒犯了读者。早在19世纪的报刊编辑,为了增强发行量,不惜造谣生事,发表奇谈怪论。但20世纪的出版商,即便能扩大销路也不敢下这个赌注。出版商像现代企业家一样,尽量要求产品产量曲线摆动幅度平稳一些。销量的大起大落对出版商不利。今天,出版商主要依靠拉广告来保证销量,并通过履行“报业协会公约”分享长期利益。

另外,由于许多小城镇往往只有一家报社,所以肆意攻击

任何一个有权势的群体都得不偿失。报社的老板宁肯遵守“美国报业发行协会”或“广播协会”的条约规范,采取公平交易的方式,而不愿冒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的风险。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传播媒介的影响范围越广,就越具有他人导向的宽容精神,同时它对政治义愤者的吸引力就越小。事实上,由于大众传媒扮演消费导师的角色,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并合理解释传统喜好与政治风格的变化、断裂和发展。因此,传媒与宽容精神息息相关。传媒不愿意人们过分热衷于某一嗜好,因为说不定传媒明天就想企图改变流行趋势。但是,传媒没有意识到干涉人们的嗜好有损于宽容精神。

在另一方面,一些年长的报刊老板则缺少宽容精神,对情报的获取充满野心。他们鼓励手下的编辑采取强硬的手段去控制那些冷漠者和顺承不良者。这两类人追求的不是政治消息,而是满足冷漠引起的刺激与娱乐。赫斯特、伽尼特以及北方牧师等报界与广播界的巨头,他们追求的是权势而不是金钱与赞同。然而,他们的读者不再是主要由政治义愤者组成,而多半是新式的冷漠者。他们接受了赫斯特的激进思想,并被《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日报》所吸引,而可能成为一个内幕消息预测者,因为这些报纸报道新闻的方式使他们能够识辨内幕消息的真假。这几家媒体教会他们把官方的宣传、学校教育以及传媒报道视为宗教式的说教,反而把老练的、野蛮的、不合法的、神秘怪诞的东西看成真实的。他们认为编辑诚挚地希望他们去辨识真伪。

► 宽容与迷信真诚

要探讨真诚的含义,我们必须从了解流行文化训练大众宽容态度的方法开始。我们一定要记住本章一开始所引用的克里蒙先生的那段话:“真诚可以给商家赢来众多忠实的顾客。”^[2]

194

在研究人们对流行的态度时,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我喜欢狄娜·萧,因为她很真诚。”“这张唱片充满了真情实意。”“你会觉得弗兰克·辛拉特娜是位纯情歌手。”很显然,人们总希望将他们与消费英雄之间的关系加以人格化,他们渴望真诚,表明了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很少信任自己和他人。我尚不太清楚他们是如何判断一个歌星或演员是否真诚。^[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歌星和演员可以自由表达普通人不能或不敢表达的情感。我认为真诚是指没有攻击性或顽世不恭,没有心机或防御色彩的行为表演。某些政客在回答公众问题或者开记者招待会时就常常使用这一套表演真诚的技巧。演员往往让自己受到观众支配或者表现得很感性和情绪化,所以对于演员来说真诚就是指观众接受他、容忍他。由此可见,对于一个胸怀坦荡、待人热情的人过分挑剔,实在不太公平。

但是,一般人所强调的真诚,还不仅仅指这些。它还意味着,评判标准已经从注重演出剧情的好坏、演技的优劣,转向演员本人的个性了。也就是说人们对判断一个演员是否真诚,主要是看他本人对观众是否真诚,而不是看他演技的好坏。实际上就是根据他的真诚与表达真诚的技术来作判断。

且不谈演技,仅从观众对演员真诚性的看法来说,观众可能会偏爱某位艺术家,正如人们会欣赏非正式表演场合说话结巴的演员。重视演员情绪特征(如真诚)的观众,往往可能逃避自己的情感需要,尽量克制表演对自己产生的情绪感染。虽然听众可能非常喜欢某位歌星,如果用10岁孩子的话来形容,这位歌星的确令他着迷。但是他却不愿意过分表露喜欢的程度,他要考虑其他同等身份观众的态度。他把真诚视为一种客观品质,或者至少是可以作为与同侪群体讨论的话题。这样他既宣泄情绪,又不失身份。他可以为一个小姑娘的出

195

色演技鼓掌喝彩,而不承认自己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在这一意义上,真诚的艺术家的确是一个努力刻苦的艺术家。

如果把政治舞台看成是一个情感市场,许多政党候选人都会竭力表现出讨人喜欢的个性。如果观众必须在演技与真诚之间作出选择。许多观众宁愿选择真诚而不在乎演技。只要候选人用心良苦肯下功夫,即便他说话结结巴巴,做事笨手笨脚,大众还是会宽容他。^[4]

► 真诚与玩世不恭

他人导向的内幕消息预测者,绝非仅仅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而内在导向者和他人导向者都可能具有玩世不恭的特征,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相同。内在导向的玩世不恭者可能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冷酷无情、投巧取巧的人;也可能是不满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这种人在行动上往往是一个正人君子。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内在导向者不管好歹随时准备利用他人。正如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想要强迫他人接受道德规范一样,他人导向的玩世不恭者,常常由于太依赖他人,而不敢完全表现出玩世不恭的作派。因此,他可能总在寻找真诚的情感。换句话说,他追寻人物的个性。如果一个伟人的个性打动了,他就会喜欢他的全部。人们渴望一个像艾森豪威尔那样诚恳的总统候选人,正说明人们在逃避冷漠与玩世不恭,而希望追求真诚与热情,从而消除个性上的压抑。在这里,所谓玩世不恭或许是指他人导向者能够容忍或接受同侪群体的规范。如果一味地接受群体规范,会让他产生对自己的玩世不恭,但并不会导致他对他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事实上,他人导向者必须借助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因为他人导向者对自己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所以

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却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内在导向者在对待政治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往往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制度、组织和政治价值的。与此相反,他人导向者对个人怀有悲悯之心,而对法律和政治机构则表现出冷嘲热讽与玩世不恭。正如他可以把政治当作体育竞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人导向者十分关注政治家的真诚个性,但这并非是件好事。因他人导向者评判真诚并不是用抽象的好坏标准来衡量,而仅仅强调领袖个人的性格特征。许多现实情况表明,真诚的态度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首先,领袖的热情与真诚并非绝对重要,主要视具体情况而言。政治组织与选民机构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扼制一个不诚实候选人的恶行。他人导向者往往仅注重政治家的品性,而忽视政治机构的强大力量。正如道德说教者将法治社会浪漫化一样,内幕消息预测者则将人治社会浪漫化。

其次,判断一个人是否真诚非常困难。大众可能会认为真诚一词的含义就是以宽容的精神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要花招。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人们简单地相信真诚,才使许多欺骗得逞。

显然,他人导向者重视热情与真诚是出于心理需要,而不是政治需要。作为一个领袖,否决的权力往往显得更为重要。当一个人自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往往可能自欺欺人;相反,认为自己不真诚的人,也许会提防自己也会受到他人的监督。^[5]

197

三、大众传播媒介逃避政治吗

好莱坞对于黑人问题的揭示,开辟了电影界的

新纪元,也给影片分销商带来棘手的问题:南方人怎么会喜欢攻击种族歧视的影片呢?……可是《勇者之家》一片在曼哈顿上映了九周,十分红火,并在达拉斯和休斯顿上演……在达拉斯,一个黑人电梯工,综合了他所听到的意见说:“我告诉你,99%的人,认为这部片子很有教育意义,其他1%的人则说这是一部好片子。”

——1944年7月18日《时代周刊》

大众传媒的批评家通常认为,传媒滋生了人们的政治冷漠,鼓励人们逃避政治和现实生活。用经济学中“葛氏定律”来说,传媒用大众娱乐的“纸币”驱逐了政治的“硬币”。有人不禁要问:“华盛顿怎么能与好莱坞和百老汇相媲美呢?”

实际上,受到众多批评的大众传媒尤其是报刊杂志,一直保持内在导向的政治态度。这些报刊比观众所要求的还重视政治,连小报也印着醒目的新闻标题,常常采用新闻图片作封面,而不是采用更有趣味的漫画。当然,报纸上的确常常刊登有关性、犯罪等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报道,但也常常介绍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赫斯特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义愤者。他喜欢把编辑的社论而不是半裸的女人照片刊登在头版。以娱乐为主的地方电台为了维护声誉和讨好联邦传播协会,每隔一小时就播出一次新闻。同样,纪录片也往往把有关政治风云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内容排在前面,而把歌星演唱或时装表演安排在后面。可见许多传播媒介事实上比市场研究结果所显示的更重视政治消息的报道。通过报道政治消息,传媒培养了公众的政治兴趣,维护了政治的威信。当然,有些时候传媒也无意去袒护那些臭名昭著的政客。

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传媒重视政治报道十分重要,因为

他是在这些媒介的指导下,制定生活计划,形成价值判断。他深信人们的政治观点与传媒所宣传的完全吻合。他认为除自己以外,其他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对政治问题警觉性很高的道德说教者。同时,他常常喜欢通过报刊上的民意测验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些民意测验除了爱对政治刨根问底之外,还询问一些公共事务,很少涉及到日常生活和体育活动。可见,大众传媒虽然无意钝化人们的政治意识,但却有意掩饰人们的政治冷漠。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就常常为自己的态度找借口。男人们尤其如此。这些人很少发现其他人对政治也同样冷漠和感到厌烦。在城市里,人们彼此并不了解,他们只能通过传媒知道与自己态度一致的人有多少。但是,传媒的首要功能是作为政治的宣传工具。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传媒从业人员喜欢按照政治领袖的观点来衡量是非。出版商宁肯赔钱也要出版几部有声誉的著作。报社、电台,为了赢得好名声,也可以不考虑利润问题。如果电影巨头只热衷于娱乐性,也就不敢大胆制作像《勇者之家》这类严肃主题影片。

实际上,尽管这些把持大众传媒的人,在政治问题上持道德说教者的态度,但大体上来说还是属于他人导向型。他们混饭吃的技巧就是一味捕捉模仿知识精英的观点与态度,很少留意广大读者与听众的态度,而这些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又不屑一顾。

毫无疑问,不同的娱乐方式,有着不同的等级划分。早期按照艺术标准来划分。今天则依据娱乐主题而不是表现方式来划分。从儿童的漫画读物到成年人阅读的评论文章都可以看出,读者在阅读内容和品味上都在不断的提高。此外随着传媒制作者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和道德修养的提高,传媒界迫

切要求在娱乐性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有教育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文章和节目。人们认为纸面光洁的刊物比印刷粗糙的刊物等级要高。同样,政治新闻要比桃色新闻更高雅。难怪体育专栏的作家渴望成为政治专栏的作家;夜总会的播音员也想主持政治评论节目,煽动政治狂热。许多出版商一开始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后来变得有点像个政治说教者。正如一些暴发户在他们助手的游说下捐钱给慈善机构,一些传媒新手也接受劝告要摆脱低级趣味的商业定位,追求更高声誉的目标。例如,无论是《生活》这样的知名画刊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画刊,都逐渐少用美女色情图片,更多地刊登纯艺术照片;同时,在周末增刊上也极少刊登刺激性的桃色新闻,而主要刊登一些严肃的政治文章。

200 因此,在美国尽管传媒的效果既很含糊又很复杂,但明显突出政治主题保持着旧式道德说教的政治风格。这种现象在报界比电影广播界更为显著。然而,总体来说,大众传媒对美国人政治态度的影响,与其说保存了内在导向的政治义愤态度,不如说鼓励并迎合他人导向者,由此强化了他人导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除政治生活以外,内在导向的影响及其作用已被逐出大众传媒之外。

四、义愤的贮藏地

除了政治问题,大众传媒很少传播有利于政治义愤者的消息。通常,传媒讨论道德问题时极其暧昧,正如第七章所述,主要反映人际关系的问题。此外,当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太快,内容太繁杂,许多保留内在导向倾向的人已不太适应。例如,他们既不明白专栏作家比利·罗斯笔下的百老汇的道德

观念和生活习惯，也看不懂连环画报上的古怪词句，更无法接受 A 级色情片中的性暗示和性符号。义愤者会发现，现代西部片不再像老式西部片那样以骑马的牛仔作为主要角色，不再表现复杂的道德问题，而是变成了虐待狂、性泛滥等社会问题的避难所。在这些内在导向的上层阶级眼里，广播剧也弥漫着悲哀的说教色彩，剧中的角色极力表现纤弱敏感的情感，往往需要专家来进行心理辅导。典型的铁石心肠的义愤者大多是男性，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

201

从《科学美国人》几年前的变化，人们可以看出传媒的另一种总体变化。原来的《科学美国人》的读者通常是具有内在导向倾向的科学专家。如今，该杂志已改用光面纸印刷，以迎合那些科学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消费者。一位老读者抱怨《科学美国人》已不再是为专业工作者编辑的了。纯粹的科学爱好者专栏只剩下天文学。我们也看到，曾是诸如《阿伽》和《尼克卡特》等道德说教题材作品的出版商史屈特和史密斯，在 1948 年只出版低级趣味的小说，如侦探小说、西部牛仔小说，并集中力量推出三种印刷精美的杂志《少女》《魅力》和《少女生活》。固执而守旧的道德说教者对这些杂志无可奈何！

如果道德说教者依然身处内在导向者的环境，继续受到无形的内在原则支配，那么大众传媒还不至于令他如此困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常常令他失望，他的性格和工作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能力和地位每况愈下。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缺少个人奋斗的成功，而是缺乏对世俗世界的了解。因此，他开始讨厌自己的性格与工作，仇视整个世界。他不顾一切地试图将国家拉回内在导向时期，在义愤的情绪推动下，他随时准备投身于政治运动。他所面对的世界使他没有立足之地，社会不断传出一些不利的消息来打击他，使他无力招架。

虽然他的破坏冲动可以借各种意识形态来加以理性化,但是很显然,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眷恋的了。大众传媒在许多方面都与内在导向者格格不入,惟有在政治领域例外。原因之一是,许多大众传媒的领导者,为了顾全自己的威望和利益,宁愿在政治问题上持道德说教者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内幕消息预测者的态度。另一个理由是,传媒只要报道一个简单消息就可以招徕大批读者。大部分读者是新式的冷漠者,易被政治情绪所感染,另一部分读者是政治义愤者,希望能够在社论或评论专栏里看到令其欣慰的观点。

表面上看,报纸、评论以及专栏文章对于他人导向者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不然,许多他人导向者也接受道德说教者的政治态度,而更多的人则游离于道德说教的政治态度与他人导向的政治态度之间。即使是宽容的他人导向者也常常被义愤者的“愤怒”所打动,这并非由于“愤怒”态度与其性格结构相吻合,而正因为不相吻合才为之吸引。例如,在商业性的体育比赛中,他人导向者喜欢有人押的赌注与自己相反,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尽管他知道这样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可见,无论是义愤者、冷漠者、还是内幕消息预测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常常表现出攻击性的义愤。所以群众向杜鲁门高喊:“哈利,加油!”各个阶层和各种性格的美国人都喜欢观看拳击比赛和西部赛马。同样,美国人也把政治争端视为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尽管美国人的政治态度趋向宽容。

我们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选举的意义在于鼓励义愤者毫无顾忌地参加选举活动。在竞选的争夺中,道德说教的传统仍然存在,并且与“追求魅力”的新风尚分庭抗礼。政党机构虽然相当注重展现魅力,但同时也吸取过去失败的经验,充分重视义愤者的政治力量。甚至他人导向者也有可能投票给持道德说教态度的内在导向型的候选人,因为其政治

态度,似乎更为他人导向者所期望,也更富戏剧性和更加恰当。

要求政府包揽许多无法处理的事务,是政治义愤者的一大政治传统。在义愤者的康涅狄格州时期,令托克维尔吃惊的是:他们既不知道法律全书中应该包括希伯莱法,也不能提供严格的法律条文。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的是,今天的义愤者竭力将政治活动中的法律强加入文化生活中,如文学、电影、大学、图书馆。这些标志着都市生活的复杂和宽容。义愤者的种种努力所遭受的抵抗,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在导向者,而不是宽容的他人导向者。因为内在导向者的宽容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不是性格特征。美国人权自由最狂热的捍卫者往往是出于自己的原则与坚定的信念,而不是通过对某位政治家的崇拜。相比之下,宽容的内幕消息预测者对于不宽容者采取一种客观的中立态度。他过于了解他人,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抗争;他太在乎别人,以至于放弃自己的原则和需要。

事实上,他人导向者试图利用幕后操作,而不是反抗道德说教的方式来抵抗政治义愤者的攻击。由于他人导向者生性温和,不愿意采取极端公开的立场,所以他们往往通过朋友和群体向政治义愤者施加压力。他对于处理幕后事宜以及人际沟通驾轻就熟。对付大众传媒也是技高一筹,何况传媒并非完全控制在道德说教者手中。这样,他人导向者就能抑制义愤者喜欢表现的政治激情。正如一个精明的检察官在向陪审团提供起诉书以前,先跟被告的律师秘密磋商,并设法平息陪审团的不满。同样,内幕消息预测者在国家与地方政治问题上可以向义愤者让步。内幕消息预测者所以能做到让步,是因为他无意通过政治来改变世界。的确,义愤者在政治上要求越多,宽容的内在导向者让步就越多。

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预测者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但在整个人口比例中仍然占少数。然而,内幕消息预测者的博学既让他自知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又使他明白想要摆脱政治只是一个幻想,所以内在导向者对政治冷漠者的影响甚微。政治义愤者则大不相同,他们对冷漠者有很强的号召力,义愤者不但可以给冷漠者留下好印象,而且善于利用他们的不满情绪。有时候,这些不满情绪可以通过抗拒政治号召,而纳入了政治领域。义愤者那种充满激奋的承诺对于许多能力不足或者缺少情感的冷漠者颇具诱惑力。早期的纳粹党、戴高乐主义和其他国家中那些自我标榜可以“超越政治”、“超越党派”、“超越多种意见”的政治群体都属于这类典型。这些群体大肆攻击那些忠于传统的群体成员中在社会上有政治号召力的人士。他们要求自由政治、自由原则、自由纲领和自由议会。这种态度在美国的政党体系和政治论述中司空见惯。因此,一旦义愤者能够做到,对内,在下层阶级中煽动国家主义思想和民族仇恨情绪;对外,迫使反义愤者向其屈服。对于宽容者而言,义愤者与冷漠者的联合已是不争的事实。宽容的内幕消息预测者与内在导向型的宽容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能够认清事实而又抗拒事实。

早在宽容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与情绪来组织政治活动之前,义愤者就会一窝蜂的来加以阻止,宽容者的性格塑造被迫终止。

五、始于责任的梦想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建议作为结论。假如传媒能提供给读者一种可以接受的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那么在心理上美

国人将变得更为坚强,更能激发美国人的政治想像力与唤醒他们的政治责任感。我们的大众传媒及其批评,如果能继续保持现状,只要目前人们的生活过的好,哪怕传媒宣传政治内容空洞无物,大众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传媒的政论权威。因为,虽然缺少实质的政治内容,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不着边际的幻想来讨论政治。传媒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如同英国上议院对大众意见的毫无影响力。比较严谨的报刊不甘屈服于这样的现实,竭力探询美国生活的新动态,摒弃诸如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的低级趣味,竭力向大众灌输政治争端。但是政治并不像传媒业主与观众所想像的那样真实,政治谣言通过强大的传媒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成为一种逃避方式。因此,可能产生政治革新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或许会被错误的权威观念所抑制,也会被那些了解大众文化并控制着传媒的人内心尚存的罪恶感和伦理观念所阻止。

传媒本身直接对大众的影响并不像传媒的控制者以及批评意见想像的那么大。这些人如果了解这一事实,就会重新调整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关注传媒本身,而无须在意信息的传播与采编。电影制片人和批评家若关心的只是内容本身,譬如种族宽容,那么他们可能忽视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编辑与社会学家如果一味试图影响选民,那么他们会很痛恨英语这种文字媒介,因为英语变成了一种煽动工具。播音员如果仅仅出于薪水低而抵制传媒业,显然说明了他对行业的语言艺术价值毫不尊重。

从种种情况来看,电影、电台、小说等工作者的往往过分重视政治而忽略了艺术,尤其是媒介自身的大众艺术价值。这样的话,这些传媒作者的生活也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的做法贬低了他们自身的技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现象充满了矛盾。美国社会可以制造一流的报纸、电影和广播(姑且不谈

传媒主题带来的问题),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堪称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幸福的国家。可惜的是与那些政治评论家相比,优秀的传媒艺术家实在太少了。

注 释:

[1] 参见甘兹在其著作:《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pathy)中有关“森林公园社区”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

[2]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研究皮货店的销售方式如何从重视售货技能转向重视与顾客的关系。他发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真诚的含义没有发生改变。他观察了一个例子:一个男性雇员解释他自己是如何反对竞争:“你要善于跟顾客谈话,当顾客进来时,你要设法接近顾客……顾客能够判断你是否真诚。”这个男售货员的成功不是仅仅用销售额来衡量,而应根据“迎合人的”和“良好的品行”来衡量。克里斯伯格:《芝加哥皮货店的商业价值观和商业实践的关系》,芝加哥大学,1949年。

[3] 在分析这些访问时,我首先要十分感谢贝克先生。他对“真诚”问题的透彻讨论使我大受启发。他运用“真诚”这一标准分析了观众对《卡特·史密斯的战争动机》一剧的反应。默顿:《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纽约,1946年。

[4] 这些分析都是在1952年大选前写作的,可以很好的说明人们当时的态度。

[5] 在南北战争其间,林肯与将军们的关系是说明内在导向者真诚和待人接物技巧的典型案例。在这一案例中,格兰特将军是一个酒鬼,但林肯只想知道他是否能胜任工作,而不在于他是不是好人,或者对林肯本人好不好。

第十章

权力的形象

在美国,富有的公民并不会因为富有而冷落穷人,恰恰相反,他们竭力与下层阶级打成一片,保持融洽的关系,时常与他们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富人十分明白在民主国家里有钱人也需要穷人的支持。在民主时代,你需要礼貌的态度,而不是靠小恩小惠来拉拢穷人。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近 50 年来,美国的权力形象已有所改变,小孩子模仿成年人,以其作榜样。通常,这种小孩都生长在大家庭里。孩子们很容易了解成人的所作所为,成人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孩子们在不具备完全成熟的生理条件之前,便早就能将成人的行为模仿得惟妙惟肖。社会成熟常常走在生理成熟的前面。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下,成人生活的角色与孩子们不成熟的生理条件差距越来越小。由于孩子们的游戏和好奇心不太受抑制,所以尽管某些仪式的神秘性仍证明了成人的权力和孩子们的无助,孩子们还是很早就知道有关性的知识和其他成人的所为。

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207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产生了典型的统治阶级集团。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地主、金融家等组成的联邦同盟领导人确实是以统治群体自居。早在这些人的领导地位被推翻之前,他们的权力已被农民和手工业者剥夺了,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掌管政权,他们只好将权力交给有政治才能的人,自己则保留了否决权,所以有时他们也能像杰克逊总统一样,采取主动的控制。然而在南北战争以后,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监督权,工业界巨头登上了统治阶级的宝座。在随后的统治中,美国的权力形象与权力实态之间的一致性,比今天的情况更为显著。

► 产业领袖与消费领袖

根据上述观点,18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作为一个分水岭,这次大选标志着寡头政治的顶峰。在政治风格上,两位总统候选人布兰和麦肯莱都属于道德说教型。当时出现一些社会群体,他们不以道德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这些群体对选举持内在导向的态度。只有少数象布鲁克斯·亚当那样的人,由于痛恨像“金甲虫”似的冠冕堂皇的麦肯莱,转而支持布鲁克斯·亚当,他们明白两位候选人的选举地位尚不明朗。

显然,虽然麦肯莱、哈纳和摩根在几个辖区内获胜,但他们并没意识到政治局面的暧昧。我觉得他们在选举中是否获得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竞选方针,即在阶级意识的指导下参与选举。我们前面曾提醒大家注意,由于政治和工作的密切结合才造就了这样一批有自我意识的领导人。工作的世界是伟大的

世界,而政治是工作的延伸,政治可以促进工作也可能妨碍工作。银行家与农业促进会的人对于政治究竟该管哪些事各持己见。但他们一致认为生产是人类生活中首要的问题。

当然对于内在导向者而言,政治并非毫无乐趣,政治成为他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饮酒作乐时,临睡前的闲谈话题。有时政治也是他们用来暂时逃避工作和财产烦恼的手段。当时的政治情形与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的领导人投身政界是为了有一番作为,致力于美国巨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不是为了赢得公众的喜欢所作的一番政治魅力表演。当时的洛克菲勒石油公司主要凭借实力和价格低廉,而不光靠牌子发家致富。同样,19世纪的政坛领袖把自己的产品即否决权与决策权,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政治买卖,也许是道德交易或者金钱交易,总之绝不会是靠讨人喜欢就能成交的。 208

这种代表内在导向者动机与追求的政治局面清楚地反应出1896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大相径庭。这种明显的阶级统治局面直到刺杀美国总统麦肯莱事件发生之后才宣告终止。此后,无情揭露政治丑闻的辛辣漫画盛行不衰,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当然,艺术也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正如古老的宗教借着天堂与地狱、善与恶等意象的明确划分而得以在人们心目中确立宗教观念;旧时的政治则靠阶级结构及其派生出来的关于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来实现政治目的。同时,由于当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认为工作至高无上。关于这一点,我无意过分强调,但不容置疑,当时的政治的确有赖于“工作优先”的思想。政治的目的在当时也表现得十分明确,政治领袖的职责是领导他人,被领导者的职责就是服从领导。无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直接涉及道德问题,他们

的政治合作就像他们在工业与农业领域的合作一样,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因为共同的偏好与喜爱。

为了与现代政治作比较,我只描述了当时最典型的政治特征。事实上,政治风格变化的侧重点与变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果读者贸然从我们的描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情感表达方式和崇尚领导者人格魅力的现象,对于扭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都无济于事,那么读者就可能夸大了我们前面的描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建立在上层人物的道德说教和众所周知的经济利益之上。有时这种关系正像韦伯兰所指出的那样,工业界的领袖在人品方面为下层人民作出了表率,多党派在竞相效仿的过程中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满足。

209

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这种早期形成的统治阶级理论依然阴魂不散。虽然今天的工业界领袖已不再直接经营商业,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也不能再为人们提供适当的精神抚慰,然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富饶的西南部,德克萨斯州产生了麦卡锡这样的政客,而在加利福尼亚则出现了乔尼尼这样的旧式政治寡头(令人惊讶的是乔尼尼出身贫寒,根本没有机会为了新的经营动机而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政治新贵的个性远远没有早期工业界领袖鲜明。正如亨利·凯撒一样,这些政治新贵比过去的达官显贵们更依赖于公共舆论和政府态度。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利用自己的个性,甚至允许自己的个性被别人所利用。对比之下,老洛克菲勒手下的艾维·李的经济计谋与15世纪德国的金融家傅格相比简直就是雕虫小技。

现代工业界巨头们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前辈们更受制于多种生存机会,更固守“不得罪人”的经济策略。一旦介入政治,他要么是出于表现富翁的义务或道义,要么是想把企业发展的每

一步都与政府沾上边。这些工业界的巨头往往不以政治领袖自居,一般人也不把他们看成政治领导人,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净化政治,从而促使政治道德化。老摩根及其朋友都认为只有他们有能力阻止布兰当选,也只有他们才能结束1907年的经济萧条,没有人能代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

昔日的工业巨头被一种全新的精英类型所取代,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消费领袖和休闲领袖。通过大众传媒的资讯,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对商业与政治的信息需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从前,人们所听到的故事往往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成功。今天,一个人之所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常常被解释为运气好。人们开始关注成功人士的衣着、饮食、女友、娱乐等消费品味,这些消费嗜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人们不敢奢望自己成为美国总统或某大公司总裁,却可以在消费领域中与名人攀比。

210

同时,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与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现象,即名人传记的描述对象,也由事业型英雄转向消费娱乐英雄,演员、艺术家、艺人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多,而政界、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佼佼者所占的篇幅明显减少。用韦伯兰的话来说,这些剩余产品的消费者们,可以通过消费技术而获得“精神慰藉”。娱乐消费英雄们在处理事务方面表现出来的笨拙,反而会增加他们的个人魅力。正如我们在某些情形中所见到的。他们的个人“真诚”可能淡化客观的艺术评价标准。

然而,这些消费领导者还称不上真正的领袖人才。他们只能算是“知名人物”,他们只是在点缀运动而不是领导社会运动。不过他们与实际的领导人才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近代绝无争议的最杰出的人物——罗斯福总统为例。他具有艺术家和演员的特质,人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但是,与麦肯

莱总统和威尔逊总统不同,当年他扮演了将美国引入战争的角色。而麦肯莱虽然明知西班牙即将投降,却依然在书屋里踱着方步,对于是否要向西班牙宣战犹豫不决。麦肯莱深知自己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威尔逊总统也是这样。而罗斯福总统却认为他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权限内决策,几乎就等于让敌人逼迫作出了决策。

另外,如果我们将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决策活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决策活动相比较,我们能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的方式就像旧式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的关系。丘吉尔是位道德说教型的领袖,尽管他极富个人魅力,但这一点,在战时表现得不明显,只是在和平时期,他的魅力才充分得以体现,因为支持他的民众大半专注工作而不是消费。与之相反,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与战前表现相同,既是一个铁腕权威,又是一个宽容的说客。他每时每刻都十分重视公众舆论。如果说丘吉尔利用的是义愤,那么罗斯福利用的则是魅力。

显然,美国与英国战时军事情况的实际差异并不足以说明领导情绪与方式的不同。虽然战时两国的国情悬殊,但更重要的是,自上半世纪以来,两国的政治风格的变化也迥然不同。1940年的美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容易领导。之后,美国社会与政治进入了权力分散的“否决群体”时期。这些否决群体形形色色,很难依靠道德说教来领导。他们太贪婪而难以道德化,同时他们又不可捉摸,很难用钞票来收买。从罗斯福的例子来看,所谓政治领导才能,就是能促进合作的宽容能力。

这意味着,早期的政治领袖们现在正忙着从事他人导向者的事业,从包括选区的支持者、通讯员以及有影响力群体内的朋友与敌人等在内的其他人那里获悉情报反馈信息。传播的革命使这种信息传递与反馈得以实现。这在过去,一个会

拉关系的老手即使能收买几个编辑为他大肆歌功颂德,也是不可能办到的。过去的跟随者也意识到政治游说的艺术和大众传播的力量。回顾19世纪与20世纪的领袖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领袖当中有许多人喜欢离群索居。如格莱斯顿、克里维尔顿、皮尔、穆勒、威尔逊和丘吉尔。即便在今天,强迫他人接受已过时的观念也可以使旧式的内在导向型故态复盟。例如:英国的柯立普、美国的史狄生和帕特森。各个时代的政治人物都必须依赖跟随者的支持,机会主义与人际技术并不是20世纪的新发明。当然,一个内在导向的领导者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看法之间的差距。然而当他调整方针时,依然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进行调整。更有甚者,他野心勃勃,志在建立千秋功业,所以毫不在意民众一时的支持与否。他不需要去赢得每个人的爱戴,他只谋求获得那些能够左右他命运的人的支持。

穆勒在其自传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曾在“议会改革之我见”的传单中直言不讳地表明,美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工人,他们羞于说谎,但一般而言,他们都是大骗子。在一个与会者多为工人阶级的集会上不知哪个不怀好意的人把上述文字贴在布告栏上。与会人员纷纷问我这段文字是不是我写的?是否已经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这两个字一出口,会场上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拿这段插曲与美国某些政治人物的一贯作派相比较,让我觉得十分有趣。英国的某些政客不仅不会坦然说出可能冒犯公众的话,而且常常为了讨好公众或者抚慰在台下听他演

讲的听众而言不由衷。

213

旧时的工业界领袖不但兼任当时的消费领袖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实权人物。他们把所有的规则都玩于股掌之间。今天在大众心目中,新的消费领袖替代了昔日工业界领袖的地位。消费领袖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消费领域,当然今天的消费领域已极度扩张。今天,无论人们如何狂热地崇拜娱乐休闲领域的明星人物,这些明星终归缺少政治领导才能和施展影响力的政治环境。如果一位电影明星想通过影片或者其他途径支持某一政治主张,必然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电影制片人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从前。天主教、工会、组织、国务院、南方人、犹太人、医生等等随时都可能向传媒施加种种压力。在议会里没有说客的少数群体,只得借助优雅和富于魅力的举止风尚保护自己。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电影制片人也不能代表否决群体的政治利益在电影中表现道德说教的立场。充其量电影制片人 or 组织中的其他人只能偷偷地将带有道德说教与政治色彩的元素塞进电影之中,这就像罗斯福及他的幕僚与新闻机构或其他协调机构暗地里安排约会一样。无论是暗中捣鬼还是私下约会,这些消费领袖的政治影响都无法与内在导向时期的工业界领袖的影响相提并论,也无法像后者那样深入影响否决群体。

二、谁来掌权

► 否决群体

“政治说客”性质的改变,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政治与麦

肯莱时代的差别提供了更重要的线索,在麦肯莱时代由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比较容易确定自己的利益所在(虽然也许是错误的),并能轻而易举地挑选维护自己利益的文人、律师和法官。“政治说客”则协助商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维护他们的政治特权。

今天,各种利益群体取代了旧时领导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每一个群体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并为本集团的利益而斗争。当然这些群体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大大小小的商业群体、电影审查群体、农业群体、劳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以及主要的种族和地方性群体都能成功地控制政治局势,使那些攻击他们的政治力量最终保持中立状态。这些群体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所要维护的实际利益也不断扩大。这标志着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早期的“政治说客”群体已不复存在。另外,群体的组织方式、群体内成员的互动方式以及控制公众舆论的方法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否决群体既不是领导群体也不是被领导群体。今天的美国,惟一幸存的领导者是那些能调和否决群体的政客;惟一被领导的,则是那些没有组织没有群体归属的不幸者。

当然在这些否决群体中,也时常发生地位之争。群体之间的竞争是垄断性的,公平与友好的准则不会导致恶性竞争。尽管如此也难免偶尔出现抬杠的僵局。工会与犹太人保护协会管辖权之争就是一例。这一争议最终还是通过协商、分割土地或者在过去分裂的选区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协调组织等方式加以解决。从总体上看,这些大的垄断群体与那些尚未组织化与群体化的个人之间的竞争,就如同垄断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的竞争。那些零散的被领导者只能在各群体之争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2]

214

每个否决群体都能采取攻击行动。不过,由于各个否决群体早已瓜分好了各自的政治势力范围,并代表每一政治势力背后的众多支持者的利益,所以攻击行动的范围大受限制。无论在群体,还是在群体所处的外界环境中,他人导向的宽容精神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情绪。否决群体的行动逐渐趋向一致,道德说教者很难施展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很难根本改变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由于否决群体的无定形权力结构,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需要支持的人与必须反对的人、同盟阵营与敌对阵营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分。这些情况无形中鼓励了那些内幕消息预测者钻营人际关系,同时却给那些极欲扬善抑恶的义愤者和热心人泼了一盆冷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政治情形鼓励了那些新式的政治冷漠者,因为他们深感任何个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事都只得交给专家来处理。作为一个外行,人们虽然应该参与和自己有关的政治事务,但却不能过分好奇和过分热情。

从本质上讲,否决群体是一种防御性群体,而不是领导群体。如果否决群体果真拥有了权力,也得靠彼此的容忍才能行使这一权力。事实上,否决群体愈来愈善于反映彼此的政治风格,包括公共关系的利益所在以及内在的和谐动机。不同宗旨的组织如“青年社会主义同盟”和“4-H 俱乐部”都采用推销员的那种心理推销术去争取和团结新成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决群体是依据性格结构的分类而形成的。比如说,在同一商业公司里,可以同时容纳内在导向型、他人导向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类型。同样,在否决群体内部也可以同时容纳多种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因此,政治说客的队伍中既包括了道德说教者,又包括了内幕消息预测者。两者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发生冲突。同时政治说客队

伍中也包括了许多学识渊博,组织经验丰富的新式政治冷漠者,他们一旦被鼓动起来,必然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尽管情况如此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今天的否决群体即便是为了明确保护道德说教者的利益而组织起来,也不得不采取他人导向的政治态度。

上述观点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的一般情况而言。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某一地区选民人数越少,加入否决群体的人数也就越少,其中某一群体获得统治地位的机会就越大。于是,在地方政治生活中,义愤的政治态度比宽容的政治态度更盛行。《芝加哥论坛报》的政治态度比芝加哥附近地区的社团小报更富有宽容精神,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许多否决群体都发现美国政治权力的无定形结构有利于他们自由发展。美国社会相当开放,即便是黑帮组织也能在多党派政治制度的庇护下,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由于黑帮组织不关心公共关系,所以黑帮成员就像过时的商人。同样,一些工人领袖发现自己掌握了经济命脉。虽然劳工的政治要求大大减弱,但这种政治要求的减弱主要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压抑而非外在介入权威所导致。同样,一个地位不稳定的攻击性否决群体,有时反而可以促成某项议案的通过。比如,据我所知,“社会安全法”之所以获得通过,主要是由于一小撮狂热分子努力的结果。至于那些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较大群体对这一法案的态度不冷不热。

出于同样的原因,某一否决群体的成员又组成若干小的否决群体,特别是“单人否决群体”(即一个人便能代表全体行使否决权),那么这一群体就成为在许多政治场合中最具势力的群体。下面可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某位农场主的政治

说客为他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此后农场主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农场主的政治说客即使关心其他如工会之类的否决群体的反应,对农场主的利益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这一事实可以加强农场主的政治说客在谈判中的筹码。他可以利用谈判对方内部公共关系的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正如一位外交官会告诉外交部长:“你在这件事上,不得不考虑某位参议员的态度。”无论政治说客群体的领导人多么具有他人导向的倾向,他仍然无力使手下达成共同的公共关系方针。许多工会领导也具有类似的权力幻想。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工会成员,工会的决策只要让成员稍有不满意,工人们就会举行罢工或消极怠工。

217 与此相反,能够支配成员的他人导向倾向的否决群体往往是软弱无力的。在白宫的强硬要求面前,大公司常常表现得十分软弱。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像塞维·埃佛利那样的幸存的政治义愤者外,公司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他人导向型。所以,公司老板话一出口,不管公司管理人员对此命令如何的不满和愤慨都得惟命是从,继续为公司的新政策卖力。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反对上级,但是却不敢干预工资、税收、结算等重大问题。与此不同,美国的天主教会因为将中央集权的命令、公众崇拜的偶像、神职人员反抗中央集权的作风(每位神职人员兼任其自己贸易组织的秘书)以及各种族组织的成员和对社会、政治的忠诚等融为一体,所以拥有极大的否决权。这种组织结构使得政治交易的协商具有了很大的弹性。

然而,上述否决群体的特点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总体上,否决群体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一古老而不断变化的两极提供了新的缓冲地带。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差距缩小以及他人导向者为形成缓冲地带所作的贡献,导致许多

道德说教者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找不到感觉。

否决群体所创造的外部条件和向政治领导提出的要求，不仅培育了他人导向的宽容精神，而且也迫使内在导向义愤者退出了历史舞台。

► 还有统治阶级吗

尽管美国的权力形态已发生了改变，但当代美国人的行为仿佛意味着决定性的统治阶级依然存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人认为劳工领袖和政客统治着国家；而劳工界与激进派都认为华尔街的巨富与六大家族操纵着国家权力；华尔街的巨富们声称华尔街统治美国资本与财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权在握的是中西部的蓬勃发展的产业大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对于金融资本的限制比产业资本要严格得多。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股份公司法案”便是针对金融资本而制定的。就尚未瓜分的利税而言，一旦股东和金融市场控制了产业资本，多项税收将化为乌有。

虽然匹兹堡、威尔顿、阿克龙和底特律等产业大王的资产比华尔街的巨富还要雄厚，但他们却越来越认为他们自己不过是财富的信托人而已。从劳工和激进派的观点来看，这些产业大王掌管“战争物资生产委员会”纯属为了让自己的公司从中牟取暴利。但也有人指出：“战争物资生产委员会”的管理经验也是使产业大王学乖的原因之一。这些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必须从“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公司。

尽管缺乏对商业管理权和商业谈判情况的深入研究，我们依然能够根据印象了解前一代商业行为的变化轨迹。从《财富》杂志记载的商业大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商业活动很少带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种商业活动的痕迹。资本

家与商人、劳工、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有了崭新的含义。另外《财富》杂志显示出人们对商业的兴趣不断减少,反而对诸如国际关系、社会科学以及现代商业的管理人员的设置等枝节问题大感兴趣。

然而,我们很难确定性格是否也像行为一样有所变化。今天的商人是否正如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依然大权在握,只是统治形式更复杂微妙,也更有经营手腕。高德森和利连·楼在“经理联谊会”一文中指出,当代销售经理在心理上依赖下属的赞同,他们十分乐意让步,以维持和手下之间的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他们十分憎恨工会,认为工会是自己与下属沟通的一道屏障³。与此相反,人们也需意识到,也有一些自给自足型的公司,重视技术层面而忽视人际因素,凡事不愿让步,也不注意商谈的情绪氛围。正如报纸报道的那样,1946年通用公司与汽车联合工会的谈判就像斗鸡比赛,丝毫没有柏拉图式的谦谦君子之风。虽然德鲁克在同年发表的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文章“企业的概念”一文中盛赞通用公司的管理旨在建立一个融洽幸福的大家庭。

219

事实上,权力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人际关系的期望与态度的基础之上。如果商人觉得自己软弱需要依赖他人,那么无论他手中掌握了多么雄厚的物质财富,他也会变得软弱和依赖他人。就我个人多年经商和从事律师事务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大制造商们虽然常常说大话,却容易被他人的敌意所吓唬。他们也许会拍案而起,但最终仍然受他人支配,甚至不惜违背公司的经营原则。或许,像商人艾佛利那样骄横暴躁的态度正好是新旧态度的分界线。人数不断减少的老一代商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模仿艾佛利,但十分羡慕他的暴躁与专横。至于新一代商人的态度恰恰相反,艾佛利式的不通人情的粗暴做法让他们十分震惊。商人们渴望赢得好名声,但时

常遭到嘲讽。教授们每每著书立说攻击商人,即使这些书几乎没人爱看。教授们为他的学生提供从事公共关系、贸易联系以及市场调查的工作。

早期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黑马骑兵团”扬言要借助反对商人的道德说教者的力量,通过立法来阻止商人的发财。今天,情况大不相同,许多诚实的知识分子纷纷在商界担任要职。这不是知识分子主动索贿的结果,而是商界老板出于对“黑马骑兵团”这些知识分子否决群体的畏惧而进行的主动收买。新的社会宏观结构需要否决群体。虽然没有进行权力实验以证明否决群体是否真的存在和是否拥有真正的权力。显而易见,那些能够为现代商人提供如何交际、同谁交际详细方案的人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关于这一问题将在第十三章加以详细讨论。正如本章开篇托克维尔所揭示的那样,永无止境地寻找赢得人们好感的机会,是富人们发出的遥远的呐喊。今天,也许托克维尔时代仅仅表现为行动上的呐喊已深植于我们的性格结构之中了。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不仅商人不能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军官也不敢大胆行使自己的指挥权。人们一般会认为在战争期间,军队应当无视外界的批评。然而将军们小心行事,深怕引起国会议员们的非议。即使他们可以像赶走讨厌的苍蝇那样赶走议员,他们还是谨小慎微。当与商人或劳工领袖打交道时,军官们往往显得过于谦卑。无论是西点军校的军官还是预备役军官都同样如此。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但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为了安抚否决群体,军方总是比较容易作出让步。他们之所以作出让步是出于对士气或者战后的公共关系的理性考虑,而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

当然,有时候“民间事务优先”的民主传统也可能是造成

军官让步的原因。军队如此自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也许是件好事。不过需要说明一点,我在这里讨论军人问题,无意评价其优缺点。之所以例举军人的例子是为了便于阐述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谁掌握国家权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指出一个人们常常忽视的现象:某件事的发起与终结需要有人来领导,而一旦事情进入正轨以后,就无需领导了。也许事情进展得十分糟糕,但仍旧会按惯性继续进行。如果去研究一下工厂、军队或其他大型组织,人们就会非常疑惑地发现:人们的本性一般都是好逸恶劳,为什么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组织内的运作依然正常?或许是因为人们仍保留着内在导向时期留下来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下层劳动阶级。但无论如何,人们井然有序工作的事实不能用领导有方来加以解释。

当然,一些否决群体和个人比其他否决群体和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哪个群体或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尚需重新估计。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摩斯卡、米歇尔斯、帕雷多、韦伯、韦伯兰或伯恩海姆等社会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发,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令我们满意的答案。

221 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里,自然有许多现象是上述社会经济学家所不能完全把握的,当然,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撰写本书时也不敢自称了解这些现象。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萨密斯。萨密斯号称是加利福尼亚州否决群体的老板,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权极一时。萨密斯是新式政客,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否决群体的利益,还代表许多相互竞争的群体的利益,从长途运输业到脊柱按摩治疗者协会,几乎涵盖多个阶层群体。同时,他善于玩弄各种权术,挑起某一否决群体反对另一否决群体,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并善于利用否决

群体的他人导向特点,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由于加利福尼亚老资格的党派几乎没有什么权势。所以在支持或反对某一特殊的群体时,这些党派系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支持,至少不遭至反对,政府官员们不得不投靠萨密斯。候选人看中萨密斯手中控制的各选民群体和大量的竞选捐款。不只如此,萨密斯还深知如何透过“民主的”公民投票机制,直接控制大众^[1]。

麦克威廉发现,萨密斯之所以权极一时,一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选取制度特殊;二是加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集团、工会、种族群体或地区群体处于统治地位。蒙大拿州与加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蒙州盛产铜矿,以制铜业为核心,人们要么支持工会,要么支持著名的炼铜中心阿纳孔达。加利福尼亚州也不同于维吉尼亚州,正如凯在《南方政治》(Southern Politics)一书中所指出的,维吉尼亚州的法规明确主张,一切事务均由法院来裁决。从上述地区法规及整个国家范围内讨论阶级与权力问题,最多只能作一个概括性的评述。即便如此,我仍不妨认为,美国从总体上来讲更像加利福尼亚州而不像具有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否决群体老板。数量庞大的否决群体及其巨大的权力意味着任何人或任何小群体都不可能像萨密斯和美国早期政治家 H. 隆那样独揽大权。

要研究全国性范围内的政治权力,我们只能从具体问题着手。假如某一问题只涉及到人数很少的两三个否决群体,那么群体中的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掮客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极大的权力。但如果这一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任何人和任何群体的领导人都没有权力单独做出决定,因为众多的否决群体立场坚定很难动摇。否决群体不会像某一政党那样在竞选中可能被赶下台,也不会像阶级那样可以被另一个阶级所取代。因此,否决群体总是大受欢迎。

也许会有人问,经过长期观察,我们究竟能否发现在美国的国事决策过程中,统治阶级或集团要比其他阶级和集团拥有更大的权力?就未来而言,很难下此定论。美国未来的政治权力既有可能落入少数能控制国会的商人和专业技术人才手中(如房地产经纪入、律师、汽车推销员、企业家等),也可能落入掌握国防和部分外交政策的军方人士手中,或者大公司经理及其律师、财政委员和能够决定工厂投资与技术的顾问手中;也许还会落入控制工人生命和投票的劳工领袖手中;另外,对南方政治有显著影响的黑人居住区的白人;与外交政策、城市就业、种族信仰、文化组织有密切关系的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帮助青年人社会化、训练成年人、安慰和关怀老年人的女性作家;控制许多主要部门和委员会的农场主,其中包括畜牧业主、棉农等(这些人是内在导向性格的典型,常常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过去的时代);还有俄国人甚至其他引起我们注意的外国人等等。这些人都有可能掌握将来的政治权力。读者还可以在上述名单中补上其他可能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物。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权力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很难确定权力的具体情形。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格的理论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同时既确定分子的精确位置又测出分子的运动速度。

然而,权力的不确定性和无规则性令人担忧。比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虽然他们自知无权无势,又痛恨权势的压迫,但他们宁可被自己臆造出来的权力结构吓唬住,也不愿意面对权力结构的消失。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宁愿在痛苦中领悟生命与世界的意义,而不愿过一种轻松舒适却没有活力与激情的生活。

现在让我来对前面两章的内容作一个小结。内在导向者

如果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要么是出自于捍卫自己的道德原则,要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两种动机皆有。内在导向者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捍卫政治原则的手段。在政治争论的过程中,他们过于敏感、激动,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就像作家乔伊斯在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开篇所描述的那样。有时,他们为了个人古老的传统或者某一阶级的地位,表现得十分顽固、狂妄和毫无人情味。无论是为了传统还是地位,他们的个人意见与他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息息相关。

与内在导向者相反,他人导向者如果对政治感兴趣,他是以否决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建立与政治的关系。他人导向者借助群体力量来维护个人利益,当需要发表政见、投票表决或向其他对手施加压力时,他都听从群体的统一安排。在向政治对手施加压力的过程中,他的个人政治观点似乎也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他往往超脱了个人意见。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投票者(即使在内在导向时期,独立投票者也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他的个人意见与实现他的参政目的之间也没有太大联系。因此,当他作为一个面对众多政治消息的消费者时,他就如同一台计算机,只能按照群体的指令输入政治信息和进行固定程序的信息反馈。他人导向者之所以能够容忍其他的意见,原因之一,是他性格上原本具有宽容精神;原因之二,是那些意见只不过是一些有趣的意见而已,对于个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或行为并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否决群体的政治圈子非常难以驾驭,因此,意见与群体政治行为几乎毫不相关。

内在导向的道德说教者笃守道德原则,并将这一原则推广到各个领域。他人导向的内幕消息预测者没有通过系统有序的情绪和信念形成特殊的判断标准。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人导向者的情感依然存在,只不过遭受压抑而隐藏起来。弗

洛伊德的理论可能预示着被压抑情感的释放,但社会习惯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当社会压制内在导向者的政治热情和道德义愤时,他人导向者对内在导向的激烈反应也就随之减弱。他人导向者在性格形成之初,也许实际上是内在导向者在扮演他人导向,但随后便假戏真做,他人导向真的变成了他实际的生活风格。

注 释:

[1] 劳温特尔:“流行杂志的发展过程”,《广播研究》(Radio Research),1942~1943年,第507页。劳温特尔博士通过讨论从“生产领域”的英雄到“消费领域”的英雄的转变,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

[2] 显然商场或政界的垄断也是一种竞争,人们十分清楚组织内外的对手,但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殊性,这些对手很难完全被消除。虽然我们一再说到公平交易和宽容精神,但这两个因素也很难消除强烈的敌对意识。的确,竞争对手面临许多他人导向的问题,如应该如何兼顾友谊、人情味、真诚和职业生活中的无情和有些近似于病态的嫉妒。

[3] “经理联谊会:人的不成熟性的个案研究”,《管理中人的因素》(Human Factors in Management),S. D. 霍宁曼编,1949年,第77页。

[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萨密斯一直追求一项他所没有获得的权力,那就是支配社会等级的权力。他出身贫寒,虽然善于突破商人和政客圈子,但却无法打入那些排他性很强的社会名流俱乐部。尽管他有意识地轻视那些受自己威吓和操纵的社会领导者,但无论怎样也抹不掉童年时代受到的心灵创伤。他的权力意识使他仇恨上流社会,在这方面他与独裁者十分相似。

麦克威廉:“手握权力的人”,《国家》杂志,1949年,第31~33页;威尔利:“加利福尼亚的神秘老板”,《煤炭党人》(Collier's),1949年,第11~13页。

第十一章

美国人与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

道德家经常抱怨,认为现代人的主要毛病在于傲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抱怨有一定道理。因为每个人都自认为比周围的人更优秀,对于那些的确比他强的人也毫不服气。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抱怨显然有些荒谬,因为这样一个不甘屈人之下,无法忍受人人平等的人会自认为是一个受欲望支配,天生就是沉湎犬马声色之徒。他心甘情愿地受低级欲望的驱使,不敢从事高尚的事业,甚至根本就没有梦想过高尚。

因此,我并不认为现代人需要学习谦逊,我宁愿鼓励现代人对自身和人类作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对他们而言谦虚是片面的,他们最需要的正是骄傲。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前面几章,我们所讨论到的当代美国的权力形象,多半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一般的学者涉及这方面研究时,也大都如此,如伯恩海姆关于经理权力的讨论,米尔斯关于劳工领袖和

其他领袖的研究。事实上,在美国人以及许多观察者眼中,美国人并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态度温和,容易合作。与此相反,他们权欲熏心、财迷心窍,喜欢标新立异和自我炫耀。或者正如下面进行的比较所要说明的,人们不仅认为,而且美国人也自认为与其说美国人象以务农为生、生性平和、容易合作的佩布罗族印第安人,不如说更象天生好斗的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

226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原始社会:美国西南部的佩布罗族印第安人(祖尼人),太平洋多布岛上的土著人以及美国西北海岸的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1]。

佩布罗族印第安人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合作的社会中。在这里没有人想让别人把他看作一个伟人,而是希望被认为是一个好伙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很少招致妒嫉或者暴力反应。异教徒也不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人们把死亡当成自然现象,节哀顺变不为之过分动情。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心平气和。虽然人们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很少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充满了合作精神。

多布岛上的土著社会则是一个充满妄想与偏执的社会,每个人都想利用巫术、偷窃、虐待来扰乱四邻。丈夫和妻子干这些下流勾当被亲戚抓个正着的事司空见惯。在那儿,异教徒遭致众人仇恨。岛上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通过内部交换而达到自给自足。人们发财心切,而又想不劳而获,因此偷盗、欺诈和巫术肆意流行。

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社会则充满了火药味,人们的竞争主要表现在标新立异的炫耀消费上。祭礼上的“比阔宴”便是一典型事例。酋长们竞争相提供美食,烧掉象征社会财富的

铜壶盖。有的为了斗富甚至不惜烧掉房子和木舟。这一社会正是韦伯兰所讽刺的摆阔斗富的炫耀消费社会。科哇魁特酋长们的“比阔宴”是一种通过消费部落剩余产品而使各方人士都能分享精神满足的合法手段，韦伯兰十分了解这些西北海岸的风土人情。

我曾问那些读过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的学生，这三种文化模式究竟哪一种最象美国高度异质化的文化模式。大部分学生回答科哇魁特文化模式最像美国文化。他们强调美国社会的商业竞争、性关系与社会地位方面的嫉妒心以及膨胀的权欲都与科哇魁特文化极为相似。

他们把美国人视为个人主义者，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少数政治态度更为激进的学生则认为美国社会更象多布岛的土著。在他们眼里美国社会在商业上尔虞我诈；家庭关系中则充满嫉妒和冷酷；在国内、国际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攻击性比霍布斯所描绘的“原始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

没有学生认为，美国文化与包括荷比和祖尼两族在内的佩布罗文化有任何相同之处，不过学生们倒十分希望美国文化像佩布罗文化。

然而，当我转而研究这些学生的文化模式时，我很少发现他们具有多布或科哇魁特文化的特征。富有的学生衣着朴素，从不摆阔，他们的作派与20年代的富人大不相同。事实上，学生中只有极个别纨绔之弟恃富自傲。就像现代的范德比尔特绝对不会再说什么：“群众该死！”这种话，同样，现代的父母也不会再说：“范德比尔特坐的位子才是第一把交椅。无论如何，我要培养我儿子成为大富翁。”^[2]

学生们不仅摒弃了科哇魁特文化那种炫耀消费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和天赋。有位大学游泳健将

告诉我：“在比赛中打败了其他人似乎让我觉得不自在，好像我做错了什么。我倒希望自己能像那位与同学能愉快合作的同同学，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赛场上的输赢。”

学生时代所体会到的美国文化和离开校园实际接触的美国社会完全不同。学生们想像中的美国大部分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而建构的。例如，现在仍有许多小说家、批评家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与其他文化相比，美国更像科哇魁特族文化。虽然亨利·詹姆士认为，欧洲的“物质主义”和美国的“物质主义”界限模糊，但是至少在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美国确实盛行物质主义。

欧洲古老的物质主义色彩已被他们的社会等级体系以及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导向时代的价值观所掩盖了。欧洲的老百姓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来模仿美国人的消费方式，然而他们比美国人更粗俗，更贪图物质享受。

然而，欧洲人却喜欢称美国人是物质主义者，美国人也自认为是19世纪的暴发户，对于“物质主义者”的名声也欣然受之。如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对于将过多的热情投入物质消费已经开始感到厌倦。现在该轮到其他国家成为暴发户，进入令人兴奋的工业经济时代了。对于这一点，我的学生还没认识到，而其他人则更没有意识到^[3]。

当我把这个道理告诉那些认为美国更像科哇魁特族的学生时，他们立刻反驳：“看！美国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不正说明了人们是如何地热衷于物质消费。”当我反问他们是否相信这些广告时，他们轻蔑地表示根本不相信。我继续问他们是否能例举出哪些人相信广告，他们至少在中产阶级中找不出相信广告的人。如果广告能够影响那些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使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下层阶级，那必然会导致穷人造反。然而，学生们还是坚持认为广告总能打动一些人。我反问学生

们为什么不总体上把广告视为一种骗人的幻觉,正如大众传媒给公众灌输政治的重要性,广告商极力传播人们正在抢购新式冰箱、新款汽车、新潮衣服的消费热点,在这样消费热情的鼓动下,你再也不能稳坐着不动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感会使人感到被动,而对广告的冷漠则让人产生超越感。事实上,只要研究20多年来的美国广告业,就会发现至少广告商们是感觉到了消费者对广告已失去了昔日的热情。以前,妻子或丈夫看到广告上的品牌车与自己家中的车子一模一样时,少不了沾沾自喜一番。现在,只有小孩子才会因为父亲买了一辆与广告上相同的新车而兴奋不已。在许多现代广告中,商品本身已隐退到广告画面的背景之中,现代广告更多采用抽象的、间接的、写意的诉求风格。广告不再令人惊异兴奋,而且人们的模仿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当然,在美国还尚存许多热情的旧式消费者,他们还没有受到日趋流行的他人导向者的那种世故与压抑的消费方式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电影《给三个妻子的信》中那个生活在小镇上的爱尔兰裔母亲。她住在铁路旁一间破烂的屋子里,家中最令她得意的便是一台新买的尚未付完款的电冰箱。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也会用风雅时尚来掩饰自己的物质主义倾向,不管如何掩饰,实际上心中物欲的冲动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他人导向者在乎的是他人的看法,他就不可能像许多内在导向者那样成为一个纯粹的物质主义者。如果想了解纯粹的内在导向物质主义者,也就是那些狂热追求物质财富的人,你一定要去找荷兰的中产阶级或者法国的农民,还有那些顽固守旧的人。

人们生活在广告商和小说家、知识分子发布的信息中,这导致人们认为别人是物质主义者,而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真实感觉。他人导向使美国人无法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确,自

相矛盾的是,他人导向阶层不但对于那些不属于同侪群体的人常常作出错误判断,而且对那些常常接触十分了解的人也作出错误的判断。

当然,商人们常常表现出美国“科哇魁特族酋长”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在文章和演讲中最喜欢描述自主经营、激烈竞争和商业冒险,这些商人就像那些喜欢夸耀自己当年如何勇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学生们和其他人的确相信商人们所讲的一切,但却没有机会亲眼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商人们与科哇魁特族酋长一样是自己礼仪和颂歌的牺牲品。

少数认为美国像多布文化模式的学生发现,他们的学生生活很难支撑他们的观点,只有欺骗爱情和考试作弊这种行径与多布文化中的丑行能挂上钩。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痛苦艰辛的历程,正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及弗兰克·诺斯等作家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私刑、黑势力、尔虞我诈和弱肉强食等丑恶现象。然而今天,只有少数商人,如汽车商和修炉人,才有机会像多布文化中划独木舟的人那样积累财富。

如果学生们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探讨美国权力形象,他们往往会为自己的观点找到证据。比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就可以提供一些了解美国的线索。我的学生当中也有人读过林德所著的《知识为了什么》一书中“美国文化模式”一章。林德一方面认为美国文化提供亲善友爱,另一方面又指出商品化社会要求极端个人主义和冷酷无情,同时,林德还描述了某中心城市的某个家庭老一辈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欲与炫耀消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建立理性行为理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对商业社会作出种种批判,他们在

有意无意之间将商人看成冷酷的“经济人”。

或许正是因为对商人的这种印象,许多私立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不愿从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青人进入大学,这种态度更为流行。才能出众的学生希望谋求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他们瞧不起哈佛商学院或华盛顿商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经商不但枯燥乏味、令人讨厌,而且道德观念也让人怀疑。同时,职业选择面临一个道德问题:如何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潜能?学生们在从商赚钱(灵魂沦丧)、参加政府工作和教书育人(灵魂得救)之间的矛盾选择中深感困惑。今天的商界,尤其是大商业公司也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智力问题和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商业竞争并不见得比其他领域的竞争更冷酷与凶残。但是,即使那些父亲就是商人(也许表达能力较差)的学生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学生们对于商业的印象以及美国生活的一般看法相当顽固。商界不得不从才能不高、反应比较迟纯的学生中招募新人。这些才不出众的平庸之人不能充分利用商业机会促进个人成长,因此,不足以成为年青人的榜样。另外,那些试图从他人身上寻找敌意和阴谋诡计的人,往往也视自己的敌意和老谋深算为合情合理之事。

事实上在美国,其他行为与商界一样,同样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充斥着品行不端的卑鄙小人,南方的暴徒和北方的阿飞到处都有。在美国也有许多“文化孤岛”与多布文化十分相似,19世纪末期科哇魁特族人文化模式的遗迹也随处可见。但是,这些文化孤岛与文化残余并没有形成权力体系,而且与任何阴谋,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别的什么,都扯不上边。

当然,我们说美国人既不像科哇魁特族人,也不像多布人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就像祖尼或荷比印第安人。显然,无论从

什么角度都只能是作概况的比较。这三个原始部落,按照我所划分的性格类型来看,只要处于人口高增长潜力时期,他们的性格多少都带有传统导向的倾向。我在此仅想作一个比喻,并无意进行详细描述。虽然本尼迪克特忽视了这一问题,但是很显然佩布罗印第安人并非那么温和友善。实际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进行有敌意的合作,他人的梦想与恶语中伤充分表现了他们压抑着的敌意与嫉妒。这一点与美国的中产阶级极为相近。他人导向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合作也不完全是温和友善的,其间暗藏着被压抑的敌对成分。

佩布罗人生活的情绪风格让人们联想起美国的同侪群体有一句侮辱人的口头禅:“你以为你是老大。”杀人、纵火、自杀等狂热的情绪常让科哇魁特人引以为自豪,而佩布罗人则反对过激的情绪反应。

露丝·本尼迪克特写道:

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着装高雅,性情谦和,心地善良……他应该十分健谈,也就是说,应当让他人感到轻松、自在。同时,无论是在田间干活,还是参加宗教仪式,都能与他人合作愉快,他绝不会显露出骄狂之气或者强烈的情感。

在我们采访年轻人时,往往发现他们身上具有本尼迪克特上面所描述的特征。当我们问他们最好的品质是什么时,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他们会说:“是与人融洽相处的能力。”当问到“什么是你们身上最坏的品质”。最常见的回答:“是坏脾气。”我们接着问下去:“这么说你们的脾气很坏吗?”事实上,这些被访的脾气并不大。我们问坏脾气是否给他们惹来麻烦,他们却一时又举不出实例来说明。那么,这

些回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崇尚讨人喜欢的社会，坏脾气被认为是最恶劣的品性，是影响合作的内在威胁。另外，同侪群体的成员认为，愤怒与坏脾气十分可笑。面对他人大发脾气时，只需一笑了之，否则会被人认为缺少幽默感。如果内在导向者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喜怒哀乐情绪从不张扬，他的良心上的禁忌与反应模式将其炽热沸腾的情绪埋藏在心底，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情绪就如同一座活火山，只是表面的沉静，随时都可能随着政治义愤而爆发。而他人导向者则会迫使自己的炽热情绪在强调友谊合作和宽容的气氛中逐渐冷却下来，虽然，这个过程不免会留下压制情绪而产生的创伤。

如今的年轻人在性生活方面，建立了一种近似祖尼人的理想模式。他们觉得对待性关系不要投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也没有什么好嫉妒的。先哲告诫青年人要“克己复礼”，在新生代那里，这句话有了新的诠释：不要让女孩子未婚怀孕，不要触犯法律，不要让自己的丑闻见报。今天，这句警世格言是指一个人要善于控制那些有损于人际关系的个人情绪体验。

最令佩布罗印第安人困扰的不是人际交往方式，而是气候问题。他们的宗教祭礼主要是为了祈雨，所以祈雨仪式设计得尽善尽美，否则他们就会惴惴不安，美国的年青人虽然没有这种能保证人际成功的宗教仪式。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带有创造仪式的倾向。人们往往把上学、工作、玩乐、参与政治（不管是以内幕消息预测者的身份还是政治义愤者的身份）以及个人冲动加以仪式化。但是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这些仪式的必要性需经过合理解释。由于美国年青人的仪式的合理性不能像佩布罗文化的祭礼那样不证自明，其成果也不像佩布罗人祈雨那样立竿见影，因此

他们不能像佩布罗人那样从仪式中获得巨大的安慰。

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年轻人已开始脱离少年同侪群体，但尚未在美国成年人的生活世界中谋得一席之地。他们认为美国是由类似科哇魁特族酋长的人所领导，率领着一群科哇魁特式的追随者。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年青人却按照荷比印第安人的准则行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他们会不会试图借助社会与政治行动来改变美国，使其更适合宽容的他人导向者的性格发展？他们是否希望采纳更接近美国真实生活的科哇魁特文化的冷酷行为吗？或许他们会承认自己毕竟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独特的人物，这一念头能否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权力形象和对美国现实生活的一般看法？

毫无疑问，上述情形都可能发生，说不定还有更多的情况出现。但对于意识形态和性格结构的变化而言，也许还有其他次要因素。学生们明白自己的竞争性与嫉妒心受到压抑，他们认为别人可以冒犯自己，而自己却不敢有所反击。学生们感觉美国社会之所以更像科哇魁特文化或者多布文化，不仅是因为美国人的观念中充满了敌意和竞争，而且因为在人们的合作态度中，敌意的成分还没有完全消失。也许这一点能帮助我们解开宽容的他人导向者的疑团，即害怕得罪他人。难道他们不可以依赖别人对自己的宽容吗？很有可能他发觉自己的宽容是靠不住的，随时都可能想发脾气。既然他感到自己表现得很温和，但内心依然情绪波动容易发火，同样他虽然看见他人和蔼可亲，也必然会担心得罪他人。

如果让这些学生从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三种文化中进行选择，他们乐意选择佩布罗文化。尽管这一选择无可非议，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模式之中。他

们希望社会安定而不想造就什么个人伟业。渴望得到他人的赞同,而不追求名望。他们并不想去发展那些可能带来人际冲突的个人才华。与此相反,内在导向型的年轻人则竭尽其才以崭露头角。这些学生很少有人会像内在导向时期的青年那样,一旦年过20岁还一事无成就会忧心如焚。而在内在导向时期,中产阶级男青年往往在20岁以后就要学会顺承社会,实现做一名成年人的儿时理想,并接受市民规范。而他人导向的少年则从来没有产生这样的梦想。他人导向的少年首先就要学习如何顺承群体。直到青少年时期,他人导向的男孩根本没有机会在家庭、同辈、梦想与他从未涉足的现实世界中做选择。

由于在群体的控制下,他人导向者很早就开始学习顺承现实生活,所以,他们的顺承已内化到性格结构之中,而不是仅仅表现为行为上的顺承。“我不想点燃世界”,这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性格的特点。而科哇魁特人想做的是正是“把世界点燃”。他人导向者追求“爱”胜过追求“光荣”。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他只拥有平庸的希望,不会梦想从事高尚的事业。”

这些学生和其他青年人对个人命运的感受与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有关。我们知道学生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力,只有在附和公司和群体时才有安全感。他们也试图避免卷入争端,以保持情感的超脱,当然这是同侪群体的要求。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没有权力?总有人得到了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力就意味着有人得到了权力。这些没有得到权力的人之所以把美国看成由科哇魁特人组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上残留的、被压抑的科哇魁特倾向,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强制性的合作,他们觉得是某些大人物在

强迫他们。

即使大人物失去了权力，追随者也不会捞到权力。土著人相信喝敌人的血或砸碎敌人的头颅可以保证获得更多的权力。但他人导向者不但从别人的软弱性中得不到权力，反而会随着别人的软弱变得更加软弱。

注 释：

[1]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波士顿，1934年。

[2] J. O. W. 霍姆斯：“战士的忠诚”，《演讲》，波士顿，1934年，第56页。

[3] 麦卡锡在一篇精彩的文章“美丽的美国”中持这一观点，《评论》，1947年，第4期，第201页。

第三编 自主性

第十二章

顺承还是自主

在人类改善生活、美化生活的种种活动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假如建造房屋、耕种粮食、发动战争、审判案件、修建教堂以及诵经祷告等工作都被机器所取代，即以机器代替了所有的人力。这将得不偿失，因为所有现代人所从事的工作都被机器替代，他们注定只有挨饿了。人性不是一部可以按照固定模式建造，并能精确按照程序工作的机器。人性宛如一棵树，在内部力量的作用下，充分地发展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物。

——穆勒：《论自由》(On Liberty)

既然领导者丧失了权力，为什么被领导者还不能接替。究竟是什么性格因素和生活情形妨碍了他人导向者接替权力。从生活情形看，“否决群体”的垄断性竞争，妨碍了个人权力的扩张；就个性而言，他人导向者简直就不会争夺权力，甚至更愿意逃避权力之争。如碰巧他是一位“内幕消息预测者”，他也能制造一个公式，指明权力之所在，然后使一切事实都符合他的公式。由此可见，在他看来站稳正确的立场比当

二

权更为重要。他不过是需要了解内幕消息，获得赞同，并跻身上流社会，以此表明“边际差异”。但是种种迹象让人们误以为他在争权夺利。事实上，一个内幕消息预测者愈是没有内在导向的倾向，他的权力野心、冒险精神以及专制性就愈弱。他希望是由诸如科吐魁特族型或多布类型的人去冒这个险，而他自己便成为想像中的操纵者或者自我操纵者。

既然他人导向者不追求权力，那么他追求什么呢？至少他追求顺承。换言之，他追求他自己设定的个性、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的相适应。如果他不能顺承，他将变成一个离异分子——关于这一概念我将在稍后加以解释。此外，他人导向者偶尔也会追求自主性。

他人导向者的自主倾向，完全是由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的客观压力以及在性格上拘泥形式的压力所造成。我不相信当今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他人导向型性格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件社会结构的完美复制品。

一、顺承者、离异者与自主者

人们不禁会问：在社会中影响力很强的群体，如何塑造出一种比社会制度所需求的更受制约的性格结构。答案可以从历史中寻找。早期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格结构来加以维持。本书第一编的前几章已讨论过性格形成的有机过程。从上述观点来看，社会性格与成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差异是社会变迁十分重要的一环。认为性格结构的变化滞后于社会结构的论点，未免过于简单化。当任何一种社会因素发生改变，其他所有的因素必然也将在形式和功能上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有足够

的空间容纳种种差异。因此个人也能够选择不同的妥协方式。在美国,高收入阶层的人们,会感受到因某些必须步骤的共同看法所产生的压力。只要这群人中有一到两个从这种禁锢中解脱出来,其他人也就有勇气去效仿,对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性格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问这一两个改革者从那里来,我们必须记住:社会性格不是由个体性格简单地组合在一起。个人的能力不局限于社会对他所要求的范围,当然这很难定义,因为个人的潜力往往不仅他人难以察觉,甚至连自己也未必知晓。

当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以不同的方式建立、毁灭或埋没人的个性。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特例,在多布岛或阿洛尔岛的原始社会里,人们似乎从孩提时代就被社会制度所压制,所以他们只能设法从文化孕育的情感中,去应付文化对他们的要求,除此之外便无能为力了。对阿洛尔岛上的居民进行的罗丝哈泽测验显示:人们的性格几乎完全一致。除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模式以外。有深度和广度的“性格保留”或者卡丁纳所谓的“基本个性类型”十分少见。这种社会很可能因为冷漠和不幸而惨遭灭亡,尤其是与白人接触后,该社会便分崩离析,自主性再强的社会成员也无回天之术。在社会性格与僵化的社会制度的夹缝中,个人潜力发挥的余地很小,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也会有“越轨”的人,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没有这些越轨的人,我们就无从了解该社会的文化。在讨论“越轨”与人口发展阶段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越轨”的准确含义。

我们一直在描述所谓的“顺承”者,他们属于典型的传统导向者、内在导向者或者他人导向者。他们在不同的人口阶段都能顺承社会或社会阶级对他们性格结构的要求。事实上,这些人似乎天生就是为了适应这些文化而存在的。尽管

我们认为对于常人而言,接受顺承模式的过程需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一个顺承者的顺承过程却毫不费劲。总之,顺承者就是那些能不加歪曲、直接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与社会阶级的人。

在每个社会中不能符合顺承者性格特征的人,不是变成离异者,就是成为自主者。“离异”一词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意为无礼的、不受控制的。我在此引用了“离异”这个词,但我的涵义超出了迪尔凯姆的原义。实际上它与不良顺承的含义相同。我避免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它的负面暗示。其实,在某些文化背景里,对不良顺承者或者离异者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顺承者。至于顺承者的含义,是指那些具有顺承社会行为规范的能力,而且能够自由地去选择是否顺承该规范的人。这种能力是离异者所不具备的。

所谓顺承不是看一个人的公开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而是看他的性格结构是否符合。一个人只要具有适应时代和环境的能力,即便他犯过错误或越轨时,仍然可以称之为顺承者。当然,多次的犯错可能最终导致性格上的不良顺承。同样的道理,一种文化模式,即便与周围环境相比显得非常缺乏理性,照样可以存在和发展。相反地,行为上的不顺承,并不指性格结构上的不顺承,一个人在行动上追求顺承,也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能会导致人格分裂和紊乱。所以,离异分子容易破坏他自己或他所处的社会,甚至两者一起破坏。^[1]可见这里讲的“顺承”是指社会心理上的适应能力,其他的评价是不妥当的。要决定行为或者性格上的顺承,我们不仅要研究个体,还必须仔细研究促使行为顺承社会体制的“变速箱”。

243 这里所指的“自主者”其外在行为表现可有可无,无论他选择什么,付出的代价均不大。另外,他还有一个选择:无论是符合文化标准,还是稍微超出顺承规范的尺度,他都可以泰然

处之。

顺承、离异、自主,这三种普遍类型的划分,与本书关于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等三种历史类型的划分一样,依照韦伯的观点,都属于“理想类型”,即为了分析方便而抽象出的类型。每一个人都可以划入某一类型,但没有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能完全用一种类型来概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即使是一个疯子,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不都是离异型的;同样,也没有一个自主者是完全自主的。个体的性格并非完全无理性地顺承文化的要求。然而,当我们研究个体时,我们总是以个人所表现出的一种突出的顺承方式来划分其类型。这种方法便于描述、分析和比较。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频率来描绘社会特征。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关离异者的许多特征。可以说,离异者是在试图塑造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性格时所产生的副产品。甚至在传统导向的社会里也会有一定数量的离异者,他们在意识和心理上都不能顺承或胜任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依靠家族的力量才得以生存。但是在任何规模的社会里都会有一些人被挤出紧密的社会网络。在比较复杂的社会里,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离异者,还包括那些曾经虽然能顺承,但被新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性格类型所排挤的人。传统导向统治时期,在家庭管制下成长的人,后来可能成为内在导向社会的不良顺承者。同样,他人导向的兴起,也可能使内在导向型的人像传统导向型的人一样变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离异者。在美国,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这种离异性格类型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他们没有能力去应付都市文化的要求而遭受排挤,由此导致他们对政治的冷漠。

244

离异者不仅包括那些没有收到社会信号的人,也包括收

到信号却没有任何意识以及成功迹象的人。在前面已提及过的那种“过度顺承”的人，由于过分专注内部和外部的信号，也可能成为离异者。在内在导向的社会中，可能出现过度引导的儿童和成年人，其超我的控制力太强，因而，正常的满足和逃避他人也能压垮他自己。同样，在他人导向的时代，一些人根本不能关闭“雷达”休息片刻，他们的过度顺承成为顺承类型的一个嘲讽——因为他们越努力去顺承，就越感到无法把握。

我们已经看到，他人导向型在政治上和个人容忍方式上努力获取成功的过程中，个人喜怒哀乐等情感流失殆尽。显然，情感的枯竭从临床上讲是一种病态。心理学家格林森曾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冷漠症而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士兵。他写道：

冷漠症患者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情绪感受力和动力。第一眼看上去，病人充满了沮丧和压抑，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缺乏情感的感受能力。无论是心理还是运动神经的反应，他都显得十分迟钝；他表情茫然，仿佛是带上了一副面具……他们在病房里非常听话，完全遵守医院里的一切规定，很少抱怨，也不提什么要求……这些病人从不述说他们的痛苦，对自己的处境也无深刻认识。⁻²¹

我个人认为现代人中也有不少类似的症状：只知一味顺承，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所知。当然，这些症状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也不算太严重。缺乏情感、表情漠然是许多现代离异者的特征，正如歇斯底里和藐视法律是早期传统导向或内在导向社会中的离异者一样。

综上所述,从藐视法律的反叛型到毫无反叛精神、丧失求生欲望的神经错乱型,都属于离异型。在美国这类人相当多。有关他们的性格类型、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易患疾病,我们知之甚少。实际上,直到最近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才又重新注意离异者的病例,并提供治疗。这就像过去医学界只重视人体外部疾病的研究,而忽视了生命保健等奥秘的探寻一样。其实,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变成离异者并不困难,因为生活中的悲剧和烦恼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任何一个人的不幸都能像寻找病菌那样,找到其根源。

关于自主者我们就知道的更少了。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存在,即在任何时间、任何方面,都有能力超越文化规范的人。在我们社会中,若是换上其他人置身于自主者的家庭背景、阶级状况和社区环境,其情形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主型、顺承型和离异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是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从事同种工作的同事或者同一社区的居民。当某人不能自主时,我们可以找出其症结之所在;而当有人在其他人不能自主时,却能特立独行、成功自主。对此我本人也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也就是古时人们称为神力的东西。的确,只要你观察一下育婴室里刚满一周的婴儿,你会惊奇地发现,在文化还没有影响他们之前,各人的反应和活力就各不相同。只因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与性格,这方面的研究只好留给其他人去探讨。

自主发展的过程与通过人口增长曲线反映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说,在一个人口高增长潜力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意识到他自己所具有的可塑性和多个角色(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角色已有人选择过)的选择权力,并不容易。正如心理学家米德所言:“选择他人所担任过的角色,能让一

个人明白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实际差异和潜在的相同之处。”因此,当人们通过传统导向的生活方式来解释文化时,文化接触对人的改变就不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诸如人口高速增长、传统导向以及个人无法更换角色等等因素,便随之产生。

几个世纪以来,黎巴嫩的农民饱受着阿拉伯游牧民族的蹂躏。但每次在遭受烧杀抢掠之后,农民们又会孜孜不倦地重新耕作。尽管他们非常明白,等到下次阿拉伯人入侵时,所有的辛苦都将化为乌有。如此恶性循环,直到肥沃的良田变为一片沙漠。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和游牧民族都别指望能得到什么了。显然,农民们从来没有想像过有朝一日成为骑马的牧民,抢劫者也未想过将来成为农民。这段“史诗”记载的不能算是人类的历史,只能视为一段动物的生活史。尽管草食动物总有一天要被肉食动物所吞噬掉,它们还是不停地吃它们的草。同样,当草食动物被吃光了以后,肉食动物却不知道要改吃青草来维生。举这一例子是想说明,在传统导向的社会里,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个人的性格和角色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阿拉伯游牧者能想到变成自耕农,反过来,黎巴嫩农民也能想到成为游牧者。那么,这两个民族也许还会继续做那些明知没有意义的事。然而,随着内在导向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不一定要束缚于一套特定的社会生态模式,因此,个人及社会的历史一定会发生重大变革。于是人们不仅能设想去适应狭窄的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还能去适应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也许,“人类一体”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人类的一切经验都是彼此关联的。

纵然由于气质或其他因素所导致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阿拉伯人如果能转换角色,以农民的身份去着想,他们对农、牧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可以不通过诉诸

武力,而是凭借操纵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如果阿拉伯人真的这样做了,他们的情形必然会改变,对于黎巴嫩农民也是如此,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绝不会像动物世界那样简单了。

总的来说,技术越先进,就越有可能使大多数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首先,技术刺激了劳动分工,因此有可能产生许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性格。其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有充足的闲暇去思考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改变,而是大多数人的改变。人的素质是人类适应自然过程中的主要资本。最后,技术的联合与闲暇的增加使人们得以了解其他历史性的解决途径,这不仅仅提供了更多的财富与经验,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性格与社会类型。

文艺复兴显示了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使未来的前景更为开阔。自我意识强烈的意大利暴发户试图去模仿希腊人,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北方人刻意模仿意大利人。在这一时期,内在导向型性格就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类型。人们也将这些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融入个人性格之中。大多数流动性较大的传统导向者决定放弃农耕生涯,成为骑马的游牧民族。新技术和隔海对岸的新大陆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必要准备,同时也使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足以养活不种地的人。从那以后,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国家,人们为了建立今天的工业文明,降低出生率,大量掠夺大自然的果实,改造农民的后代。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后代不得不学会从事其他行业。

今天,处于初期人口减少阶段的国家,人们又面临新的改变机会。虽然,在这个阶段,历史不但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反而可能提供误导。人们不必因“心理陀螺仪”来限制自己的选择,而且人们接受的信息要比儿童时期内化的信息多

得多。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边际向消费边际的转移,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像以往那样,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

在一个富裕社会进入到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以后,由于中产阶级的扩张,他们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的收入、价值观、闲暇方式都成为社会主流。因此,个人改变的可能性不是指阶级的改变,而是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的改变。

219 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性与阶级无关。在内在导向性占主导的时期,人的性格是为了工作和在工作中形成的,因而一个人是否拥有生产工具,区别很大。今天,拥有生产资料者的心理优势正在消解,而为了闲暇和在闲暇中形成的性格占了上风,因为闲暇和消费方式已经相当普遍。由此可见,顺承、自主和离异等现象反映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消费训练和人事接触的不同。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发生在中产阶级内部的现象。

自主性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被人们所注意。即使在今天,工作与性格的关系依然藕断丝连。职业地位影响着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那些具有自主性的人可能更偏爱某类职业;此外,不同职业群体成员的日常工作经验也有助于形成某一种性格。大体来说,在初期人口减少时期的社会类别的差异,已不再是金赛、贝拉米、马克思、韦伯兰等人针对人口过渡增长期所描述的工作负担过重、不劳而获、贫困和奢侈、长寿、短命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今天,大部分的美国人,即 2/3 的“特权阶级”对 1/3 的“被统治阶级”,比过去那些单凭经济需求与生产手段起家的人,更能应付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其性格上也较容易受到环境差异的影响。

二、内在导向时期的自主性

自主者像其他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一样，能运用性格与环境的条件，背离这一文化的顺承方式。因此，我们不能说“自主的他人导向者”或“离异的他人导向者”，只能说“他人导向时期或群体中出现自主者”，或者说“与他人导向、内在导向模式发生冲突所形成的离异分子”。自主与离异一样都是偏离常态顺承模式的现象，尽管这种偏离现象的范围与意义依然被顺承模式所控制。 250

在内在导向的社会里，自主者与顺承者一样，具有内化了的明确目标而且在应付环境的变化方面训练有素。与之相反，顺承者受“陀螺仪”的驱使追求某一目标，但他无法控制“陀螺仪”的速度和方向，甚至常常没有意识到“陀螺仪”的存在。而同时代的自主者则能选择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的步伐。对于自主者而言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动力都是理性的、非权威的、非强迫的；而对于顺承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既定的、外界强迫的。

显而易见的是，只要行为受到专制或神权的钳制，无论工作还是娱乐，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从理论上讲，不管行为受到多么强大的压制，只要思想上是自由的就有可能成为自主者（思想自由是在现代极权主义出现以后才受到一定的侵犯），但在实践中，如果人们打算发展和确定其性格的自主性，则必须有机会获得行动上的自由。我认为萨特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所有的人在极端的专制下也能选择自我，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英雄人物才能做到。

自主者不能与英雄人物相提并论,因为英雄人物并不在乎自主性。自主者是指那些在性格上保持充分自由的人,不管他们能否能够或者愿意公然冒险偏离正常的顺承方式。伽利略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为了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伽利略需要享有一定的自由,如交换天文学的著作和天文仪器,记录研究成果等自由。然而,伽利略选择的并不是英雄式的途径。如果生活在今天的苏联及其附属国中,伽利略就不可能这样选择,因为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下,人们连殉道与守密的自由都没有。

251

在文艺复兴以后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中,人们遭遇了各种时代变迁,然而无论神权、王权,还是其他统治形式,都没有比苏联的专制统治更严厉。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谋生途径的增加,人获得自主性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另外,在专制统治的早期,由于专制者的迂腐腐败以及缺乏目标,自主者有机可乘。现代的专制统治比一般人所了解的更无能、更腐败,但由于它的目标明确,所以一定会向自主性全面宣战,其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同时,自主者接受社会与政治权威是有条件的,他们在保持自己的判断力的前提下与他人进行合作。在集权的统治下,包括判断权在内的任何权力都不被认可,所以在苏联所有的科学理论和艺术作品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惟恐这些作品和理论中隐藏着潜意识的秘密与独立的见解。

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民主国家中,对自主性的打击并不严重。然而,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民主国家里弥漫着不确定的权威,对人们自主性的获得非常不利。其主要原因是,他人导向者在应付微妙而紧张的人际关系方面训练有素、得心应手,而对付公开的权威则反应迟钝。在内在导向时期,人们的确更易获得自主性,但是内在导

向型的自主性已不再适合现代人。为了理解这一变化的原因,我们必须考察内在导向时期为自主者所提供的防御性堡垒,而在今天这种防御已日渐式微。对新教国家而言这些防御性堡垒包括对待良心的态度、有关工作、财产、阶级和职业的保护以及逃往边疆的可能性措施。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内在导向型的新教社会或世俗的新教社会要求人们顺承社会,顺承不是指看别人脸色行事,而是指顺承内在的“陀螺仪”或良心。这样为个人提供了隐私的权力。因为虽然社会多少可以惩罚人们的所作所为,但内在导向的社会对发现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兴趣,甚至也没有这种能力。个人就像是“白慕大”皮划艇赛的选手,不注意对手,只在意眼前的目标和风向。

其次,关注的是去边疆开拓的人们的防御工事和避难所。在实行护照制度以前,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周游,因此暴君的权力鞭长莫及,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力也得以保存。^[3]难怪罗杰·威廉斯见大事不妙,便溜之大吉;伏尔泰则浪迹欧洲列国;马克思可以躲到大英博物馆避难;舒茨逃到了美国。这些昔日的避难现象仍历历在目。

第三,内在导向时期的自主者能从工作本身获得一种防御。在这期间,顺承者大都以工作为重。尽管在清教国家里,人们很难从工作中得到乐趣,但工作往往是目的本身,也可视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事实上,“物质上的困难”常常使得自主者,也包括他们的自主性不太强的同事痛下决心,排除杂念,专心做事。法国生理学家贝纳德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

难道我们会因为时髦人物的敏感喧嚣和那些对科学思想一窍不通的人的反对,就动摇我们的立场

吗？当然，所有的情感都应受到尊重，所以我做事小心，以免冒犯他人。由于我潜心解释这些情感，所以别人的意见不能轻易地阻止我……一个生理学家不是什么时髦人物，而是一个科学研究者，专心致力于他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他听到的不再是动物的嚎叫，看见的也不再是鲜血淋漓，他的目光只关注科学观念，眼睛看见的只是隐藏在有机体内等待自己去解决的科学问题。同样，一个外科医生决不会因为哭泣与哀嚎而停止手术，因为他只追求科学观念和手术的目的……当然，在我们已经进行了活体解剖之后，再来讨论活体解剖的伦理问题是毫无意义和荒唐的。人们对待同一事实总会有不同的看法，既不可能消除分歧更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因此，科学家只应注意那些能理解他的观点的研究人员的意见。至于他们的行动准则，只需听从良知的引导。¹⁴

像贝纳德这样的人，他需要的是同事对他工作成果的赞同，而不是关于他个人品质的称赞。他们不像他人导向时期的自主者那样热切地需要他人的认同和温暖的人际关系。

最后要谈的是，财产和阶级是努力追求自主性的人们的坚固防线。财产和阶级地位不仅保证百万富翁炫耀消费，而且也庇护隐居哲学家的玩世不恭以及曼切斯特的骑师兼工业巨头的双重生活。财产、工作与地位也可以保护普通人。如果人们忠于职守，那么八小时之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支配。例如，作家兰姆身为一个小职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霍桑等许多美国 19 世纪的作家所担任的职业不用花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今天的作家则与此不同，为了多挣钱，不得

不身兼数职,疲于奔命。今天,只要人们能在职业等级的链条上获得一席之地,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感,有充分的条件去争取自主性。在一定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范围内活动,就不会招来个人情感和命运的挫折与打击。

然而,许多上述的种种防御也常常成为获得自主性的障碍。通过阶级、私有财产、职业组织起来的社会,将家庭、财富、宗教、政治力量作为武器,抵抗人们的自主性。政治与宗教改革家、艺术家、工匠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弊端深感不满而牢骚满腹,虽然现在这种牢骚已大大减少,可牢骚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自主性的障碍也常常可以作为个人的防御系统,一旦他们的其他方面充满了活力和天分,就可以为自主者和不劳而获者提供自由和充分的满足。

从近几百年来的自传和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家族专制的压迫下,人们为争取自主性而斗争。家庭比国家更多地承担负责培养内在导向的中产阶级的任务,培训中产阶级新生代的社会性格和为该阶级服务的人才。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在儿童反抗父母、师长权威的孤军奋斗中,书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当然书本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瓦解他的反抗意志,增加他的压力。如果有幸得到一本好书,书本就会像一个同情孩子的师友,帮助他打破家庭权威的禁锢。

直到青春期,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形成较稳定的组织形式以后,其他的孩子才可能帮助某一孩子突破家庭的束缚。实际上,对于追求自主性的少男少女来说,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期。即使是一个顺承良好的人,一旦脱离家庭,步入一个更加严格控制他们的社会体系当中,他们也会发现作为父母权威替代者的社会权威可能符合自己童年时内化了的父母形象。至于那些可能成为自主者的青少年,在摆脱父母的控制过程中,他既抗拒内在的权威,又敌视外在的权威。我们可

235

以从约翰·穆勒的成长经历中,全面深刻地剖析这一过程,穆勒只是在充分顺承生活以后,才摆脱了父亲的控制,而弗兰茨·卡夫卡则不能摆脱家庭的控制。

一个人一旦步入社会,追求自主,如果没有财富,他直接面对的就是财产障碍问题。无论他竭力想往上爬或者鄙弃钻营,他都得面对地位障碍问题。如果他想自由地表达宗教信仰,他还将面临宗教障碍问题。这些问题都将令其困扰。特别是在清教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人们小心行事,无法获得像荷兰学者伊拉上莫斯或伽利略那样的自由。结果在过度引导和引导不足之间,几乎没有自主的空间。要将这些障碍变为防御非常困难,让人望而生畏,就连马克思、巴尔扎克、尼采、梅尔维尔、罗宾逊等大人物都在逃避生活。杜威和罗素也是典型例子,不过罗素的运气较好,在面对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挑战时,内心冲突较少。

三、他人导向时期的自主性

律师与立法者具有所谓的“解释法律条文”的技巧,借助这一技巧,他们不必长篇累牍地引经据典,就能驾驭法律文件。在此我也模仿这一方法,引述穆勒的《自传》《论自由》《论社会自由》《论妇女的顺从》等著作的片段以便讨论。这些著作论述了自主者所面临的问题。随着民主制度的兴起,原有的自主性障碍趋于消失,出现了新的、更为复杂的自主性障碍——即公共舆论。其实,如果去阅读萨特、布威尔、弗洛姆、罗素等现代作家的书,你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的主要哲学观点竟然与穆勒不谋而合。

穆勒写道:“在这个时代里,仅仅表现出不顺从或者拒

绝接受社会习俗,也是一大贡献。”然而,穆勒的兴趣在于个人而不是社会贡献。在写完上面这段文字后,他发现了有两种强烈的趋势正在发展。第一种趋势正是许多其他思想家所看到的,人们不模仿教会、达官显贵,也不再接受书本的说教,而是更注重彼此的互动,从同侪群体、大众传媒中获得行动的指南;第二种趋势则被一般人所忽视,即人们无论是在公共事务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有一种追求快乐和推动整个生活方式进步的趋势。显然,至托克维尔和穆勒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以后,整个社会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们害怕被指责为投机行为,对于今天充分受到外界信号支配的自主性性格结构者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穆勒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今拒绝顺承社会习俗的人可能会自问:“发生这样的事真的是我希望的吗?大概只是因为……”

这一比较或许过分强调历史的变化,但事实上,自主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问题。在内在导向时期,许多心理因素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自主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形成。而在他人导向时期的社会环境中,自主者能够系统地关心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西方民主国家里具有较高经济地位的人,除了少数最富有的人之外,几乎都是他人导向型,对于他们而言,过去追求自主性所承受的来自家庭和权威的巨大压力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有着极大自由的社会阶级里,难以依据经验确定谁是自主者的原因。在这些阶级中除了那些还在追求自主性的人外,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存在。这些人无法像“内在导向”环境的自主者那样容易对“敌人”下定义。譬如,一个“内幕消息预测者”虽然具有同情心和宽容精神,但掩饰不了他的冷漠和无法了解的原始情绪,这种人是不是自主者的敌人?另外,对于那些袖手旁观,对任何事都表示充分理

解和随声附和的人,是“敌人”还是“朋友”。总而言之,今天,自主者必须高度警醒,保持超脱的态度,以免使自己受到“他人导向”的影响。

理由之一就是,今天高度敏感的自主者在内在导向时期从我们的社会中获利。虽然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内在导向时期,自主者拒绝菲力斯人的规范,往往只在乎自己的喜好和品味。例如,许多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率性而为的艺术家都极具现代性。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个人内心世界微妙的差别。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感情,这些情感化的符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且,这些艺术家十分清楚什么人他们的敌人,即那些顺承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深知他们需要什么,并极力顺承以满足需求,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不是让人们慢慢品尝,而是疲于奔命。目前,这类人仍有不少,但在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已能采取防御性措施,而且他们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自主者。

我认为在现存社会中,自主性与社会中主要的顺承方式多少有点关系。自主性永远不会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个人与顺承方式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有时是戏剧化的,有时是悄无声息的。现代工业社会已使许多人成为离异者,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顺承者。这种现象却为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自主机会。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以及它给我们提供的选择空间时,我们将能够为自主性创造更多的机会。

258 相信以上的论点比证明它更容易,所以,还是让我来指出今天人们努力争取的自主性的范围以及所遇到的困难。

(一) 波希米亚人

前面已经提及过,在内在导向群体中,越轨的人往往可以在地理上或者精神上逃向波希米亚,而仍然可以保持个人的身份。今天,虽然整个群体可以具有自由奔放的波希米亚式

的生活,但群体中的个人却未必是自由的。相反,他们热衷于群体信号,即试图借助攻击特权阶级的幻想来寻找生活的意义。换句话说,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在“否决群体”的掩护下,在各大城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同侪群体,而且他们顺承这些群体的行为准则毫不费劲。

正如穆勒所说,在今天没有顺承的人可以发现自己变得古里古怪,他就像一个电影明星,为了不让他兴致勃勃的朋友们失望,必须接受安排给他的角色。实际上,这种在他人影响暗示下,追求自主的努力往往堕落成为他人导向型的闹剧。

(二) 性

关于性的方面,自主者的路径在哪里。是接受现代的开放态度,还是抵制老于世故的同侪群体中的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人们会采取那种方式呢?是要模仿那些置身于圣洁谦卑的女人们之间的祖先,还是采纳像性学专家金赛等人所鼓吹的“性自由”和“性经验”?当妇女变为精明的消费者后,她是否主动,何时采取主动成为令人焦虑的问题。或许妇女面临更为难于扮演的角色。即使是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既要存有野心,同时又不得不假装谦卑老实。她们一般没有多少机会借工作来逃避性的困扰。因为如果她们有了工作,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会认为她们的技术会妨碍性生活,同样性生活也会妨碍工作。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似乎又回头去追求古老而又更安全的性生活方式,但是,她们的努力是枉然而徒劳的。

(三) 容忍

当容忍与被容忍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时,容忍就不会是一个问题。这时,人们只要能表达善意的言辞和略施善行就足以解决问题。但是,一旦奴隶成为自由人,无产阶级成为有着自我尊严的工人时,早期意义上的那种“容忍”就一定会

被更复杂、更恰当的态度所取代。然而,那些未来的自主者却很难迎合这种改变。

通常可见,在解放了的黑人社区里,尽管黑人举止粗鲁,但因为他们是黑人就可以被容忍。实际上,这种现象使人产生种族歧视。在种族问题上的道德标准使黑人和白人都感到困惑。因为白人和黑人都无意追求自主性,而是在容忍对方和容忍种族的不同。简而言之,要想区分哪种容忍是可疑的、哪种容忍是健全的,必须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

高度的自我意识是他人导向时期自主者最显著的标志。正因为内在导向者比他们的前辈传统导向者更具自我意识,而他人导向者又比内在导向者更具自我意识,所以,在鼓励自我意识的环境中成长的自主者能顺利摆脱其他顺承模式,获得更多的自我意识。他的自主性不在于掩饰和否定情感的能力,而是在于认识并尊重自己的感情,了解自己的潜力及局限。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能否意识到自我意识,能否获得高度抽象水平的问题。

260 我们都很了解,要获得高度的自我意识水平是件不容易的事,许多人即使已获得自我意识但不能将自我意识融入自主性的生活结构,反而沦为离异分子。然而,这种过程产生的离异分子比起顺承者那种不具自我意识的焦虑更可取,尽管社会赞同这种焦虑。那些顺承者不愿意重新解释自己所处的文化,最终曲解了他们本身。

传统导向型已逐渐成为过去,今天,主要性格类型的冲突表现为他人导向和内在导向的斗争。现在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极端类型:一种是通过他人导向而强制顺承的人,另一种是以自主性克服环境局限的人。在我看来,追求自主性的人和无法获得自主性的人,或者不让他人成为自主者的他人导向者

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因为他人导向赋予人们一种敏感性和果断行动的能力。在美国的社会组织中,能够提供许多机会让人们去探索性格的潜力。我认为自主性必然可以从他人导向型中有系统地发展出来。

注 释:

[1] 默赖:“社会结构与离异者”,《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自由出版社,1949年。

[2] “冷漠症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季刊》,第10卷,1949年,第290页;雷提斯:“情感丧失的趋向”,《美国人的意想》,第4卷,1947年春季刊。

[3] 为了进一步讨论尚需争取的自由,请参考拙作:“对国外游客和招募人员的法律限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评论》,第41期,第793~835页。

[4] 贝纳德著、亨利·格林译:《实验医学导论》,1927年,第102~103页。弗洛伊德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喜欢引用菲迪拉德·勒斯的一段话:“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像我这样将毕生精力都献给科学与工作的人,也会常常受到挑剔和指责。正如一个化学家因专心实验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蒸馏瓶也会受到非议一样。然而,对于这些挫折,真正的科学家只会微微皱一下眉头,一旦排除了障碍,他又开始平静地从事实验和研究。”参见弗洛伊德著、布勒尔译:《智慧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115页。

第十三章

错误人格化：工作中的
自主性障碍

人类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人类自己，只有人类才可以剥夺自己行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因为只有人类自己才能够确立生存的意义，把人生的意义理解为追求自由……为了实现自由，需要考虑人的未来。别人为我开拓未来，建立美好明天，但是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参加创造未来的过程，这就等于白白地浪费了我的生命和才华。假如他们强迫我处于他们的水平之下，那就是断送了我的前程和未来，把我变成了一件“物品”。

——布威尔：《似是而非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

一、工作的文化界定

他人导向者的情感世界里隐藏着许多自主性的潜力。但是，显然他人导向者的工作、娱乐及政治活动，虽然可能比内在导向者更为灵活，但他们的自主性却经常被其他社会组织

消耗殆尽。尤其是目前流行的所谓关于工作、游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文化界定耗尽了个人的自主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界定将许多费劲的娱乐带入让人高兴的工作，同时也将许多群体适应的工作引进了他们的娱乐。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迫去接受这些关于工作和娱乐的界定，正如我们被迫去接受那些关于阶级、性别、种族的界定一样。不管这些界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对我们的基本人性和精力的恢复是否有利，文化模式和社会化过程都强迫我们接受这些界定。

在人口过渡增长期，工作更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工作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它是一种有纪律的急救行动，从人类内在的混乱与惰性中，拯救出有用的社会产品。在这一时代可以看到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有了惊人的进展。一般而言，人们是迫于经济需要而去工作，这一点可以从马尔萨斯、萨纳和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中看出。今天，我们对人的工作本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我们依然倾向接受这样一个心理假设：工作和生产是在纪律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我们还不十分明白，也许惰性是人们不愿意工作的消极反抗，也是对工作界定的反抗表现。

因为工作被认为是比娱乐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于一些最无趣的工作，也采取认真对待的传统习惯。换句话说，人们重视的是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作。这就是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贸易行业，职业声望普遍不高的原因。

我们对工作的界定还包括对家庭主妇工作的界定。在国家统计数字以及人们的心目中，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不算工作，因为她们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未能按照时间与货币来计算。妇女终日操劳却无任何权益与成就感。这种对家务劳动的贬低使妇女感到委屈和受到伤害。相反，底特律的工人可

以在三小时之内完成全天生产目标,其余的时间他们则在工厂里闲荡,而他们照样声称工作了八小时,他们的妻子和一般民意对此也毫无异议。

这些关于工作的文化界定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也为主业者提供了生存的机会。我们往往强调经济中最明显的那部分,而忽视了娱乐其实可以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例如,人们认为民防团发现火警要比在娱乐区内巡逻更重要。同样地,“公共事业振兴中心”的联邦剧院看起来就要比乔治亚州的“公共事业紧急事务所”的大楼要逊色得多,因为人们认为后者远比前者更重要。

在目前的社会里,消费被认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说明我们是为了充分地使用产品而消费,要达到充分地使用产品只有不断地增加产量,而不是通过增加闲暇、进行消费训练或充实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得以实现。然而,通过扩大耐用品和半耐用品的市场来推动消费,同时,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大力开发诸如电视这样的新产品,我们就会发现原有的一些经济习惯和理论假设已经过时。不过,似乎战时经济为生产的过度扩张提供了一条出路。

实际上,由于人们渴望积极参与到创造性的工作中去,而且生产性的技术问题也即将得以解决,所以,如何争取人的自主性和人格的“生产倾向”^[1]已成为当前最亟待解决的任务。内在导向者的性格结构与所处环境使他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而且使他把工作看成马尔萨斯所称的“必须之事”。他人导向者的性格与环境具有一种潜力,在重新界定和重新建立工作范围中有很大的灵活性。客观地说,新的环境使他人导向者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主观上来讲,这种新环境有可能使人们将过去花费在工作上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闲暇领域。然而,现在仍然有许多他人导向者不愿接受这种变革,宁愿将一切

精力、才情都倾注到工作中。当然,由于他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多,他也就能从重视工作中获得一定的好处。

二、有魅力的人、多余的雇员 和必要的雇员

我们在本章和下一章会讨论两个概念:一为“错误人格化”;二为“强制性剥夺”。在前面章节我们提到的所谓虚伪、造作地向他人献媚就是错误人格化的表现之一。我认为,在工作方面,错误人格化是自主性的主要障碍。比生产技术上出现的问题更消磨他人导向者的情感与精力。“强制性剥夺”同样也是获得自主性的主要障碍,而且这一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娱乐方面。剥夺泛指经济、伦理道德、社会等级,家庭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即限制了人们休闲娱乐和建立友情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工作中遭受错误人格化困扰最严重的人,在闲暇中也往往受到最大的强制剥夺。

有一个关于社会和个人发展过程中的逻辑认为:即使克服了自主性障碍,人类还会遭遇其他障碍。人类获得的自由必须世代更新,自由的增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当这些障碍解除之后,人的自主性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目前妨碍人的自主性的主要障碍,其实发挥着许多有用的功能。

► 白领阶级的人格化:“追求魅力”

内在导向的经理们对自己的秘书从来就不屑一顾,而秘书作为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群体中的一员,也很少把“老板”看成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受到“无形之手”的支配,老板与秘

265 书都只关注工作,彼此则毫不关心。他们之间的社会鸿沟只能通过主仆之情得以沟通。相反,他人导向型的经理们却把他与下属的关系加以人格化,因为他自己也是在人格化高度水平上出卖劳动的白领,同样是这一社会体系中的一分子。这种人格化的现象尽管并不旨在剥削,但由于是强制性的,因而是错误的,就像有敌意的合作模式。这种人格化就是白领阶层操纵他人和自我操纵的指令。

我们可以通过两份芝加哥日报所刊登的文章,看出人们对妇女就业问题态度的改变:一份是《芝加哥论坛报》代表传统的以工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另一份是《太阳时报》似乎更赞同新兴的人格化的价值观。《芝加哥论坛报》每日专辟一个“白领丽人”的专栏,专门教导女士们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培养忠于职守的美德。其意图在于建议那些白领女士与老板只能保持家长式的关系,不要另存奢望。凡是接受“内在导向型”模式的人大多喜欢这一专栏。既然老板就是老板,所以女士们不敢奢望其他,也不在乎老板是否应该多一些人格化特征。

《太阳时报》则代表了更自由、更进取的职业女性。这些女性的阅读兴趣不在于单一地讨论主雇关系的专栏。往往被那些以事业为重,充满魅力的、自我奋斗成功的妇女的事例所打动,并被办公室人际关系的心理分析专栏所吸引。这些文章反映了经济的人事安排,大多数经理不论是男还是女都属于“他人导向”型性格。他们认为女性不仅仅是“助手”,而且应该是魅力四射、光彩照人。

在讨论闲暇时社交风格与工作时社交风格之间的关系方面,《太阳时报》比《芝加哥论坛报》作了更深入的讨论。它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老板一向持“人格化”倾向。他十分了解困扰白领女士的其实是怎样向老板暗送秋波并得到老板的赏

266

识的问题。《芝加哥论坛报》则对所谓的“情感操纵技巧”没有太大兴趣，它仍然推崇那些毫无魅力的速记和打字技巧。

在对政治冷漠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魅力的重要意义。同样，对工作的冷漠态度，往往激发人们追求魅力的热情。魅力的多少，与工作本身关系不大，而主要是看为谁而工作。例如在游泳池和为女老板工作是最不受人欢迎的。因为游泳池的工作会消减魅力的神秘性，替女老板做事则根本没有机会卖弄风骚。看来，妇女更乐意把情绪投射到工作场所，而不是在娱乐场所宣泄。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妇女的工作与闲暇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现象迫使老板不得不尽量满足女职员对人格化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办公室之外的生活枯燥无趣。下班之后，白领女子常常面临强制性剥夺的原因是因为虽然置身于大都市，但白领女子很少能借助自身的能力、金钱、教育和生活空间来改变她们的友谊关系及娱乐方式。白领女子只能在工作环境里，在与老板的互动过程中施展魅力，并把全部的情感投入办公室的工作之中。

那些他人导向型的经理，不得不去启动一连串的人格化活动，但他本人的人格化并不完善，所以当他扮演一个倒卖证券的银行家、出卖政治见解的政客、出售方案的行政人员或者是被白领女子纠缠的老板与顾客时，都会感到不太自在。

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来说，这种新的敏感使他们难以带上工作的面具来逃避错误的人格化。一些内在导向者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把他人看成一个人，也不认为人是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然而，他人导向型的经理专家和白领阶层仍很难将工作中“强迫性”的友谊与工作以外的自然纯真的友谊明确区分开来。

267 ▶ 阶级对话：工厂里的模式

一方面，白领阶层的人士模仿他人导向型的上层中产阶级的风格；另一方面，工厂里的蓝领工人则从来不轻易相信他人，他们只有在得到别人的热情欢迎之后，才肯卖力干活。当然今天他们不再这样坚持了。总体来讲，经理为了使加入工厂工会组织的工人接受上司的“热情欢迎”，必须要煞费苦心，否则工人会把精力耗在人际关系上而妨碍工作。正如前文中提及的，经理们必须一方面不断增加管理人员，如培训指导者、顾问和督导员、士气鼓动人员。同时他还参与鼓动工人士气的研究，检验这些鼓动方法的有效性和工人的工作效率。

工厂里的工人在上学的时候，常把老师视为管理人员，以逃学、怠课反抗老师善意的指导或者恶意的种族偏见。同样，在工厂里他们对人事部门的友好态度也不加理睬。经理们大都以为高效率的生产就等于高昂的士气，其实不然。高昂的士气也可以在为了避免失业而雇佣多余工人的情况下，与较低的生产率并存。工人可能认为团结一致，互相了解就是高昂的士气。但这种情况容易助长怠工，而且可以对那些不愿采取一致行动的工人加以有效的制裁。

董事会或人事部门常常会告诉工人们，你们要超额完成生产指标，你们的工作很光荣。然而，许多经理对工厂当局这种不顾其他条件的消极说辞感到十分不满，多数诚恳的经理努力寻找适当的工作计划，通过所有权的转让、制定生产计划及质量控制等措施让工人获得更多的股份。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是让工人们将情感活力和娱乐精神注入到工作中，这样生产效率与工人的热情都有了提高。

268 只有经理们才会注意到工人、工作过程和经理三者之间的和谐情绪，对于工人和工作过程而言，和谐的情绪并不重

要。原因在于“他人导向型”的经理不能容忍敌意和冲突，因此，在努力消除敌意与冲突时会令他们非常繁忙。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今的美国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敌意与冷漠会对生产效率产生严重的影响。其实，和谐情绪的获得是和谐工作的前提，而不是那些愉快的、有意义的工作的副产品。当然，如果一味向工人灌输和谐情绪的重要性，反而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因为人们会对工作的和谐情绪期望过高，这样反而造成必须通过劝说和宣传才能维持工作情绪的和谐。

这并不是要否认我们必须设法减少工作的单调性和提高监察人员的工作技巧。如果士气操纵专家有权变换劳动岗位或能改变“流水作业”的生产模式，那么就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工厂改组的先后秩序和主次关系只有经理有权决定。

工厂里有两类人敢于反对有机组合的联合作业：一类是孤僻者，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拒绝把自己卷入工人人们的和谐情绪之中；另一类人是资方为了避免失业而有意雇佣的多余人员，这类人则好管闲事。这两类人都愿意保持个人情感的自由，反对工厂强迫他们把工作与娱乐混在一起。孤僻者不愿介入工厂制定的“情绪计划”，也不想加入工厂内部的任何群体活动，而多余的雇佣者则认为这些措施不过是剥削工人的花招，应当一概拒绝。

显然，由于这些人的抵制，因而要使工人效仿白领阶层或摹仿老板，迫使工人阶层更加人格化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许多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会十分羡慕工人阶级，他们不仅羡慕工人阶级拥有公开表达不满的自由，而且也羡慕工人阶级敢于拒绝工作。另外，无论工人们觉得工作如何单调无味，让人精疲力尽，但他们在娱乐时都能玩得很痛快。这一点，白领阶层则做不到。

269 ▶ 必不可少的成员

应付秘书之类白领人士的人格化,或者向蓝领工人灌输劳动士气之类的事情并不是让经理们忙忙碌碌的惟一原因。经理们之所以整日疲于奔命,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是公司里必不可少的人物。他的这种精英意识在美国教会、学校和政治领域十分流行,他整日忙碌、奋斗拼搏以证明他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当然,当今社会人人都担心被认为是多余的人,人们的这种恐惧心态十分普遍也非常严重。

然而,他人导向者若以“罕见人才”自居,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错误人格化使他们无法了解为什么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中,有许多生产部门得不偿失地工作并非是必须的。^[2]当然对工作的文化界定也是形成“必不可少”观念的原因之一。例如,工作的报酬表示个人努力和不可缺少性,这一界定同时给“不可缺少”的人带来一些附加收获。譬如,妻儿的同情与理解以及满足闲暇的需要与机会。

三、过度人格化的社会

270 获得自主性的途径之一,是消除工作中的人格化因素,尽量降低工作过程中情感困扰的程度,鼓励人们自己决定是否有必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按照文化的要求使工作的方式人格化。当然,在任何体制变迁的途中都会存在心理上的障碍。既然他人导向的性格是社会体制的产物,那么当他成年之后,他便要求自己的性格能得到这一社会体制的重用。所以,一旦社会体制不像他所预期地去重用他的性格,他的内心难免会感到极度的空虚与失落。

在《社区》(Communitas)一书中,波希瓦尔和古德曼也曾论证过上述问题。这本书是当代论证工作与娱乐问题最富有想像力的著作。^[3]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王国,在那个国家里的人们只需要最小程度的劳动就足以谋生,然而,这些悠闲的人们却面临一个惊人的问题——如何打发一天的时光。书中写到:

突然有一天,美国人发现他们已从物质匮乏和社会压力中解脱出来。在过去,物质需求与社会压力驱使人们奋斗不息,并在过程中获得习惯性的满足;而现在,美国人突然间发现经商已经变得单调与乏味,同时他们又不可能重新发现自身的潜力。

正如一个在重点小学上学的小女孩,希望大人们为她作出保险的决定。她问道:“老师,我们今天还必须做我们想做的事吗?”

减少工作需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动化,它大大地降低了人们注意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精力;另一种是利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非人格化因素的特性。但这两种方法都会遭到激烈的抵制,并不仅仅是那些照看机器的人反对自动化。事实上,我确信,要不是大家都担心因失去了工作而惊慌失措,工厂早就进入全自动阶段了。

像德曼、马伊等许多人本主义作家,强调把“欢乐”与“意义”引进现代工业组织之中,所以常常犯阻碍自主化的错误。这些人就像社团主义者和信奉合作制度的人一样,试图恢复传统导向社会和早期内在导向社会的那种在工作中建立人际关系的特点。结果他们矫枉过正,试图使工厂和白领阶层人格化、情感化和道德化。至少这些人在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即

271

把我们的文明看成是一种非人性的社会而加以谴责。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与其反对现代工业的非人性,不如顺其自然发展,但是要明确的是增加自动化的程度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人们更好的娱乐与消费。

正如我们所见,对大多数的白领阶层而言,错误人格化仅仅是他们将遇到的一切都加以人格化。而对于许多工厂的工人而言,老板为了减少失业而雇佣一些多余的人。这一事实是他们在工厂中遇到的惟一社交问题。当工作对于人们仅仅只有陪衬意义时,工作仍然是真实的、重要的和吸引人的。工作的这一诱惑力正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使工作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丈夫反对,中下层阶级的妇女们仍然喜欢去上班的原因。为了逃避极其封闭和剥夺她们权力的家庭生活,她们宁肯接受最单调枯燥的工作。因此,推动自动化进程的问题,不仅必须考虑失业的原因,更要考虑到那些仍遭受内在导向遗留下来的来自家庭贫困、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痛苦和剥夺。但是,我们必须为她们想出更好的办法,不能总让她们把工作当作逃避家庭生活的避难所。正如我们认为,为穷人提供安全感和良好的治疗等保护措施,远比把他们关在收容所和精神病医院要好得多。

► 自动化与欢迎

从日前社会与经济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必要的人格化在何处终结,不必要的人格化又从何处开始。另外,我也没有掌握区分有利可图的生产与劳而无功的忙碌之间的标准。例如,由于低工资(黑人手工洗衣妇与洗衣机在价格上竞争),不愿意发明机器,消费者购物时“购买”人格化的需求和劳动力本身对人格化的要求等,这些因素与第三产业中自动化进程缓慢究竟有多大关系。在此,自动化进程与消费者

的需要不太相关。

同样,我们也很难判断消费者希望个别关照的需求,与生产者要求避免不必要的人格化的权力之间有多大的冲突。两者的矛盾关系集中体现在零售环节。在美国,由于消费者的增加和奢侈品市场的扩张以及他人导向型的兴起,售货员的工作比20世纪初更难做了。例如当时在纽约第五大街商店的女售货员就可以不紧不慢的卖东西。在1900年,逛街购物不过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活动,顾客依照自己阶层流行的消费风格慢慢悠悠的挑选,似乎买什么东西也不太在乎。更重要的是,女售货员只需应付人数不多的顾客,很容易记住每个顾客的消费偏好,所以均能及时恰当地提供导购服务。今天,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是人格化分销系统中典型的一员,整日面对熙熙攘攘、形形色色、消费口味捉摸不定的顾客,老板则要求她对顾客含糊不定的需求作出快速的反应。

这些现象说明了现阶段工业化的主要弊病在于:我们的确需要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以适应娱乐休闲的要求。但这个行业本身却是今天最劳神费力、最乏味无趣的体力劳动。百货商场就是典型的例证。自动化究竟应该从哪里着手?经济学家们通常把这个问题视为投资再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然而,大概国家预算应当包括预测该预算可能引起的或消除的错误人格化的程度。

我们迫切需要新型的工程师,他的工作是消除错误人格化引起的心理痛苦,就像今天的保险工程师专门排除威胁生命的灾难一样。例如,这类工程师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使汽油泵像自动售货机一样,从而使加油站全面自动化,就像目前最先进的圆形自动车库一样。同时,他必须为工厂和办公室精心设计,消除导致情绪紧张的环境因素。并为那些因自动化而失业的人员另谋出路。他必须充分发挥想像力和运用技

273

巧,制定出一整套指标,用来衡量在正常情况下,某种工作所能产生错误人格化的最严重程度,订出这一尺度,作为错误人格化的允许上限。从这一观点来透视美国眼下办公室的流行趋势显得非常有趣。目前,一人一间的私人办公室已经逐渐被宽敞明亮的公共办公室所取代,许多人可以在一起开放民主地工作。我想办公室布局的这一变革,对人们提出了工作与社交的双重要求,对于那些过分专注工作的人难免要受到非议,而那些不能同时兼顾社交与工作的人则会感到焦虑。对其他的人来说,这种变革既能减轻孤独工作所产生的焦虑,又能获得友谊。

在分销行业中,推销员随时都得与顾客周旋,私人办公室已经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必须发展办公自动化。贝拉米在其著作《回顾》中,提出了一些明确可行的途径。他认为,顾客买东西不必一定到门市,可以直接向当地的仓库定货。如果大多数交易都能实行自动化,顾客和销售人员都可以省去许多精力与情绪。超级市场、自动售货机、邮购商店等借助丰富多彩的展示和广告招睐顾客。这些自动化技术的发明,拓宽了分销系统中人的自主性的空间。

274

贝拉米还指出,当我们生活舒适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过着困苦的生活时,我们如何减少自己的罪恶感。在他人导向时期,这种罪恶感非常普遍,并随着人的自主性的增加而日益加深。贝拉米为了促进国家工业组织的发展和指导青年人正确择业,设计了一套方案。该计划要求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去“工业部队”服役三年,以帮助他们最终选择自己的职业。过去的民防团也曾给青年人提供类似的训练,但就像其他善事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消除苦闷,所以有钱人从不参加这种活动。在还没有对“生产”下一个新定义之前,或许贝拉米的“工业部队”和民防团之类的组织,多少可以减轻我

们对非生产性工作产生的罪恶感，一旦人们在精力旺盛与充满理想的青年时代受到的严格训练与管制，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有权像美国诗人瑞利一样生活。当然许多退伍军人都在“美国军人权利基金”的资助下念书和闲荡，如果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十分清苦的话，每次从美国政府领取资助时，这些人总会感到有一点内疚。

以上是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些建议，但我们不一定需要采纳。那些追求自主性的人可能拒绝接受主流文化对工作的界定，这也是一种罢工，但不是反对工作本身，而是反对文化对工作的要求。为了工作，文化如同一条无形的绳索限制了生活本身的激情。

美国作家梭罗是一位一流的测量员，他选择了这门几乎绝迹的手艺，一周只需工作一天就足以谋生。诗人威廉姆斯同时又是新泽西州路德福德城的一位通科医生。查尔斯·爱维斯是一位出售5 000万美元保险金的代理商，同时他也是一位作曲家。虽然他的音乐作品鲜为人知，但他通过音乐创作获得生活的意义。爱维斯并没有因为挣了大钱而感到内疚，或者因为过着正常美国富翁的生活而不是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而产生负罪感。然而，许多美国人仍然不愿效仿他们的做法或者效仿兰姆或霍斯洛等19世纪作家的观念。这些作家以稿酬来衡量工作的好坏，最看好那些工作时间少而酬劳又高的工作。许多美国人宁愿用错误的人格化、虚假的劳动士气、必不可少的成员等观念来填补高效率生产造成的精神空虚。然而，目前人们把自己的个性、才华、情感和创造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领域，但他们的付出与报酬往往并不相符。

注 释：

[1] “生产倾向”是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使用的概念，用

来指一种性格类型。具有生产倾向的人能够通过爱、人和事物发生联系,并且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来征服世界。为了自主性的概念,我在此非正式地使用这一概念。

[2] 汉斯·沙赫在其著作:《弗洛伊德,大师与朋友》(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46~47页)中,描述了弗洛伊德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许多年前,一个医学老教授死了,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捐献遗体供解剖研究。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亲自承担了解剖工作,当时由我做助手。“看这儿”解剖学家对我说,“这些就是动脉,它们像一条绳子一样又硬又厚,当然这人无法承受”。我回答说:“完全正确,但事实上,这个人一直承受着这些又硬又厚的动脉血管,直到昨天生命结束之前。”

[3] 《社区:生活的意义与生活方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17年,第120页。

第十四章

强制性剥夺：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上）

小时候，我常常渴望变成其他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别人拥有的种种好处。我从未想过要去嫉妒那些比我更快乐幸福的人，当然我是以小孩子的心态来衡量谁更幸福，但是我缺少激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我认为，嫉妒会妨碍人们对同伴正确的评价，只能看见他的优势，忽视其缺点。当然不该否认那些令人嫉妒的对象的确有其不凡之处。换句话说，嫉妒也许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尽管这种想像力未免有些随意。

——亨利·詹姆士：《一个小男孩与其他人》

(A Small Boy and Others)

在美国，随着闲暇的分配越来越广泛，变化越来越迅速，闲暇给美国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性问题。他人导向者擅长娱乐和利用闲暇时光，因此他们在娱乐时比在工作中更易冲破来自社会体制与性格中的自主性障碍。对他人导向者来说，娱乐决不是工作时间和工作情感的副产品，而是陶冶生活艺术，培养生活情趣的途径。通过娱乐活动，有自主性潜力的人能

够从普遍的社会性格的约束中找到失落的个人性格。

坦白说,我们对娱乐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过分看重工作的意义。过去的研究主要注重生产者的社会性格,直到近期研究的视角才开始转向消费者。至于娱乐者的研究还仅仅处于发现阶段。然而,有人认为研究娱乐生活有可能导致私人生活公开化,妨碍了自成系统的私人生活。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对闲暇和娱乐保持沉默态度是对私生活的最好保护吗?

我现在不去论证一个人应当怎么样娱乐,也不是想评论追求自主性的人应该如何安排闲暇时间。凡此种种都不是我所要讨论的。下面我只讨论在一般娱乐领域中人的自由受到的限制。

一、社交的否定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社交过度是一种错误人格化,在经济生活中,许多人都不得不过度社交。当然,我并不否认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社交不足比社交过度更为严重。在他人导向者的整个顺承体系和自我调整体系中,赞同他人和指导他人是重要的组成元素,剥夺一个人渴望社交的性格本能,他不仅不能获得自主性,而且会成为离异分子。这就如同采用突然的监禁方式迫使一个人戒酒戒毒一样残忍。另外,如果一个他人导向者正在寻求自主性,他也不能单独完成,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他人导向者在儿童的同侪群体中完成其社交社会化的过程。群体中的儿童在年龄、肤色和社会阶层方面大致相同,但在个人气质、兴趣爱好与想像力方面却不尽相同。如果他是一个顺承良好的人,他则会学习模仿周围的同伴,学会合作、

容忍和控制脾气。在这一过程中，他要学会忘记性格中的“非社会性”和“非他人导向”的方面。只要他一直生活在这种同质性很强的同侪群体中，如邻居、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之中，他就不会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有什么差异，一旦发现两者存在差异，必然引起他的烦恼和不安。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他身处一个鼓励和支持表达被压抑的群体，而不是惩罚自主性的群体之中，他就会向自主性迈进了一大步。

他也许偶尔会感到有些单调乏味和情绪波动，但是要做到这些，他必须在心理上和组织上具备一定的能力，以便能发现和结交新的朋友以及新的同侪群体。

然而，自由选择朋友并不是当今现代都市人解决社会问题最时髦的方式。许多批评家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现在人们的自由不是太少了而恰恰是太多了。这些批评有些出自宗教观点，有些是源于对离异分子的偏见。更大的麻烦是，美国人每隔几年就搬一次家。这些批评者不愿意人们使用拖车住房或流动房屋等容易迁徙的形式，而是希望将流动者纳入以临近社区为基础的社交群体。在这方面他们与城市规划师的想法相似，认为南方乡村社团和法属加拿大魁北克村落是美国最理想的社团。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社团广泛分布在欧洲和美洲。社团与阶层在大众中生根，就像多布岛上土著人念咒符使甘薯根定位一样。

我们可以称这些批评家为新传统主义者。他们似乎想剥夺其他人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力，但自己却把拥有这种权力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今天挑选法国大餐来尝尝，明天又想换意大利口味。他们从各个时代中挑出自己中意的观念，与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交朋友。他们欣赏非洲原始艺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雕像，并阅读四种不同语言的书籍。他们认为这都是他们理所应当享受的权益，而不是什么义务，

279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较村故的他人导向者出于恐惧、烦躁、无聊以及追逐时髦而怀念逝去的时代。其实,在过去,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选择机会。马克吐温在《康涅狄格州的北佬》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讽刺意义。马克吐温以他辛辣的笔调,提出了一种比较健康的怀旧情绪。

批评归批评,不容置疑,美国的社交活动与“友谊市场”正如美国的商贸市场一样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大的,做家长的往往只能在阶级与种族的界线内,约束孩子的社交活动。然而,到了青春期,汽车使得他们可以逃脱父母对自己社交活动的监视。成年以后,交通的便利、共同的语言、度假和舞会的普及,使人们可以结交形形色色的朋友。然而友谊市场还是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关税”的困扰。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限制了个人消费、闲暇和娱乐。虽然最低工资水平取决于工人和农民的消费,但工人和农民还是希望老板为防止失业雇用多余的人手。另外一些人因为没有得到工资合同的保障,而无法参加工人联谊会等组织所举办的娱乐和社交活动。那些无权参加活动的人与有权参加活动的人都会受到这种剥夺的复杂影响。特别是他人导向者,会因为那些遭受排斥的人而感到内疚,并因此而减少娱乐和挣钱的机会,最终他会感到通向自主的道路举步维艰。

280

另一方面,借容忍之名想打破政治、经济等关税壁垒,从而建立新的关系反而会使社交活动更受限制。这一做法也会引起文化上的内疚,他人导向者极其所能宽容同侪群体一起进行社交活动,但不能将其友谊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要求克服两种障碍: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譬如,他被要求与社会地位比他低的黑人接触,但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不同,阶层道德观念阻止他这样做。因此,他必须强迫自己克服阶层道德的障碍,当他抛弃旧的道德约束并发自内心追求人人平

等的价值观时,他会因为突然失去“友谊市场”的关税壁垒而感到惊慌失措,因为在心理上他早已习惯旧的标准,此时可能特别怀念它。

二、社会交往与妇女受到的剥夺

随着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与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大多数男人的地位变得模糊不清。男人不再借助严格的礼仪和其他成规习俗来保持凌架于妇女之上的社会地位了。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现在妇女的性要求与性欲能力是她们母亲那辈人所梦想不到的。同样,由于男人已经对同性别的人之间充满敌意的合作感到非常焦虑与不安,但他们并不欢迎异性由于摆脱了传统障碍而产生的合作与友谊。内在导向者常常以妇女的监护人自居,抱怨他们的太太不理解自己,而他人导向者则常抱怨太太对自己了解过多。

妇女解放运动引起男人的不安,男人们试图让女人重新扮演传统规定的家庭角色,恢复对妇女的剥夺。许多男人和女人都面临家庭破裂的苦恼,渴望回到人口曲线早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模式,他们不明白当今离婚率的上升,显示了敏感的中产阶级对婚姻有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婚姻增加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正如米德在《男与女》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在选择配偶时,人们对社交与闲暇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伴侣在这方面与自己共同进步。^[1]

281

当然,许多离婚事件是由于我们的闲暇社会在性方面过分渲染所造成。显然尽管新传统主义者宣扬禁欲主义,像过去一样指责性魅力是一种罪恶,但是无法阻挡具有娱乐倾向的人们迫切要求选择朋友和情人。人们要求发展一种新的婚

姻模式,要求离婚自由和建立开放的娱乐社会。由于妇女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受到剥夺,所以婚姻为成千上万的妇女提供的好处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

然而,妇女在工作与娱乐中要真正实现与男人地位平等还需要一段时间。今天男女相处已十分自然,人们也更喜欢男女混合的工作和娱乐,这些是人们与剥夺女性的旧传统残余势力斗争的结果。有时候,难免会遇到纯男性的场合,在这种场合里,有些男人是因为反对男女混合的新道德观而来参加的。由于儿童的性潜伏期越来越短,男孩在6~10岁之间就已趋于成熟。有些成年男子人为地延长潜伏期,以逃避女性的压力。更糟的是他们是以男人的价值观来品评如何与女人成功交往,因此男女双方均体验到因妇女解放带来的压力、局限和罪恶感。

282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人导向盛行的社会阶层中,即便是那些经济地位很高的妇女依然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夺。这些妇女被动地进行消费和娱乐,她们没有能力解决娱乐的权力问题。《今夜出游》中的女主角被软禁在乡间别墅,除了与他丈夫交往之外,断绝了与一切男女朋友的关系。许多住在郊区的妇女,大多是乡村农妇,情况就更糟了。丈夫开着仅有的一辆车上班去了,留给妻子一个如同监狱般的家,守着孩子、电话,还有电视。这种幽闭的生活使这类妇女变得异常迟钝与乏味以至当禁锢她们的经济枷锁被解除以后,她们的心理依然像囚徒,这种剥夺限制了她们择友的范围,并增加丈夫外出工作的心理负疚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争解放了许多家庭妇女,她们喜欢在工厂工作以增加社交机会,虽然所挣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但这些妇女执意踏上这条独立之路。这是19世纪的妇女不可想像的。尽管绝大多数工作对妇女而言是辛苦而乏味的,但独立性是娱乐中自主性的必要基础。

当然,一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妇女的确有时间娱乐,她们也许参加桥牌、园艺或其他娱乐活动的群体,但是她们的转变看来很简单,其实困难很多,因为从前的妇女是以业余者的身份打发闲暇时间,而现在某些闲暇领域已不再专属于家庭妇女,往往成为一门专业化的职业。譬如,人们现在已经不太欢迎乐善好施的太太,因为帮助人的慈善事业已成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业余慈善家的参与易遭人不满与抵制。同样业余志愿者也不能照看病人了,除非她们愿意为专职的护工做些杂活,她们不再能帮助别人、使人高兴,因为福利事业与娱乐活动全都专业化了。地方“妇女选民联盟”和“女青年会”使妇女有了机会发展自己的行动计划,而且使这些计划与当地的需求结合,但这些地方性妇女组织的行动计划很难有什么新的尝试,往往只是遵照官方旨意行事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妇女把业余时间放在工作上,就会遭到否决群体的阻碍。她们要么必须冲破政治经济的重重阻碍,要么就得成为这些阻碍的牺牲品继续遭受奴役。现在连政治组织筹款也都专业化了,政治参与者只需往外花钱即可。面对这种状况,要么回到冷漠者的态度,或者像工厂的女工那样,找一份社会文化所界定的工作,从而获得自身解放。如果妇女不能在闲暇娱乐中获得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对她们丈夫也大有好处),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把工作中忍受的焦虑和烦恼统统带回家。

三、整合社会

文化“关税”在美国的友谊市场上随处可见,严重地限制了个人社交范围,也大大地减少了选择可以帮助自己成为自

主者的人做朋友的机会。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现象,在不同种族的地区,时常可见人们自我剥夺的趋势。不过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因文化多元而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社会发展现象。

281 现在,移民所遭受到的强制美国化的旧时压力已经减弱了。只有—些贫困潦倒的新移民如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仍处于这一压力之下,处于下层阶级的黑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或斯拉夫人,多少开始学习并靠近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谓文化的实践,是指少数民族无需急切的接受全盘美国化的工作与娱乐,相反,主流文化鼓励这些少数民族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丰富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在饮食方面,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烹调风格,应该尽可能收集保留。⁴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黑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则未完全被同化,仍保留其民族的特征,至少他在自我表现认同方面依然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复杂而微妙的障碍,他不能参与主流群体的社交活动。同时,本民族否决群体的政治领导鼓励他的自主性。这实际等于强迫他把自己的社会活动限制在本民族群体以内,并顺承民族群体的规范。尽管对于个人而言,他被限制在单一文化之中,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仍可称为多元文化。

285 因此,北方大城市的下层黑人阶级受贫穷与种族隔离,而上层中产阶级的黑人则受到本民族领袖的支配,按照领袖的要求做一个合格的黑人,对闲暇娱乐方面的民族控制往往比工作领域的控制更严格。与白人交往不仅被“新解放的白人”所反对,而且也受到来自本民族领袖的压制,这些民族领袖可能将这种友好往来解释为向白人献媚。

其他娱乐追求也可能因种族隔离而蒙上一层阴影。有些地区,中产阶级的黑人之所以拒绝爵士音乐,仅仅是因为白人称赞黑人创造了爵士乐。其他阶层的黑人则以爵士乐或罗宾

逊的歌引以为荣，就像大多数犹太人为以色列和爱因斯坦深感自豪一样。还有一些中产阶级的黑人不能享用西瓜等传统黑人食品，更不允许欣赏黑人通俗小说家罗切斯特、亚摩斯和安迪等笔下描绘的人物形象。同样，下层犹太人不太理会美国人对犹太人的消极看法，但那些几乎被同化的犹太人，必须顺承那些划分犹太文化的本族领袖的摆布，按照他们的要求安排闲暇结交朋友。因此，这类群体的社交受到外界主流文化与内部种族文化专制的双重限制。为了努力保持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他们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必然处于内疚与焦虑之中。这种个人美国身份就像现代迷信，个人既不能完全接受，又不敢完全拒绝。

注 释：

[1] 米德：《男与女》(Male and Female)，纽约，1949年；帕森斯：“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年龄与性别”，《美国社会学评论》，第7期，1942年，第604～616页。

[2] 当然，饮食特色不过是美国历史的后清教徒如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以及前清教徒如黑人移民的闲暇生活风格的标志之一。比如，从1902年到1920年，占人口多数的白人清教徒，无论在工作领域还是在闲暇领域试图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努力并不成功，在工作领域他们训练有术，但在闲暇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如一些被剥夺工作权力的民族在闲暇与消费方面与清教徒进行了有力的抗衡，如意大利的厨师、俄国移民马戏团、黑人演出团等等。最后，清教徒向这些新移民发起了进攻，禁止他们演出。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炮制了所谓的“西西里阴谋团伙”。其实，如果当时的社会像今天这样崇尚消费价值，那么犹太人和黑人就会免遭种族攻击，通过艺术和娱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消费领域。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就有力量唤醒大多数的民众。虽然，人们充满了热情和活力，但如果没有众多的移民以及熟悉移民文化的人，美国的闲暇与消费就会因缺少传统文化而黯然失色。

第十五章

能力问题：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下）

劳动分工一旦完成，每个人注定要有某种专门职业，他只能是猎手、渔夫、牧人或者理论批评家。如果他不想失去谋生的手段，他就必须保留自己的职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再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社会统一安排生产，实行按需分配。人们可以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上午狩猎，晚上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活动，但是没有人是专门的猎手、渔夫、牧人或批评家。那时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好的工作。

——卡尔·马克思：《论闲暇》(On The Amateur)

我会弹琵琶、吹笛子、演奏风琴，还有敲击小鼓；我会投掷飞刀，并能用手抓住迎面而来的飞刀而自己毫发不伤；我会讲故事，散布谣言，也会给太太小姐写情诗。

中世纪杂耍艺人，《论专业》
(On The Professional)

一、娱乐的地位

“剥夺”之所以成为娱乐的障碍,主要是由于在过去的时代中,身份地位制约着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妇女、儿童和中下阶层封闭单调的生活是工业革命早期司空见惯的现象。娱乐体现着社会等级的观念影响至今。财富、交通及教育的发展虽然能为闲暇生活开辟更开放、更广泛的前景,但内在导向时期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继续成为娱乐的障碍,清教思想有损于整个娱乐领域,如体育、戏剧、庆典及其他纪念日。无论是富有传统意义的万圣节还是美国国庆这样新设立的纪念日,均会受到禁欲主义者的谴责。只有孩子们才免遭此难,能够开开心心地过节。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讲,节日不过是请客送礼、应酬客人的麻烦事。我们的确不愿这样过节,但无可奈何只得如此。我们知道,“节日”是经济分配过程中精心设计的一个步骤。一些诸如母亲节这样的新节日被悄悄地添加进来,这样一年之中需要增加消费的日子又多了。这些新增加的节日其实成了人们忙碌的工作日。清教禁欲思想就像一个印地安的施恩者,不仅把工作与分配视为至关重要,而且吝啬得把原本少的可怜的节日也收了回去。清教主义烙在美国人心灵上的创伤众所周知,就像大家都知道星期天的存在。

287

要想完全弥补娱乐在内在导向时期所受到的创伤,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与此同时,他人导向又为娱乐增添了新的不幸。他人导向者在追求娱乐方面与追求其他领域一样也无所顾忌,但是缺少内在导向者那样的保护措施。由于他厌恶必须为娱乐群体的情绪负责,他宁愿参加固定而客观的纪念日和游戏仪式。一般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市民没有或者不关

心节日庆典。事实上各种各样的饮料,形式各一的纸牌,室内游戏,公共娱乐随处可见。有的传统、有的新潮、有的方便简单、有的豪华复杂。即便是这样,要想使每个参加玩乐的人都很开心尽兴,则是勉为其难。同时要求每个参加娱乐的人相同程度地投入情绪,也妨碍了娱乐中的自然社交。更重要的是,这种娱乐群体使他人导向者缺少个性,工作已束缚了他的人格化。而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人格化是娱乐所不可缺少的。正是因为他觉得不为群体娱乐有所贡献就会产生内疚,所以他需要学会区分什么是令人恐惧的孤独,什么是偶尔可以选择的个人空间。

288

我们看到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对人要以诚相待,对同伴与大人不得有所隐瞒,即使在做游戏时也该如此。这正是他人导向者的风格。他人导向者重视做事的感觉和方法而不重视事情的结果。看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而不在乎财产和地位的丧失。只要让他知道一切,他就可以姑息任何恶行。做父母的如果希望孩子获得自主性,就要鼓励孩子们学会自己选择,包括必要的撒谎。让孩子可以选择有利于保持同他人亲密交往的环境,也可以选择顺承父母及群体等权威的要求来保持交往的环境。显然,一个人想要自主地娱乐休闲,既需要个人充满幻想的娱乐,又需要仪式性的社交娱乐。这类人将面对艰难的格斗,一方面要战胜传统遗留下来的娱乐剥夺,另一方面又要战胜新出现的人格化。

这些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思考,我们还需补充说明经济大萧条给工作和娱乐带来的影响。经济萧条并没有导致对工作界定的改变,相反使工作变得珍贵而困难。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找一份工作很困难而使工作显得十分珍贵。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我们应把促进充分就业而不是高失业率或者闲暇

作为经济目标。当我们了解到，在经济萧条时失业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机会时，我们就不会为努力追求就业率感到奇怪。然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娱乐常被文化界定为工作的剩余。即使有足够的金钱供消遣，也无法解除文化对娱乐在道德上设置的障碍。正如再多的退休金也难以解除被迫退休老人的心理障碍。因为只有拥有工作资格的人，才有权享受社会资源。如果一个人无法证明自己正在为今后的工作努力地塑造自我，他在情绪上必然会遭到打击。总之，无论是年轻人、失业者，抑或退休后的老人、家庭主妇，还是内疚的多余受害者，或者游手好闲的福人，在娱乐的时候多少都会感觉不自在。因为根据文化的界定，只有工作的人才有权娱乐。

工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闲暇时间，有时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些闲暇时光。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代表了娱乐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专业化过程，出现了许多娱乐专家，这给那些非专职的娱乐者也造成一定影响。本章开头引用了中世纪杂耍者的一段自夸之辞。尽管他们可能确实多才多艺，但他们在今天的马戏团或电视节目几乎赚不到一分钱。今天，业余的娱乐者怎敢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专业化的专业娱乐者竞争？也许连哈姆雷特本人都不敢向自己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明星劳伦斯·奥立弗指手画脚，难道业余娱乐者还能在专业娱乐者面前卖弄自己的娱乐技巧吗？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编中指出的，内在导向者还可以借助“向下逃避”来发挥自己的娱乐能力，而他人导向者在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娱乐技巧的压力下无处可逃。

因此，恢复娱乐能力与恢复工作能力一样困难。收入与工业组织的变化，或许使闲暇时间的分配日趋公平，人们娱乐的罪恶感也随之减少，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去娱

乐,甚至反而使娱乐专业化了。与此同时,人们早已忘记了该如何去从事真正的娱乐活动。我们不得不问,假设娱乐比工作更容易激发人的自主性,这两者难道不都是同样使我们与社会疏远吗?

尽管存在上述的种种障碍,我认为他人导向者在娱乐方面具有各种潜力,只是不易为人所察觉。一些他人导向者的娱乐技艺就像工匠的技艺一样有着古老的基础,其他诸如消费的艺术则具有新的特点。

290 他人导向的同侪群体在工作和娱乐中产生的无形产品——交换嗜好,可以看作是一种娱乐训练。或许人们在娱乐方面的潜力比我们耳闻目睹的还要多,这种潜力不像人们时常指责的那样被动、虚假和易受操纵。

二、能力的形成

► 消费:研究的课程

大众传媒是引导消费的导师,如果要了解消费规模,就应该从研究传媒开始。最近的几部电影向人们示范闲暇与家庭生活的新方式,并暗示摆脱同侪群体的束缚有助于个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并促进自主性的发展。在《给三个太太的信》和《人人都这么做》这两部影片中的男主角代表着强悍有力的权力追逐者,他跨越了自己的阶层,从中下层阶级跳到了中上层阶级,这种地位流动仍然是我们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刚刚跨越了一个阶层的人,虽然脱离了原来的同侪群体,却还不能立即融入新的同侪群体。因此他缺乏安全感,被外界驱使着无法成为自主者。影片《人人都这么做》的

男主角道格拉斯是一个性情粗鲁、反应迟钝的内在导向者。后来，在他活泼开朗、爱好唱歌的太太鼓励下，发现了自己唱歌的天赋。从此，他对自己复杂的情感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现象说明男人不必再把艺术的感觉视为太太们所特有的。只要男人们愿意，就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这正是令男人们左右为难的古典喜剧性的新情况：他面对着新的上层同侪群体的行为方式，却又想超越它。

近年来又有一些其他风格不同的喜剧，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类似的主题，即不受同侪群体左右而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剧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同一种典型的男人——生活中的万事通，能自我教育，性情古怪，完全自主。例如在系列片《贝维德先生》中，贝维德先生就是一个有些虚伪的学者和社会离异者。他只要稍稍下点工夫就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诗人瑞利一样，只有在社会允许个人主义存在的情形下才能发挥他的技艺与才华。只因他具有惊人的才智，他才能利用社会条件创造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从某种角度来看，《贝维德先生》所表现的主题不同于“道格拉斯”形象的电影。后者揭示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意义在于不断自我超越而不是标新立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部影片的主题又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除了都在讲述令人发笑的事件外，两者都认为同侪群体的势力是可以被征服的。这两部影片通过对主角的塑造，说明了个人可以利用工作与闲暇生活的潜力来探索与确定自己的个性与感受力。这就超出了同侪群体的要求。

当然，大众传媒的艺术家们，包括导演，作家和所有的幕后工作者，都对自主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从事娱乐业的人在媒体内外，都向同侪群体施加压力，并提出逃避同侪群体的新方式。即使美国电影界最权威的影评家也可能忽略这一点。他们一味指责好莱坞粗制滥造，却没有意识到千百万

的大众正是通过电影学会了丰富多彩的生活风格和闲暇方式。那些模仿波加持不拘小节的行为方式和赫本无所畏惧的傲慢气质的影迷们,很有可能在崇拜和模仿的过程中,使自己从心胸狭窄的同侪群体中解脱出来。甚至当观众对“和蔼”、“友善”等传统价值发生怀疑时,大可把影星费尔兹那种近似疯狂的疑心的例子搬出来为自己辩护。我认为,电影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开放。电影界要抵制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同时也要反对那些要求电影应该担负教育功能的否决群体。在家庭与学校教育失败以后,这些否决群体希望借助电影来教诲观众。

292

由此可见,否决群体所要求的美德之一是按照学校和家庭的意志“行动”,他们竭力批判当代电影,拒绝流行文化。与此相反,那些批评家们所热衷的娱乐活动是注重个性化与个人参与,如技艺活动等。

► 技艺的表现机会

系列片《贝维德先生》对显示个人能力与技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它的表现方式很像影片《可敬可佩的克莱顿》中对炫耀阶级差别与个人能力的讽刺。今天的艺术家们由于狂热地执迷于自己的艺术嗜好,而显得十分古怪。贝维德先生就是通过炫耀他的各种技艺满足他的“怪癖”。他的生活方式正是对“在美国个人嗜好与艺术能力是否正在衰退”这一问题最好的诠释。当然,有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闲暇与勇气去追求他从未做过的技艺。我们听说在西方电子公司的霍桑分厂有数千名园艺爱好者,他们每年都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园艺展览,展示自己千姿百态的园艺作品。工厂邀请了业余摄影师、业余木刻家、业余建筑设计师以及体育、音乐、戏剧爱好者,聚集一堂。然而,还没有研究数据显示那些曾经是

私下追求的嗜好而今已成为世界闻名的活动,以及对劳资关系的作用与影响。除了几部认真细致的调查著作,例如伦德堡、科玛洛夫斯基和麦尔纳尼等人合著的《闲暇:对郊区市民的研究》(Leisure: a Suburban Study)一书以外,我无从知道技艺式的闲暇对现代美国生活是否有新的意义。

在闲暇时间里从事技艺活动与内在导向时期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是相吻合的。内在导向者关注物质生活中的困难,而不太注重同侪群体之间形成更复杂的娱乐爱好的交换,并且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此外,内在导向者将工作之余的精力都投入到闲暇爱好之中。因此,他在闲暇中也充满了工作时的热情。例如,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发明创造。即使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依然将业余爱好与工作上的技术革新结合起来。今天技艺本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价值,“星期六画家”的流行就是一个证明。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为了迎合那些反对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人而过分注重旧式的手艺嗜好,产生了一些特殊的问题。由于工匠的保守倾向,尤其是技艺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导致手艺的实力不但无法与动力工具竞争,而且还受到那些以假乱真的业余嗜好作品的干扰。当然,动力工具对于那些执著技艺的业余艺术家也大有益处,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在精良机器的引诱下,继续保持对手艺的纯真追求。

我们只需通过研究那些汽车爱好者,特别是汽车装卸迷对动力工具的依赖,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多么的含糊^[1]。在这一领域由于技术与设计的范围极广,新手和非专门的赛车手都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汽车迷们在富有的美国传统的修理装饰活动中乐此不疲。年轻人怀着丰富的想像力和出色的才能驾驶着自己改装的福特和雪佛莱汽车在密西西比湖与底特律汽车公司流水线上生产的汽车一试高低。这些人对底

特律的汽车一直百般挑剔。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品质最精良的底特律汽车居然无法撵走这些业余的“自装车”,反而促进它们的发展。显然,这些人自行设计改装车子,绝不是为了赚钱,反而是将自己仅有的银行存款花在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上。由于他自行组装设计的汽车更经济、更有效,从而施展了他的才华,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然而这一领域也逐渐专业化了。《汽车迷》这一杂志是为了迎合车迷们的需要而出版的。据该杂志报道,供应这些车迷们的汽车配件与工具已发展为大宗交易。1948年的交易额已达到800万美元。与此同时,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商也从这些汽车设计者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动力设计的启发。

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迷的命运与其他业余爱好者,如爵士乐爱好者的十分相似。不但要追求技术、爱好还需要关注品位交换和批评意见。谁想通过掌握一门技艺获得自主性,他就必须注意周围的同侪群体(不是自己直接加入的那个)的爱好交换市场。但是,为了摆脱大众的干扰,他就必须像神秘的中世纪杂耍艺人那样不断的寻找“秘技”。因此,他最初可能是满怀质朴的自发感情去学习手艺,但是后来他把手艺作为炫耀的手段。纯粹的技术关怀粉碎了初时的梦想。技艺和其他娱乐一样面临自相矛盾的情况:为了体现人们的想像力与生命力,技艺必须是真实的。但是,一旦手艺人具备了这种“真实”的能力,这一能力就会导致相应组织的成立,而工业组织必然会战胜这种业余组织,并使这种能力日益规范化。

整日处理人际关系事务的行政职员可以通过严肃的技艺重新发现童年时代以及内在导向的记忆残余。一个广告商成天从事人格化的工作,他可以在周末驾帆船参加竞赛。驾驶帆船是一种沉默的技艺,每个参加者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独立驶向目的地。显然这些娱乐者参加各种技艺活

动的动机既不是为了提高个人能力,也不是出于更远大的自主性目标。

重要的是要了解技术活动的限度,否则我们就会期望太多而超过这一限度。那些想用欧美人过去的娱乐风格来处理现代闲暇的人,更要注意这一问题。确实,今天在美国到处都在告诫人们不要因富有而懒惰,不要沉湎于流行文化的娱乐活动中,不要沉醉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从这些娱乐警示来看,任何轻松的娱乐都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技艺似乎更不会是轻松的。 295

上流社会的他人导向者常常呼吁在技艺的立场上反对消费。然而一般来讲,他人导向者极力去迎合早期内在导向的性格结构和社会条件所产生的闲暇生活方式,更是行不通。他这样做,注定被看成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这一复古趋势在那些充满活力的土著舞爱好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土著舞爱好者常常是具有他人导向的城里人或者郊区人,他们做出追求内在导向的姿态。因此他们在娱乐和消费口味方面崇尚艺术和技巧。他们过着有点像土著人的生活,尽量远离大众传媒。他永不疲倦的骑在老式英国自行车的车座上,唠唠叨叨地数落新式汽车的豪华丝绒座。他以不听收音机为荣,并把电视机视为怪物。

土著舞的盛行确实证明了人们正在寻求有意义且富有创造性的娱乐。同时也说明了崇尚手工艺的传统开始复兴。土著舞的爱好者追求某种美好的事物,但却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因为他对美国的现状十分厌恶。所以对未来不存在幻想。他试图追寻欧洲和美国旧式娱乐模式,就像许多内心深处继承了祖先内在导向性格和意识形态的人,惟恐祖先遗留下来的娱乐方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土著舞爱好者的这种恐惧心理与一些当代批评家的心态

非常一致。这些批评家虽然真切地关注自主性,但对从娱乐中找到自主性从不抱希望,他们甚至在技艺活动与体育运动中也发现不了自主性。这些批评家有一点比土著舞爱好者要好,即他们重视艰苦工作的经历以及社会和个人的种种灾难性的体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痛苦和不幸是培养个人性格力量和集体观念的惟一有效途径。人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他们认为,我所提倡的美国诗人瑞利那种具有娱乐特点的谋生方式,会招致个人的心理崩溃和社会危险。他们憎恨现代人在人事上的软弱,却没有看到这种人事软弱恰恰代表着性格的进步。他们因此而试图人为恢复物质困难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引发战争^[2]。

不可否认,巨大的灾难降临有时的确能唤起人类的潜力,这种潜力可以促进自主性发展。生一次大病能让人静心休养,有时间进行思考与梦想,感悟生命的真谛。他或许能像屈林的小说《旅途中》的英雄拉斯克一样康复过来,也许也会像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之死》中的那位俄国官员,在临死之际首次正视自己,为自己虚度了年华而深感惋惜。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证明了适度的艰难困苦会给个人与群体带来益处。社会学家默顿、威斯特和伽哈达等人对新泽西一个战时工人社区住宅的调查研究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在战争时期,工人们住在简陋的草棚里,住宅区里没有公共设施,没有商店,甚至连排水管道也没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挑战下,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群策群力,克服了一切困难,把家园变得井然有序,生机勃勃。但是美好家园建成之后,气馁随之降临。社区中主要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反而变得平淡乏味和失去活力,人们苦心营造的社区合作住宅很快又萧条了。

当我们反思这类事件,就会深深意识到当代社会中的紧急时刻的确有助于促使人们主动发挥潜能。因为在内在导向

机制衰落的时候，人们只能借助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来激发自身的潜能。欧洲和亚洲的游客告诉美国人应该学会享受“无为”生活的乐趣，他们批判美国清教主义思想及其副产品拜物主义。这些批评并没有太多的益处。因为如果要成为自主者，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历史和性格相吻合，而历史和性格赋予我们某种承前启后的任务和乐趣。因而，我们应当关注个人性格的发展，不再需要清教主义思想来刺激工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我们应当看到每一个生命就是一次“紧急事件”，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借助性格的力量“拯救”生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具有了崇高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会为了让生活变得富有挑战性，或者想借助外在的威胁与要求来麻醉自我，诸如对生存意义的缺失和焦虑，而发动一场战争或放一把火。

► 好尚方面的新批评

显然无论技艺在个人或群体的闲暇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均不能完全解决自主者的闲暇娱乐活动问题，而内在导向者可以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得到慰藉，他人导向者只有通过“好尚交换”才能获得自主性。也正是在通过好尚交换的过程中，他人导向者与同侪群体之间建立了联系。一旦他成功的超越了这一阶段，他就能独立地形成自己的好尚标准，甚至可以批判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过程的消极方面，比如，他人导向者把好尚方面的错误归因为自身性格上的问题，或者将这一错误夸大化，看成自身最严重的错误。他时常因此而感到困惑和绝望。现在，我们必须看到好尚交换的积极一面。事实证明，它给美国成年人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也许还是最具策略性的教育方式。美国民众中精英阶层的好尚之所以能迅速传遍

298

到各个阶层甚至包括下层阶级,或许《生活》杂志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以前一些社会阶层只能接受最简单最原始的好尚,现在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欣赏现代建筑艺术以及现代家居艺术,更不用说其他时代的艺术成就了^[3]。

当然他人导向过程是促进这一转变的最核心的因素。但我深信好尚方面实实在在的力量也同样增强了。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20年前的电影在现代观众眼里早已过时,这固然有可能是由于电影风格变化所致,但更重要的是,电影制片人与观众在动机与行为方面日益变得非常老练和复杂。

好尚的进步速度往往被大众文化艺术批评家们所忽视,他们不仅没有注意到好莱坞的电影和流行小说杂志是多么的优秀,更没有发现那些乍看不过是一些被动的毫无创造性的听众的好尚交换者们的一些评论是多么深刻和富有感染力。其中最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爵士乐的评论。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像霍普森和巴纳塞这些音乐评论大师,而是指全美各地的青年人,他们由衷的喜欢爵士乐,他们的喜欢程度无法用简单的“真挚”或“极好”,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他们认为爵士乐不属于专家们所划分的学校文化或正统文化,而是像电影或连环画。对于流行音乐制造商们将其产品贴上单一标签的做法,他们顽强地加以抵制,甚至使用暴力。他们的抵制有时会获得成功,他们喜欢自己选择不同的形式,例如他们喜欢乐队合奏甚过个人独唱,喜欢即兴演奏而不屑依照悦耳的乐谱进行演奏。他们有着自己的标准,以此对抗规格化的标准。他们像现代汽车装卸迷一样,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语言符号和文化来配合新的技术。

和车迷一样,爵士乐的爱好者如果仅限于在狭小的同侪群体中交换好尚,爵士乐就无法得以继续发展。事实上,长久以来爵士乐盛行不衰,让许多人和小群体为之倾倒,甚至人们

用来评论爵士乐的严格的审美标准本身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流行文化的评论家们不愿意承认大众好尚交换是提高大众评判能力的基础。他们讨厌爵士乐、肥皂剧、电影和电视剧，就像内在导向者讨厌妓院和杂耍一样。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与对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批评如出一辙。但是，批评家没有看到，早期批量生产的确排斥了精美的手工艺品，降低了大众审美品位。但现在大量生产的形式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工业机器也可以灵活地生产出比手工业时代品质更精美，种类更丰富的产品。与此同时，批评大众传媒的评论家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早期大众传媒破坏了那些古老的价值观，但今天正是由于传媒的高度发展使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第一流的小说、散文、绘画、音乐和电视。

这些社会进步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好尚交换的过程必然会超越其本身，成为其他事物；另外，好尚交换还有助于他人导向者自主性的发展。

三、娱乐顾问

为了使个人无畏地面对新的消费机会，我们常常需要向导和路标。在专业化的都市社会里，人们很需要娱乐顾问。

300

“娱乐顾问”听起来有点像临床医学的术语。在美国“顾问”一词常常用来指一些发展迅速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旅行社代理人、旅馆老板、导游、体育教练、艺术指导老师（包括舞蹈老师）等等。也有一些顾问把提供娱乐需求作为副业。比如，室内装饰专家表面上来看与娱乐业不相干，其实他的工作

也是为人们的娱乐生活服务。当然,大多数顾客要求室内设计要引人注目,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更深远的意义,室内装饰专家还能帮助顾客安排基本的家居计划,使人们的闲暇生活更加舒适和丰富多彩,使家居装饰更有品位。装潢业兴起的背后是人们对家庭生活趣味的追求。

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建筑更明显地显示出装修讲究娱乐与趣味的功能。现代建筑师要像室内装潢师一样为顾客修建住宅。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建筑师只需告诉顾客如何正确方便地使用各种设施,而今天的建筑师要帮助顾客精心选择设计室内外风格,经过建筑师的指导,社会流行的时尚、兴趣品位、社会式样(如卧房简洁)、闲暇时间的生态学均得到了体现,这在一个世纪前是无法想像的。如今,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把从前只有少数专家才可享有的娱乐机会带给了大众。

另一些娱乐顾问主要关心美国人的传统娱乐方式——度假。度假使人们能遇到一些不属于自己同侪群体的人和不同社会经验的人,所以度假可以视为初期人口减少时期戏剧化的象征,就如同在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市场。当然,由于普遍高薪,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愿与人接触。在假期,他们往往去打猎或者消磨在公寓与花园里。与此同时,假期逐渐成为沟通有钱有闲阶层的方式。度假为有钱人提供了与那些出售技艺的人(如骑师、游泳健将、画师和舞蹈家等)相互联系的时间与地点。当然,除了海滨旅游顾问以外,大多数娱乐顾问都只顾忙着捞外快,很少真心帮助个人了解真正的娱乐需求。

可以预见,在10年以后,娱乐顾问会大幅度增加。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让娱乐顾问指导他人导向者的娱乐技能,只会增强其他人导向倾向,影响他人导向者自主性的获得。为娱乐提供指导会不会导致剥夺他人导向者尚存的自主性和个性?当然,这种结果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

促使娱乐顾问给予顾客恰当的指导。让他们指导他人导向者从事具有想像力的娱乐活动,帮助他们意识到在娱乐中发展自主性是多么的重要。

四、开放儿童市场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提高成年人娱乐方面的能力,而忽视了儿童的娱乐。其实,童年时的经验对成年以后娱乐能力的形成影响深远。在此我不打算做详尽的讨论,仅提供一个大胆的设想供大家参考。为了改善儿童娱乐(在第三章已述)中有碍自主性的现象,我建议儿童玩具制造商和广告商建立一项基金,用于儿童经济消费模式方面的实验和创造。我提出的这一建议一定会让儿童市场的制造商和广告商感兴趣。

302

例如,发给一群孩子一种临时购物券,允许他们光顾一个像世界博览会那样规模大、品种全的超级百货商场,店里的东西从山珍海味到各色乐器应有尽有,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购买。站在一旁的市场调查员可以帮助孩子们做出选择,但不以站在厂家的一方宣传那种商品好,那种商品不好。通过这些实验,可以显示孩子们的真正的消费喜好,因为在实验中他们不再受同侪群体、金钱的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找到机会发自内心地评价和重新形成他们的商品价值观。在这个“自由商店”里,孩子们还能找到一片自己的天地,可以尽情地享用书本、音乐、糖果和连环画册^[4]。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摆脱了种族、阶级和同侪群体限制面有幸自由表达消费选择的儿童,是否比今天的大多数成年人更富有批判闲暇经济的想像力。

人们可以设计出其他类似的“富裕经济”的模式,通过实验,让儿童和其他受剥夺的人免受同侪群体和传媒的压力。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市场调研是对经济生活实行民主调控的最有前途的路径之一。大家都知道市场调研不单单是为了操纵人们购买物品,接受现存文化界定,而且也是为了发现人们需要什么,尤其是在无拘无束的幻想中需要什么^[1]。如果没有这类实验模型,人们很难发挥想像力。

注 释:

[1] 巴尔斯雷:“装卸汽车的文化”,《美国季刊》,1950年,第2卷,第353页。

[2] 战争的经验表明:磨练他人导向的性格,并不需要利用物质困苦与战争。战争的经验还表明,性格上的他人导向者和政治冷漠者并不能忍受艰苦的物质环境。战争时期为了抚慰士兵,常常通过可口可乐、美国的电台广播和美国式的娱乐,来营造美国家乡的环境氛围。这些美国式的怀柔政策并没有降低士兵的战斗力,反而可以增加部队的集体意识。柔顺性、精通器械、广泛的社交艺术和高等教育水平,可以使人迅速承担各种事务和胜任现代战争的要求。

[3] 前任工业组织协会官员查尔斯,最近提醒我注意一个现象,底特律的汽车沙发。工人们拒绝为旧式沙发加厚,其实许多沙发都是前几年设计的,早已过时了。

[4] 街道图书馆与这种形式非常相似,由于这些图书管理员是街坊邻居,所以他们在借书给孩子时可以摆脱学校和家长权威的影响。她们的兴趣在于给孩子提供帮助,而不是向孩子灌输知识和道理,而且因为她们的出生背景大都是内在导向倾向,因此,她们不坚持与孩子的关系带有人格化的色彩。

[5] 我一再强调大众传媒和工业化批量生产并不是要否定传统艺术的重要性。我的目的是想缩小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距。尽管两者之间还存在恐惧、势力态度、不理智的倾向,但我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相互交流的希望。

第十六章

自主性与乌托邦

时间、事件或个人心理上的独特活动都可能瓦解或破坏人们的意见,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既没有遇到公开的挑战,也没有遇到有预谋的讨伐,然而曾经支持那些意见的人却一个接一个默默地改变了立场。每时每刻都有人放弃原来的立场,直至最后,只剩少数人还坚持原有的观点。尽管如此,原来的观点依然占主导地位,因为反对它的人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只不过在私下悄悄地交换彼此的意见而已。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一场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他们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只好彼此面面相觑,保持沉默。尽管大多数人对过去相信的事物已发生了怀疑,却仍然假装相信。这一徒剩空壳的社会舆论的幽灵,令改革家们噤若寒蝉、退避三舍。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我们讨论了中产阶级的工作与娱乐,希望能从中找到自主性社会性格形成的途径。对于上述结果

我并不感到满意。要知道克服错误人格化和强制性剥夺并非易事，而且，即便这些障碍得以克服，要找到自主性形成的途径或创造出有助于自主性形成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的建议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姑且先下一个结论：在自主性一词的目标尚没有明确界定以前，人们需要一股巨大的创造热情和狂热的乌托邦思想。

本书一开始就讨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技术的种种变化，读者可能会问，我们是否真的能指望乌托邦的思想来拯救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我认为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只有某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才能得到广为传播，并为大众所接受。同时，关于性格的棘手问题以及性格再生产的倾向，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接受思想的方式。虽然要解决社会结构和性格结构的问题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我深信思想的力量必然会对人类历史作出贡献。例如，尽管马克思否定思想的重要性，摒弃了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在历史上，他本人就是思想力量的不可辩驳的例证。我们都知道，他并没有告诉工人阶级只需抓住时机，及时行动就可以获得解放。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鼓动家，他努力为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创造一种思想与制度的氛围。

我认为，今天我们有必要有意识地用马克思所摒弃的乌托邦的思想来理解环境。我不赞同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类被动和机械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假设，然而由于我们处于一个觉醒的时代，所以，我们是想把乌托邦变成合理的目的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相对来说，集中精力解决社会罪恶更容易见效。我们知道，穷人一无所有，而富人竭力抑制穷人进入上流社会的愿望。实际上，穷人和富人都避免追求同侪群体欲求水平之外的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政治上的内幕消息预测专家很少涉及他个人常识之外的事物。

就政治运动而言,由局内人以及建设性的批评家所制定的,在他们看来是切实可行的目标,其实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维持现状成为人们最谨慎的希望。许多律师、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最小的变化就是最好的。然而,今天,这一要求必然令人失望,因为安于现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

也许有一天,这些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美国人会觉悟到他们的过分顺承。他们也许会发现许多社会行为规范和仪式不过是社会的某种反映,而并非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些规范虽然有些虚伪,但还是能给相信它的人带来一些“间接利益”。由于性格结构比社会结构更难改变,所以这些觉悟和发现还是很难实现。我们知道许多先哲已经指出绝对的自由在其出发点上已经是错误的,但他们的同代人却不愿正视其他可行的选择。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至少会启发某些人的思想。

城市规划师也偶尔会提出这一问题。城市规划师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职业群体,他们对当代流行文化不恰当的界定感到十分厌烦,因为这一界定麻醉了城市中富人和穷人对于城市生活的不适感。由于他们胸怀大志、富于想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成为自由进步的政治传统的守护人。这一政治传统逐渐扩散到美国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从这些城市规划师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建筑物表现生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狭隘的工作领域。他们认为,城市规划不仅仅要考虑工作方便,还必须注重闲暇和舒适。但到目前为止,地方否决群体势力依然在扼制城市规划师的想像力,来显示他们和城市交通工程师一样顽固和实际。

然而,我认为,当代美国人对待闲暇生活的态度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多变得多。同样,那些乌托邦政治思想的根源也不是显露于外,而是隐藏的、诡秘的甚至是伪装的。近年来,由于传媒报道和最有权威的公共生活部门充满了危机情

绪,人们对于政治的好奇与兴趣已被排斥到政治圈以外,所以人们只能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孕育新的批判与创作的标准。如果在这些人开始接受政治教育之前,没有受到官方教条的钳制,他们就有可能接受各种思想,广泛阅读各类书籍,甚至将包括邻居的思想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流行的生活方式都尽收眼底。

如果他人导向者能发现以下三个事实:①自己从事的不必要的工作实在太多;②自己的思想与生活和别人的一样有趣;③自己与同伴厮混在一起打发寂寞,就如同渴了喝海水一样无济于事。那么,他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抱负。

这种可能性听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但不可否认已有许多变化并没有被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美国记者所捕捉到。当然,我们还没有恰当的指标和充足的数据来显示我们急于表现的诸如性格、政治体制、闲暇风格等无形事物。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充满神奇的地方,美国人擅长用幽默和讽刺掩饰自己兴趣的伎俩,丝毫不比中国人逊色。正是因为这样,我和合作者的结论难免有偏差,我们的性格、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的幻想,自然会限制了我们的观点。

尽管,本书的许多论断尚待进一步论证。但有一点不容质疑:今天,人们已经开始重视自然界巨大的资源和人类区分各自经验的能力。所以人们不会因为受到诱惑或者被强迫去顺承,也不会因为不顺承而成为离异分子。“人天生是自由与平等的”这一命题既真又假,因为人与人生下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彼此效仿,他们就因此失去了自由与自律。

索引

- Adams, Brooks 亚当, 布鲁克斯 183n., 207
- Adjustment 顺承能力 71, 240
~ defined 顺承的界定 242~243
~ of inner-directed 内在导向的顺承行为 250
~ and anomic 顺承和离异 244
~ of other-directed 外在导向的顺承行为 259~260
~ through work 工作中的顺承行为 264~265
- Advertising 广告 80, 97~99, 228~229, 273, 301~302
- Alger, Horatio 阿伽, 霍拉修 92, 149
- Alorese culture 阿洛尔文化 241
- American Magazine* 《美国人》杂志
- Anderson, Sherwood 安德森, S. 121
- Anomic type 自主型 240, 243~246, 257, 274~275
- Antagonistic cooperation 有敌意的合作 81~83, 101, 137, 139, 152, 213~214, 232, 234, 264
- Anxiety
of other-directed 他人导向者的忧虑 25, 27, 47~48, 51, 64, 136, 148, 150, 177, 258, 260, 273, 280, 285

- Apathy 冷漠 124~125, 244
 ~ and sex 冷漠与性 145
 political ~ 政治冷漠 27, 34, 165~171, 191, 193, 197~198, 265
 ~ of primitive societies 原始社会的冷漠 240
- Asch, Solomon E. 阿希, 所罗门 E. 155n
- Athenian empire 雅典城邦 25~27
- Audience
 ~ in tradition-directed society 传统导向社会的听众 86~87
 ~ in inner-directed society 内在导向社会的听众 89~91
 ~ in other-directed society 他人导向社会的听众 150, 188, 190, 193~195, 197, 298
- Augustine, St. 奥古斯丁, 圣 124
- Automatization 自主化 269~274
- Autonomy 自主性 239, 241~242, 257~258
 ~ and curve of population 自主性与人口曲线 246~248
 ~ and choice of occupation 自主性与职业选择 248
 ~ in tradition-directed society 传统导向社会的自主性 240, 246~247
 ~ in inner-directed society 内在导向社会的自主性 248~255
 ~ in other-directed society 他人导向社会的自主性 108, 255~260
 ~ in work 工作中的自主性 261~275
 ~ in play 娱乐中的自主性 276~303
- Avery, Sewell 埃佛利, 塞维 216, 219
- Avocational counselors 娱乐顾问 299~301
- Bagehot, Walter 巴格赫特, 沃特 78n.
- Beauvoir, Simone de 布威尔, S. 255, 261

- Becker, Howard C. 贝克, 霍华德 C. 61n., 194n.
- Bellamy, Edward 贝拉米, 爱德华 120, 249, 273~274
- Benedict, Ruth 本尼迪克特, 露丝 4, 225~226, 230, 231, 232, 234, 241
- Berle, A. A., Jr. 柏尔 A. A., Jr. 114
- Bernard, Claude 贝纳德, C. 252~253
- Bible 《圣经》90, 96, 180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80
- Blumer, Herbert 布卢默, H. 150n
- Bohemianism 波希米亚 257~258
- Breckenridge, M. E. 布兰克里奇, M. E. 105
- Burnham, James 伯恩海姆, J. 20, 225
- Businessman
 ~ and craft skill 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129~131
 ~ inner-directed and other-directed 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商人 130
 ~131, 134~135
 ~ and price leadership 商人和价格领导者 131~132
- Butler, Samuel 巴特勒, S. 49, 50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221~222
- Carnegie, Dale 卡耐基, D. 149~150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14, 212, 217
- CCC camps 民防团 226, 274
-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89~91, 104
- Character
 social function of ~ 性格的社会功能 5~6
 ~ and social change 性格与社会流动 3, 28~29
 ~ and curve of population growth 性格与人口增长曲线 8, 31~33
 ideal types 理想类型 9

- tradition-directed ~ 传统导向型性格 11~13, 16
- inner-directed ~ 内在导向型性格 13~17
- other-directed ~ 他人导向型性格 17~24
- the three types compared 三种性格类型的比较 24~26
- autonomous ~ 自主性性格 240~241, 243, 246, 249~260
- agents of formation 性格形成的因素 37~38
- Characterological struggle 性格的冲突 31~35, 260
- Chesterfield, Lord 切斯特菲尔德, L. 66, 91
- Chicago Sun-Times* 《芝加哥太阳时报》265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193, 215, 265
- Child market 儿童市场 96~99, 301~303
- Children
~ character formater 儿童性格的塑造 5, 21, 37~38
~ in tradition-directed society 传统导向社会的儿童 38~40, 42, 51, 85~86
~ in inner-directed society 内在导向社会的儿童 40~45, 87~95
~ in other-directed society 他人导向社会的儿童 45, 47~57, 60~65, 70~72, 96~108, 288
-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 温斯顿 210, 211
- City planners 城市规划师 185, 278, 306
- Civil War (U. S.) 美国南北战争 173, 179, 207
- Clark, Colin 克拉克, 考林 9, 20
- Class
upper middle class and other-direction 上中产阶级和他人导向 14~16, 51
“old” and “new” mid-

- dle class 新旧中产阶级
16.47~48
~ relation to character
structure 阶层与性格
结构的关系 37,55
~ in tradition-directed
society 传统导向社会
中的阶级 38~40
~ and the peer-group
阶级与同侪群体 47,70
~ effects upon litera-
ture 阶级对文化的影响
91~92
~ and consumption 阶
级与消费行为 117~
119, 141~142, 144~
145,157
~ and popular culture
阶级与大众文化 153
~ and politics 阶级与
政治 163,177,184,206
~208,213
~ and work 阶级与工
作 262~263
~ and envy 阶级与妒
嫉 268
- Comics 连环画 93, 98~
105, 155 (参见大众传
媒)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182,248
- Competition
~ among inner-direct-
ed 内在导向的竞争 81,
113~115
~ among other-direct-
ed 外在导向的竞争 46,
81~83,139~140
in veto groups 否决群
体的竞争 213~214
- Conformity 遵从 77,139~
140, 150, 181, 241~
243,257~258
- Consumer trainee 准消费
者 74~75, 96~98,
104,149
- Consumption, conspicuous
消费行为 117~118,
226~227,230
-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 消费模
式 19,73
inner-directed ~ 内在导
向的消费行为 116~123
other-directed ~ 他人
导向的消费行为 150,

- 189~191, 227, 290
- Cookbooks 食谱 142, 144
~145, 147
- Craftsmanship 手工技艺
129~131, 138, 290, 292
~295, 297, 299
- Crampton, Gertrude 科兰
普顿, G. 105
- Cultural pluralism 多元文
化 283, 284
- Cynicism 玩世不恭 174,
195~196
- Defoe, Daniel 笛福, D. 92~
93, 102
- De Man, Henri 德曼, H.
270
- Depression 萧条 138, 288
- Deviants 偏离 11, 241~
242, 244, 249~251(参
见自主型)
- Dewey, Thomas E. 杜威,
托马斯, E. 191
- Distribution system 流通
体系 137, 143, 272~
274, 287(参见消费行
为)
- Divorce 离婚 281
- Dobuan culture 多布文化
226~227, 230~231,
241, 278
- Dress 礼服 157
- Drucker, Peter 德鲁克, 彼
得 20, 218
- Durkheim, Emile 迪尔凯
姆, E. 125, 242
- Dwellings 居住环境 39,
43, 48, 53, 296
- Education
progressive ~ 教育的
进步 60~65
- Dalton plan 道尔顿教
育制度 63
-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 D. D. 191,
195
- Enforced privatization 强
制性剥夺 264, 266~
267, 271, 276~285, 304
- Entertainers 杂耍艺人 76
~78, 97~98, 286, 289,
291~292
- Erikson, Erik H. 埃里克
森, E. H. 5, 33, 178
- Ethnic groups, privatization of

- 种族剥夺 283~284
- Etiquette 礼仪 11, 73~76, 91~92
- Factory worker 工厂工人 267~268, 270~271
- Fair trade 公平贸易 131~132, 135
- Fairy tales 神话故事 100, 101, 107 (参见神话传说)
- False personalization 错误人格化 261~264, 269~275, 277, 304
- Family 家庭 38~40, 45, 66, 86, 96, 254, 281 (参见父母)
-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论》173
- Fielding, Henry 费尔丁, 亨利 3
- Fiske, Marjorie 弗斯克, M. 83n.
- Folk dancer 土著舞爱好者 295
- Food 饮食 142~145, 284
- Forster, E. M. 福斯特, E. M. 121
- Fortune* 《财富》杂志 47, 134, 218
- Fountainhead, The* 《寻根者》156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92
- Freidson, Eliot 弗莱德森, 埃利特 100n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S. 13, 30n., 44, 46, 50n., 253n., 269n
- Fromm, Erich 弗洛姆, E. 4, 5, 19n., 22n., 114n., 251, 255, 263n
- Funt, Allen 冯特, A. 121
- Galileo 伽利略 250
- Gans, Herbert J. 甘兹, H. J. 190n
- Gesell, Arnold 格赛尔, A. 61
- Glamor 魅力 191~192, 202, 208~210, 266~269, 301
- Goals
 choice of ~ 目标的选择 5~5, 40~44, 48
 tradition-directed ~ 传

- 统导向的目标 12, 18
 inner-directed ~ 内在导向的目标 15 ~ 16, 18, 40, 73, 76, 79, 91, 93, 101, 115, 124 ~ 125, 175, 250
 changes in ~ 目标的变化 89 ~ 90, 91 ~ 93, 150 ~ in literature 文化目标 93 ~ 95, 149 ~ 150
 other-directed ~ 他人导向的目标 79, 128, 137 ~ 138, 155, 231, 288, 294;
 ~ of other-directed businessman 他人导向商人的目标 132 ~ 133
- Goldsen, Joseph M. 高德森, J. M. 218
- Goodman, Percival and Paul 古德曼, 波希瓦尔和帕尔 270
- Grandmothers 祖母 56 ~ 57, 70
- Granger Movement 保护农业社运动 172, 207
- Green, Arnold 格林, A. 19
- Greenson, Ralph 格林森, R. 244
- Griswold, A. Whitney 格里斯沃德, A. W. 149
- Guilt 内疚感 24, 25, 274, 279 ~ 280, 288
- Hearst, W. R. 赫斯特, W. R. 192 ~ 143, 197
- Heroes 英雄 73, 99 ~ 104, 120, 250
- Hobbies 业余嗜好 68 ~ 69, 142, 292 ~ 296
- Holmes, Justice Oliver Wendell, Jr. 霍姆斯, J. O. W. Jr. 227n.
- Hoslett, S. D. 霍宁曼, S. D. 218n.
- Hot rodders 汽车装卸迷 293 ~ 294, 299
- Howe, Helen 何薇, 海伦 154
- Hughes, Everett 休斯, E. 130n., 139
- Huizinga, A., 慧增嘉 16
- Huxley, Aldous 赫胥黎, A. 29

Immigrants 移民 32~34,
127,166,283~284

Indians, American 美国印
第安人 5,33,95,225~
228(参见科哇魁特人;
佩布罗人)

Indispensables 必不可少
的成员 269~270

Individuality

~ in tradition-directed
societies 传统导向社会
的个体 11~12,15~16,
17,40

~ in inner-directed 内
在导向的个性 16,17,
79,81~82

~ and progressive ed-
ucation 个性与教育的
进步 60

~ and consumption
个性与消费 79~82

~ and the press 个性
与压力 88,96

~ and other-directed
character 个性与他人
导向性格 107~108,
137,241

Industrial Relations 工业

社会 65,111,127~
128,133~134

Industrialization

~ and war 工业化与战
争 14,18,35~36

~ and child labor 工业
化与童工 17

~ in phase of incipient
decline 初期人口减少
阶段的工业化 17~20,
48,74~75,85

~ and other-directed
工业化与他人导向 18

~ and frontier econo-
my 工业化与边疆经济
26

~ and literacy 工业化
与文化 87~88,92~93

~ and inner-directed
工业化与内在导向 112
~114,117~118

~ and government
planning 工业化与政府
计划 113

~ and changing char-
acter structure 工业化
与性格结构的转变 247
~248

Inner-directed character 内在导向性格 8
 ~ defined 内在导向性格的界定 14~15
 ~ and tradition 内在导向性格与传统 15~16
 ~ and role of parent 内在导向性格与父母角色 40~44, 45, 48
 goals of ~ 内在导向性格的目标 45, 115~116, 138~139
 ~ and other-directed 内在导向性格与他人导向 45, 159~160
 ~ and role of teacher 内在导向性格与教师角色 58~60
 ~ peer-group 内在导向性格与同侪群体 66~70
 ~ and competition 内在导向性格与竞争 81~82
 ~ and literacy 内在导向性格与文化 87~94
 ~ and work 内在导向性格与工作 11~16
 ~ in Russia and India

俄罗斯和印度的内在导向性格 114~115
 ~ and self-approval 内在导向性格与自我赞同 123~125
 ~ and tradition-directed, 内在导向性格与传统导向 124~125
 ~ and apathy 内在导向性格与冷漠 124~125
 ~ and sex 内在导向性格与性 145~146
 leisure of ~ 内在导向性格的休闲娱乐 156~158
 ~ in politics 政治生活中的内在导向性格 172~180
 ~ and autonomy 内在导向性格与自主性 249~255, 260
 hobbies of ~ 内在导向性格的业余嗜好 292~293, 294
 Ives, Charles 爱维斯, 查尔斯 274

- Jahoda, Marie 伽哈达, M. 296
- James, Henry 詹姆士, 亨利 121, 228, 276
-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114n.
- Jazz 爵士乐 78, 108, 285, 294, 299
- Jews 犹太人 156, 212, 214, 222, 283~285
- Joyce, James 乔伊斯, J. 223
- Key, V. O. 凯, V. O. 221
-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约翰 119
- Kinsley, Charles 金赛, 查尔斯 249
- Knupfer, Genevieve 科纳夫, G. 166n.
- Kriesberg, Louis 克里斯伯格, 路易斯 194n.
- Kwakiutl Indians 科哇魁特族印第安人 226~228, 231~235, 240, 258
- Labor unions 工会 112, 173~174, 214, 216, 218~219
- Ladies Home Journal* 《妇女家庭杂志》76, 151, 153
- Lassalle, Ferdinand 勒斯, 菲迪拉德 253n.
- Lasswell, Harold D. 拉斯威, H. D. 164n.
- Lazarsfeld, Paul 拉扎斯菲尔德, P. 78n., 135, 198n.
- Leisure 休闲娱乐 18, 20, 46n., 54, 89, 110~111, 116, 119~123, 136, 149~150, 155, 158, 160, 276, 279, 280, 282, 284~285, 286~297, 299~301, 306~307
- Leites, Nathan 雷提斯, N. 144, 164n., 244n
- Lewin, Kurt 列文, 科特 30
- Life* 《生活》杂志 55n., 62, 81, 199, 298
- Literacy 文化 87~91, 95~96
- Literature
~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文学作品与资本

- 主义的兴起 92~93
 ~ and inner-directed character formation 文学作品与内在导向性格的塑造 91, 149
 heroism in ~ 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 99~101
 ~ and other-directed character formation 文学作品与他人导向性格的塑造 106~107, 149~151, 155~156
 Loeb, Martin B., 罗布, 马丁, B. 148
 Loneliness 寂寞 69~70, 155, 158, 287, 307
 Low, Lillian 楼, 利连 218
 Lowenthal, Leo 劳温特尔, L. 209n.
 Lundberg, George 伦德堡, G. 292
 Lynd, Helen Merrill 林德, 海伦 M. 70
 Lynd, Robert S., 林德, 罗伯特 70, 230
 Lynes, Russell 莱因斯, R. 145
 MacMurray, Fred 麦克默里, F. 144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 托马斯 10, 36
 Manipulation 操纵 51~52, 53, 63, 129~31, 149~150, 240
 Mann, Thomas 曼, 托马斯 113
 Marginal differentiation 边际差异 46~47, 69, 78, 81, 102, 139, 142~143, 239
 Market research 市场调研 97~99, 133~134, 198, 302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12, 249, 255, 286, 305
 Mass media
 ~ in period of incipient decline 初期人口减少时期的大众传媒 20~22
 ~ and children 大众传媒与儿童 50~51, 55
 ~ and peer-group 大众传媒与同侪群体 21~

- 22.80.82
 ~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s 大众传媒与现代通讯 84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228, 229.297
- Mayo, Elton 马伊, E. 270
- McCarthy, Mary 麦卡锡, M. 228n.
- Mckinley, William 麦肯莱, 威廉 207~208, 210
- McWilliams, Carey 麦克威廉, C. 221
- Mead, G. H. 米德, G. H. 246
- Mead, Margaret 米德, 玛格丽特 4, 41n., 49n., 280~281
- Means, Gardner C. 米恩斯, G. C. 114
- Merton, Robert K., 默顿, 罗伯特 K. 78n., 185n., 194n., 198n., 242n., 296
- Martin and Margy Meyer-son 梅尔森与马丁 169
- Middle Ages 中世纪 6, 7, 12~13, 16, 92~93, 165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J. S. 43, 211~212, 239, 255~256, 258
- Mills, C. Wright 米尔斯, C. W. 19, 78n., 225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垄断竞争 46, 97, 132~133, 213~214
- Mood engineering 情感操纵技巧 266, 275
- Morale 道德 65, 128, 136, 267~268
- Movies 电影 97, 200
 ~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电影与显性消费 117
 realism of ~ 电影的现实主义 102~103
 ~ and consumer orientation 电影消费取向 150
 heroes of ~ 电影中的英雄人物 100, 102~103, 155~156
 ~ and moralizing 电影与道德 198~199
 ~ and politics 电影与政治 212~213

- ~ and play 电影与娱乐
 ~ and taste 电影与品味
- Murphy, Gardner 墨菲, G. 16n.
- Music 音乐 76~78, 108, 120, 153~154, 194 (参见爵士乐)
- Myth 神话传说 62, 85~87, 92~93, 99~101
- Negro Worker, The* 《黑人工人》94
- Negroes 黑人 32, 34, 50, 68, 109, 140, 197, 272
 ~ and politics 黑人与政治 166~167
 white tolerance of ~ 白人对黑人的容忍 259, 279~280
- Neotraditionalists 新传统主义者 278, 280
-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时报》193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纽约先锋论坛报》188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91, 150
- New Yorker, The* 《纽约人》杂志 22
- Newsweek* 《新闻周刊》46
- Notestein, Frank W. 诺斯坦, 弗兰克 8n., 14
-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 98
- Other-directed character 他人导向性格 8
- Parents 父母 5~6, 37, 38~57, 71, 138 (参见性格; 家庭)
- Peabody, Rev. Endicott 皮伯第, R. E. 123
- Peer-group 同侪群体 21, 37, 47~48
- Personality 人格 3~4, 29, 46, 155n., 194 (参见他人导向型性格)
- Play 娱乐 62
- Polanyi, Karl 波兰尼, 卡尔 113n
- Politics 政治 163
-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79, 97, 149~151, 153, 158, 188~189, 193~195, 199, 285, 299,

- 303n.
- Population 人口 7~9
- Power 权力 165
- Privacy 隐退 43~44
- Property 财产 114, 133~134, 141
- Pueblo Indians 佩布罗印第安人 225~227, 231~233
- Puritan 清教徒 14~15, 17, 40~41, 43, 79, 92~93, 114, 120, 124, 157, 284n, 287
- Radio 收音机 97, 103, 142
(参见大众传媒)
- Rand, Ayn 兰德, A. 156
- Ranulf, Svend 罗乃夫, S. 27, 179n.
- Realism 现实主义
~ in play 娱乐中的现实主义 62
~ in comics 连环画中的现实主义 102
~ in children's stories 儿童故事中的现实主义 104~106;
~ in politics 政治中的现实主义 185
- Rebels 反叛 58~59, 60, 86~87, 98, 122, 241~242
- Reformation, the 改革 6, 14~15, 43, 145
- Religion 宗教信仰 120, 180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6, 13~15, 40, 145
- Riseman, Evelyn T. 里斯曼, E. T. 85n.
- Ritual 仪式 233, 235, 287, 306
-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 富兰克林 D. 191, 210, 212
- 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 163, 206~207, 217~218, 225
- Russia 俄罗斯 17, 114, 183, 187, 222, 250~251
- Sachs, Hans 沙赫, 汉斯 269n.
- Samish, Artie 萨密斯, A. 221~222
- Santayana, George 桑塔亚娜, 乔治 3
- Sartre, Jean Paul 萨特, J.

- P. 250, 255
- Schachtel, Ernest 沙赫特尔, E. 85n.
-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美国人》201
- Service Trades 服务业 20, 127, 133 ~ 134, 271 ~ 272
- Sex 性 39, 50n., 68, 76n., 106
- Simmel, Georg 齐美尔, G. 126, 135
- Sincerity 忠诚 189, 193 ~ 197
- Slocombe, Lorna 斯洛孔波, L. 151
- Smiles, Samuel 斯麦尔, S. 92, 149
-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39 ~ 40, 42 ~ 43, 45, 60, 122 ~ 123, 127, 138, 149, 229, 283 ~ 284
- Spectator, The* 《观察家》杂志 22
- Status 阶层 13, 134, 145, 148, 190, 198 ~ 200, 228
- Sullivan, Harry Stack 沙利文, 哈瑞 30n.
- Superego 超我 30n., 41, 244
- Superman 超人 83, 98, 99, 103
- Taste exchanging 好尚品味的交换 289, 298 ~ 299
- Taste socialization 好尚品味的社会化 63, 71 ~ 72, 73 ~ 76, 97 ~ 98
- Tawney, R. H., 托尼, R. H. 45, 113
- Teachers 教师 37, 57 ~ 65
- Television 电视 (参见大众传媒)
- Temper 情绪脾气 72, 151, 232, 234
- Temple, Willard 坦伯尔, W. 151
- Thomas, W. I. 托马斯, W. I. 30, 66, 88
- Thoreau, Herry David 梭罗, H. D. 274
-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 46, 197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A. 19, 23, 112, 141, 163, 202, 206, 219,

- 225, 235, 304
- Tolerance 容忍 64, 73, 152, 232, 234
-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 L. 22, 183, 296
- Tootle the Engine* 《引擎突突》105~107, 119
- Tradition directed character 传统导向性格 8
- Trilling, Lionel 屈林, L. 19, 93n., 296
-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 H. S. 191, 202
- Twain, Mark 吐温, 马克 97n., 230, 27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9~20, 93, 179~180
- Veblen, Thorstein 韦伯兰, T. 47, 118, 153, 208~209, 226, 249
- Velic, Lester 威尔利 L. 221n.
- Veto groups 否决群体 163, 192
- Villains 反派人物 99~100, 103
- Vincent, E. L. 文森特 E. L. 105n.
- War 战争 14, 18, 35, 138, 167, 176, 179, 185, 263, 296
- Warner, W. Lloyd. 沃纳, 劳伊德 145, 148
- Warshow, Robert 华修, 罗伯特 155
- Washington, Booker T. 华盛顿, B. T. 94
-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94
- We Happy Few* 《幸福者寥寥》154~55
-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8, 45, 92, 124, 243
- West, Patricia Salter 威斯特, P. S. 296a
- White, Antonia 怀特, 安东尼 58
- White, William Allen 怀特, 威廉 A. 130
- White-collar worker 白领人士 20, 264~266, 269, 271
- Williams, Dr. William Car-

- los 威廉姆斯, Dr. W.
C. 274
-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W. 172, 210~211
- Wittfogel, Karl 威特弗格尔, 卡尔 25n.
- Wolfe, Katherine M., 沃尔夫, K. M. 83n.
- Wolfenstein, Martha 沃芬斯坦, M. 144
- Young, G. M. 杨, G. M. 118n.
- Znaniecki, Florian 赞尼基, F. 88
- Zuni 祖尼人(参见佩布罗人)

译者后记

《孤独的人群》一书自出版以来,理斯曼的社会性格理论便被广泛借用和引用,尤其是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概念已成为西方思想界耳熟能详的术语。

《孤独的人群》虽然阐述的是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变化发展情况,但距离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并不遥远。作为译者,我们希望能打开一扇让我们的读者了解西方人的各种心理动态和人际关系特点的窗户;让我们的读者呼吸一些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诙谐文风的清新学术空气。

全书共三编,其中序言及第一编由王崑翻译,第二、三编由朱虹翻译。这是我们师姐妹的首次合作,同时也是一次愉快而令人兴奋的合作。

尤需一提的是,在本译著中融汇了众多人的期待与努力。我们由衷地感谢为这部译作最终顺利编译完成,给予我们诸多帮助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承蒙我们的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的引荐和支持,才使我们有了编译本书的机会和资格;本书的责任编辑徐滨老师在编审过程中提出了诸多修改建议,使译稿的质量大有提高;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才使本书得以出版。在此,谨表诚挚的感谢。

另外,从对本书的初步接触到最终出版,我们希望一切都

能尽善尽美,可事实与愿望之间总会存在距离,书成之后,难免有漏误之处,还请诸君不吝赐教。

王 崑 朱 虹
于南京大学陶园
2001年冬

